

版權信息

Personal Impressions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Isaiah Berlin 1949, 1951, 1955

© Isaiah Berlin 1958, 1964, 1965, 1966, 1971, 1972, 1973, 1975, 1976,

1979, 1980, 1986, 1987, 1989, 1993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1980, 1998

Introduction © Noel Annan 1980,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11—201號

書  名　個人印象

作  者　【英】伯林（Berlin，I.）

編  者　【英】亨利·哈代

譯  者　林振義　王　潔

責任編輯　許　昆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43860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http://weibo.com/yilinpress?from=feed&loc=nickname)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http://weibo.com/1261360957/profile?topnav=1&wvr=6)

目录

[第一版自序 22](#_Toc68682382)

[編者序 24](#_Toc68682383)

[附言 26](#_Toc68682384)

[序言 27](#_Toc68682385)

[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 39](#_Toc68682386)

[一 39](#_Toc68682387)

[二 41](#_Toc68682388)

[三 42](#_Toc68682389)

[四 44](#_Toc68682390)

[五 47](#_Toc68682391)

[六 49](#_Toc68682392)

[七 50](#_Toc68682393)

[八 52](#_Toc68682394)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 54](#_Toc68682395)

[哈伊姆·魏茨曼 60](#_Toc68682396)

[一 60](#_Toc68682397)

[二 66](#_Toc68682398)

[愛因斯坦和以色列 80](#_Toc68682399)

[伊扎克·薩德赫 88](#_Toc68682400)

[劉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 97](#_Toc68682401)

[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牛津 110](#_Toc68682402)

[理查德·佩爾斯 115](#_Toc68682403)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靈學院 118](#_Toc68682404)

[約翰·蘭肖·奧斯汀和牛津哲學的早期起源 121](#_Toc68682405)

[約翰·佩特羅夫·普拉門納茲 131](#_Toc68682406)

[莫里斯·鮑拉 136](#_Toc68682407)

[戴維·塞西爾 140](#_Toc68682408)

[回憶弗吉尼亞·伍爾夫 145](#_Toc68682409)

[埃德蒙·威爾遜在牛津 149](#_Toc68682410)

[奧伯倫·赫伯特 156](#_Toc68682411)

[奧爾德斯·赫胥黎 160](#_Toc68682412)

[1945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 162](#_Toc68682413)

[一 162](#_Toc68682414)

[二 162](#_Toc68682415)

[三 162](#_Toc68682416)

[附錄 162](#_Toc68682417)

[跋：我生命中的三條主線 162](#_Toc68682418)

[一 162](#_Toc68682419)

[二 162](#_Toc68682420)

[三 162](#_Toc68682421)



溫斯頓·丘吉爾在去唐寧街途中，1940年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哈伊姆·魏茨曼在1945年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前的草地上，1932年



伊扎克·薩德赫



劉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



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最高法院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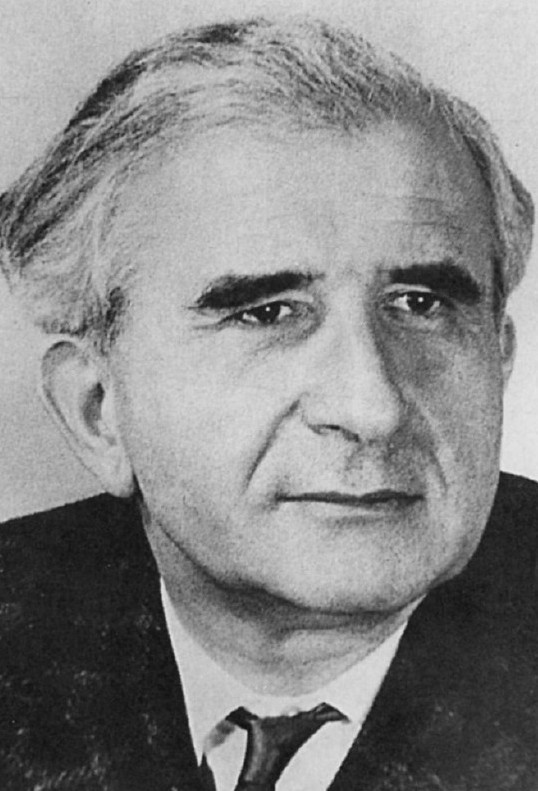
理查德·佩爾斯



休伯特·亨德森



約翰·蘭肖·奧斯汀在1952年



約翰·普拉門納茲



莫里斯·鮑拉在牛津，1950年



戴維·塞西爾爵士和伯林合影，牛津大津新學院回廊，1950年



弗吉尼亞·伍爾夫



埃德蒙·威爾遜，1953年前后



奧伯倫·赫伯特在薩默塞特郡皮克斯頓花園的家中



奧爾德斯·赫胥黎



安娜·阿赫瑪托娃和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在莫斯科一個公共朗讀會上，1946年

# 第一版自序

這本書收集的文章類似18世紀流行的所謂頌詞，即紀念逝去名人的演講詞。除了兩篇文章外，所有文章都是應邀而作。這兩篇例外即關于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劉易斯·納米爾的回憶，同樣，《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一文并非約稿，成文緣由是我相信自己有話要說，就我所知，這些話在其他地方還沒有說過。

這些頌詞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內容，主要取決于文章的主旨。因此，關于莫里斯·鮑拉和約翰·普拉門納茲的回憶是牛津追悼會上的悼詞；《哈伊姆·魏茨曼》一文也是在倫敦類似場合下的一個公共演講；對理查德·佩爾斯、休伯特·亨德森、約翰·蘭肖·奧斯汀、奧爾德斯·赫胥黎、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和奧伯倫·赫伯特的回憶，是受學術期刊或紀念文集的編輯邀請而作。《愛因斯坦和以色列》一文，是在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的研討會上宣讀的開場白，我的意圖是展現他對社會現實和真理重要性的敏銳感受。某些人把愛因斯坦當成一位圣潔內向、透過模糊的理想主義迷霧看待世界的思想家來尊崇，對這些人而言，這種敏銳感受令人失望。關于丘吉爾的文章最初是對他戰時回憶錄第二卷的評論，命筆之時正值他成為下院反對黨領袖，開始受到來自大西洋兩岸廣泛而激烈的抨擊，其中某些指責很有道理。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他在1940年拯救英國（實際上是拯救絕大部分人類）免受希特勒禍害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紀念，理應受到足夠重視。出于同樣想法，關于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我希望提醒讀者，對我們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仍很年輕的一代人而言，當時歐洲被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薩拉查和很多東歐及巴爾干半島的獨裁者所統治，政治天空著實黑暗無比，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政策沒有帶來一絲希望；很多人還沒有對建立一個社會和道德方面都算健康的世界的可能性感到絕望，對于那些人而言，在我們很多人看來，僅有的一絲希望之光來自羅斯福總統和他的新政。同樣，這篇文章主要寫于戰后隨即發生的爭論期間。

最后一篇是為本書所寫的新文，涉及1945年和1956年我的俄羅斯之行。我主要希望描述我所會晤并結識的兩位天才作家的觀點和性格，這是我過去從未發現的，甚至在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和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的回憶錄里（這是我們能見到的對一個恐怖時期作家和藝術家生活最詳細和最感人的描述）也沒有見過。我的文章（有一部分在牛津大學瓦德漢姆學院贊助的鮑拉講座上發表過），可看成是對她們的回憶錄的一點補充。

我希望表達對我的朋友諾爾·安南為這本合集作序的深切謝意。我想告訴他及讀者的是，我非常清楚，承擔作序這一任務不可避免地需要投入多少感性、良知、時間、艱苦勞動，需要有解決事實和友情、知識和道義上的得體之間沖突的能力。我想感謝他答應為本書作序的極大好意。最后，我想借此機會再次向本版文集的編輯表達深沉而日益增長的謝意。任何作者都難以遇到一位比他更好、更公正、一絲不茍、精力充沛的編輯。我想感謝亨利·哈代博士挖掘整理出這本時間跨度巨大的論文集，并且厘清了有時必定不是無足輕重的沖突——其中某些沖突是由作者的癖好造成的。

以賽亞·伯林

1980年6月

# 編者序

這本書是我搜集整理、準備重印的五卷伯林著作之一，其中大部分已發表的文章過去從未以合集形式[1](#_1_24)出現。他的很多作品以前都是分散的，通常散落于不明之處，大部分都已絕版，只有六篇文章被收集重印[2](#_2_24)。這五卷作品，加上包含在其中一卷（《反潮流》）上的全部作品的目錄[3](#_3_20)，以及此后我所出版的很多他以前未發表的著作[4](#_4_20)，使他的全部作品比過去更容易為人共享了。

本卷中的文章是對20世紀名人的頌詞或回憶錄。除了羅斯福和愛因斯坦外，作者與其他名人都有私交，還有一篇敘述了他1945年和1956年在莫斯科（1945年他在英國駐俄使館工作）和列寧格勒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安娜·阿赫瑪托娃及其他俄國作家的會晤。第一版所收文章最初出版細節如下。《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以及《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牛津》，僅有的兩篇主人公在世時發表的文章之一）第一次刊登在1949年《大西洋月刊》卷184第3期（標題“丘吉爾先生”）和《谷山雜志》第981期（標題“丘吉爾先生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64年倫敦的約翰·默里將此文重印成書，標題為“丘吉爾先生在1940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一文1955年登在《政治季刊》第26號上，并以“歐洲人眼中的羅斯福”為標題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卷196第1期上。《哈伊姆·魏茨曼》一文是赫伯特·塞繆爾講座第二講，1958年由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出版。《愛因斯坦和以色列》刊登在1979年11月8日的《紐約書評》雜志上，這是1979年3月14日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周年研討會開幕式演講的主要部分，演講全文收入杰拉爾德·霍爾頓和耶胡達·埃爾卡納（編）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歷史和文化視角》，耶路撒冷百年研討會（普林斯頓，1982：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劉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1966年收錄于馬丁·吉爾伯特（編）的《沖突的世紀》（倫敦：哈米什·漢密爾頓）和《遭遇》雜志卷17第5期（1966年11月）。《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牛津》是華萊士·門德爾森（編）的《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頌詞》（紐約，1964：雷納爾）的約稿。《理查德·佩爾斯》刊登在1958年的《巴利奧學院年報》上。《休伯特·亨德森在全靈學院》是《牛津經濟學文集》1953年為紀念亨德森而出版的第5期增刊中的一部分。《約翰·蘭肖·奧斯汀和牛津哲學的早期起源》是以賽亞·伯林勛爵等所著《論約翰·蘭肖·奧斯汀文集》（牛津，1973：克拉仁頓出版社）的約稿。《約翰·佩特羅夫·普拉門納茲》是1975年在牛津大學圣瑪麗教堂普拉門納茲追悼會上的演講，當年由全靈學院內部出版。《莫里斯·鮑拉》一文是1971年在圣瑪麗教堂鮑拉追悼會上的演講，當年由瓦德漢姆學院內部出版。《奧伯倫·赫伯特》是約翰·喬利夫（編）的《奧伯倫·赫伯特：拼湊肖像》（提斯波利，1976：坎普頓·羅素）的書稿。《奧德爾斯·赫胥黎》是朱利安·赫胥黎（編）的《奧爾德斯·赫胥黎》（倫敦，1965：查托和文達斯）的書稿。《1945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一文是1980年5月13日鮑拉講座的刪節版，于本書最初發表——正如作者所言，此文是專門為本書所寫的。

本次第二版增加了1980年后發表的四篇文章。《伊扎克·薩德赫》最初發表在《中流》雜志卷39第4期（1993年5月），這是我應作者要求，將他關于薩德赫的兩篇短文編撰而成的：一篇先前未發表，另一篇《論伊扎克·薩德赫》（以色列電臺英語頻道的一個簡短演講廣播），1986年9月5日以希伯來語譯文發表在《迪法拉報》（Davar）上。《埃德蒙·威爾遜在牛津》刊登在《耶魯評論》卷76（1987年）。《回憶弗吉尼亞·伍爾夫》發表在《一百名作家》（1989年）一書中，標題是“作家們回憶：弗吉尼亞·伍爾夫”。《戴維·塞西爾》發表在《1985-1986年與1986-1987年年報》和《1987年委員和會員名單》（倫敦，1987年：皇家文學學會）上。

除了一些必要的訂正并增加幾條文獻外，這里重印的文集實際上保留了最初的形式。在這個新版本中，我又進一步做了基礎訂正，增加了一些文獻。

有幾篇性質相同的文章未予收錄，大部分比本書中的文章短，或者內容上與本書有重復。主要的人物有哈伊姆·魏茨曼、邁耶·維斯戈爾、米歇爾·蒂皮特、倫道夫·丘吉爾、雅克·赫佐格、阿瑟·萊寧、雅各布·塔爾蒙、特迪·科萊克、以賽亞胡·萊博維茨、納胡姆·戈德曼、馬丁·庫珀、戴維·本——古里安、亞當·范·特羅特、約翰·普拉門納茲、耶胡迪·梅紐因、亞歷山大和沙羅美·哈爾佩恩和H.L.A.哈特。全部細節可參見前面提到的書目[5](#_5_18)。

對十七年前我準備第一版時得到的幫助，我仍然感激。另外，以賽亞·伯林一如既往地耐心回答我的詢問；他的秘書帕特·烏特欽給了我不可或缺的幫助。弗吉尼亞·盧埃林·史密斯對《1945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一文給予幫助。我也要感謝茲維·德羅爾、[6](#_6_18)利·聶爾和約拉姆·薩德赫在我寫作《伊扎克·薩德赫》時給予的幫助，以及海倫·麥科迪、羅伊納·斯凱爾頓——華萊士和威爾·蘇爾肯對第二版的幫助。

亨利·哈代

于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

1997年7月

## 附言

以賽亞·伯林于1997年11月5日去世。本版《個人印象》那時已出付印樣，但沒有印刷。本書正文沒有改動，我只是利用這個機會，在書后加了一篇跋。1979年5月，伯林因對自由觀念的貢獻，在耶路撒冷被授予耶路撒冷獎。這篇跋是獲獎感言的精簡版，感人而見解敏銳，此前曾發表于《猶太季刊》總第27期（1979年夏/秋季號），以及《保守猶太主義》總第33期（1979年冬季號）。我和我詢問過的人似乎一直都認為，這篇感言是這本書的一部分，因為它實際上是一篇自傳性的個人印象。我不止一次建議伯林，應該在這個天然的情境中重現它，但伯林總是給出他那富有個性的答復，說生前將這篇感言收入文集似乎太個人了，也許也太自我了；但等他過世，我就可以按照我認為最好的方式處置它。令我深感難過的是，現在我能自由地在書后加上這篇跋了。

亨利·哈代

1997年11月

# 序言

在今天的英國，頌詞[7](#_7_18)作為一種文體已不是很受歡迎，僅僅用于追思儀式上稱贊逝者的美德。現在更常用的是傳略和訪談，其目的不是稱頌贊揚，而是批評打擊。比弗布魯克欣賞這種潮流，稱之為“槍打出頭鳥”[8](#_8_18)。新聞記者像斗牛一樣，刺探并瞅準別人的弱點，插上短劍[9](#_9_16)，將可憐的公牛引向自我暴露的厄運。專業采訪者陶醉于這種特殊技能。他們一致認為，這對受訪者有積極作用：他可能不那么讓人肅然起敬，但至少真實可信。

知識分子鄙視新聞記者，但他們采取的招數與新聞記者如出一轍。社會科學家們對大量的人類經驗實踐進行了歸納[10](#_10_14)處理，結果，歷史就像是一個牧場，畜群被非人的客觀力量所驅使——它們也不知何故——大聲反芻著在牧場上走過。批評家們像暗礁中的螃蟹，快速躲進后現代主義的巖穴里，不去考慮人們現實中是如何說話寫作的；或者把一位在世的藝術家替換成其作品里一個虛構人物。難怪大眾會購買傳記。然而，又有多少兩卷本的大部頭傳記只是枯燥無趣的文獻堆砌，讓人覺得如鯁在喉？那些敢于用美德和罪惡的原色來刻畫人物的傳記作家，似乎常常囿于聲調嚴厲的小說家之父亨利·格林多年前提出的“不說死者壞話”[11](#_11_14)的準則。而那些保持沉默的傳記作家則表示，他們這么做是為了避免因涉嫌誹謗而自找麻煩。

以賽亞·伯林無視當前這種種潮流。他的思想理論往往涉及全人類，他自己的生活經歷與人類休戚相關。伯林為激發自己興趣的人物所寫的文章，都是贊美的杰作。他像西拉之子耶穌[12](#_12_12)一樣希冀我們謳歌名人。但吸引伯林的，不是名人的聲望，而是他們的天賦。崇拜英雄并不使他感到羞愧。他絲毫無意像上帝那樣，將英雄逝去和麻雀墜亡相提并論。英雄們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世界因為他們而進步，變得更加友善，威脅也有所減少。了解一位偉人，目的是改變人們關于人類能做什么、可以成為什么的想法。伯林發現，視雪萊為凡人，以及與帕斯捷爾納克或斯特拉文斯基、弗吉尼亞·伍爾夫或畢加索、羅素或愛因斯坦等人交往，使他興致勃勃。但他關注的并不局限于天才們。有時，那些想法褊狹、行為古怪、冒犯好人[13](#_13_12)的家伙，也會吸引伯林，激發他去尋找精確的詞句，貼切地描述其品質和怪癖。這類人不必是猛士或明星。一個集某些罕見奇才于一身的無名學者，也會讓伯林覺得世界很美好。他喜歡人們表現出引人入勝的品質：樸素值得稱道，詼諧也值得贊美。他嚴肅樸實的朋友約翰·奧斯汀發現，生活中很少有哪種樂趣可以與毫無保留地贊揚別人相媲美。與凱恩斯批評起人來的毫不留情相比，伯林贊美他所仰慕的名人時樂此不疲的勁頭，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如果把這些贊美的杰作當成傳統的頌詞，那就錯了。與他所有的作品一樣，這些作品乍看起來只為博得一樂，背后卻隱含著他真正富于創造力的思想。偉大的科學家取得了改變物理學或生物學進程的突破，新聞會給以報道；經濟學家由于提出了將其知識領域內所有變量合理卻矛盾地聯系起來的理論，而受到贊揚。據說，這些便是增進知識的途徑。但是伯林并非在這種意義上增加了我們的知識。觀念史之所以一直受到歪曲和誤解，完全是因為它被濃縮成了抽象的概念。伯林想傳遞給我們的信息，恰恰不是一篇關于觀念史的抽象論文。當然，他撰寫過自由理論和歷史傳記方面的文章，但這些文章中的評論，本身并不足以闡明他自己所增添的對生命的詮釋。

這種詮釋便是多元主義。一提到那個晦暗的詞匯，想象力便無從施展！“我們生活在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具有閹割力的陳詞濫調。使用“多元主義”這個詞時，大多數人的意思是，社會是由大量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行動的少數派組成的。因為這些群體之間的利益互相沖突，他們必須學會容忍他人的存在。國家本身是真正需要具備最大限度寬容的組織，雖然它不得不在政治上表達社會中最廣泛的共識因素，但它也必須特別機敏地包容那些觀點與社會共識相反的人士。不僅僅是政府需要寬容，每一個有控制權的團體、機構、管理層，盡管形式各異，都應該對少數派的感受做出反應。然而在實踐中支持這種理論有一個難處。當由于采取扶持政策使少數派發展壯大而自身受到削弱或耗竭時，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政府，都無法抵制堅定而冷酷的利益集團或黨派。從多元主義受益之后，利益集團或黨派便推翻這種理論，通過接管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來排擠政府，然后溫和地聲稱其他所有少數派的利益應該服從他們的利益。當政府發號施令的權力受到挑戰，又對自己的合法性猶豫不決時，難道還不應該倒臺嗎？

以賽亞·伯林對多元主義的詮釋非常深刻。他沒有把時間花在判斷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抵制或屈服于壓力集團上。吸引他的，是多元主義的合理性，而不是其政治后果。不但要反對多元主義的敵人，更要提防那些裝扮成多元論者，而當明白了伯林言論的含義后卻憤憤不平的人。那些口頭上贊成多元主義的人，無法理解伯林是多么令人煩擾。伯林相信，追求一個良好目標往往會犧牲另一個良好目標。永遠無法做到施以仁慈卻不減損公正。平等和自由都是良好的目標，但很難兩全其美。這一點讓進步論者非常不滿，他們愿意相信他們目前正在追求的目標與自己珍視的其他目標并不沖突。然而伯林并不相信有什么萬靈藥或一攬子解決方案。對不少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使邊緣群體重新融入社會的措施，伯林持懷疑態度。專橫偏執的人士和規劃者把同胞公民們驅來趕去，安排他們后代的前途，打著效率和公平的旗號決定公民居住的地點和方式，借宣布這些決定的必然性為其決定的暴虐進行辯護。伯林對此深感不安。官僚們樂于制定各種規則條例，來操縱其他所有人的工作。這令伯林懷疑，官僚們更想操縱耍弄百姓，絕對不會遂民之愿。但即便在他看來，強勢官員的目標肆意侮辱人類的天性，對于演變到反抗效率原則的政治運動，伯林也未表示出很大熱忱。他對民粹主義和工團主義持保留態度，對二者關注少數派自由的程度感到疑慮。

他的這些保留意見未能使保守派感到一絲欣慰。伯林自己并不懷疑政治中的理性或類似理論，在這一點上，他與邁克爾·歐克肖特不同。對貨幣主義、赤字預算或其他統計學或社會學分析，他也許沒有什么看法，但并不認為將理性付諸政治的努力毫無價值可言。這些理論來自抽象推理分析，如果付諸實踐，可能緩解良好目標之間那些讓人神傷的痛苦沖突。生命并非一場將自己陷入兩難窘境的漫長掙扎，達到平和的折中平衡是可能的，這種折中也并不總是令人痛苦。平等和自由有時能夠達成妥協，有時無法達成。但是，伯林不同意那些否認這類糾紛可以調解的觀點。同樣，參與性民粹主義也不是一種讓他熱血沸騰的政治組織。然而，如果可以證實這是邁向更為平等的明顯進步，他也不會拒絕它。伯林也不同于溫和的保守派，他認為平等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和神圣價值之一，當其他神圣價值與平等相沖突而受損時，毫無疑問要犧牲掉平等；但只要無法證明平等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就必須實現平等。如果許多人食不果腹，而限制少數人的自由就能解決這個問題，那么就必須讓少數人失去自由。如果由此帶來了痛苦，那也必須如此。應該坦率地承認自由受到了限制——為了善行，決不應模棱兩可，這便是伯林的全部要求。他既不同情“所有文化都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之上”的保守觀念，也不贊成一些知識分子推崇的“藝術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必須不惜代價地加以保護和培養”的想法。是毀壞羅馬這樣閃耀著歷史珍寶之光的城市，還是失去國家獨立、讓民眾屈服于暴政？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間作出痛苦抉擇，伯林會義無反顧地奮起抵抗，不惜將城市化為焦土。也許有人猜想，由于同情屠格涅夫，伯林也會像他那樣痛恨右翼、畏懼左翼。倘若伯林面臨屠格涅夫在19世紀的俄國所面臨的那種抉擇，這種猜想是正確的。伯林發現反動統治令人憎惡，而恐怖主義的革命派則不堪忍受。但在西方民主政治領域內，他任由自己的想象力縱橫馳騁。

想把某種特定美德發揚到極致，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觀點。在不從根本上貶損其他美德的前提下，往往不可能將一種美德發揚到極致。認識這一點卻非常難得。在伯林看來，人們會不切實際地希望確保他們事實上永遠能夠同時追求所有的美好目標；于是對聲稱可以如此的政治思想家言聽計從。這些圣賢們聲稱，他們發現了一種更好的自由——積極自由，它可以將人們對于公正、平等及自我實現機遇的渴望，與人們對于自由、無拘無束生活的愿望協調起來。積極自由是一種理論的美稱，它認為如果人民受過啟蒙，完全理解一個美好、公平、令人滿意的社會所需的條件，那么，不僅睿智的哲學家，而且國家（其實就是政府自身）都能確定人民的真正需求。如果能夠確定人民需求的說法是真的，那么國家就有合理的理由忽視普通民眾說的所愿或所憎之事。民眾說出來的僅僅是他們渺小個體的想法，他們那未成熟的可憐人格尚不足以完全理解生活的所有可能性，經常為邪惡沖動所役使。就此而言，有誰愿意成為酒鬼？又有誰不同意，對每個渴望完美生活的人來說，藝術非常重要？然而嗜酒者太多，大部分民眾毫不在乎藝術，于是國家就被迫實施禁酒令，宣傳藝術，只要它健康有益，可以啟發人們關注美好未來。

人們往往服膺這種自由觀，因為他們愿意相信關于善的一種常識性觀點——善必定是不可分裂的，真必定是美的而美必定是真的，真和善的不同方面必定能夠協調起來。但伯林認為，它們有時是無法調和的。意識形態回答“應該怎么做”和“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人們傾向于相信這些問題有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實際上，這樣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不存在這種答案，是因為生活遠不是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方案。伯林的多元主義源于他對語言哲學和歷史的理解，根基遠比政治學深厚。其他哲學家對約翰·奧斯汀剖析他們論述中的命題并揭示錯誤的驚人能力感到厭煩。伯林記得艾耶爾對奧斯汀說過：“你像只獵犬，自己不想跑，就咬傷別的獵犬，這樣它們也不能跑了。”但伯林贊同奧斯汀，不是由于他論辯之激烈，而是因為他像后來的維特根斯坦一樣摒棄這樣的教條——人們能夠組織起邏輯上完美的語言，以反映現實的條理性。艾耶爾從實證原則出發，拒斥違背該原則的論斷。與艾耶爾不同，奧斯汀認為，分析知識、信念和經驗的唯一途徑是研究人們如何實際地使用詞語，他反對關于經驗真理和邏輯真理的區分。這兩個術語是伯林所謂的“極端”（all or nothing）式哲學必不可少的。

奧斯汀也是一位理論家，他提出了語言的言外用法理論（施為表達、歸屬表達和限定表達）。在解決哲學難題上，他相信體系和團隊合作，而伯林不太贊成這種想法。但奧斯汀的做法，并不是收集問題，再將它們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單一體系之中。有些邏輯實證主義者面對一個問題時，會用他們自己的術語進行重構，致使問題走樣，或者當成一個假問題而加以拒斥，而奧斯汀則原封不動地看待每一個問題。像約翰遜博士一樣，奧斯汀對違背全部經驗的決定論教條有些蔑視，伯林對此有同感。奧斯汀并不認為人類是掙扎在歷史因果關系網絡中、無法作為自由個體而行動的蒼蠅。

奧斯汀把語言看作是人們在特定情況下的一種行為，這種觀點令人振奮，也受到伯林認同。伯林的多元主義獨立于牛津哲學之外，可以說在他的人物寫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最有說服力。我們時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沒有像伯林那樣給觀念賦予人格、肉身乃至生命。伯林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對他而言，這些觀念不僅僅是抽象的東西，它們是活生生的——否則它們怎么能存活？——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激勵他們，塑造其生活，影響其行動，并改變著歷史的進程。正是人們創造了這些觀念并使之具體化。其中，有些是隱居在與世隔絕世界里的學者，他們蔑視裝腔作勢、陰謀詭計和野心抱負等發跡、攫取的游戲。面對蠻橫無理，或辯論中只想置人于死地的反論，他們會非常厭煩而退避三舍。雖然這些人非常值得欽佩，他們的價值標準給人深刻印象，但他們的做法并不是反省生命的唯一途徑，他們的價值觀也不是人類的必然準則。以賽亞·伯林把布魯姆斯伯里派[14](#_14_12)的低聲爭論比作室內樂，而室內樂很像布魯姆斯伯里派的觀點交流，此起彼伏，像一次永不掛斷的電話交談。對此，伯林這位20世紀30年代牛津大學的年輕教師感到欣喜。但這并不是讓人欽佩或受益的唯一生存形式。室內樂確實是一種簡樸而嚴格的音樂形式：貝多芬或巴赫都沒有創作出比身后發表的四重奏或變奏曲更深刻的作品來。交響樂、大合唱和歌劇需要一個龐大的管弦樂隊及至少六名的獨奏者，它也會使我們感到高興和驚訝。如果某些迂腐學究指責這些音樂形式“庸俗或浮夸”，我們就會覺得荒謬。

那么，我們為什么不承認世事有其自身合理性并受到自身規律的支配呢？我們為什么不承認政治家不能成為學者，或者學者不能成為政治家，正如很久以前教會把人劃分為平信徒、在俗教士和修道士那樣呢？伯林寫道：“生活可以透過許多窗子來看，沒有一個窗子必然是清晰或模糊的，比其他窗子看東西更為真實或更為歪曲。”布魯姆斯伯里派有權堅持自己的價值尺度，但他們錯誤地認為所有明智聰穎的人都要遵從這個尺度。你大可認為自己發現了關于道德、歷史、繪畫和人際關系的真理，但要說偌大世界上任何不接受這些結論的人都是白癡或無賴，這就很荒唐了。因此，政治家必須展現出很不一樣的品質，其生活遵從的理想必定與后來的學者做出的詮釋相去甚遠。多元主義意味著接受眾多適應于不同環境、不同職業人群的理想。事實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政治家。認定受某種觀念影響的一類政治家，比按照不同觀念行事的另一類政治家糟糕，這是愚蠢的想法。在描寫羅斯福時，伯林曾經對比了兩類政治家。第一類政治家原則單一、思想狂熱，無視人民和環境，使之屈從于自己的強大意志；第二類政治家有著敏銳的直覺，能意識到事物的發展方向和民眾的感受，并推斷采取何種方式實現他們的愿望。伯林寫道：“我的區分標準，既非道德的，亦非價值觀的，而是類型的。”每一種類型里，都有品德高尚、富于魅力者，也有品行不端、聲名狼藉者。伯林把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爾、戴高樂、伍德羅·威爾遜和希特勒歸為一類，而將俾斯麥、林肯、勞合·喬治、馬薩里克、格萊斯頓和羅斯福歸為另一類。

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通常對政治所作的許多道德判斷很不真實。僅僅好人就能給他們的人民帶來尊嚴和繁榮，這是不正確的。但所謂現實主義者的說法，即政治上的良好目標幾乎往往都是通過不良手段實現的，也是錯誤的。體面可敬、認真負責的人常常無法治理好國家而自毀名聲；流氓惡棍、殘暴狂徒卻能在混亂無序的局面下實施法律、恢復秩序，推翻人民歡迎的虛弱政府，代之以強有力的暴政。然而事實上，希特勒這樣的暴君是看著他們建立的帝國在自己眼前坍塌而一命嗚呼的，而本——古里安那樣不屈不撓追求公平、獨立的領袖，卻率領他們的同胞，沖出不公受欺的困境，在同胞的感恩戴德中長逝。伯林不是莫斯卡或米契爾斯那樣的政治現實主義者，這兩位會開心地告訴讀者，如果國家要抵御外敵，社會要保持穩定，民眾要過上幸福生活，就要為這樣的“表演”買門票，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包括失去自由、無辜者死亡和政敵被處決。這張門票太貴了，伯林和伊萬·卡拉馬佐夫一樣，都只好退掉門票[15](#_15_12)。他不是政黨成員，不加入任何組織，對各種空想盡可能兼容并包。他認為托爾斯泰和馬克思都弄錯了，其真理遠遠多于謬誤，理應深受尊敬。別林斯基從狂熱地信仰一種主義轉向另一種主義，致力于按他的理解宣傳真理，不能容忍任何他認為固執地過著錯誤生活的人。別林斯基與伯林敬仰的政治家魏茨曼大相徑庭。但若沒有別林斯基這樣的人，人類將十分貧困。這是伯林選用頌詞作為本書體例的原因。這是一種表達不同生活類型的方式，也提醒我們某個乍看上去討厭任性的人，他身上卻如何富于良好品質：某個有爭議的人如何嚴格按照與自己事業相符的標準生活。除非社會承認人們確實并應該按照不同的理想生活，否則這個社會中的成員就不會是自由的。

像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一樣，以賽亞·伯林用一種完全屬于他自己的風格寫作。沒有這種風格他便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近年來，當他用磁帶記錄他說的話、在定稿之前修訂文本時，這種風格變得更具個人色彩。這種方法對大多數作家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伯林的頭腦如此非同尋常，無論是在室內與一群朋友交談，還是在講壇上發表長篇演說，他都會邊想邊說，結果一個從句接一個從句，謂語會長得變成一大串分詞。如果別人采取這種方式，就會變成對雄辯家西塞羅的拙劣模仿。伯林不像雕刻著一大堆石塊，把人類與基本自然力量聯系起來的亨利·莫爾；他很像點彩畫家[16](#_16_12)修拉，在畫布上涂上一連串的形容詞、短語、類比、闡述和詮釋，最終，一個特定想法、一項行為準則、一種生活觀念的所有復雜性便展現在我們眼前。當我們剛剛理解了這個生活觀念，他就采用同樣的辦法來營造一種與之沖突或相輔的生活觀念，通過對比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前者。當一個詞不能表達明白時，他常常用兩個詞。他絲毫不怕讀者會在他迷宮般的句子中暈頭轉向，因為句子具有口語的節奏感和跳躍感。伯林贊成他所謂的丘吉爾的約翰遜式散文。舊時代文體風格的自發復興，如哥特風格的復興，不必搞成不倫不類的贗品，它可以是真實的回歸。丘吉爾的散文是對他自身及其歷史觀的描繪，色彩豐富、鮮明生動、氣勢恢宏、光彩奪目、不拘細節、心系整個世界，不是為了表述或反省個人生活，字里行間充滿了對祖國及其國際地位的深情關注。伯林的寫作風格同樣忠實地反映了他自己的價值觀。

理所當然，這是因為他具有強烈鮮明的是非感。任何人都不該設想多元論者是相對主義者。伯林像基督徒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忠于自己的人生觀。他提醒我們，不要指望一個觀念像方程式那樣精確無誤。

除非認為所采用的范疇過于違背“事實”，我們不會抱怨對[他所寫]事實的“回避”或歪曲。詮釋、敘述、歸類、象征是人類不可避免的自發活動，我們簡單而籠統地稱之為思考。只有在結果與我們自己的社會、時代和傳統相去甚遠時，我們才會抱怨。

那并非傳統智慧，更不是一種文化中的公認信仰，而恰恰是我們下意識思考時所用的概念和范疇，這又取決于我們是誰、存在于何時何地。那么，伯林自己的生活觀是什么？他特別珍視的美德是什么？

伯林的內心一直關注精神生活和牛津大學。牛津賦予他學者地位，他的回報，就是幫助牛津籌建一個研究生院，并承擔起他在其他情況下不愿承擔的任務。他刻意去贊揚那些單純質樸或孤獨內向，與他自己性情迥異的人，比如每天不在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里花上十四小時便覺得荒廢了一天的學者，還有腦子像海綿一樣裝滿賬目細節（比如建筑儲備基金所得的極低利息）的學院員工；這些人不可能是因為熱情洋溢的幽默語言而受他關注。他在生活中也實踐著多元主義：他真誠地敬仰那些像他一樣毫無疑問屬于知識分子，卻更樸素而不茍言笑的人。然而，即使身處這些人中間，他仍禁不住提醒我們：指望他們都表現出相同的優良品質，是不切實際的。休伯特·亨德森和理查德·佩爾斯都是很好的大學教師，但要是指責靦腆害羞的普拉門納茲討厭各種委員會和假日之后休息室內對答爭辯的喧鬧聲，難道不荒謬可笑嗎？莫里斯·鮑拉喜歡言辭激烈，不甘寂寞，追求享受，排斥樸素，熱情洋溢，討厭郁郁寡歡，看重格物致知的歡樂，欣賞抵制權威和自視甚高的人，鄙視虔誠[17](#_17_12)和一本正經[18](#_18_12)的人。要譴責鮑拉這樣喜歡吵吵鬧鬧的人，難道不是同樣滑稽可笑嗎？大學還應重視高尚的精神。像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那樣的教授，熱情興奮地驅趕著呆板拘謹的自我意識——這是學術機構的致命缺點——愿與年輕同事為友，不愿與那些頭腦健全、自詡為學術生活仲裁者的俗人為伍。對一個著名學府來說，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

伯林對于牛津大學和精神生活的忠誠，在他描寫約翰·奧斯汀的無與倫比的文章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可與凱恩斯對早期信仰的回憶相提并論。在那本回憶錄里，他把奧斯汀刻畫成為了追求真理而不分敵友、不計后果、一往無前的人。只有當伯林后來結識了凱恩斯的導師G.E.莫爾時才發現這一點。一定會有人把伯林對那個研討班實際討論內容的描述，當成英國哲學迷失在迂腐困境中的決定性證據。但這些人肯定是錯誤的。每個時代的哲學家，包括柏拉圖的弟子們、經院學者、笛卡爾主義者、黑格爾派，經常糾纏于瑣細的問題，或致力于知覺和認識論等已經清晰界定的難題。伯林并不自負。回首往事，他認為像自己那樣參加奧斯汀研討班的年輕牛津教師都過于以自我為中心，因而發表論文不多。如果他們的一個觀點被小組其他成員所接受，他們就心滿意足。然而，正如伯林所說，那些從不相信他們正在首次發現能對他們研論主題產生深刻影響的新的事實，“那些從未體驗過這種幻想魅力（哪怕是短短片刻）的人，都不會理解真正的精神愉悅”。

學者們往往惹人厭煩——即便最偉大的學者也是如此。伯林年輕時，有一天一位學者來訪。一些人將他視為天才，另一些人覺得討厭之極。這位學者就是納米爾。伯林說：“實際上，兩種特點，他兼而有之。”納米爾并未讓伯林厭煩。他不止一次慢條斯理地向伯林解釋，研究馬克思是浪費生命，因為馬克思是一個不值得關注的人，因為觀念只是人們下意識地追逐權力、榮譽、財富和享樂的產物；即便是這個時候，伯林都沒有沮喪。當納米爾解釋英國成為強國的原因時，立刻變得富有情趣，言談也文雅起來。他聲稱，正是由于英國人認識到觀念是多么不重要，并把知識分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的位置上，英國才成了強國，伯林聽得更入迷了。多年來，伯林一直饒有興味地記著納米爾很多更加驚悚的辱人之語。興趣漸濃的原因有二。伯林不像那些一聽說自己的課題毫無價值，就把批評者當成瘋子的學者；他會自問：為什么納米爾會有那樣的想法？納米爾是怎樣一種人？在伯林眼里，納米爾不但是理性主義者中最為反對形而上學的一位——他支持馬赫和弗洛伊德或后來的維也納學派的分析論，同時又是一名猶太人和迪斯累利那樣的民族主義者和浪漫派。關鍵他還是一名東歐猶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者。

自他還是在圣保羅學校上學的孩子開始，以賽亞·伯林就是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這種忠誠激發了他寫出那些最出色的作品。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蔑視、仇恨那些成功融入所在國文化的猶太人，但伯林并不這樣。他和納米爾所說的“哆嗦的以色列人”的子孫們沒有任何爭執。作為猶太人后代，這些“哆嗦的以色列人”已經不再“哆嗦”，而是與他們的鄰居和睦相處，坦然接受他們的身份，沒有妒忌、焦慮和恐懼，不再遵從猶太禮儀、慶祝猶太節日，實際上還可能對猶太教懷有敵意。對某些猶太人通過盡力隱瞞自己的猶太身份以吸引別人注意、聽見別人提到猶太人之名就退避三舍、喜歡在洛茲板球場的長廳扎著瑪麗勒本板球俱樂部領帶閑逛的做派，伯林的確有些憎惡。雖然伯林不與這些人為伍，但他也不會拒絕與所受全部教育都是為了鼓勵全面的親阿拉伯政策和懷疑否定以色列的外交部官員進行交談。伯林非常明白，那些對他津津樂道的人，心中仍隱藏著輕微的反猶情緒。而上流社會幾乎忘記了他是個猶太人，因為他對自己的猶太血統泰然處之，不急不怨，正如上流社會的人們身處自己的安樂窩一樣。實際上，對于這些怠慢、侮辱、煩惱瑣事和今天猶太人仍然面臨的排斥行為，他都能敏銳地察覺到。其他人可能輕視這些事情，并不計較，像雅各一樣偽裝做作[19](#_19_12)；但對伯林來說，這些屈辱使他確信建立以色列國的必要性。他之所以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是因為猶太人應該居住在耶和華的應許之地上，而是因為他希望地球上有那么一個地方，猶太人不再是少數民族，不用擔心因為舉止不合規范、無法模仿外族文化而受到外族人的鄙視，甚至遭到驅逐或殺害。當他寫到魏茨曼時，你可以感到伯林在為自己呼吁。他注意到了“烈士、失敗者、傷殘者、環境或自身荒謬行為的受害者——這些在猶太人幽默中總是被嘲諷懷疑的對象——是如何使魏茨曼滿懷憂傷憎惡的”。中歐猶太人那些刻薄世故的笑話（例如“我真倒霉，每次我買了侏儒，他都會長高”），充斥著前衛的詭辯、諷刺和粗俗，掩蓋著令人絕望的政治狂熱，伯林對此并不欣賞。此外，當他提到魏茨曼對英國的熱愛和作為一名東歐猶太人，對英國的人道主義民主、公民自由、法律平等、寬容精神、自我節制、厭惡偏激、不殘酷，甚至對英國嗜好異常古怪人事的特點表示仰慕之情時，伯林也是在表達他對這個自己父母所移居國度的熱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伯林在英國駐美大使館供職數年。在此期間，他估量了所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本可實現的事情，以及導致他和魏茨曼對于英國主動幫助以色列建國這一希望破滅的命運變局。他從不為自己的誤解尋找開脫的借口。然而一旦他當時正確，即使結果相反，他也的確沒有認過錯。

有人可能懷疑伯林是雙重效忠。過去這樣的質疑是用于調侃天主教徒。也有很多老于世故的政府人員，如哈羅德·尼科爾森，認為英國外交部雇用猶太人是不明智的做法，因為他們“不屬于我們”，很難指望他們認識r到英國在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利益。雙重效忠會造成緊張，扭曲忠誠，否認這一問題的存在是不正確的。但伯林沒有這個問題，他毫不懷疑自己是英國政府派駐華盛頓的公務員；英國是他的國家，然而英國并沒有征召他，沒有強迫他接受某種觀點，也沒有推行他極端厭惡的政策。作為一名平民，他有辭職的自由，即便在戰時。由于擁有自由，他無權違命或挑剔。一度只有英國獨自反對希特勒，伯林認為完全效忠英國是理所當然的事。伯林清晰純粹的道德觀念，使他免于經歷那些不正直的人面對原子彈這樣的問題時所經受的可怕的內心動蕩和自我反省。當然，在與使館內的同事討論中東問題時，他們多數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他偶爾會發現自己與他們意見不合，因而感到苦惱。再則，當某些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效忠英國玷污了他的名譽時，伯林也會感到痛苦。但煩惱或痛苦不同于道德扭曲和壓力。假若伯林忍受了道德扭曲和壓力的話，那么這個世界上的尼科爾森們所持的任何人都不能忠誠地服務于兩種理想的觀點，可能贏得信任，并從一般意義上為仇外主義特別是反猶太主義提供火種。伯林也不局限于雙重效忠。作為一名多元論者，他認為保持四重或五重效忠也不算矛盾。

盡管如此，或許正是這些年的經歷（除了在莫斯科的短期逗留外）使他下定決心不再為任何政府服務。他也不為權勢所迷惑。如果有權勢者請他出山，他未必會回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比弗布魯克聽說伯林曾為外交部每周電訊撰寫關于華盛頓政治景象的著名評論時，便召見伯林，使盡渾身解數，用甜言蜜語誘騙伯林為他的報紙撰稿。伯林沒有馬上接受他的提議，這使比弗布魯克感到難以置信。“哎！阿諾德·本涅特能為我畢生工作，為什么伯林先生就不接受我的提議？”伯林可以享受奢侈生活，至于如何安排，比弗布魯克深諳此道。他聲明，可以安排一項多數人無法享受的待遇——一套不顯眼的公寓，伯林可以在那里享用女色，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伯林沒有答應。此后不久，比弗布魯克的一名手下在一篇社論中對伯林進行了譴責。對這件軼事，伯林很是開心。

“在很多方面，猶太人是一個難以相處的奇怪民族，”他寫道，“尤其是因為猶太人的歷史與大多數最著名、最受尊崇的歷史因果理論相抵觸。”有些人聲稱，歷史學研究對象包括階級和社會運動、人口和氣候變化等非人為力量，以及技術進步與貿易規則等等；對此，伯林在猶太人的歷史和以色列建國過程中發現了最有說服力的反駁證據。在布羅代爾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西班牙國王直到第二卷才全面亮相。在大部分章節中，與那個時代其他親王和才俊一樣，他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伯林可不是這樣看待歷史的。以色列建國本身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伯林看來，以色列之所以能夠誕生，主要是偉大政治家哈伊姆·魏茨曼的功勞。任何對以色列建國的解釋，撇開魏茨曼都站不住腳。而魏茨曼關于促成以色列建國的合理設想和政策，卻因無法預測的偶然事件而告吹。這種歷史必然性是非常少見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以色列建國并不是個人行動推翻歷史決定論的唯一范例。1940年英國抵抗希特勒，以及1941年希特勒入侵蘇聯，都同樣能說明問題。如果魏茨曼成為偉人的原因，是他對歷史進程的干預促使不可能之事發生，那么丘吉爾和羅斯福也都算是偉人。但緊接著，問題即如一串煙花在空中炸開：我們怎樣看待偉人？伯林強烈反對黑格爾宣稱的偉人不受道德約束的觀點。在贊揚魏茨曼時，伯林斷言：“（他）沒有犯下實干家及其傳記者出于所謂國家原因[20](#_20_12)而為之辯護的暴行……雖然魏茨曼有現實政治[21](#_21_12)大師的名聲，但他從未編造過電報，從未殺戮過少數派，從未關押處決過政敵。”即便身陷危機之中，政客們也不應該出于國家或某些利益集團的所謂要求，而犧牲公眾認可的私德規范。同時，如果愿意，你或許可以問一名偉人諸如他是否仁慈可親、善解人意、容易相處等問題——你要是在考慮一名朋友的生活，問這些問題倒非常恰當——但你應認識到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關于一位政治家，更恰當的問題是他的成就、人生觀及對其政策的影響。馬修·阿諾德指出，任何翻譯荷馬史詩的人都應認識到荷馬是高貴而令人崇敬的，他的寫作風格華麗恢宏。同樣，伯林建議羅斯福的批評者要承認，正是由于羅斯福的人格魅力，在他去世時美國才順理成章地被看成是民主政治和人道主義社會政策的冠軍。是羅斯福給了美國人前所未有的國際國內地位；為達此目的，他從未因為保持權力而犧牲過任何基本的政治原則，也從未由于想擊敗他的敵人而去激發煽動邪惡的熱情。同樣，全世界都認為丘吉爾是拯救自己祖國、防止歐洲落入邪惡強權魔爪的偉人。兩位偉人過去有批評者，將來也一定會有，而且批評者的某些言論會是正確的。然而在兩位偉人展現出的品質、風度和成就面前，那些批評顯得蒼白無力。他們之所以能展現出這些品質、風度和成就，是因為受到了各自人生觀的激勵——丘吉爾基于對既往和自身歷史地位的認識而得以統領他的時代，控制自己的激情；羅斯福根據對未來的領悟調整他的政策，從而賦予美國人民解決自身難題的最大能力。盡管伯林專注于個人生活的美德，他對公共美德也有公正的判斷。

我們當中很少有人擁有將生命視為一個整體的想象力或修養，但并非只有成為一名政治家或藝術家才能擁有人生觀。每個社會階層都有這樣的人物。伯林記錄了1946年寓居駐巴黎使館期間遇到這樣一個人的經過。他是奧伯倫·赫伯特。在所有人離開很久之后，他留住伯林，不是跟他交談，而是獨白。伯林正琢磨著在第二天早晨五點離開之前能否睡上幾個鐘頭，赫伯特卻跟著他進了臥室，繼續獨白。伯林說他沒有覺得，也不可能認為赫伯特的做法很古怪。因為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很多話要說，他自己也會這樣做。在當時以及隨后數年的交往中，伯林認識到赫伯特不僅懷有強烈、不切實際、離經叛道，甚至偶爾有點可悲的觀點，而且其生活深受某種（部分是地主貴族式）清規戒律的約束，但他突出的嚴謹專一和寬容豁達的精神，卻使這一切變得更有趣。這是一種有局限性且懷有偏見的觀念，但并不卑鄙可恥。正如伯林所述，赫伯特厭惡騙子、野蠻人和狡詐的冒險家，但更討厭市儈小人、膽小鬼和偽君子。盡管他追求的某些目標稀奇古怪，也不顧有無實現的途徑，但赫伯特對功利主義原則的蔑視讓人尊敬，這正是因為他的宗教抑制了他先天缺失的中庸之道。

讓一位知識分子認清另一位知識分子身上的古怪之處難度更大——古怪的不是他的習慣，而是他對現象理性而冷靜的分析。毫不意外，伯林會對天性異常溫和、謙恭和心胸開闊的奧爾德斯·赫胥黎著迷。知識分子中的普遍看法是，赫胥黎成名之后把精力荒廢在超常心理學上了。伯林對這種看法的駁斥方式不同尋常：恰恰相反，他認為在斯賓諾莎之后，或許沒有任何人像赫胥黎那樣堅信知識能夠解放人類。伯林聲稱，赫胥黎把知識圖景擴展到了隱性知識和開放知識，認為他洞察了可能成為下個世紀進展最大的領域——身心關系，以及神話、宗教儀式與經驗研究的關系。

沒有人會認為這些頌詞出自乏味的性情。世上確有從未說過別人一句壞話的貴人，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教會自己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在那里沒有人會聽到、看見或講出壞話。伯林不是那樣的人。對人性缺點他不會熟視無睹。對于他喜歡的、敬重的以及他不太看重的人，伯林都會迅速發現他們的致命缺陷。正如劍橋大學的杰克·加拉格爾所言，我們每個人都有糟糕的朋友，同時自己又是某個人的糟糕朋友。但就算以賽亞·伯林禁不住用同情和慈愛眼光看待某些即便讓他尷尬的糟糕之人，在他眼里，還是有一些人因麻木不仁或冷酷無情，而既可怕又乏味。他對惡人和壞人有所區分。壞人，就是那種從油滑阿諛投機起家，僅僅為了滿足自己對權力地位的貪欲而在危難時刻背叛朋友，最終無緣無故傷害別人的野心家。惡人比壞人更差，徹頭徹尾地惡毒或陰險。陰險惡毒之徒完全不同于那些他不太樂意見到，但很有才干的成功人士——如果要會見，他會做得很好。險惡之徒也有別于某些類型的名流、勢利小人、自負的好人[22](#_22_12)或傲慢墮落的歐洲貴族——對這些人伯林都可以容忍。險惡之徒讓他感到恐懼，如果遇到了惡人，伯林就會像生氣的幽靈一樣離開房間。

與某些眼光敏銳的人不同，伯林對詆毀別人沒有興趣，絲毫也沒有。可能他有些挑剔，但他不同于很多倫理學家，并不覺得苛刻挑剔是一種令人愉快的精神狀態。在觀察研究騙子、吹噓者、愚笨或狡猾的家伙時，伯林喜歡發現他們身上的可取之處。激發他寫作的，是救贖而非譴責，是他人的優點而非缺點。伯林寫作時，他挑選自己想贊美的人物，并只對他們的良好品行大書特書。對于缺點，他從不歸納，而是籠統帶過。例如，倘若發現某人衣著風格值得贊揚——即便是穿著狂放不羈的人，伯林就會拿他與衣著時髦、整潔漂亮的人作對比，讓讀者自己去猜想他們是何許人也。像哈姆雷特一樣，伯林感嘆人類是多么偉大的杰作；與哈姆雷特不同，人類給伯林帶來歡娛。

人類之所以能讓伯林興致勃發，是因為他擁有那些做出睿智判斷的賢明之士非常缺乏的一種特殊天賦。那是一種壓抑不住的喜劇感，其特征是自然天成、活潑戲謔、荒謬中見快樂。這種幽默不完全是英國風格，與其俄羅斯血統有關，與泉水般洋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處于契訶夫作品核心的幽默風趣相類似。他對戲劇感高度發達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博科夫情有獨鐘，這并不是無緣無故的。伯林喜愛笑話和輕松愉快，即便是出自滑稽可笑的男生之口的幽默語言——丘吉爾曾用這些男生幽默來奚落敵人、娛樂朋友、鼓舞同胞。

那么這些頌詞并非藝術家畫室里拋在一邊的草圖。它們是以賽亞·伯林全部作品[23](#_23_12)的一部分，與他關于自由、關于啟蒙時期和19世紀知識分子的文章同等重要。如果不把觀念看作人類激情、欲望、渴求和沮喪的表達，人是無法理解觀念的。而只有對關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們，“生命”這個詞本身才有意義。

諾爾·安南

# 溫斯頓·丘吉爾在1940年

## 一

距今不遠的1928年，一位著名的英國詩人兼評論家出版了一本關于英語散文寫作藝術的書。由于是在一個痛苦的幻滅時代寫作的——這是對愛德華時代的虛假繁榮，更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宣傳造勢和高談闊論的幻滅，這位評論家贊揚了簡潔之美。如果說簡潔的散文常常干癟單調，它至少是誠實的。如果說它有時顯得不優美、不好看、不活潑，它至少反映了真情實感。總之，它避免了所有誘惑中最壞的東西：自命不凡，自我表現，如一座有著脆弱粉刷外墻的建筑——或表之以騙人的光滑，或覆之以精巧的巴洛克細節，這些都掩蓋了可怕的內在空洞。

時間和氛圍是非常熟悉的了：這是在利頓·斯特拉奇通過暴露維多利亞時代名人的偽善或顢頇的方法建立新的風格、伯特蘭·羅素揭發偉大的19世紀形而上學家們對急于上當而不自知的一代人布下可怕的騙局、凱恩斯成功地嘲弄在凡爾賽結盟的政治家們的愚蠢和罪過之后不久。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修辭乃至雄辯受到謾罵，因其裝扮成文學和道德上的偽善人、肆無忌憚的江湖騙子——他們敗壞了藝術品位，污損了真理和理性的事業，最糟糕的是帶來罪惡，并且把一個容易輕信的世界引向災難。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剛才提到的那位評論家很熟練并且輕蔑地解釋他為什么對可憐的魚販子凡宰特[24](#_24_12)向泰耶爾法官說的、后來記錄下來的那些話——一個行將赴死的純樸人說出來的感人的、不符合語法的只言片語，要比對當時大眾廣為閱讀的著名大師的美文更為佩服。

這位評論家對謙卑、正直、慈悲，以及尊重他人感受、個人自由、情感等這些東西給予最高贊譽。在他看來，被他選作后一類例子的這個人是上述品質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浪漫主義人生觀出了名且讓人不放心的倡導者，是恃強凌弱的軍國主義者，是充滿激情的演說家和記者，是這個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上公眾人物中最為人知的人。這個人就是那時在任的保守黨政府的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

“這三個條件是雄辯所必需的——首先是一個合適的題目，其次是一顆誠摯而熱烈的心靈，最后就是毅力或韌勁。”作出這個觀察之后，作者從丘吉爾大約四年前面世的《世界危機》一書第一部分中引文來透徹說明自己的觀點，繼而指出：“這類雄辯是假的，因為它是做作的……意象是陳舊的，隱喻是極端的。整個段落散發著虛假的戲劇氣氛……連珠炮似的修辭祈使句。”他徹底否定了丘吉爾的散文，認為它夸夸其談，啰啰唆唆，不合宜地善辯，慷慨激昂，這來自“過分的自夸”，而不是“主題渲染”。

在一個不僅修辭甚至典雅的雄辯都似乎成了無恥的矯飾的年代，這個觀點很受年輕人的歡迎，他們抗拒任何似乎要越出真相的東西。丘吉爾的評論者在（有意識地）為戰后一代人代言：對于當時正在進行的廣泛而快速的社會變革的心理現象——政府當局要堅決地把人們的關注從這上面移開，哪怕是目光極不敏銳的文藝評論家也是看得見的；情緒上不滿足、充滿敵意、不牢靠；如此重大變動的后果是過于痛苦的，留下來的遺產就是對于宏大風格的這種仇視。這場災難的受害者們認為，他們有權利拒絕一個無情背叛他們的時代的虛飾。

然而，這位苛刻的評論家和他的讀者們嚴重地錯了。被他們指責為華而不實、空洞的硬紙板的東西實際上是堅實的：這正是這位作者的自然手段，借以表達他英雄的、粉飾的、有時過于簡單甚至樸素，但常常是誠實的人生觀。評論家看見的只是一幅難以置信的、黯淡透明的模仿畫，但這是一個錯覺。現實很不一樣：這是創造性再現的一個嘗試，雖則是無意識的。它逆當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動，只是因為它是對從吉本和約翰遜博士延續到皮考克和麥考利的正式的英語表達方式的刻意回歸，是丘吉爾先生為了傳達自己特定觀點而創造出來的復合武器。在慘淡蕭條的20世紀20年代，對于帝國主義時代敏感而復雜的追隨者來說，它過于明亮、宏大、生動、不穩定，那些人的內心世界復雜而敏感，他們無法當然也不愿意去欣賞這個毀掉了那么多他們曾經信任和熱愛的東西的時代。評論家及其支持者在這一點上躊躇不前，但他們對原因的分析難以令人信服。

他們當然有權利有自己的價值尺度，但把丘吉爾的散文作為虛假的幌子、空洞的贗品而不予理睬，是一個失策。復興不是虛假的那一類。比如，哥特復興，如果說有些懷舊，代表的是對待生活熱烈而緊張的態度。這樣一些例子會顯得古怪，它源于更深沉的情感，比繼之而來的某些纖弱的、“現實主義”的風格有更多可說的東西。事實是，哥特復興的倡導者，發現他們在回到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中的過去這一過程中取得的解放，決不會損害他們或他們的成就。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被塵世的知識所禁錮，只有感覺到自己是站在舞臺上的演員時才活躍起來，由此得到解脫，第一次大聲說話，就被發現有很多事情要說。還有那樣一些人，他們只有穿著制服或甲胄或戲裝才能伸展自如，只有透過某種類型的眼鏡才會看見東西，只有在對他們來說以某種方式得以合法化的場合才能勇敢地行動，他們把生活看成是一出戲，他們和其他人被指派必須說某些臺詞。于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上次戰爭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例子：當他們的生活被戲劇化地改變的時候，當他們置身戰場的時候，有退縮傾向的人們表現出奇跡般的勇氣。如果他們一直穿著制服，生活還經常是一個戰場，那他們會繼續這樣做。

這個框架需要的不是“逃跑主義”，不是人工的、異常的或失調的跡象。它經常是一種用人們性格中最強烈的單一的心理要素的術語來表述的經驗觀點：并不常常表現為簡單斗爭的形式，這些斗爭發生在沖突的力量或原則之間、真理和荒謬之間、善惡之間、對錯之間、個人誠實和不同形式的誘惑與墮落之間（如前面提到的評論家所說的情況），或被認為是永久的東西和曇花一現的東西之間，或物質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之間，或生命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之間，或藝術的宗教與其假想的敵人——政客、牧師或市儈——之間。生活可以透過許多窗子來看，沒有一個窗子必然是清晰或模糊的，比其他窗子看東西更為真實或更為歪曲。既然我們主要用語詞來思維，它們就必然有作為鎧甲的屬性。約翰遜博士的風格在丘吉爾《最光輝的時刻》一書的行文中經常被模仿，特別是當作者縱情于嚴肅的玩笑時更是如此，這本身在當時是一個攻防武器。不需要深刻的心理學的精微分析，就能發現為什么一個人會像約翰遜博士一樣易受攻擊，他在心理上屬于上個世紀。

## 二

丘吉爾的主導概念，他的道德和思想世界唯一的、核心的組織原則，是一種歷史想象，它如此強烈，如此具有綜合性，可以把全部的現在和將來囊括在一個豐富多采的過去的框架中。支配這種方法的，是尋找道德和思想的確定意義，為事件之流賦予形狀、特點、色彩、方向和一致性的愿望和能力。

這種系統性的歷史主義，當然并不局限于行動中的人們或政治理論家：羅馬天主教思想家用堅定而透明的歷史結構的術語審視生活，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是這樣做的，馬克思主義者直接繼承的浪漫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也如此。我們從來沒有抱怨過“逃避”或歪曲事實，直到所采用的范疇被認為與“事實”相違背。解釋、聯系、分類、符號化，是那些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人類行為，我們簡單地稱之為思維。如果我們有所抱怨的話，只是因為結果與我們的社會、時代和傳統的共同觀念差別過大。

丘吉爾把歷史（和生活）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復興盛典：當他想到法國或意大利、德國或低地國家、俄羅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國家，他看見的是栩栩如生的歷史意象——某種介于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歷史書上的插圖和貝諾佐·戈佐利在里卡迪宮所畫的《三圣賢之旅》之間的東西。他的眼光從來不同于整齊的分類社會學家、細心的心理分析學家、慢條斯理的古董商人、耐心的歷史學者。他的詩歌沒有解剖學——看見肌肉之下的裸露骨骼、顱骨和骨架，以及生命之流下面普遍的衰退和死亡——的眼光。他用以建構世界的單元，要比生活更簡單和宏大，原型就像古代詩人的原型那樣生動和重復，或有時就像戲劇家的原型那樣，這些戲劇家把人物和情景看作是不朽的光輝原則的永久符號和體現。這個整體就是一系列結構上對稱和某種程度上風格化的創造，或者彌漫著明亮的光線或者投射在最黑暗的陰影里，就像卡巴喬的一幅傳奇作品，幾乎沒有細微差別，用原色作畫，不用半色圖片、難以理解和玄妙的東西，沒有吞吞吐吐或暗示或竊竊私語的東西：聲音在音高或音色上并沒有變化。

丘吉爾在戰爭期間的演講使用古語的風格已為我們所熟悉，是所謂嚴肅場合所要求的高聲調（編年史家的正式打扮）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丘吉爾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風格應該充分滿足歷史不時對演員提出的要求。他1940年就外交部的一份草案寫道：“在我看來，提出來的觀念錯在試圖不明智地談論政策改良，這與悲劇性的簡單化、與時代和迫在眉睫的問題的嚴肅性不相適宜。”

他自己的敘述則有意識地爬升和擴張，直至達到不列顛之戰的巔峰。結構和緊張是悲劇式的，其中正是體現在吟誦調和詠嘆調之中的表達方式上的矯揉造作，用來消除正常存在的毫不相干的千篇一律，凸顯出主人公的事跡和苦難。在這樣一部作品中，喜劇的時刻必定符合作品的整體風格，是對它的愚弄。這正是丘吉爾先生的做法。當他說他“用肅靜的凝視”看這或看那，或告訴官員們他們“笑話”一個精心策劃的計劃的失敗“會被認為是對我極大的不恭”，或描述他的同事看到成功隱藏起來的陰謀有所進展而顯露的“極美的微笑”的時候，他的確切意思正是：模仿英雄氣概的聲調——讓人想起吉卜林的小說《斯托基公司》——并沒有破壞歌劇的規矩。但是，規矩雖在，它們卻并不能任由作者擺弄：現在他能得心應手地運用它們，它們已經與第一天性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藝術與自然已不能區分開了。他文章的僵化模式，是他表達思想的正常手段，不僅僅在他開始創作之時如此，而且存在于貫穿他日常生活的想象中。

丘吉爾的語言是他為滿足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一種手段。它有著大膽的、冗長的、相當一致的、易于辨識的節奏，這使它像所有強烈個性化的風格那樣，有可能被人（包括他自己）拙劣地模仿。當一種語言的使用者賦有極為鮮明的性格，并且成功地為自己的措辭創造一種手段的時候，這種語言就變得個性化。在丘吉爾散文中可以看到的來源、成分、對經典的模仿，是非常明顯的。結果是獨一無二的。不管對這種風格有什么樣的態度，它必定會被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現象。忽視或否認都是盲目、輕佻或不誠實的。表達方式，不僅僅是在特定情形中，而是總是正式的（雖然強度和色彩會隨著場景而不同），總是公開的、雄辯的、面向世界的，與內省和個人生活的躊躇和緊張相去甚遠。

## 三

丘吉爾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作的品質，就是他整個人生的品質。他的世界建立在公眾超越私誼上，建立在行動以及簡單善與簡單惡之戰、生與死之戰的最高價值上；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戰爭之上。他一直在戰斗。在1940年最晦暗的時刻，他告訴意志消沉的法國部長們：“不管你們會做什么，我們都將永遠、永遠、永遠地戰斗下去。”這個標志貫穿了他的整個生命。

他為何而戰？比之于那些同樣富有激情但行動上并不怎么一致的人們，答案更為明顯。丘吉爾在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和信念是相當有品位的。他的批評者常常指責他沒有定性，指責他的判斷善變甚至反復無常，比如他改變對保守黨的忠誠轉向自由黨，在兩者之間搖來擺去。但在貿易保護問題上除外，當他在20世紀20年代作為鮑德溫內閣的財政大臣支持關稅時，這種初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指責明顯錯了。事實上，在漫長而風急雨驟的職業生涯中，丘吉爾很少改變主張。如果有人想去看看他在我們時代的大問題和長期問題上的觀點，只需去找找他在漫長而清晰的公眾生活的每一個時期——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歲月里，就這個主題說過或寫過什么就可以了。人們會發現，他的觀點發生變化的例子，少得驚人。

看起來固執和可靠的鮑德溫，當環境需要時會靈活調整態度。張伯倫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托利黨人主張的堅定反對者，當他看到黨或局勢有所要求時就改變政策——在這一點上比鮑德溫更為明顯。他追求的是政策，而不僅僅滿足于調整態度。丘吉爾則堅定不移地服從最基本的原則。

正是他核心的、畢生的信念所具有的力量和一致性，比他對權力的熱烈或激情，或比那些被認為是他的任性而不可靠的才華的東西，在保守黨總部里引發了更大的不安、更多的反對和猜疑。沒有哪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組織會對這樣一個人感到十分滿意，他把獨立、自由想象以及令人敬畏的性格力量，同堅定信念、在公私利益上堅持誠實一致的觀點結合了起來。丘吉爾相信“雄心，更多的是出于對名望的追求，而不是對粗俗目標的獵取，它在每一顆心靈中閃閃發光”，他相信并努力爭取個人的功績和光榮。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劇作家，或19世紀的歷史學家或倫理學家的設想中，任何一個皇帝都會把勝利地騎馬穿過波斯波利斯看作是一件英勇的事情——他確切知道哪些事情在他看來是宏大的、瀟灑的、高尚的、值得高貴的人們追求的，哪些事情是他因其黯淡、灰色、蒼白并可能會削弱或破壞宇宙間的光和運動而心生厭惡的。改變方向、屈服和怯懦的妥協會使他們自己聽命于感覺健全的人們，這些人希望使他們為之奮斗的世界充滿常常是無意識的樂觀主義；但如果這些人追求的政策有可能降低速度、損害生存的力量、削弱他所崇拜的“生機和活力”——這是比弗布魯克男爵的話，丘吉爾就準備進行反擊。

丘吉爾是那些日見其少的真正相信特定世界秩序的人物之一：那種賦予該秩序生命和力量的渴望，對他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產生了最強大的也是唯一的影響。當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要去描述和分析他關于歐洲或美國、關于大英帝國或俄羅斯、關于印度或巴勒斯坦，抑或是關于社會或經濟政策的觀點時，他們將會發現他關于所有這些主題的見解，都可以套在一個固定的模式里，這是他早年建立起來的，后來只是有所強化。這樣，他常常相信在偉大的國家和文明里秩序幾乎都是分層的，例如，他從來沒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憎恨德國：德國是一個偉大的、有著神圣歷史的國家；德國人民是有著偉大歷史的民族，因此在丘吉爾的世界圖景中占有相稱的空間。他譴責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普魯士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納粹，但他完全沒有對德國人民有所指責。他對法國和法國文化懷有熱烈的想象，并且堅定地宣傳英法合作的必要性。他一貫把俄羅斯人看成是歐洲文明高墻背后的、沒有定形的、類似亞洲的群體。他對美國民主的信仰和偏愛是他的政治觀的基礎。

他的外交觀始終是浪漫主義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爭取自主的斗爭占據了他的想象，猶如意大利復興運動得到其自由主義先輩的同情。同樣，他在社會政策上的觀點，符合他從本世紀頭十年自由黨當局中他最敬仰的人們——阿斯奎斯、霍爾丹、格雷、莫利，尤其是1914年之前的勞合·喬治——手中接受下來的那自由主義原則，不管世界會怎么樣，他發現沒有任何理由去改變它們。如果這些1910年進步的觀點今天看起來不大令人信服，而相對于政治而言，它確實無視社會經濟不公——霍爾丹或勞合·喬治幾乎不能因此受到指責，那么這些觀點來自丘吉爾對于很早以前就一勞永逸建立起來的關于人類關系圖式的不可動搖的信念。

## 四

把想象力視為主要的革命性力量，是錯誤的——如果說它毀滅和改變了迄今孤立的信念、洞察力、心理習慣，那么它同樣把它們融入一個高度統一的系統。如果它們充滿了足夠的能量和意志力——這種意志可能被加上幻想，幻想很少受到事實的威脅，并用在心中整理的事實建立一個理想模型——有時就會改變整個一代人的觀念。

英國政治家中最富這些稟賦的是迪斯累利。他實際上認為，帝國主義的魅力，輝煌的而為大多數非英國人所持有的觀點，有著異國情調的浪漫，充滿了形而上學的情緒，包括所有與英國傳統中一切最嚴格意義上經驗的、功利的、反體系的東西正相反的現象，這些像魔咒一樣控制了兩代英國人的心靈。

丘吉爾的政治想象力有某種同樣魔法般的變化力量。這個魔法，是煽動家所具備的，同樣也是偉大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所具備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同那些改變了關于國家本身及其特點和歷史的國內形象的人一樣，十分嫻熟地掌握了這個魔法。但是他和丘吉爾之間的差別，要比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更大，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所屬大陸和文明的差異。這種對比在他們各自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上得到生動的展示——這些角色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的新東西和天才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少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是在更廣大區域中進行的爭奪，它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劇烈地改變了世界的社會政治輪廓，或者更甚。但是1914年在連續性上的中斷要更加狂暴。1914年之前的歲月之于我們現在，甚而之于20世紀20年代，就像是一個大規模和平發展的長時段的末期，突然而災難性地被打斷了。在歐洲，1914年前的歲月，被那些后來不知道真正和平的人們以懷舊之情看待，這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紀是持續不斷碩果累累的時期，成為人類的一個獨特成就，其強大影響延續下來，即便被戰爭打斷，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驚人的。與之相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標志著人類文化發展的衰退。比如說，文學的品質——它肯定是思想和道德活力的最可靠的標準之一，在1914年到1918年戰爭期間達到的高度是1939年之后不可比的。在西歐，這四年屠殺和毀滅的歲月，也是天才作品持續出現的幾年，像蕭伯納、威爾斯和吉卜林、霍普特曼和紀德、切斯特頓和阿諾德·本涅特、比爾博姆和葉芝這樣的著名作家，同樣還有像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福斯特、艾略特和亞歷山大·布羅克、里爾克、斯特凡·格奧爾格和梵樂希這些新銳，都在創作。自然科學、哲學和歷史學也還在卓有成果地發展著。相比之下，新近的這場戰爭有什么可以拿出手呢？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在一個方面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形見絀：牽涉其中的國家的領導人，除了法國明顯例外，都要比他們的原型更為高大、精神上更為有趣。幾乎可以毫無爭議地說，斯大林比沙皇尼古拉二世更迷人，希特勒比愷撒更引人注目，墨索里尼與維托里奧·伊曼紐爾相比也是如此。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雖然同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一樣令人難忘，但他們達到的絕對歷史高度要比后兩位稍遜一籌。

亞里士多德說過，歷史就是“阿爾基比阿德斯做過或遭遇過的事”。假如說歷史被定義成歷史人物實際上所做的事情，那么這個概念，不管社會科學如何努力去顛覆它，都比與它競爭的假說更為正確。不管怎么說，丘吉爾完全接受了這個概念，并且充分利用了他的機遇。他敘述的主要是人格，并且對個人天分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時有溢美之詞。在他的書中，偉大的戰時主角的表現使他的敘述具有某種史詩性質，他筆下的英雄和壞蛋都各具才干，這不僅僅——或實際上完全不是——來自他們所卷入事件的重要性，而且來自他們在人類歷史舞臺上的聲望。雖則這些人物在歷史上有同樣的位置，偶爾還有沖突，他們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互相映襯的。

讀丘吉爾的書，讀者必定會超出書本在心里進行對比和比較。羅斯福的過人之處主要是他對生活的驚人熱愛和對未來的無所畏懼。作為一個人，他對未來熱切歡迎，給人的感覺就是：不管時代會帶來什么，所有東西都會按他的意愿行事，沒有什么東西再那么可怕或壓迫人，以至于不能服從、用于和塑造成新的不可預測的生活方式，這是羅斯福及其盟友和忠誠下屬投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熱心建立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希特勒那里也看不到恐懼，不過他的自信來自于一個瘋狂者的暴力和狡黠的愿望，這使他很容易從于己有利的角度來歪曲事實。

對未來的信念如此熱烈，對塑造未來的力量的信任如此淡定，當其與對未來的真實輪廓進行現實主義評價的能力聯系起來的時候，意味著對人們生活環境的趨勢，對構成這些環境的人們的欲望、希望、恐懼、愛恨，對被客觀地描述為社會和個人“潮流”的東西，自覺或半自覺地有著極為敏銳的認識。羅斯福的這種敏銳性達到了天才的程度。他所具備的并在整個總統任職期間所保持的象征意義，主要是因為他把握住了時代大勢和對未來極不尋常的投射。不僅是對美國公眾輿論的把握，還有對他的時代更大的人類社會運動總趨向的把握，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這個運動內在的流動、震顫和回旋，似乎都以地震儀般的精確性在他的神經系統中記錄下來。他的大多數同胞是認可這一點的——一些人滿腔熱情，其他人則懷著憂郁或強烈義憤。遠離美國的人們正確地把他看成是他這個時代最具天才和最堅定不移的民主代言人，最具時代感，最外向，最直率，最具想象力，精神最為博大，脫離了內在生活的制約，在用他的洞察力、先見之明和能力樹立信心方面有著舉世無雙的能力，這使他成為謙恭的人們的典范。

對于現在乃至將來的踏實感覺，知道去哪里、如何去和為什么去，這使他在健康最終受到損害之前是愉快的、歡樂的，使他樂于同迥然不同的人在一起，只要他們具有代表性，在各自獨特的世界中主動向前，不管怎樣都行。這種內在的生命活力彌補（還不只是彌補）了智識或性格上的不足，他的敵人（和受他傷害的人）從來沒有停止過指出這些不足。他們的嘲笑實際上沒有影響他：不管他們的洞察力多么深刻或感情多么細膩，在所有東西中他首先不能忍受的，是遲鈍、無動于衷、憂郁、恐懼生活、心中只有來世或死亡。

丘吉爾幾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同樣不怕未來，還沒有人比他更熱切地熱愛生活，對所接觸的一人一物都傾注了那么多的熱忱。但相比之下，像所有偉大的發明家一樣，羅斯福對社會的未來形態有著半自覺的預知意識；而丘吉爾與藝術家有些相似，他盡管氣質外向，卻善于內視自省，丘吉爾最強烈的感覺是對過去的感覺。

他清晰而色彩鮮麗的歷史觀是他思考現在和未來的依據，是他用于如此結實地建構、如此富麗和精心地裝飾他的世界的不竭源泉。如此堅固、如此包羅萬象的建筑，是不會由任何像敏感的儀器那樣易于對其他人群、機構或民族永恒變化的模式和方向作出反應和響應的人建造的。實際上，丘吉爾的長處（他身上最令人不安的東西）正在于：和羅斯福不同，他身上沒有裝備不計其數的敏感天線，以把變動不居的外部世界中最小的擾動測試出來。和羅斯福不同（就此而言，同格萊斯頓和勞合·喬治也不一樣），他不用緊張和專注的方式反映當代社會或道德世界；他創立了這樣一種力量和連貫性，它成為一種現實，通過施加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了外部世界。正如他在戰爭中的經歷表明的，他有巨大的消化事實的能力，但是這些事實已經被他用強有力地加之于原料上的范疇，改造成了某種他可以用來建筑自己巨大的、簡樸的、防衛堅固的內在世界的某種東西。

羅斯福有著外顯的人格，是一個天真的、達觀的、愉悅的統治者，他的歡樂和明顯無意的放棄使助手們感到失望，他似乎樂于制定兩個或更多個完全矛盾的政策。在最黑暗和最危險的時刻，更通過迅速和輕易地設法擺脫政府的關照使他們驚訝。丘吉爾也喜歡快樂，他同樣既不缺乏愉悅，也不缺乏豐富的自我表達的能力，甚至還有讓專家汗顏的輕松地快刀斬亂麻的習慣，但他并不是一個輕佻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種深度——相應地還有一種對于悲慘的可能性的感覺——這恰是羅斯福輕松的天才本能地忽略掉的。

羅斯福玩起政治來技巧嫻熟，并且他的成功和失敗都很輝煌。他的表演似乎毫不費力。丘吉爾既熟悉光明，也熟悉黑暗。像內在世界的所有居民，甚至是他們的短暫訪客一樣，他既有憂郁的沉思，也有緩慢的恢復。羅斯福可能說起過血和汗，但當丘吉爾為英國人民奉獻淚水時，他說的那句話林肯、馬志尼或克倫威爾可能都說過，但羅斯福沒有說過，雖然他是一個勇敢、慷慨大方和感覺敏銳的人。

## 五

丘吉爾并不是未來文明的使者，他全神貫注于他自己的生動世界，他對別人內心實際發生的事情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大可懷疑的。他不是在反應，而是主動行動；他不是要作一面鏡子反映別人，而是要按照他自己強有力的標準影響和改變別人。寫到敦刻爾克時，他說：

毫無疑問，在這緊要關頭，如果我在主持國家的方針大計上稍有躊躇，我就會被趕下臺。我確信，每個大臣都已下定決心，寧愿馬上犧牲生命，家庭和財產全遭毀滅，也不愿屈膝投降。他們的這種表現，代表了下院，而且可以說是代表了全體人民。在這以后的幾天和幾個月中，我每遇適當的場合便表述他們的心情。我是能夠表述他們心情的，因為他們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們這個島嶼的每個角落。[25](#_25_12)

那一年的6月28日他叮囑羅西恩勛爵，當時的駐美大使：“你的心情要舒暢而鎮靜。此間沒有一個人情緒低落。”[26](#_26_12)

這些光彩奪目的句子幾乎不能公正評價他在激發他所描述的情感方面的作用。因為丘吉爾不是一個吸收、聚焦、反射和放大別人情緒的靈敏鏡頭；和歐洲獨裁者不同，他沒有像一個儀器那樣利用公眾輿論。在1940年，他認為他的民族有著不屈不撓的剛毅，有著堅定的品質并且傳承下來了。無論如何，如果說他沒有去著力表現他的一些同胞在危險時刻的恐懼與希望，這是因為他把他們強烈地理想化了，最終他們會接近他的理想，并開始用他看待他們的方式看待自己：“我有幸表達出來的英國的輕松和沉著的脾氣”——的確，他在激發這種情感方面出力最大。他的句子具有催眠般的力量，他的信念如此堅定，他以強烈的雄辯吸引了他們，以至于在他們看來，丘吉爾說的實際上正是他們心靈理智中的東西。毫無疑問，這種情感是存在的；但直到丘吉爾從他們內心喚醒它之前，很大程度上它是沉睡著的。

1940年夏天，他發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演說之后，他們開始用一個新的觀念看待他們自己的英勇和世界的敬重，此后就成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英雄形象，就像溫泉關戰役或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一樣。他們進入了被他的話語改造了的戰爭。他們在自己那里發現的精神，是丘吉爾用才智在他自己那里建立起來，并且灌輸給了他的民族，代表他們對原始沖動作出了生動反應，他只是有幸用合適的話語表達出來而已。他激發了英雄的感情，并且改變了不列顛之戰的命運，不是通過捕捉他周圍人們的情緒（實際上，在任何時候，這都不是一種懦弱的迷惑、困惑或冷漠，但是某種程度上的糊涂；是剛毅但缺乏組織性），而是通過毫不動搖，正如他不為周圍生活由之組成的那么多繽紛色彩所動。

英雄般自豪的特殊品質和他心中涌起的崇高感，像在羅斯福那里一樣，不是來自于活著和掌控歷史上關鍵時刻的那種興奮，不是對于事物的變化和不穩定性的興奮，不是對于未來的無限可能性的興奮——正是未來的不可預測性，為每時每刻自發的即興創作，為與不安分的時代精神相一致的大的想象性變革，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相反，它來自于持續的內省沉思的能力，來自于情感的厚重和執著——特別是對于他承擔著個人責任的偉大傳統的感情和忠誠，來自于一個他勇于擔當并必須傳遞給值得接受這一神圣重擔的人的傳統，他不僅要正確和完整無損地傳遞給他們，而且還要加以強化和渲染。

俾斯麥曾經說過沒有什么東西像政治直覺一樣：政治天賦就是聽到遙遠的歷史駿馬馬蹄聲，然后通過超人的努力跳起并抓住騎手的衣服后擺的能力。沒有人比溫斯頓·丘吉爾更熱切地聽這攸關命運的聲音，在1940年他做了一個英雄的起跳。他寫道，“要想壓制由對可怕事情的長期權衡而帶來的內心激動，是不可能的”，而當危機最終爆發的時候他有所準備，因為經過畢生的努力他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內閣首相的作用是獨特的：“如果他踉蹌了，他必須站得住；如果他犯了錯誤，錯誤必須被掩蓋起來；如果他睡覺了，他必須不能被肆意打擾；如果他不是一個好人，他必須被撤換。”這是因為此時他是“英國的生活、它的啟示和它的光榮”的監護人。他完全相信羅斯福，“可以想見，為了處于可怕的危險中的世界自由事業，他會放棄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說公職了。”他的文章記錄了不列顛之戰的巔峰時刻出現和蔓延開來的緊張——“這是一個生或死都同樣偉大的時刻”。在似乎就要失敗的時刻產生的品質，就是面對致命危險的清晰、勇敢的認識和取勝的意志，這些都是燃燒著的歷史想象的產物，所依賴的材料不是外在的而是來自心靈之眼：當將來的歷史學家在平常日子的灰暗光線中去嚴肅地評價和解釋這些事實的時候，他們會發現這幅圖像的形狀和簡單性很難復制出來。

## 六

首相能夠把他的想象力和意志施加給他的國民，擁有伯里克利那樣的統治地位，嚴格地說是因為在國民面前他比真實的自己人更大、更高貴，并且在危機關頭把他們提升到一個不同尋常的高度。這是一種人們常常并不（也不應當）喜歡居于其間的氛圍；它需要高度緊張，持續下去就會毀掉所有的正常感覺，過分夸大人際關系，并且把普通的價值歪曲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不過，它到頭來確實改變了大量不列顛群島居民的自我認知，使他們的生活惹人注目，使他們穿上了自認為和彼此都認為與偉大的歷史時刻相稱的盛裝，把懦夫改造成了勇士，無所畏懼地抗擊敵人。

這是獨裁者和煽動家把和平的人們變成行進的軍隊的一種手段；丘吉爾的獨一無二、令人難忘的成就，就在于他在一個自由體制的框架中建立了這個必要的幻象，沒有破壞甚至沒有扭曲這個體制；就在于在緊急時刻過去之后，他喚起的精神沒有繼續壓迫和奴役人民；就在于他通過以歷史觀的術語解釋現在而拯救了未來，這種歷史觀沒有歪曲或阻礙大不列顛民族的歷史進步，而是以想象中的傳統或一個絕對可靠的、超自然的領導人的名義，試圖讓大不列顛民族實現一些不可能和難以企及的輝煌。丘吉爾沒有陷入浪漫主義的宿命，是由于他有著充分的自由主義意志感覺。如果說這種自由主義意志有時對現代專制的悲慘一面缺乏了解，那它對專制制度對人民的巨大欺騙中錯誤的、可笑的、卑劣的東西，還是保持了敏銳的覺知——有時候過于寬容，但仍然是敏感的。獨裁者有一些極為鮮明和極有特點的綽號：希特勒是“這個罪人，這個仇恨和失敗的怪胎”。佛朗哥是一個具有讓“淌血的民族”服從自己的“邪惡品質”的“心胸狹隘的暴君”。貝當政權未得到寬恕，它對傳統和永恒的法蘭西的借重被認為是對民族感情令人厭惡的嘲弄。1940年到1941年的斯大林是一個“集冷酷無情、詭計多端和學識淺薄于一身的巨人”。

對篡奪者的真正敵意——這在丘吉爾那里甚至比對權威和秩序的熱愛還要強烈，來自于丘吉爾和羅斯福都同樣明顯具有的一種品質，即對生活非同尋常的愛，對施加給人類關系豐富多樣性的嚴苛約束的痛恨，對促進、妨礙或歪曲成長和活力的東西的本能感知。但因為丘吉爾如此熱愛著的生活本身，是作為對傳統虛飾的一部分戴著歷史面具展現給他的，因此他建構歷史敘述的方法、重點的擺布、人物和事件相對重要性的分配、歷史理論、敘述的構架、句子結構、語句本身，都成為復活歷史的要素——這種復活，就像文藝復興或攝政時期的新古典主義一樣鮮活、原創和具有個人特點。由于認為不帶個人色彩、單調、缺乏戲劇性的必然是無足輕重的，從而在總體上遺漏了太多東西，這種抱怨也許是合理的。歷史學家認為事實并且只有事實是有趣的，更糟的是他們認為所有事實都同樣有趣。抱怨丘吉爾復活歷史的辦法不是當代的，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要比那些客觀的歷史學家看待事實所戴的模棱兩可、不偏不倚的眼鏡缺少真實性，對現代需求缺少反應，這不就是怯懦的賣弄和盲目嗎？

## 七

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的不同之處，至少在一個方面比國家特點、教育甚至氣質上的明顯差異更顯著。雖然羅斯福有歷史感，生活上富足、無憂無慮、悠閑自在，對個人安全堅信不疑，在美國之外的更大世界里處之泰然，但他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和新世界之子。相比之下，盡管丘吉爾熱愛當下，渴求新知識，感知當代技術可能性，并在大膽運用技術方面思緒飛揚，盡管他熱心基礎英語，盡管訪問莫斯科時他的連身工作服讓主人們很不舒服，他仍然是一個19世紀的歐洲人。

差異是深刻的，這足以說明丘吉爾和他所敬重的美國總統在世界觀上的不相容性。美國和歐洲，也許是20世紀和19世紀的某些根本不同，在這種引人注目的互動中似乎具體化了。20世紀之于19世紀，猶如19世紀之于18世紀。塔列朗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見解，即那些沒有在舊體制下生活過的人們，不知道真正的生活樂趣是什么樣子。實際上，從我們的角度看，這一點是清楚的：19世紀初期那些熱切的、浪漫的年輕人似乎不能透徹理解或喜歡革命前世界最文明的代表的生活態度。尤其是在法國，那里的差異最明顯。諷刺，尖刻，眼光狹隘，專盯著性格、風格上的細微差異，對隱隱可辨的色彩差異的先入之見，極端敏感，這些都使得即使像狄德羅這樣“先進”和富于遠見的人的生活，都截然不同于浪漫主義者更寬廣而簡單的視野——這就是19世紀在理解事物上所缺乏的歷史觀。

假設雪萊遇到伏爾泰并進行交談，他的感受會怎么樣呢？他極有可能深感震驚，震驚于眼界的狹隘、覺悟的小氣、顯見的淺薄和苛求衣食、伏爾泰那種惡意的似乎是老處女般的細心、對小物件的沉迷、對經驗細枝末節的追逐。他可能會對漠視當時大的道德和精神問題感到厭惡或痛惜，這些問題范圍之廣泛、意義之重要，使得最優秀和最清醒的心靈感到痛苦不安。他可能會認為他是不道德的，但更可能會認為他粗俗，過于尖刻，過于渺小，過于小氣，荒誕不經和無恥猥瑣，會在莊嚴的場合傻笑。

反過來，伏爾泰很可能會極為厭煩，看不到這么多倫理雄辯的充分理由；他在所有道德興奮點上都會眼光冷淡而充滿敵意：圣西門對于世界的宏大構想（它使半個世紀之后的左翼年輕人深感激動），借助科學、技術和精神資源，改變了世界的形狀，將它整合為一個整齊劃一的人造體。這在伏爾泰看來似乎是一片沉悶和單調乏味的沙漠，過于同質化，味同嚼蠟，虛幻縹緲，對那些小的、隱而不露但關鍵性的差異和不協調視而不見——它們賦予經驗以個性和意味，沒有它們就不會有文明的遠見、智慧、對話，當然也不會有從一種高雅和考究的文化中產生出來的藝術。在他看來，19世紀的道德觀是一臺單調、模糊、粗糙的機器，它無法識別光線的焦點，無法識別聲音和顏色的短命模式，這些模式轉瞬即逝的無限變幻就是悲喜劇，即人際關系、人情世故、政治、歷史和藝術的內容。

這種溝通上的失敗，原因并不只是觀點的變化，也是把兩個世紀區分開來的眼光類型。18世紀的眼光是微觀的，19世紀的眼光則是宏觀的，它的眼界寬多了——是以普遍的至少是歐洲的方式來觀察，看到的是大山的壯麗輪廓，而18世紀敏銳地看到的，只是山坡的紋理、裂縫和不同陰影。18世紀眼光的目標更小，眼睛離客體更近，19世紀重大的道德問題并不在其敏銳鑒別力的關注范圍之內：那是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破壞性差異，它導向了某種并不必然更好或更壞、更丑或更美、更深遠或更淺薄的東西，但首先是不同種類的情景。

與這種差異類似的某種東西把美國與歐洲（同樣把20世紀與19世紀）區別開來。美國的眼光更寬闊、更大方；雖然表達方式局促，但它的思想以一種宏大的、廣泛的單一觀點，超越了民族和種族的藩籬，超越了世界觀差異。它重物而不是人，觀察世界（那些在19世紀以這種方式來觀察世界的人被看成是烏托邦式的怪物）借助的是豐富而具有無限可塑性的原始材料，這些材料有待于建構和設計，以用來滿足世人對幸福、善良和智慧的渴望。因此，把它以極端方式與歐洲人區分開的差別和沖突，似乎必定是瑣細、非理性和可憐的，對自尊而道德上自覺的個人和民族沒有價值；事實上，這些差別和沖突很容易被支持關于現代人任務和權力的更為宏闊的觀點所抹除。

對歐洲人來說，這種美國人的態度，這種可能只是為那些生活在山巔和平原上的人們提供一幅全景畫的大范圍展望，似乎出奇地平淡，沒有細節或色彩，有時似乎缺乏深度，當然也沒有那種對于或許只有住在山谷里的人才具備的精細辨別力的即時反應，因此在他們看來，美國人知道的多，但理解的太少，忽略了中心思想。當然，這并不適用于每一個美國人或歐洲人——在歐洲當地人中有天生的美國人，反過來亦如此——但它似乎刻畫了這些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 八

從某些方面來看，羅斯福朦朧地理解并且沒有完全責備歐洲人表現出來的這種態度。更清楚的是，丘吉爾在很多方面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有著本能的同情。但總的來說，他們并不代表不同的世界觀，他們能夠深深理解和敬重彼此的才能，這就是他們不尋常的想象力和都喜愛生活多樣性的明證。在一方看來，另一方不僅僅是盟友，是一個偉大民族令人欽佩的領袖，還是一個傳統和文明的象征；他們的異中之同，就是期待著西方世界的復興。

羅斯福被難以捉摸的俄羅斯人所吸引，丘吉爾則在外國人和沒有吸引力的象征物面前本能地退縮。總的來說，羅斯福認為自己可以哄騙甚至誘惑俄羅斯，把它同化進包含整個人類的偉大社會中來。丘吉爾則持懷疑態度。

羅斯福是一個圣公會教徒，富有想象力，樂觀，自信，愉悅，相信經驗，無所畏懼，精通社會進步的觀念。他相信，有了足夠的精力和精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成。他就像英國小學生那樣，退縮以躲避對表層之下東西的深入了解，并且看到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間許多密切關系，從中可以以某種方式建立一種新的、更自由、更富裕的秩序。丘吉爾也富有想象力，精通歷史，更嚴肅，更用心，更專心，心事更重，深感長久的分歧會讓這樣一個秩序難以實現。他相信制度和種族、階級、個體類型的永久特點。他的政府是按照明確的原則組織起來的；他自己的辦公室紀律嚴明。他的習慣雖不尋常，卻有規律。他相信自然的、社會的，還有近乎形而上學的秩序——一個不可能也不期望被破壞的神圣的等級制度。

羅斯福相信靈活性，隨機應變，以無限多樣的新的、出其不意的方式富有成效地運用人力和資源。他的機構有些混亂，或是故意如此。他自己的辦公室并不組織有序，他習慣了高度個人化的政府。他讓擁護制度權威的人很生氣，但令人生疑的是，他是否用其他方法達致目標。

世界觀上的這些差異是深刻的，但它們在范圍上很大，又都是真實的觀點，沒有被個人的癖性和道德標準上的差別所局限和扭曲，這些標準把威爾遜、勞合·喬治與克萊蒙梭截然區分開來。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經常有分歧；他們的理想和方法很不相同；在羅斯福總統隨行人員的回憶錄和隨筆中對此多有涉及。但關鍵是，這種討論是在兩位政府首腦清醒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會彼此反對，但從不希望彼此傷害；他們會簽發相互矛盾的指令，但他們從不爭吵。當他們妥協的時候——正如他們經常做的那樣，他們沒有痛苦感或失敗感，而是作為對歷史的需求或對對方的傳統和人格的回應。

他們彼此把浪漫輕松的一面展示給對方，遠遠高出盟友或下屬們的爭斗：他們的會議和通信成為他們雙方有意突出的事情；他們是有王室血統的表兄弟，都為這層關系感到自豪，他們對對方古怪脾性的認識敏銳、有時有趣，但從不諷刺。在歷史大變動期間結成的這種關系，會被它的嚴肅性有所夸大，而從未減弱或退化，而是保持著正式的尊嚴和高漲的情緒，這在以前國家首腦的關系中幾乎沒有過。每個人與其說是被對方，還不如說是被對方的思想所吸引，被自己獨特的興奮所感染。

相互間的關系是真誠的，這是由于有某種甚至超出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或個人和官方的尊重或敬佩的東西，就是說，是由于他們彼此喜歡對方的生活怪癖和幽默，以及對生活的主動參與，喜歡到了特殊的程度。這是一種獨特的私誼，哈利·霍普金斯理解并極力鼓勵這樣做。羅斯福的趣味感或許是輕松的，丘吉爾則有些嚴肅。但這正是他們彼此共有并與盎格魯——撒克遜圈子之外的少數政治家（如果說有這種政治家的話）共有的東西。助手們有時忽略或誤解了這種東西，它使兩人的交往具有非凡的品質。

羅斯福的公開講話不同于丘吉爾引起全世界注目的杰作，但他們在精神或本質上并不矛盾。羅斯福沒有給我們留下來他對世界的解釋，或許他的日常生活更多地被執行這樣一個任務所占據。但他們都完全清楚彼此在當代世界歷史上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并且丘吉爾對他的管家角色的描述，是帶著對這種責任的完全清醒認識寫下來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他以相應的嚴肅態度來對待。他就像是歷史舞臺上的一個偉大演員——或許是他這一類人中的最后一個，在燈火輝煌中以一種大氣、從容不迫和高雅的語調說著令人難忘的臺詞，這同樣地適合于這樣一個人，他知道他的工作和他這個人將成為很多代人研究和判斷的對象。他的敘述是一個偉大的公開演出，具有形式上的重要意義。這些語詞、輝煌的短語、經久不衰的情感品質，是表達他對自己和世界看法的一種獨特手段，將像他已經說過和做過的所有事情一樣，必然強化聞名的公眾形象，這不再能與作者的內在本質和真實特點區分開來：一個極為出眾的人，比普通人更大方、更質樸，在他有生之年就成了一位歷史巨人，膽識超人，身體強壯，富有想象力，是他的民族所產生的兩個最偉大的實干家之一，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演說家，他的國家的救星，一個屬于現實同樣也屬于傳說的神話英雄，我們時代最大寫的人。

#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

我從來沒有同羅斯福總統會面過，雖然戰爭期間我在華盛頓待的時間超過了三年，但我甚至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我對此感到遺憾。在我看來，看見某個多年來占據人們想象的人物，特別是聽見他的聲音，一定會以某種深刻的方式修正人們的印象，使它更為具體、更富立體感。然而，我真的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僅僅是在廣播上聽到過他的聲音。結果，我必須在無法得力于個人熟識，或許還應該加上，在對美國歷史或國際關系沒有任何專業知識的情況下，來努力向大家介紹我對羅斯福總統的印象。我也沒有能力去評論羅斯福的內外政策，或這些政策更大的政治或經濟效果。我這里只能試著就羅斯福總統的人格在我們這一代歐洲人中產生的廣泛影響描述一下個人的印象。

當我說某個人多年來占據人們的想象時，這對羅斯福和我們這一代英國人，或許對歐洲大部分地方的人，事實上是對整個世界的人來說，確實是真的。在20世紀30年代，如果一個人尚且年輕，生活在民主國家，不論其政治觀點如何，如果他有著真正的人類情感，有著最微弱的社會理想主義火花，或對任何一種生活的熱愛，那么他的感受一定會類似于在拿破侖被打敗之后的復辟時期歐洲大陸年輕人的感受，一切黑暗而沉寂，大的反應傳布開來：少許激動，絕無抵抗。

一切都開始于1931年的股市暴跌，它削弱了很多中產階級年輕人的經濟安全感，其實這種感覺也許是沒有什么根據的。隨后是30年代的鐵幕，那個時代的英國詩人們——奧登、斯彭德、戴·路易斯——留下了非常生動的證明：黑暗的、沉悶的30年代，是所有時期中孤獨的時光，沒有一個歐洲人愿意退回到那時，除非他對法西斯主義的消失感到悲痛。在那個年代出現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希特勒、反饑餓示威游行、阿比尼西亞戰爭、和平投票、左派圖書俱樂部、馬爾羅的政治小說，甚至還有弗吉尼亞·伍爾夫發表在《工人日報》上的文章、蘇維埃的審判和清洗，年輕的理想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分子皈依共產主義或對共產主義強烈同情，這似乎是堅定和強大到足以有效抗拒法西斯主義敵人的唯一力量——常常找不到比這更好的理由；有時與這種皈依相伴的，是到莫斯科訪問或在西班牙戰斗，犧牲在戰場上，要不然就是對共產主義實踐痛苦而憤怒的幻滅感，或在兩種程度較輕的罪惡之間作出絕望和牽強的選擇。

那些日子里，最動人的宣傳說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力量過時了，現在就是要在兩個陰郁的極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紅色和黑色之間作出選擇。對于還沒有被這些喋喋不休的說辭弄得失去理智的人們來說，黑暗中的唯一光明就是美國的羅斯福政府和新政。在民主世界處于虛弱和絕望與日俱增的時候，羅斯福散發出信心和力量。羅斯福是民主世界的領袖，在30年代的所有政治家中，唯有他身上沒有陰云籠罩——陰云既沒有籠罩他也沒有籠罩他的新政，在歐洲人看來新政更是人類歷史上的光明篇章。說他的偉大的社會實驗是在無視外部世界的孤立主義指導下進行的，這是正確的。但是，這在心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國誕生于對長期受宗教和民族沖突困擾的歐洲的愚蠢和惡行的反抗，自然要尋求不受歐洲生活潮流干擾的解放，特別是在歐洲眼看要墮入極權主義夢魘的時候。羅斯福尋求并非特別的外交政策，如果說不是完全沒有外交政策的話，確實是把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降到最低限度，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美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羅斯福的做法，得到那些發現歐洲景況凄慘的人的原諒。

他的國內政策顯然出于人道的目的。20世紀20年代放縱的個人主義，帶來了經濟崩潰和普遍的災難。在這之后，羅斯福力求建立新的社會公正規則。他這樣做并沒有逼迫國家穿上純理論性的束身衣，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抑或是法西斯帝國作為新秩序所炫耀的某種新的社會組織。美國的社會不滿達到最高點，把企業家作為社會救星的信念在著名的華爾街經濟崩潰之后一夜之間煙消云散，羅斯福正在為壓抑的怨恨和悲憤提供一個巨大的安全閥，試圖阻止革命的發生，并為更大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公平——美國生活傳統中最好的部分——構建一個制度，而不改變美國自由和民主的基礎。在沒有同情心的批評家看來，做事的似乎是這樣一些人的雜亂集合：業余人士、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私人朋友、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思想家，這些人今天都被稱為飽學之士，他們的真正面目和領導企業或制定政策的方法，激怒了華盛頓歷史悠久的政府機構中的公仆們和頭腦清晰的各種類型的保守主義者。但明顯的是，恰恰是這些人還不熟練，恰恰是他們被允許盡情地發表意見、進行試驗、沉溺于大量的試錯，恰恰是私人關系而非體制上的關系，才帶來了它自己的活力和激情。華盛頓無疑充滿了爭論、辭職、宮廷密謀，個人與個人團體、黨派、小集團、名將的私人支持者之間無休無止的戰爭，這必定讓習慣了慢節奏和更規范的行政模式的嚴肅而負責的官員們生氣；至于銀行家和商人們，他們的感受過去有分量，但在那個時期他們很少受到關注，因為他們被認為把自己的名聲給深深地敗壞了，事實上是給永久地敗壞了。

這個廣大而劇烈的混亂控制了一個漂亮、有魅力、歡快、非常勤奮、非常樂觀、闖勁十足的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人們指責他缺點太多。他背判了自己的階級；他愚昧無知、不講規矩、不負責任。他在玩弄別人的生命和職業方面心狠手辣。他被冒險家、狡猾的機會主義者、陰謀家所包圍。他冷嘲熱諷、厚顏無恥地對個人、團體和外國代表作出互相矛盾的承諾。他以他巨大的和不可抗拒的公眾魅力、他驚人的高昂情緒，彌補了他在其他方面優點的缺失，而這些優點被認為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的領袖更為重要的——努力、勤勉、負責等優點。所有這些都是對他的指責，其中一些可能確實是公正的。吸引他的追隨者的是，他擁有罕見而令人鼓舞的品質：他胸懷寬廣，有著遠大的政治見識、強大的想象力，了解他生活的時代和20世紀正在起作用的巨大的新力量——技術、種族、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方向；他支持生活和運動，支持盡最大可能慷慨地促進最大多數人希望的實現，他不支持謹慎、節儉和清靜無為。總之，他完全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

他是20世紀或者包括其他世紀少數幾個看起來對未來完全沒有恐懼感的政治家之一。不管發生了什么事，他都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應對局面和取得勝利的能力。他信任助手們的能力和忠心，因此他以平靜的目光看待未來，好像在說：“來吧！不管可能是什么東西，都會被我們粉碎，我們將它變成有益之物！”正是這一點，或許還有其他品質，讓他吸引了觀點極為不同的人們。在一個令人失望的世界上——這個世界好像被奔向毀滅的卑鄙而致命地高效的狂熱者、奔波忙碌著的困惑人群、缺乏熱情而在他們無法解釋的事業中殉道的人所撕裂，他相信自己阻止這個可怕潮流的能力，只要他還在掌控局面。他有著獨裁者的性格、精力和手腕，他站在我們這一邊。在他的言論和公開活動中，他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對他的所有政治的、私下的和公開的批評可能都是真的；他的敵人和一些朋友所認為的他的所有缺陷可能都確有其事；然而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是獨一無二的。當歐洲的天空越發陰暗的時候，特別是戰爭爆發后，對于歐洲那些貧窮和不幸的人們來說，他就是一個仁慈的半神半人，只有他能夠并且最終會拯救他們。他的道德權威——他在他自己國家之外獲得的信任程度，遠遠超出了在他們心目中所有時代的美國先驅者——是無可匹敵的。威爾遜總統在早些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當他勝利地乘車穿過巴黎和倫敦的時候，或許引發了一些類似的情感；但它隨后就消失了，并留下了可怕的失望感。甚至他的敵人都很清楚，羅斯福總統不會像威爾遜總統那樣被擊倒。他為他的聲望和他的人格增加了一點政治技巧——真正的精湛技巧——這是他之前的美國人所不曾具有的。他實現自己愿望的機遇顯然是非常大的；他的追隨者不可能收獲痛苦的失望。

實際上他非常不同于威爾遜總統。因為他們代表了兩個對比鮮明的政治家類型，每個類型中都不時會有才干卓著的人物出現。第一類政治家是單原則和有信仰眼界的人。由于執迷于他自己光明而清晰的夢想，他常常既不去理解人民也不去理解事件。他沒有懷疑或遲疑，通過集中意志力、直率和力量，他能夠忽略許多身外發生的事。這種極端盲目和固執的專注，在某些場合能使他讓事件和人物屈從于他自己的固定模式。他的力量在于這樣一個事實：軟弱和優柔寡斷的人們自己沒有安全感，沒有能力在選擇之間作出決定，他們從對一個超人之類的領導人領導才能的屈從中發現了輕松、安全和力量。對他來說，所有爭論都是清晰的，他的宇宙完全是由原色組成的，主要是黑色和白色，他朝著目標的行進看起來既不向右又不向左，依靠他內在的強大的洞察力來支持。這樣的人在道德和智識品質上差異很大，就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樣，在世界上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爾、戴高樂，或許列寧也屬于這個類型——我這里描述的區分不是道德意義上的，不是一種價值而是一種類型。在這個范疇里面，既有像威爾遜這樣偉大的恩人，也有像希特勒那樣可怕的壞蛋。

另一類有影響的政治家是天然的政治生物，因為樸素的英雄常常是明確地反對政治的，至少從表面上看，是要把人們從政治生活的錯綜復雜和欺騙中解救出來的。這第二類政治家有著最精微的觸須，它們以難以或不可能進行分析的方式傳達給他們，他們周圍事件、情感和人類活動不斷變換的輪廓——他們天生就有一種獨特的政治感覺，依靠的是一種以精確的印象考慮問題、整合大量轉瞬即逝而難以捕捉的細節的能力，就像藝術家處理他們的材料時所具有的能力。這類政治家知道如果要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要做什么、何時去做。他們知道自己常常不是天生局限在一些內心深處的思想或內向的情感的私人世界里，他們是把他們的大量同胞以某種模糊的、不能言說但執著的方式正在思考和感受的東西具體化、強化和清晰化。憑著這種能力去判斷他們的材料，非常像雕刻家那樣知道能夠從木材中塑造出什么、從大理石中塑造出什么，知道怎樣和何時去塑造，他們類似于有著天生治病能力的醫生——這種能力不是直接依賴于只有通過觀察和試驗，或從其他人的試驗中才能獲得的科學解剖學的知識，雖然沒有知識就不會有能力。這種直覺的——或至少是不能傳達的——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人們需要的東西的知識，這種洞察財富所在的能力，是某種為許多類型的天才、為科學家和數學家共同擁有的東西，同樣也是許多類型的商人、管理人員和政客共同擁有的東西。這些人，當他們是政治家的時候，敏銳地知道人類思想和情感的流動方式，知道在哪里生活最沉重地壓迫著人們。他們傳達給這些人的是這樣一種感受，就是他們理解人們的內在需要，對人們最深層的沖動作出了反應，總之就是他獨自能夠按照群眾正在本能地探索的路線去組織世界。俾斯麥、亞伯拉罕·林肯、勞合·喬治和托馬斯·馬薩里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格萊斯頓，在更小的程度上沃波爾，屬于這類政治家。羅斯福是這種類型中了不起的能手，他是現代他這一行當中最仁慈的也是最偉大的大師。他確實渴望人類過上更好的生活。盡管新聞界的敵意在蓄積，不斷有預言說他走得太遠了，不能再次當選總統，但在羅斯福的四個任期中，他在美國大選中獲得絕大多數選票，完全是由于一種模糊的情感：對大多數美國公民來說，羅斯福是站在他們一邊的，他祝他們好運，他會為他們干事。這種情感漸漸擴散到整個文明世界。對貧窮者和受壓迫者來說，他成了一個傳說中的英雄——他們也不大清楚為什么會這樣，遠遠超出英語世界的范圍。

正如我前面說的，他被他的一些敵人指責背叛了他的階級，他確實是這樣的。當保留著一些自由貴族成長其中的舊秩序的風度、生活方式、感情結構和魅力的一個人反抗他的生活環境，并且接受新的、社會反抗階級的觀念和渴望時——接受這些東西不是出于權宜之計，而是出于真實的道德信念或對生活的愛，他無法再站在他認為狹隘、卑鄙、帶有限制性的一邊——結果是令人著迷和富于吸引力的。這就是使得像孔多塞、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或者其他一些19世紀俄羅斯、意大利、波蘭的革命者具有如此吸引力的東西；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可能一直同樣是摩西、伯里克利，或愷撒大帝吸引人的奧秘所在。正是這種紳士風度的品質，連同這樣一些事實：他們感到他在斗爭中會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支持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反抗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戰爭中他開放和無所畏懼地放棄中立，使他在戰爭歲月里為英國人深深地喜歡。我清楚地記得，倫敦的大多數人在1940年11月聽到美國總統選舉結果時是何等激動。從理論上說他們不應該擔心。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強有力地和言辭懇切地把自己說成是民主體制的支持者。然而說英國人對兩個候選人在感情上保持中立，那是荒唐的。他們骨子里就覺得羅斯福是他們終生的朋友，他同他們一樣痛恨納粹，他希望他們所信仰的民主和文明取得勝利，他知道他需要什么，并且他們的理念與他的目標是相似的，而與他所有對手的目標相似之處就要少一些。他們感到他是真心實意的，因此他們不關心他的政治任命是在老板們影響下作出的還是出于個人原因，抑或是輕率作出的；不關心他的經濟學說是否離經叛道，他是否充分謹慎地重視眾議院或參議院的意見、美國憲法的藥方，或最高法院的意見。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知道，他會以他巨大的活力和能力給他們以保證。還沒有什么事情具有這樣長久的大眾魅力；群眾知道他們真正喜歡什么，什么東西是真正吸引他們的。德國人想著希特勒是什么樣子，事實上希特勒大概就是什么樣子；生活在歐洲、美洲、亞洲、非洲、澳大利亞，還有產生政治思想基本原理的別的任何地方的自由的人們——所有這些人感到羅斯福是什么，他事實上就是什么。他是民主體制最偉大的領導人，是20世紀社會進步最偉大的擁護者。

他的敵人指責他密謀把美國拖進戰爭。我不想討論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種指責缺乏證據。我認為，當他發誓要讓美國處在和平之中的時候，他想要竭力做到這樣，這與幫助民主國家促進勝利并不矛盾。有一個時期，他必定想到他能夠不介入戰爭而贏得勝利，后來他就處在作為世界命運仲裁者的獨特地位——迄今還沒有人得到這樣的地位，不必去撫慰那些卷入戰爭而不可避免地帶來的痛苦力量，這些力量成為締造和平所需的理性和仁慈的障礙。毫無疑問他非常相信自己臨機決定的神奇力量。他無疑有很多政治錯誤，其中一些已經難以彌補了：有些人會提到斯大林和他的意圖、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另一些人會公正地指出他對自由法國運動的冷淡態度，他對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紳士想法，還有他在很多其他問題上的錯誤。他讓他堅定的支持者和忠誠的仆人憤怒，因為他沒有告訴他們正在發生什么事；他的政府是高度個人化的，這讓那些頭腦清晰的官員們憤慨，讓那些認為必須與他們磋商并經他們通過后才能制定政策的人蒙羞。他有時候也讓他的盟友們生氣，但當他們后來想到在美國和世界上有想看羅斯福笑話的人，想到這些人動機是什么，他們對他的尊重、愛戴和忠誠就又回來了。沒有人樹立更多公開的敵人，也沒有人有權利為這些敵人中的某些人的平等和動機感到自豪。他可以公正地稱自己是人民的朋友，雖然他的反對者指責他是一個煽動家，這種指責在我看來是不公正的。他并沒有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基本的政治準則；他沒有僅僅為了向那些他不喜歡或他想征服的人實施報復或者因為他發現這正是他易于操控的環境，而激發邪惡的情緒；他明白，他的行政工作必須走在輿論的前面并引領輿論，而不是受輿論的拖累；他讓他的大多數同胞比以往更為身為美國人而自豪。他們親眼看到他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也非常真切地看到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人不同尋常的轉變。或許這主要來自他20世紀20年代早期身體垮掉和他在戰勝殘疾上的巨大勝利。因為他一開始的形象是一個出身名門、有禮貌、沒有特別天分的年輕人，有些自以為是，在格羅頓和哈佛得到了同齡人的喜歡而非特別的敬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一個能干的海軍部副部長；總之，他似乎是帶著溫和的政治雄心開始了一個美國貴族常規的職業生涯。他的疾病，他夫人的政治品質和對他的支持、鼓勵——歷史當然會記錄下來她的高潔品格和善良心地，似乎以一種完全獨特的風格，把他的外顯人格變成了一個強壯的、仁慈的維護者，他成了民族之父。他做的不止這些：他還改變了政府及其對人民的義務的基本概念。福利國家雖受到諸多指責，但顯然已成時尚：對生活和社會服務最低標準的直接道德責任，今天理所當然地被西方民主國家中最保守的政治家幾乎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共和黨1952年競選獲勝后，也沒有去顛覆羅斯福社會立法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在20世紀20年代還被視為烏托邦。

羅斯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在確保取得對自由的敵人的勝利之后），就是他表明，政治上的有效和仁慈是可能的，并告訴人們：按照20世紀30年代激烈的左翼和右翼的宣傳，對政治權力的征服和占有是與人類的品質不相容的，但它必然要求對之嚴肅追求的人們把生命犧牲在某種無情的意識形態或專制統治的祭壇上——這種充斥在當時的藝術和談話之中的宣傳，很容易看出來是假的。羅斯福的榜樣強化了世界各地的民主體制，就是說，促進社會公正和個人自由的觀點并不必然意味著所有效能政府的終結；力量和秩序并不同于學說的束身衣，不管是經濟學說還是政治學說；把個人自由——松散的社會結構——與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組織和權威調和起來是可能的；羅斯福最偉大的前任曾把這個信念描述為“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27](#_27_12)

# 哈伊姆·魏茨曼

## 一

哈伊姆·魏茨曼的成就，和他公眾生活的細節，我這里有大量文獻需要記述或進行分析。他的個人特點不那么出名。他是我有幸熟悉的唯一一個天才政治家，我樂于試著去傳達他那種天分的點滴。所謂“點滴”，就是它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罕見人物的生活和特點的一小部分。

理解一個偉人，或分享他的友情，必須永久地轉變人們關于人類可能是什么或做什么的觀點。不同學派的社會理論家有時試圖讓我們相信，“偉大”這個概念是一個浪漫的幻象——一個被政客或鼓動家濫用、對事實深入考察就能拆穿的粗俗概念。除非當面遇到一個真正的偉人和他的杰作，你無法最終駁斥這個貶值的概念。“偉大”不是一個特定的道德屬性，也不是一種私德。它不屬于人際關系范疇。一個偉人不必有好的德性，或正直，或仁慈，或細膩，或討人喜歡，或具有藝術或科學天賦。稱一個人是偉人，是說他在滿足或對人類的核心利益產生實質影響方面，有意邁出了（或可以邁出）一大步，這遠遠超出普通人的能力。配得上“偉大”這個字眼的思想家或藝術家（我并不必然意指一個天才），必須極大地推動社會朝著人們一直在追求的某些思想或審美目標前進；或者改變人們的思維或情感方式，這是此前人們在個體能力限度內想不到的。這樣一個成就，有時被那些為此而著迷的人看作人類解放的一個壯舉，有時被看作一種奴役，有時是兩者兼而有之。同樣，在行動領域，偉人似乎僅靠單槍匹馬就能夠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或者永久和徹底地改變極大一部分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真正稱得上偉人的人，他所帶來的變化，必須是那種最具判斷力的人認為是先前不可能的——某種靠事件的力量、靠時代“潮流”或“趨勢”難以帶來的東西，也就是說，是某種離開干預難以發生的、先前也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引起這個變化的人才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偉人。無論如何，那就是人們回顧后得出的看法。這是不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人類（例如馬克思或托爾斯泰）事實上是否高估了他們某個人的重要性——某種不承認存在英雄、沒有人情味的歷史觀是否在事實上是正確的，這里姑且不論。英雄創造或打斷了一個民族的生活，如果這個概念來自一個幻象，那么盡管所有重要的論據都反對它，它還是一個非常持久的、強迫性的和普遍的幻象。這已得到我們時代經驗的有力證明。就我眼下的目的而言，我至少可以說，這不是虛假的，而是一個真實的社會歷史觀。因此，我樂于開始論證這個相對謹慎的命題：如果曾經有過偉人——英雄，或者更具體地說，如果有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說成是那種永久和深刻改變很多人生活的革命的創始人，那么魏茨曼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是我要努力加以說明的。

我曾經說過，偉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由于他的積極干預，那些看起來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結果真的發生了。很難否認這樣一點，就是那些最終導致創建以色列國的行動屬于不可能或出人意料的一類。當西奧多·赫茨爾開始宣揚通過用列強認可的、正式而公開的行動建立一個現代類型的猶太主權國家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可能的時，那些最明智、最穩健、最理性的人們，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誰聽了都認為這是一個瘋狂的計劃。確實，很難想見他們會有別的反應。

在19世紀，猶太人的處境極不正常。他們散居世界各國，其組成難以用諸如國家、種族、協會、宗教或其他常用來描述世襲或傳統類型聚合團體的概念來界定。“猶太”明顯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國家”：他們沒有構成其上多數人口的固定疆域；他們甚至不能被描述為多民族帝國——如奧匈帝國、俄羅斯或英國——中少數種族或民族意義上的那種少數；他們沒有一片可以稱之為祖居地的國土，而威爾士人、斯洛伐克人、魯塞尼亞人、祖魯人、韃靼人甚至北美土著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都是在他們祖先土地上生活的綿延不絕的群體。當然，猶太人有自己的宗教，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好像并不用任何能夠明顯識別的方式對此有所表示；但是他們不會被界定為獨立的宗教主體；當猶太人在近代遭到歧視或迫害時，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遭人厭惡的并不是他們的宗教儀式；當猶太人放棄他們的信仰皈依基督教時——如狄斯累利、卡爾·馬克思或海涅，仍會令人想到他們是猶太人或出身猶太之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祖上已經習慣了同周圍人群不一樣的宗教。畢竟，沒有誰會說他人是基督教長老會、羅馬天主教或穆斯林出身或世系；一個人或許會被認為是來自土耳其或印度——但不會被認為是穆斯林家系或來自穆斯林種族。

那么，何謂猶太人？他們是一個種族嗎？“種族”這個詞仍讓人感到意味著某些見不得人的聯系。有時人種學家使用“印歐”或“蒙古”這樣模糊的歷史學概念。語系只是偶然地被劃分為雅利安語系、含語系或閃語系，但這些至多是定義說這些語言的人的文化的技術術語。直到上個世紀末，種族作為一個政治性描述，還不是那些思想上體面的人們的觀念；他們被認為是與令人不齒的民族沙文主義或文化沙文主義態度聯系在一起的。實際上，正是其可怕的鼓動色彩，使得這個詞被看成有嚴重的偏見。那些能干的人種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競相去證明沒有“純粹”的種族，證明這個概念完全是模糊和混亂的。

但是，如果猶太不是一個種族，那么他們又是什么呢？是一種文化或“生活方式”嗎？猶太人至少在西方國家參與了他們所在國家的文明進程。姑且不說這些，從界定如此易識別之物的角度看，“猶太”是一個非常淺顯的概念，就是這樣一群人，他們的情感是強烈的、確定的，看上去很清楚就是猶太人。因為毫無疑問，在世界觀和行為方式上，甚至在外部身體特點上，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一些很容易看出來的、持久的、遺傳性的基本區別。面對明顯的事實，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不難作出判斷。在基督教世界里，猶太人的殉教如此痛苦和聲名狼藉，對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致對經過啟蒙的和文明的人們來說，有一種自然的傾向去完全否認這個問題，或堅持說它過于夸張了，或許，只要它不是被頻繁地談論和提及，可能很快就會徹底消失了。

這是很多猶太人自己非常渴望采取的態度。他們中間比較樂觀的“融合論者”天真地認為，由于教育和自由文化的普及，猶太人能夠和平地融入他們的周圍環境，如果猶太教繼續存在的話，那些信教的人會被他們的基督教同胞認為是完全不同于長老會或圣公會信徒的異類，在羅馬天主教教徒占多數的國家里則會被認為是完全不同于唯一神派或公誼會信徒的異類。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情況正在西方國家里發生著；在很大程度上，到現在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但有時一個小小的開端會造成嚴重的后果。說猶太人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像意大利人或至少像亞美尼亞人那樣，同時它還擁有一個以國家形式組織起來的民族所具有的地盤——事實上它完全會被認為具有這樣的權利，不管怎么說，這樣一個概念對絕大多數考慮過這個問題的人來說是荒誕不經的。說猶太人事實上就是一個民族——雖然是一個非常古怪而散居各處的民族，他們最終會返回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屬于他們自己的某種形式的國家——這對于那些有很強想象力的與世隔絕的浪漫主義者，比如拿破侖、富歇或俄國十二月黨人革命中的彼斯捷爾等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想法。這些仍然是沒有人嚴肅對待的胡思亂想，甚至產生這種想法的人們也不會當真。所以，到了世紀末，當像英格蘭的勞倫斯·奧利芬特、法國的埃內斯特·拉阿拉納這樣仁慈的天主教徒，或像薩爾瓦多、摩西·赫斯這樣的政治評論家，或拉比希爾施·卡利舍鼓吹要返回圣地時，這還被當作一個怪論，甚至是危險的謬論。當小說家狄斯累利或喬治·艾略特用這種浪漫的鄉愁作為體裁時，它可能會被當成有關理想化過去的觀點的老練版本而摒棄——夏多布里昂、司各特和德國浪漫主義者使之時興起來。這是新的歷史想象，可能還是宗教的或美學的或心理學想象的奇異果實，但與政治實踐沒有任何關系。虔誠的猶太人每日祈禱三次要回到錫安，這是相當自然的，這被看作是表示渴望彌賽亞的降臨，渴望這罪惡與痛苦世界的終結，渴望上帝治世的到來，并完全遠離有關政治自決的世俗觀念。即便東歐猶太人中間世俗教育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在貧窮的俄羅斯猶太人中引發相當的動蕩，致使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在俄羅斯引發屠殺浪潮之后）到巴勒斯坦去建立小型的、理想化的農業定居點，即便巴黎的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男爵用他獨特的、富有想象力的寬厚行動拯救這些殖民地使之免于滅絕，并帶來相當程度的農業發展之后，所有這些仍然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實驗，是一個古怪、高尚、令人感動而感傷的姿態，但不是現實生活。

當猶太國家的概念終于真的傳播開來，傳到了西方國家，吸引了像約瑟夫·張伯倫和米爾納這樣嚴肅而有影響的政治家時，當它激起像赫伯特·塞繆爾這樣溫和、精明而深具責任感者的狂熱時，一些可信而可敬的西方猶太人可能還不大贊成它，我們對此不必感到驚奇。最典型的反應，就是塞繆爾的政治伙伴和親戚埃德溫·蒙塔古——那時他是阿斯奎斯（后來是勞合·喬治）內閣的成員——感到自己受到了中傷。諾維奇爵士又一次跟我說，蒙塔古常常用慍怒和憤慨的語氣向他的同事發表演講，宣稱猶太人不希望也不認為他們應該被送回猶太人區；他在倫敦各式各樣的客廳里向朋友們進行游說，情緒激動地問他們是不是把他看成了一個東方怪人，是不是想看見他“被遣送”到地中海東岸。其他穩重而有愛國心的英國猶太人感受的沮喪和痛苦不亞于埃德溫·蒙塔古，巴黎和柏林猶太人圈子里的情況也大致相似[28](#_28_12)。

所有這些，從西方國家的猶太人所過生活的角度，甚至是從20世紀美國猶太人定居點生活的角度來看，是很好理解的。不管這些國家的猶太人真實地位如何——或稱他們是一個種族、一個教派、一個共同體、一個少數民族，或發明一個獨特術語來稱呼他們的異常特點——一個新的民族和國家是無法從他們中間建立起來的；他們和他們的領導人都不會認為這具有現實的可能性；現在他們依然這么認為。盡管有那么多社會沖突、不安，甚至在艱難時期，他們還不得不遭受屈辱和迫害，他們過去和現在都還深深地參與了他們作為組成部分的社會的生活，并且在此過程中失去了他們大部分原汁原味的民族個性，沒有了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全新生活的意愿。即便是希特勒的大屠殺，看起來也沒有在大多數德國猶太人中激起特殊的猶太民族主義感情，激起來的主要是困惑、憤慨、恐懼、個人英雄主義或失望。猶太民族主義幾乎全部是在俄羅斯帝國和在一定程度上穆斯林中東國家的猶太人中才具有了現實形態[29](#_29_12)。

當然，在俄羅斯和波蘭猶太人中間，已經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融合、整合、俄羅斯化、波蘭化。盡管如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活。他們被俄國政府驅趕進所謂的“柵欄區”。在那里，他們通過自己的傳統宗教和社會組織聯系起來，形成了一種中世紀社會的生存方式，其中世俗的和神圣的東西尚未區分，而在西歐，猶太人已經（至少從文藝復興以來）躋身中上等階級。他們說著自己的語言，在相當程度上同周圍的農民分開居住，同他們進行貿易，但相互不信任和懷疑的高墻把他們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這個廣大的猶太人共同體構成了地理上連續的、被包圍的地方，不可避免地發展出自己的制度，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像是一個在自己祖先土地上居住的真正的少數民族。

有時候，想象會比所謂的客觀現實更有力。主觀感受在社會發展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俄羅斯帝國中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開始覺得他們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族群：確實與眾不同，屈服于史無前例的迫害，遠離他們的生命被忽視的陌生世界，但只是由于他們在同一個狹小地域中被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有點類似于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組成了一個明顯單獨的、半民族性質的共同體。他們在無意識的約束中發展出觀點上的某種獨立性，提出了影響和有時候煩擾西方很多同教者的問題——特別是關于他們地位的主要問題——而這些問題對他們自己并不非常重要。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法國、美國、英國的猶太人常問自己他們是不是猶太人，如果是，那么是在何種意義上是，又意味著什么；他們周圍的人對他們的看法是對還是錯，公正不公正，如果是歪曲的，是否需要采取措施去加以糾正而不對這些人的自尊造成過多傷害；他們是否必須冒著失去認同的危險，可能還要忍受因背叛了祖先的價值而引發的內疚，去作出讓步和同化；或者相反，冒著遭人白眼甚至是迫害的危險進行抵抗。這些問題對俄羅斯猶太人的影響很小、相對模糊，因為他們——在道德和心理方面——生活在自己廣大、被隔離開的猶太人區里。監禁雖然使他們承受著經濟、文化、社會上的不公平和貧窮，但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說，他們的精神仍然很堅強，一點也沒有打算要采取錯誤的立場逃走，不像他們那些在隔離區之外的社會上更暴露和更不穩定的教友那樣。俄羅斯和波蘭猶太人中的大多數生活在骯臟和受壓抑的環境中，但他們并沒有被遺棄或無根的感覺；他們彼此間的關系和同外界的關系并不互相矛盾。他們活得很本真；他們也許不喜歡他們的景況，也許想擺脫它，或進行反抗，但他們不會自欺欺人，也不會努力去把那些人們（尤其是鄰居們）一望而知、最具特點的屬性掩藏起來。他們的道德和精神完整性要強于西方那些更富有、更文明和更光彩的兄弟們。他們的生活與宗教祈禱儀式聯系很緊，他們的理智和感情充滿了關于猶太歷史和宗教的意象和符號，從中世紀衰敗以來，這些東西在一定程度上說在西歐幾乎沒人能懂了。

當赫茨爾帶著華麗的外表和空幻的凝視，像一位來自遠方的先知那樣出現的時候，他們中的多數人被那種把他們與這位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彌賽亞使者區別開來的陌生感和距離搞得神魂顛倒，他不會用他們熟悉的語言講話——這種隔膜使得他和他的訓示顯得更神奇、更具有吸引力。但是當他們的領導人準備接受英國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提出的，在烏干達建立定居點以取代難以進入的巴勒斯坦這個妥協性的解決方案時，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赫茨爾常常表現出英雄般化繁為簡的才能——這是那種單一觀念常常表現出來的狂熱，事實上這是使他們卓爾不凡、卓有成效的品質之一，并且他無視困難，快刀斬亂麻，使東歐的猶太群眾激動不已，在西方政治家和重要人物面前用符合邏輯的、簡潔的、富于想象力和巨大熱情的語言闡述他的思想。猶太群眾盲從他，他們知道這是一條光明之路。像很多空想家一樣，赫茨爾理解的是問題而不是人類，尤其不是他那些熱心的東歐追隨者的文化和情感。巴黎確實很有價值；猶太問題急迫而嚴重；為了一個等待移居的具體領土，他準備至少暫時不顧猶太思想和情感的飽和階段，這些思想和情感帶著錫安和巴勒斯坦的意象和符號，帶著偏見，帶著祈禱書和《圣經》中的偏見。從來沒有哪一個民族如此按照文字而生活：沒有誰認識到這一點作為衡量東西方差距尺度的極端重要性。俄羅斯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并不需要去學習這個真理：他們就是這樣長大的，認為它理所當然。失去了曾經是最古老的根、他們所有信念的唯一目標的土地，有關國家地位的希望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它可能只會被更理性但更精疲力竭的——更少血性的——西方猶太人所接受，他們無論如何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間塑造出來的新社會的材料。如果沒有俄羅斯猶太人——事實既非如此，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猶太復國主義可能會以任何其他嚴肅的形式出現。

有一種看法認為，沒有任何社會問題會長久地像嚴苛的宗教正統思想那樣把猶太人同外部世界隔離開來。在此之前，一旦遭受貧窮、欺凌和壓迫，他們會傾向于在彼此間尋求溫暖和庇護。東歐猶太人傾心信仰上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個人得救（在上帝看來的不朽）上，或寄托在彌賽亞的降臨（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它加速或推遲）上。當冷漠的大眾感情上開始軟化，就帶來了社會和政治問題。一旦啟蒙運動——世俗思想和一種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開始滲透繼而涌進隔離區的猶太村鎮，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就不會再滿足于坐在巴比倫河畔，唱那放逐中的錫安人之歌。有些人為了尋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放棄了父輩的宗教，接受洗禮，在俄羅斯社會中取得了顯赫和優越的地位。有些人在西歐這樣做。有些人相信，猶太人受到的不公平，只是沙皇暴政或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更大范圍的不公平的一部分，他們成為激進分子，成為社會主義者或其他社會運動分子——在這些社會運動分子看來，猶太人的悲慘地位會隨著所有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普遍解決而消失。這些激進分子、社會主義者和“俄羅斯化”或“歐洲化”信奉者中的一些人，渴望猶太人作為一個組織細密的團體完全融進鄰居之中。另一些人，受了那個時代“民粹主義”（那些“良心上不安”的俄羅斯貴族子女試圖改善農民命運的理想主義運動）的影響，用半自治的猶太團體模糊和感性的字眼考慮問題，這些猶太團體就像是自由社團大家庭中的一員，說著他們自己的意第緒語，在藝術和科學工作中有所創造，在俄羅斯帝國內相互間組成某種分散的、半社會主義的、自由的民族聯盟。同樣也還有那些人，他們仍然信奉古代宗教，決心用加高本來已經很高的猶太人居住區的圍墻來防止世俗主義的威脅，致力于用更加嚴格和狂熱的信仰去保留猶太法律和傳統，用憎惡抑或恐懼來看待所有的西方運動——不管是民族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也不管是保守主義的還是激進主義的。但是在19世紀80和90年代，絕大多數年輕一代俄羅斯猶太人，沒有參加過這些運動中的任何一個。他們那時受到關于他們可能是什么的普遍觀念的影響，實際上對此也很困惑，但他們仍然是中產階級的猶太人，基本上不再受到父輩的束縛，清楚（不滿意但并不以為恥）他們不正常的地位，溫和地忠誠于傳統的生活方式但并不愚忠，既不是刻意的異教徒也絲毫不是叛教者，既非狂熱者也非改革家，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厭倦了他們在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劣勢地位，試圖去尋求他們能夠得到的最為自然而自在的生活，不去過分考慮終極目標或基本原則。他們熱衷于家庭、傳統文化和自己的專業追求。面對迫害，他們在史無前例的困難條件下，以令人驚嘆的樂觀主義、不屈不撓、手腕甚至是快樂，維持著他們組織細密的社會結構（常常借助于奇怪的借口和策略）。

魏茨曼屬于這一代人，屬于這個牢靠的環境，并且成為它最完整的、最有天分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代表人物。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對之演講的正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直到生命的終點，他是他們中間最快活的人。他滿腦子思考的，都是猶太人的事；他的語言和生活觀，都是猶太人的。他從他們之中創建了新的國家的基礎，正是他們的性格、理想、習慣和生活方式——超過任何其他單個因素，使他們成為以色列國。由于這個原因，它或許是存在于當代世界中的對19世紀民主最堅定的信仰。

## 二

魏茨曼出生和生長在俄羅斯西部平斯克城附近一個完全的猶太人圈子里。他的父親是一個小本經營的木材銷售商，是一個活躍而虔誠的社團的典型成員，他的孩子很多，他注意使他們擁有他自己擁有的那種充沛精力和對待生活的樂觀態度；特別是對教育的尊重，對完整人格的尊重，對每一個領域中扎實成就的尊重，以及處理所有問題都要有清晰而具體的方案——有時要不懼權威；相信只要勤奮、誠實、守信、有安身立命的技能，最終都能過上好日子。現實主義、樂觀主義、自信、對人類成就的尊重，以及最重要的是對生活本身的永不滿足（而不管會帶來什么），加上相信早早晚晚這些方面都會轉化為優勢——一種強烈的外向態度，根植于某種意義上屬于猶太傳統的牢不可破的歷史連續性，正如某種東西十分強大而不會被人或環境所破壞乃至消滅。在我看來，在這個最積極向上的人身上，這些都是最突出的特點。另外，他性格剛直，不會自憐和自欺，絕然無畏。沒有證據表明他曾遭受道德或政治困惑的折磨。他出生其中的傳統體系是十分安全的。

魏茨曼早年接受了這樣一個命題，猶太人的罪孽主要是由他們的社會環境的不正常造成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們仍然遭受半奴役，處于低下和依附地位（這使他們身上產生了奴隸的美德和惡習），他們的神經疾病（不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都難以治愈。一些人或許會帶著尊嚴承受這樣的命運，其他人則被摧垮，或被他們的原則所出賣、角色錯位，因為他們發現負擔過于沉重。個人的完善和力量是不夠的：除非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有某種改變——變得正常起來，與其他人群一樣，否則絕大多數猶太人仍然會容易在道德和社會方面出現問題，為溫和者所同情，為苛求者所極度厭惡。故此，除了革命——徹底的社會變革、大眾解放，無藥可救。

在魏茨曼之前已有人得出這個結論：事實上，它構成了所有前錫安主義者小冊子中最著名的著作——平斯克爾的《自我解放》——的基本內容，并且激發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先驅者的殖民努力。赫茨爾將它翻譯為西方的術語，賦予其條理清晰和雄辯的政治形態。魏茨曼并不是一個思想發明家：他的獨創性在于，他給從別人那里接受過來的觀念注入了特別令人信服的、十分具體的內容。他的政治天賦同他的科學天賦一樣，在于他的應用理論而非純粹理論。像同時代的列寧那樣，他把理論轉化為現實，同樣也把理論和現實都給改變了。但又不像列寧，他性情溫和，絲毫沒有偏執的理性主義，而偏執的理性主義相信（從人類痛苦和死亡的角度看）代價過高的最終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把觀念首先看成是實踐判斷的工具，生來就有一種非常強烈而生動的現實感和相伴而來的歷史想象力——這就是說，他有一種幾乎絕對可靠的感覺，判斷什么不可能是真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

魏茨曼和他那一代人堅信，如果猶太人要獲得解放，他們就必須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在那里他們才會不再被迫通過強加在所有依賴者、顧客和奴隸身上那種經常性的狡黠、獻媚和偶爾的傲慢混合在一起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來獲取基本的人權；最終這塊土地必須是——可能只能是——巴勒斯坦。在他的圈子里，任何相信這個主要論點的人幾乎不再嚴肅考慮其他可能性。對他們來說，精神上的紐帶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真實。相比之下，經濟和政治因素看起來不是那么具有決定性的。如果一個民族依靠完全理想化的資源造就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生活和生存，不管是好還是壞，物質條件不會把他們的注意力從想象中移開。這個想象的中心就是圣地。赫茨爾、伊斯雷爾·贊格威爾以及其他那些出生或成長于西方的人們，或許需要相信這樣一點：在俄羅斯，對大多數接受這個基本前提的人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猶太人既不會同化和融化掉，也不會被繼續隔離開來。如果這是合理的，其余的都好說。

魏茨曼與他圈子里的人共有其他說不出口的假定：他并不困擾于未來這個國家的政府會是或必定是什么的問題，比如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他關于公正、平等、公共機構的觀念，是非宗派性的和前馬克思主義的；他同加里波第或科蘇特或其他偉大的19世紀民族主義領導人一樣，關心的不是將這個或那個精確表述的政治或社會學說移植到他樸素的、溫和的、本能的、民主的民族主義之上，他們相信和推動的民族復興，與其說是作為以特定學說為基礎的一項政策，不如說是作為他們自然而然并且毫無疑問接受下來的一場運動。這樣的人——從摩西到尼赫魯——創立或領導運動，主要是因為發現他們自己與社會的渴望息息相關，從感情上相信使他們遭受壓迫的秩序是不公正的，認識到自己是比大多數同齡受害者更強有力、更具想象、更富成效的戰斗者。一般來說，這樣的人不是理論家：他們有時是教條主義者，但更經常的是，他們從符合需要的角度改造了流行觀念。魏茨曼終其一生相信的東西，少數來自書本，來自這個或那個社會學或政治學教師的信念，或來自他最熟悉的社團之外的地方，來自共同的思想儲備，來自他所呼吸的空氣。從這個意義而不是別的意義上說，他是他那個民族的真正代表。在他的一生中，他本能地在他自己運動中的極端或激進傾向面前后縮。他是站在靠近自己民族意識的中心而不是邊緣的那些人物（有人曾經這樣說起過一位著名的俄羅斯評論家）[30](#_30_12)之一；他的觀念和情感，很自然地適應了絕大多數猶太群眾的（常常不可言說但卻處于中心地位的）希望、恐懼和情感模式，他對他們抱有深深的和天然的同情。他的天賦主要在于能夠把猶太群眾的企求和渴望清晰地表達出來，并找到實現的道路。他這樣做，并沒有在任何一個方面夸大這些企求和渴望，或強把它們壓進一個預想的社會或政治框架，或把它們趕向他自己私下設想的某些目標，而是始終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

因此，雖然他不是一個偉大的受歡迎的演說家，沒有養成虛情假意表示謙卑的習慣，行為上常常采取超然、嘲諷和輕蔑的方式，是他的隊伍的一個自豪、傲慢、沒有耐心、完全獨立的指揮官，沒有一絲一毫的煽動傾向，或這方面的天分，但他從來沒有失去他的民族中絕大多數人的信任。他并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說話辛辣、不受歡迎，一向要求自己理性辦事，從不感情用事。雖然如此，猶太群眾本能地感到他是理解他們的，知道他們心里想什么，這也是他自己想要的。他們相信他而追隨他。他們相信他，因為他們認為他是他們最核心利益的一個特別強有力的、自信的、堅定的保護者。另外，他無畏而聰明。他理解他們的過去和現在，但最重要的是，他對未來充滿信心。

這后一種品質，在哪里都很少見，在被征服者和被壓迫者中間尤為少見。同我們時代民主國家的其他偉大領導人一樣，同勞合·喬治和羅斯福叔侄一樣，魏茨曼有一個不可征服的信念，就是無論將來如何，他和他的民族都會更美好。他從不放棄希望，他保持著穩重、自信和代表性。他從不離開他的追隨者的視野，躲進私人的幻想或極端利己的夢幻中。他是一個有著巨大的自然權威、尊嚴和力量的人。他從容不迫、慈祥、沉著、充滿自信。他從不隨波逐流。他總能控制住局面。他接受了全部責任。他對贊美和責備淡然視之。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今天的政治家難以超越的睿智和魅力。直到他漫長一生的最后階段，他讓猶太民眾迷惑的，不單單是他具有的這些品質，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表面上他已經成為一個有名氣的西方科學家（這使他能夠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保持獨立），很容易同西方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師們打交道，但他的基本個性和觀點保持不變。他的語言、比喻、措辭變化都根植于猶太人的傳統、虔誠和智慧。他的趣味，他的身體運動、坐臥行走的方式、手勢，他極富表情的面部特點，并且最重要的是，他說話的語氣、重音、音調變化乃至極為多樣的幽默，同他們是一樣的——是他們自己所具有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同他們血脈相連，他是一個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人。他明白這一點。但在處理本民族問題時，他沒有任何自我意識。他沒有夸大或抬高自己的特點。他不是演員。他自己從不演戲也不看他的對話者演戲。他沒有個人癖好。他不可動搖的權威來自他的自然品質，來自他的創造性和批判性力量的結合，來自他的自我控制，來自他的平靜，來自這樣一個事實：他是一個眼界寬廣的人，不受任何東西的困擾，甚至不受他自己理想的困擾，因此從不會被激情或偏見所遮蔽而對他自己的猶太世界中的任何有關因素視而不見。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失敗——失敗很多——并沒有使他陷入痛苦；它的成功也沒有讓他作出不切實際的評價。他對猶太人性格中的缺點和荒唐之處——這是一個他很少對之保持沉默的主題——有著敏銳和高度諷刺性的認識，也有著真摯的喜愛，并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把猶太民族從這些缺點和荒唐之處帶來的屈辱或危險困境中解救出來。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動用了他所有的特別資源。他相信長期戰略；他不信任即興而作；他是一個謀略大師，但不管對他有什么樣的批評，他完全不是一個為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他并不準備訴諸歷史或政治必然性來為錯誤行為辯護。他并不試圖通過暴力或詭計去求得民族解放——去塑造人民，如果需要就用極端的暴力，比如列寧；或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欺騙他們，比如俾斯麥；或用未來幸福的承諾讓他們暈頭轉向，這樣的承諾可以適合任何人的幻想。他從不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號召猶太人為了將來某個時候才會實現的一些幸福作出可怕的犧牲，或獻出生命，或犯罪，或縱容其他人犯罪；他也不會像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極端主義者那樣，去不道德地利用猶太人，或有意去激怒他們反抗這個或那個現實的或想象中的敵人。他希望他的國家獲得自由和幸福[31](#_31_12)，但不能以冒犯他和他們相信的人類價值為代價。他希望把他們從放逐地帶到一塊土地上，在那里他們可以過上適合人類的生活，不必背棄自己的理想或踐踏別人的理想。

他在政治上與加富爾伯爵相似，都痛恨暴力，依靠語言作為唯一的政治武器。他準備用每一個可能的計謀去擴展他巨大的魅力，勸說這個或那個英美政治家或樞機主教或百萬富翁，去提供為達到他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他準備掩蓋事實，準備開展秘密工作，準備吸引和征服每一個人，準備利用他的追隨者或任何一個在他看來有用的人，作為實現有限目標的手段——只有不再需要他們時，才對他們完全失去興趣，惹起他們不知所措（有時非常明白和痛苦）的憤怒。但是他不準備拿他自己根本的道德和政治原則做交易，并且從來也不會這樣做。他不怕樹敵，不怕公開或私下議論，也毫不害怕后世的評價。他理解人類，對他們懷有興趣；他為自己對他們的誘惑力感到高興；他喜歡政治調情。除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天賦外，他事實上是一個最高級的、最具秩序感的政治能手。

這些品質自有其瑕疵。它意味著會忽視他人的意愿、態度，可能還有權利。他有時極少關心他并不同情的那些人的意圖和性格，他們抱怨受到了忽視，或被無情利用，或被專制對待。他在某種意義上過于大膽，過于相信他的事業和他的朋友們必然勝利，常常低估他在自己黨內和整個世界上的反對者們所持信念的暴力和誠意。這既是一個長處，也是一個弱點：這無限地增加了他內在的安全感和他的樂觀主義，并且解放了他的創造活力；但也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到恐懼和無法消解的敵意的后果，而恐懼和敵意是他在自己共同體之外的人們中間必定要遇到的，猶太復國主義惹怒或煩擾了這些人——公開的和暗藏的反猶分子、阿拉伯人及其支持者、英國政府官員、很多教派的教士、通常的可敬者和受到認可的人。他正確、堅定、有力、幾乎是過于倔強的積極性格，幾乎必然要忽視人類個體的弱點——忌妒、恐懼、偏見、虛榮，忽視或懦弱或怨恨或欺詐的小動作，特別是那些虛弱、愚蠢、膽怯或壞心眼的官員們故意刁難的伎倆，這些東西比重大決策要多，積累起來就擋住了他的道路，最終眾所周知，出現了流血事件。

同樣，他常常無視他的個人或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和敵人。他有很多對手和敵人，尤其是在他自己的民族中。狂熱信教的猶太人把他視為神圣彌賽亞位置的不虔誠的、潛在的篡奪者。在西方位居要職的膽小猶太人，特別是那些成功或杰出人物——他們經過大量求索和付出很大代價之后終于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現代社會中的安全位置，把他看成是一個危險的麻煩制造者，似乎他要扒開他們費了好大勁才包扎和掩蓋起來的傷口。充其量，他們會把他當成一個帶有威脅的盟友，給予他帶有疑慮的尊重。那些社會主義者、激進人士和國際主義者——當然特別是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把他看成是反動的19世紀民族主義者，試圖引導猶太人從他們夢想中的世界社會這樣一個寬闊并灑滿陽光的高地，倒退到一個被放逐到東方地中海落后地區的肖小民族這樣一個讓人透不過氣的環境中，這是荒唐的時代錯誤，注定要被無情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力量掃到一邊。那時，有一些俄羅斯或美國的猶太平民主義者相信一種地方性或區域性的猶太大眾文化——具有放逐中的準民族性質——說著意第緒語、平民化、非政治、拙劣地模仿當時的俄羅斯民粹主義。他們把魏茨曼看作一個勢利小人、精于算計的政客，是他們所熱心的社會福利計劃的敵人——這項計劃裝飾著仁慈和樸素的工藝品，以及在一個冷酷和無動于衷的異教世界中對老式猶太生活中心的精心保護。最后，在懷疑論者和玩世不恭的家伙、理智者和喜歡諷刺別人的家伙、悲傷者和憤世嫉俗的家伙看來，猶太復國主義只不過是一場癡夢。魏茨曼很少在意他的對手，但自信了解對手的強弱所在——而對手們并不了解他——并且覺得自己在道德上和思想上都遠遠超過他們，由此決定了要去拯救他們（如我前面提到的，謙卑并不是他的品格）。他并不像他們恨他那樣恨他們——只是除了共產主義者，這些人是他平生真正害怕和憎惡的，就像是一群群政治蝗蟲，不管其職業是什么，他們破壞的總是遠遠超過建設的。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對手，把他們看成是必須全力拯救的羔羊，免得他們遭受無可回避的宰殺，他這樣做的時候似乎被自己致命的熱忱所感動。結果，他把他曾經與之爭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至少有一次在瑞士大庭廣眾之下正式辯論過）的俄羅斯社會主義領導人[32](#_32_12)簡單視為眾多競爭的心靈捕手，有可能脫離猶太解放運動，使該民族一些最具才干和最富建設性意愿的子弟走向毀滅。遺憾的是，這樣的爭論現在沒有了。有兩種生活觀念——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注定要割裂現代世界。除了持有這兩種生活觀念的領導人之間發生的尖刻而膾炙人口的辯論之外，再沒有哪兩種運動會發生更為尖銳或明確的沖突。這個關鍵性的辯論，在當時特殊的猶太民族需求和問題的小而模糊的平臺上開展，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魏茨曼相信他會勝利——對此他從不懷疑。這并非源于對他個人力量毫不動搖的信念，雖然這種力量是強大的；也并非源于他的率真，雖然從某些方面看，他的確擁有某種類型的偉人所具有的深刻簡單性和對人的信賴，尤其是在他與英國人打交道方面。而是因為他相信他所代表的猶太生活的趨勢是至關重要的和不易損壞的，相比之下他的對手所代表的趨勢則是建立在歷史的流沙之上，立足于更為狹隘的經驗領域，出自個人和派系的因而也是曇花一現的觀點，他感到他自己代表的則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人類對于個人解放、民族平等和過更好生活的愿望。他從自己對人類根本目標、核心利益的信念中汲取了巨大的道德力量，這不可能永遠被阻擋下去，僅此就證實和保證了偉大的革命性事業最終取得成功。我敢肯定，他沒有在他的感情和他所持守的價值、他覺得自己應占的歷史地位之間做出區分。

當傳記作者考察他同這個運動的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的分歧，考察他同大法官布蘭代斯和極右翼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弗拉季米爾·亞博京斯基之間的斗爭，抑或考察他同像索科洛夫或本——古里安以及很多小人物這樣真正支持他自己溫和政策的人之間的差異的時候，他們會問——他們必定要問——這中間有多少是出于個人野心、熱衷權力、低估敵手、脾氣上不耐煩的專制；又有多少是出于原則，出于思想忠誠，出于對何者正確或僅為權宜之計的理性信念。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相信找不到任何明確的答案，或許壓根兒就沒有答案。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像在每一個政治家那里一樣，個人動機，從低里說，緊密聯系著政治私利的概念；從高里說，緊密聯系著純粹而公正無私的公眾理想。魏茨曼與任何那樣的暴行無關，因為當事人和隨后的傳記作者都為暴行辯護，說是出于所謂“國是的理由”——國家允許受困于一些大的危機的政治家以國家、社會或宗教的崇高需要為由去犧牲公認的私德標準和原則——這樣的理由惡名昭著。魏茨曼以現實政治的大師聞名，但他沒有偽造電報，沒有屠殺少數民族，沒有處決和監禁政治反對派。當巴勒斯坦出現猶太恐怖主義的時候，他的感受和行為很像反動的沙皇大臣被理想主義革命者暗殺時俄羅斯自由主義者的表現。他對此并不支持，私下里嚴厲譴責，但并不認為公開譴責這些行為或作惡之人就是道德上正直的。他真誠厭惡暴力：他過于文明和仁慈以至于不相信暴力的功效，盡管可能是錯的。雖然他認為他們是在犯罪，但他并不打算公開反對這些行動——這是從絕望人們的痛苦心靈中激發出來的，他們準備犧牲性命去從西方列強的外交部門惡意準備的背叛和毀滅中拯救他們的弟兄。這種背叛和毀滅是魏茨曼和他們都一致認識到的。

貝文的巴勒斯坦政策，最終使魏茨曼懷疑自己畢生對英國及其政府的尊重和忠誠，是否讓猶太民族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他對事業要比對任何個人問題更投入。因為他既不虛榮也不天生固執，他并非不了解自己犯錯誤的可能性。他確實沒有放棄希望；他相信，為了取得猶太人定居點生存斗爭的勝利，需要的不僅僅是內閣大臣和公務員。當他在倫敦旅館房間里來回踱步，聽到白廳關于這個或那個戰后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行動的報告說“太晚了，幫不了他們”時，他一直在念叨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他很想知道他自己起初對英國的信任是否沒有無故延長新的猶太國家誕生的陣痛。他贊同英聯邦自治領的地位，認為猶太國家可能是個早產兒。1936年皮爾委員會的分治方案，標志著他與英國政府之間富有成果的合作達到了頂點，他認為那些破壞這個方案的人，特別是外交部的人，要對后來的災難負責。他清楚自己已經被撤職了，因為他過于相信這些人。但他終其一生都是聞名的親英者、溫和派、政治家，這些聲名在為巴勒斯坦猶太人定居點的生命而斗爭面前都沒用了。他偶爾也會抑郁悲觀，但他相信為正義事業戰斗的人們，在情況極糟時，必須盡可能死得夠本——如果必要的話——就像參孫在非利士人神殿中表現的那樣。他認為，對民族和對個人都應該是這樣。

當阿拉伯——猶太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問心無愧。他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戰爭是一種自衛——猶太人沒有誰懷疑這一點。他一輩子都相信并執行和解政策，為此而蒙受了政治上的苦楚，戰爭并不是他造成的。

像已故的大法官霍姆斯一樣，魏茨曼一生都相信，當牽涉大的公共議題時，人們必須首先支持一方；不管他干什么，一個人都無法保持中立或不表態，他必須——作為一個絕對義務——對世界上的一些有生力量寄予同情，冒著世人對他的動機和人格責難、曲解和誤會的危險（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去參與世界事務。結果，在猶太人的獨立戰爭中，他要求不要妥協，并譴責那些作出妥協的人。他蔑視那些認為個人誠實，或心安，或純潔的理想比他們不容分辯地從事和被委派的（藝術、科學、社會和政治）工作更重要的人。他并不寬恕為了私利或別的東西而放棄終極原則，但在他看來政治禁欲主義似乎是軟弱和自負、愚蠢和卑劣的混合物。政治禁欲主義是人們為了逃避失望或免于被玷污而尋求某個私人的亞杜蘭洞[33](#_33_12)，為了信守某些內心的聲音或某些不可動搖的、對于邪惡的公開世界來說過于純粹的原則，去占據意識上烏托邦的或政治上不可能的位置。他并不掩飾對那些抱有純粹主義觀點的人缺乏尊重，常常不會公正對待他們。他的觀點當然遭到那些最富勇氣和正直的人們的反對，實際上是厭棄；但在我看來，它比對立的觀點更為高明。如果我不承認這一點，就有點不坦誠了。無論如何，可由此見到他內在的東西。

魏茨曼的內心生活十分豐富，但他沒有去逃避并不令人滿意的外在現實。他熱愛外部世界，熱愛任何看起來會促成一種寬廣、豐富和慷慨的生活潮流的東西，在其中人們的才智能夠得到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在人類的良好稟賦中，他最喜歡理解力、想象力、優美、力量、慷慨、堅毅、誠實，特別是風度高雅。在他看來，這是只有那些沒有算計、狹隘和神經質自戀的、古老和穩定的文化才具有的內在優雅、自然寬容、做事雷厲風行和自信。他認為英國人最好地展示了這些品質，他至死都忠于英國。這種忠誠并非沒有回報，一開始是支持繼之又毀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熱愛英國的獨立、自由、尊嚴、氣派。這些是自由的人們的美德，他尤其渴望猶太人養成、發展和具備這些美德。

英國與猶太復國主義實驗，尤其是與魏茨曼在爭取簽訂《貝爾福宣言》和托管巴勒斯坦中所發揮作用的聯系，常常被認為具有某種偶然性。有時可以說，假如魏茨曼碰巧沒有獲得曼徹斯特大學的教職，他或許不會定居英國，就不大會在20世紀的初葉遇到阿瑟·貝爾福，那樣他當然就沒有資格去影響貝爾福或勞合·喬治，或者其他任何一位英國政治家，而這些人的話在建立猶太人定居點上是起決定作用的。這是真的，可能也是歷史上偶然事件發揮影響的典型例子。但是人們會開始懷疑，他從歐洲大陸移居英國是否全屬偶然。對魏茨曼以及許多具有他那樣背景和教養的東歐猶太人來說，英國超過所有其他國家，代表著鞏固的民主、博愛與愛好和平的文明，代表著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穩定、寬容、尊重個人權利，代表著基于《舊約》與《新約》的宗教傳統。它囊括了自由中產階級的所有美德，適合18世紀舊制度下法國的親英者，基于同樣的理由，也適合19世紀東歐的親英者。首先，英國使猶太人享有一個安全、和平和進步的生存空間，擁有作為人和作為公民的全部權利——簡言之，這里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渴望得到的、而他們自己中間極為缺乏的一切東西。魏茨曼的成長環境和整個圈子[34](#_34_12)的態度孕育了對英國先入為主的敬慕，他是帶著這種敬慕來到英國的。如果不是在貝爾福那里見到了最精致、最嚴格形式的貴族品性這個最吸引他的東西，就難以理解他與貝爾福爵士長期而癡迷的調情，而他一生中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許多事情都得益于此。

魏茨曼是一個出名的和魅力十足的政治誘惑者，實際上他決心如此，但除了向他真正尊敬的人他并不奉獻自己，他不準備為了政治上的好處與那些在道德或政治（有時也在審美）上排斥他的人建立私人關系。或許，以下做法是更為明智的：不與大法官布蘭代斯爭吵，不期望“在平斯克和華盛頓之間架設橋梁”，不忽視阿拉伯領導人或羅馬教廷的政要，不對歐內斯特·貝文粗暴的壞脾氣作出強烈反應。但他不會破壞自己的性情。他只喜歡大氣的、富有想象力的、寬宏大量的性格，相信猶太民族的未來取決于他們單方面的讓步，相信只有與具備上述性格的人才能達成協議，相信純粹出于政治便利的聯姻是注定要失敗的。他的反對者說這純粹是浪漫主義，我相信他們說錯了。他相信長期的協議需要雙方在利益、原則和世界觀之間取得真正的和諧，并且開始相信猶太人和英國人之間的親密關系達到了很不尋常的程度。像這方面的大多數情形一樣，這持續下去會是一個令人傷感的錯誤，一個雙方都要付出沉重代價的錯誤，但卻是一個有趣的和有吸引力的錯誤，一個深深影響了新國家的特點的錯誤。

或許魏茨曼過分沉迷于自己的趣味。他實在是太喜歡英國人了：他喜歡英國生活、語言、理想的具體性；喜歡中庸、對極端行為有禮貌的蔑視、公眾生活的整體氛圍，沒有殘忍、激情和偽劣。他更喜歡難以捉摸的想象，愛好古怪和獨特的東西，喜歡怪僻、獨立的品質。他有著巨大的魅力，就像迪斯累利那樣；英國人喜歡為他著迷。正如迪斯累利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信或說話的時候女王或許是清楚的，英國人可能意識到他們正在受到魏茨曼的誘惑，但對此毫不懷疑——直到他們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們并不認為快樂的力量，發揮幻想、愉悅而常常尖刻的幽默，溫和表達出來的大膽想法，以生動的明喻、嚴肅而溫和的語言、對可理解的物質成就的不斷引用表達出來的政治浪漫主義，必然是不誠實或卑鄙的，或對他們自己構成危害。他們是安全的，因而是彬彬有禮的；他們傾聽，并且樂于受到吸引。沒有一個法國政治家，沒有一個美國人（更不用說赫茨爾想向他們演講的德國人）會甘心受到魏茨曼政治想象力和歷史記憶的深刻影響，而貝爾福、勞合·喬治或丘吉爾，以及許多戰士、政客、教授和記者卻欣然這樣做。他們不是僅僅被一個聰明和令人愉悅的說客欺騙了；這個外來的化學家和他的英國主人的價值觀事實上是一致的。他們發現用他的話語來思考這個世界并沒有什么困難，還相當樂意如此，對幫助他們這樣思考的人心存感激。事實上他們是正確的。那些看不到他的談話充滿機智或刻意的異國情調的人，在道德和政治上是麻痹的。因為事實證明，歷史是與魏茨曼那由冷靜的常識和深沉的歷史情感組成的愿景相符合的，而與大不列顛、法國和美國政府部門中“現實主義者”的一般概念是不符合的。他主張的事情幾乎總是現實可行的。他的反對者極力主張的東西大部分被實際上發生的事件所否證。

我曾經說過，魏茨曼的話訴諸的是理性而不是感情。一般說來，他的論證方法既不是建立在統計或其他精心準備的證據基礎上的證明，也不是情緒化的修辭，或激情的說教，而是來自對一個特定場景或事件過程進行生動、細致、協調和具體的描畫，并且一般而言，他的對話者認為這幅畫事實上與他們對于人和事的認識、對于現在和未來事情的看法是符合的。道德、歷史、經濟、社會和個人的因素，已經融入了魏茨曼那些出色的、沒有記錄下來的說明中，也結合在了生活中（因此，在私下場合面對面而不是面對聽眾時，他的話最有效）。他不是一個分析型而是綜合型的思想者。他展示的是一個圖案，或是要素的混合物，而不是一個個自我孤立和自我關照的元件的抽象本質。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那樣，在那里具體性成為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他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這里得到的自然同情，使他不由得將更多的感情資本投給了英國——這種投資是無法回收的。不管是出于他的追隨者還是來自猶太復國運動之外，反對他和他的想法的一個因素，是對英國價值觀的本能反感，這些人更同情其他的世界觀或生活方式。

我回頭還是說說他對英國的熱情，這在他那里、在他的理想中至關重要，因為他希望新生的猶太社會——新的國家，成為英國經驗（幾乎是唯一的經驗）的政治弟子。他特別重視本能上妥協的趨向，雖然尖銳的棱角事實上是磨不平的，但如果爭論雙方威脅說要廣泛破壞社會結構、損壞共同生活的最低條件，那么棱角在很大程度上就會被忽視。另外，魏茨曼深信科學方法在人類生活中的運用，英國在這方面曾經在世界上領先；他對純粹科學的興趣很有限；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希望發明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并且創造出新的、更為文明的需求——他對自然科學無限的變革力量充滿信心。這是他的樂觀主義、他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的核心所在；并且他喜歡像典型的英國人那樣考慮這個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科學家提供的服務實際上被英國政府部門忽視了，這是他生活中最失望的事情之一。

1939年戰爭爆發時，他表示要放棄他的某些政治偏見，以便重新試圖為收留他的國家服務，因為他已經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著名發明。他沒有得到回應。他抱怨那些同他進行討論的大多數英國官員表現出來的遲鈍、怯懦、小器、保守主義、恐懼未來，抱怨他們完全無力把握國家的經濟地位，更不用說把握世界上注定到來的危險和機會。在戰爭期間，他帶著深深的疑慮回到這個事實。他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美國事實上得到了遠比在英國好的反應，他覺得這點不好接受。他懷疑英國人對生活的想象和嗜好是否正在消亡。在他看來，在對新世界的恐懼中，在迷戀過時的世界政治秩序概念的絕望嘗試中（正如他在白廳看到的），在試圖反悔英國人對巴勒斯坦猶太人承諾的卑劣努力中，都充分表現出同樣的消極態度，其癥狀就是衰竭和失敗。對他來說，從道德和政治原則全面倒退，開始于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對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對佛朗哥獨裁西班牙的寬恕，最重要的當然是對希特勒的寬恕。他1940年或1941年談到反猶太復國主義時，帶著典型的坦誠對丘吉爾首相說：“爵士，請您記住，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這當然是他的一部分意思。政治上的滿足、軟弱、精神恐懼、無視令人反感的事件，對他來說只是同一個令人沮喪的衰落狀況的一個側面，它蒙住了英國經濟計劃者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恢復英國衰落地位的可能性（實際上，也看不見必要性）。他覺得很有把握的是，拯救英國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創造性地運用非洲帝國的資源建立一個宏大的新的合成材料工業。他作為一名化學家，對這個領域了解比較多，也做了很多開發工作。他使用大量綱要式的術語來思考問題，也用這些同樣的科學術語來看待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他對大陸的貧窮和自然資源匱乏進行反思時，寄希望于把猶太人看上去確實擁有的一種資本——技術能力、創造力、活力、不顧一切——變成科技奇跡，這會促成建立新的世界，特別是新的、后張伯倫時代的英國。他相信英國人會明白這一點，看到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這讓他很沮喪。他感受到了冷落，不再認可這個他如此堅定而毫無私心地熱愛過的國家。

他覺得他有權利抱怨。在兩個主要場合，他在自己的追隨者面前遭到公開的失敗，他們對他的主要責難，是他對英國政府的善意有著狂熱的依賴。他被迫于1931年辭職，抗議以受害者為代價對阿拉伯人的暴行作出讓步，這個讓步政策開始于工黨政府的《巴斯費爾德白皮書》，下屆政府也延續下來。1946年類似情形曾經再次出現。可以合理地推斷，魏茨曼與英國和解的政策——這導致在1938年到1939年間對猶太人地位的徹底背叛，如果持續下去的話（他那個時候鼓吹接受所謂的莫里森計劃），必定會進一步導致一系列的諾言被違背、希望被摧毀。終于，他痛苦而老大不樂意地開始認為，這或許會成為現實。他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但私下里帶著不屑的神情說起后張伯倫時代政治家們沾沾自喜的愚蠢。當他的一些英國朋友想對他說，英國太疲倦、太貧窮以至于再也無力承擔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矛盾的承諾了，因此必須讓他們雙方自行處理。他蔑視和憤怒地拒絕了這種說法。他認為，這是懦弱的，與提出這點的人是不相稱的，尤其是，它對任何強國來說都是一個錯誤的分析和一項自殺性的政策。

他的地位很快變得尷尬起來。他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的追隨者認為他的親英政策破產了，認為他對它投入過深——并且是對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的承諾——到頭來證明只不過是一頭高貴而過時了的猛犸。英國或美國政府中沒有誰急于去看他。他是一個悲慘的、令人敬畏的、政治上窘迫的人物。內閣大臣和官員們都看到過魏茨曼盛怒的全部影響，那是一種令人生畏（即便說不是受罪）的經驗。現在這不再是必須的了。這種寬慰幾乎是可以聽見的。殖民地部待之以冷淡的禮遇。他受到外交部有預謀的冷淡，這不是來自低級別的官員，而是他們從自己上司那里得到了暗示，似乎認為他們可以自由表達對阿拉伯人的堅定支持而免于懲罰。他在貝文那里受到粗暴對待，貝文對魏茨曼乃至整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懷有聲名狼藉的個人敵意，沒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但是，魏茨曼不會放棄他最古老的政治愛情。對他而言，英國比所有其他國家放在一起的分量還重。

我曾于1947年在巴勒斯坦與他待在一起，期間猶太人針對英國在巴勒斯坦駐軍的軍事和恐怖活動達到頂點，面對同事們日盛的流言蜚語，他依舊喜愛并樂意見到他那個地區的英軍司令和其他英國官員。他感到被出賣了，盡管他是現實主義者，政治上講究實際，但他還是不能理解實際上發生的事情。他丟不掉關于英國的浪漫主義、帶有某種丘吉爾風格的形象，最終，這種形象來自對它的道德想象力而不是眼前私利或轉瞬即逝的情緒的感動。在他看來，那個獨自反對暴行和罪惡的英國，那個他兒子為之犧牲的英國，比他關于猶太人過去和未來的想象更真實。他努力視而不見。他重返科研工作。他常說，經過公眾生活不可避免的污染之后，什么事都不會比在實驗室里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所做的、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工作具有更純粹的道德效果，在那里，真理不會被欺騙，人類的惡行和愚蠢起不到多大作用。他讓自己忙于在雷沃特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里的工作[35](#_35_12)。但這種療法并不完全有效。他相信英國政治家，把他的追隨者交到他們手里；可每一艘移民船都被貝文和哈羅德·麥克邁克爾爵士打發走了，這使他重回出賣者的角色。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英國政府，特別是工黨政府給他帶來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帶給他的傷害；猶太人尤其不會這樣做。他沒有要求，也不期望他的民族向他致謝。摩西的命運在他看來是自然的，或許是理所當然的。在他自己親近的追隨者眼里，他似乎完全不是刀槍不入的：尤其是當他以漫不經心的無禮或不加掩飾的輕蔑對待他們，或時不時以一個偉大實干家的猝然無情對待他們的時候。雖然他對追隨者造成了打擊，他們對他還保持著個人忠誠。因為他的個人吸引力是無與倫比的。人們從很遠的地方來拜訪他，知道或猜想他已經完全忘記自己為什么派人去叫他們來，并且會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真正的困惑，充其量表現出愉悅的驚訝，并且會用一些粗心、歡欣和友好的話把他們打發走。他與他親密的追隨者之間的友誼，在某些方面不像巴涅爾同英國下議院中的愛爾蘭黨之間的關系。他們對待他的態度幾乎都是夾雜著敬重、緊張的尊敬、怨恨、崇拜、妒忌、自豪、惱怒，最后，壓倒性的看法是在他們面前站立著一個超出人類一般標準的、強大有時也讓人害怕的領導人，他領導著新近獲得解放的囚犯們，他們自己的歷史主要是按照他的思想和活動來形成的。他們或許反感他，但最后他們——他們的大多數人——總是屈服于他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

對于英國又是另一番情形。他在英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關系方面的先入之見——有時成為一種困擾（或許是他僅有的強迫觀念），使他看不到那么多的其他因素，比如其他強國特別是歐洲強國的態度、阿拉伯統治者的態度、巴勒斯坦定居點內部社會和政治勢力的態度。英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聯系的崩潰，不僅僅與他保持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實際權力（他視之為生命）上的失敗有很大關系，似乎也在于有些人支持反抗英國只有付諸暴力的主張，這些人認為除了恐怖主義，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拯救猶太人定居點，而這一點是魏茨曼全身心并且終生都極端厭惡和拒斥的。沒有別的什么東西比那更加危險。他想不到，他渴望建立并置于大英帝國保護之下的這個國家，現在或許永遠不會具備那些他長久以來始終敬慕的、英國特有的道德和政治品質。他沮喪地認識到，這些品質在每一個地方都正在消失，甚至正在他度過最幸福歲月的島國消失。

沒過多久，他被選為以色列總統，這是一個具有漂亮的符號價值但少有實際權力的職位。他在猶太人和他們各處的祝福者的歡呼聲中接受了這個職位，完全了解它的含義。他知道他自己成就的大小，從不談論它；他是那些恰如其分地估價自己，并從他們看待別人的正確角度看待自己的罕見人物之一。他的自傳，特別是關于他早年的篇章，敘述上驚人地客觀而栩栩如生，見不到絲毫的編造、夸張、虛榮、自憐和自我辯白，展示出了他真實的、充分而平衡發展的、自主的、驕傲的、基礎牢固的、稍有嘲諷的天性，沒有內在沖突，在內心深處與自然界和社會的力量本能地和諧一致，并由此具有天生的智慧、尊嚴和權威。

他的不幸來自外部，很少來自內心；直到生命的終點，他都維持著內心平衡。他很清楚他的成就并非無與倫比。他知道，他在散居各地的難民中創立了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成長和不可限量的前景，現代史上還沒有任何人能做到這一點。這使他感到憂心。只有自由和獨立還不夠。就像古代的先知那樣——西方政治家有時就是這樣看他的——他渴求美德。他不喜歡猶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生怕它們會占上風。他厭惡癡迷和偏向；蔑視對和經驗實在沒有穩定具體聯系的學說和理論的沉迷。他并不重視單純的思想成就本身，只有當它對人類生活有所貢獻時他才會表示欣賞。他喜歡實體性、實踐判斷、活力、快樂、理解生命、可靠性、勇氣、勇敢和實際成就。殉難、失敗、死亡、成為環境或自己愚蠢的受害者——這是愛嘲弄、懷疑的猶太式幽默感的陳腐主題——讓他內心充滿憂慮和反感。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點這樣一個整個猶太復國主義實驗的核心目標，是為了治愈猶太人中只由被強化的無根感帶來的創傷和精神疾病。他特別不喜歡混在一起的先鋒派的世故、政治狂熱、犬儒主義、粗俗、機敏、糟糕的心情，以及能干的、典型東歐式的、充斥世界媒體版面的猶太新聞記者所具有的學識和偶有苦澀的頓悟。他更加痛恨愚蠢，他并沒有費心去隱藏這一點。在他晚年，當他在雷沃特家中生活在和平和巨大的聲名中、成為受全世界尊重的人物時，他時常為以色列噩夢般的前景困擾。在以色列，單純、無畏而盲目的愚蠢，與在隔離區滯留時間過長而帶來的奴隸們才有的墮落和具有破壞性的狡黠、漫無目的、不負責任、虛無主義的不安情緒結合在一起。魏茨曼看到，以色列被這些東西給毀掉了。然而，他也看到這種情況或許不會發生。那時，他一想到早年克服了千難萬險而夢想成真，他現在真正生活在猶太人中間，生活在有著自己國家的自由民族中間，他就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幸福。

他不是一個宗教上正統的猶太人，但他過的完全是一個猶太人的生活。他不喜歡教權主義，但他對虔誠而嚴守教規的猶太社區富裕和傳統生活的所有細節都有一種溫情的熟悉，因為他正是在東歐的鄉村和小鎮度過了童年時光。我不好談論他的宗教信仰；我只能證明他有著深厚的自然的虔誠。在他晚年，我不只出席過一個場合，當他帶著令人感動的尊嚴和高尚慶祝逾越節聚會的時候，他儼然成了猶太家族的長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已經與猶太大眾的生活密切聯系在一起，他的樂觀主義源于猶太人共同的信念，即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他們的苦難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他們的人權主張——他們的希冀——必定會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最終得到滿足。他和他們都不會接受這樣一個命題，人類中的大多數會漠視地球上最脆弱和最悲慘的少數民族對公正與平等的呼聲。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斗爭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這是首要的前提。然后，如果這些主張在偉大的人類良心的法庭上被認可為有效的，那么它們早早晚晚會變成現實。武力和狡詐都沒有用場。只有建立在真正需求基礎上的信仰和工作才是有用的。“奇跡確實會發生，”他有一次對我說，“但一個人必須為奇跡盡力工作。”

他相信他會取勝的——對此他從不懷疑，因為他感受到了背后的巨大壓力。他相信，很多人如此熱烈和合情合理地渴望的東西不會永遠被否認；如果被充分組織起來，道德力量總會戰勝單純的物質力量。正是這種平靜而絕對的信念，使他有可能在世界上的政治家中間樹立一種強悍的形象：他本人就是一個世界級的政治家，代表著一個流亡政府，其背后站著一個大的、凝聚起來的、強有力的、善于表達的共同體。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什么比這更缺少真實性，雙方對此都很清楚。然而雙方行動（談判）起來就像它是真的一樣，似乎他們是平等的。如果說他沒有面臨求助者經常陷入的窘境，那正是因為他非常講究尊嚴和自由。他可以十分令人生畏；在有生之年，他羞辱人的一些情況令人記憶深刻。哪怕只是聽說這位沒有權力但難以對付的特使要來訪，部長們都會本能地躲避，因為他們害怕見面或許最后完全成了一種道德體驗：不管搞得多么簡短，他們最后都以對這位不講情面的客人作出一些關鍵性的讓步而結束，個中理由他們自己也不能解釋或說明。但是，不管具有什么樣的非凡魅力，在他身上都見不到感傷。哈伊姆·魏茨曼是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完全自由的猶太人；不管怎么說，以色列國是按照他的想法建造的。沒有誰曾經終其一生為自己豎立起一個可與他相提并論的紀念碑。

# 愛因斯坦和以色列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不朽聲名主要來自他卓越的科學天賦。關于這種天賦，像大多數人一樣，我完全沒有能力言說。愛因斯坦被公認為自牛頓以來物理學領域中最具革命性的創新者。由是之故，他本人和他對其他話題的看法到處受到特別的尊重和關注。他對此是清楚的。雖然他是一個謙虛到家的人，常常被逢迎搞得窘迫，并且不喜歡出風頭，但想到這一點他是欣慰的，即如果真要對個人表達敬意的話，這種敬意應該給予那些在思想文化領域取得成就的人，而不應給予那些在權力和征服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實際上，一個數學物理學家竟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性人物，這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是為人類增光添彩。

在理論物理學或許還有物理學哲學領域之外，如果把愛因斯坦思想的影響比之于其他偉大的物理學先驅者思想的影響，就會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不用回溯太遠，伽利略的方法和自然主義，在17世紀思想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遠遠擴展到技術哲學以外。牛頓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不管是否得到正確理解，啟蒙運動的整個進程是建立在牛頓原理和方法之上的，是從牛頓的輝煌成就中得到其信心和廣泛影響的，在法國尤其如此。在這個時期，這改變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核心概念和方向，包括道德的、政治的、技術的、歷史的、社會的。沒有哪個思想或生活領域能逃避這種文化變動的影響。

在弱一點的程度上，達爾文亦如此——他的進化概念影響了生物學之外的很多思想領域：它顛覆了神學，影響了歷史科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對達爾文和赫胥黎觀點的濫用，因其優生學，有時還有人種學的含義，造成了社會政治危害。我也許對把弗洛伊德視為自然科學家有所猶豫，但毫無疑問，他的教誨同樣影響了遠離心理學的領域——歷史學、生物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

但是，愛因斯坦呢？他的科學成就涉及科學哲學，他的觀點——他早年接受，后來放棄了馬赫的現象論——表明他擁有哲學家的天賦，事實上，他的觀點與斯賓諾莎、休謨、康德、羅素的核心學說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愛因斯坦和普朗克在我們這個世紀的杰出物理學家中確實是無與倫比的。但他對時代一般觀念的影響呢？對有教養者看法的影響呢？當然，他表現出的是一個人中圣者的形象：有著純潔的心、高尚的心靈、不尋常的道德和政治勇氣，不懈追求真理，崇尚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同情社會主義，痛恨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壓迫、暴力，對生活持唯物主義觀點。但撇開那種人類善良同社會公正和非凡智力相結合所展現的東西——就是說，撇開他的榜樣生活，撇開他那個時代成為并且被看成是一個最文明、最可尊敬、最有仁心者的那些方面——在一個很多人似乎按照全然不同的價值而生活的社會中，愛因斯坦有什么影響呢？

在今天，“相對”這個詞一直被廣泛誤解為意味著相對主義，否定或懷疑真理的客觀性，否定或懷疑道德和其他價值的客觀性。但這是一個古老的和人們熟知的謬論。希臘智者、羅馬懷疑論者、法國和英國的主觀主義者、德國浪漫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宣稱的那種意義上的相對主義，使近代神學家、歷史學家和普通人深受困擾——與愛因斯坦的信仰是正相反的。他是一個有著樸素而絕對道德信念的人，這已在他的言行中得到體現。他的外部自然的概念是一個可以進行科學分析的、理性的秩序或體系的概念；科學的目標就是關于獨立的現存實在的知識，即便用來分析和描述它的概念是自由的、隨意的人類創造。

愛因斯坦學說的普遍影響是什么呢？迄今，現代理論物理學，即便是它最概要的東西，仍沒有也未能成功地像牛頓核心學說被伏爾泰等人介紹那樣形諸于大眾語言。英格蘭品格高尚的公眾人物，如霍爾丹和赫伯特·塞繆爾，試圖從廣義相對論中推導普遍的、常常有些陳腐的形而上學或神學真理，但結果只是表明他們的無能。

但是，如果說愛因斯坦科學思想對他那個時代一般思想的影響還有些不確定的話，那么他的科學研究之外的思想與我們時代最積極的政治現象之一的聯系，卻是無可置疑的。愛因斯坦用他的世界性聲望幫助（事實上傾心于）建立以色列國家的運動。一個民族應該感激那些幫助他們改善現實自我形象的人。如果有機會，稍有自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向愛因斯坦表達敬意。愛因斯坦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和對希伯來大學的興趣是終生的。他同魏茨曼爭論過不止一次；他對希伯來大學，尤其是其第一任校長來說至關重要；他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待阿拉伯人的政策；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對猶太復國主義基本原理的信仰。如果今天那些像年輕時的愛因斯坦一樣痛恨民族主義和宗派主義、尋求社會公正、相信普遍的人類價值的年輕人（或其他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異教徒，希望對此有所了解的話——如果這些人希望知道，為什么他這么一個被同化了的德國猶太人家庭的孩子支持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的國家，不用較真也無須煩惱，任何一個體面而敏感的人都可以思考那些以他的民族的名義所做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看來是錯誤或不明智但仍然穩健的，直至生命盡頭他都如此認為——他們就應該讀讀愛因斯坦這方面的著述。愛因斯坦所說的話，無論是在科學中還是在生活里，都帶著他一貫的明晰和直擊要害的天賦，都是簡潔的，都道出了真理。

他出生在烏耳姆城，父母都不信教。他在慕尼黑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沒有遇到歧視。如果說他曾經激烈反對學校，并且近乎神經崩潰，那么這看來并不是反猶感覺引起的。也許，他反對的是19世紀90年代德國教育中的準軍事紀律和民族主義狂熱。他在米蘭和蘇黎世學習，在蘇黎世工作，還在伯爾尼專利局謀到職位，后來在布拉格和蘇黎世獲得了大學教席，1913年被聲名時至巔峰的能斯脫、哈伯，還有普朗克說服，接受柏林的一個研究職位。

我不必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普魯士的氣氛。在1929年寫給德國總理的信中，愛因斯坦說：“當我十五年前（即1914年）回到德國時，我才第一次發現我是一個猶太人，而使我得到這一發現的，更多的是非猶太人而不是猶太人。”[36](#_36_12)盡管如此，一些早期德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影響，特別是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這位德國猶太人的導師在這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布魯門菲爾德的后半生中，愛因斯坦與他保持著親密的友誼。但是，同赫茨爾一樣，他認識到自己是猶太人的決定性因素與其說是與不熟悉教義的沖突（在布拉格他遇到了這種教義的信徒，但那時他顯然對此不感興趣），還不如說是與主流圈子中的沙文主義和排外之間的沖突，在柏林即如此。這使他意識到，即便在文明的西方，猶太共同體也處境危險。他斷言：“當一個人融入共同體時，他最好的一面才會發揚光大。因此，猶太人的道德危險是不與本民族的人聯系，并被接納他的民族視為外人。”[37](#_37_12)“猶太人的悲劇在于……他們失去了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的共同體的支持。結果就是個人缺乏牢固的根基，極而言之等于是道德不穩定。”[38](#_38_11)

他認為，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以現存的群體生活建立一種緊密聯系，使個體猶太人能夠承受其他人群常常加于他們的仇恨和屈辱。愛因斯坦告訴人們，赫茨爾應該受到敬仰，因為他竭盡全力呼吁只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才能根除這種罪惡——它無法為同化所去除。老德國猶太人隔離區中的猶太人生活困苦，他們被剝奪了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同歐洲的進步隔離開來。

那些普通的、地位低下的人們有一個我們所不及的優勢：他們每個人都屬于一個他們完全融入其中的共同體，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擁有充分的權利，而這個共同體并不要求他改變自然的思考習慣。過去我們的祖先在心智和體能上都相當脆弱，但從社會意義上說他們卻享有令人羨慕的心靈平衡。[39](#_39_11)

后來人們獲得解放，迅速適應新的開放的世界，熱切地取悅他人，結果就是失去自我，消失在一個共同體里面。

雖然多數猶太人調整自己——從語言上、態度上，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包括宗教形式上——以適應他們生活于其中的歐洲人，但猶太人和他們東家之間的陌生感始終沒有消失。這種自發情感是反猶主義的根本原因，善意的宣傳也無法將之消除。民族主義者力圖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和歐洲人摻和在一起。[40](#_40_11)

愛因斯坦指出，否認或駁斥情感偏見或公開敵視，是毫無作用的。對他來說，受洗過的猶太樞密顧問只讓人覺得可憐。他視國家邊界和軍隊為禍水，但他并不這么看待民族的生存：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相互尊重地共同生活，相互包容差異，這就是文明和公正。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猶太復國主義說法，就是對另一位國際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摩西·赫斯類似難題的回應。看看愛因斯坦1933年說的話：“對我們來說，作為個人在人類文化進程中起一份作用是不夠的，我們也必須對付只有民族作為一個整體才能完成的任務。唯此猶太人才能恢復社會的健康。”[41](#_41_11)所以：“巴勒斯坦不僅僅是東歐猶太難民原居地，而且是重新覺醒的整個猶太民族共同精神的化身。”[42](#_42_11)

在我看來，這就是對猶太復國主義信條的經典表述，同阿哈德·哈姆非政治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一致的：從本質上說，愛因斯坦所宣揚的是創立一個社會的和精神上的中心。當英國的政策和阿拉伯國家的抵抗在他看來使得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不可避免時，他平靜地接受了這點以及為免遭滅絕而使用武力，或許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必然的惡，但不過是以尊嚴和應變能力，而非傲慢承受的負擔和義務。像所有可敬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愛因斯坦越發擔心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關系。他企望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為這個國家能夠通力合作。但他失望地意識到，一系列事件使這種企望在眼下難以實現。他始終如一地支持以色列猶太人國家，認為必須在這里追求猶太人的理想，特別是其中的三個方面：“追求知識本身，酷愛正義，以及渴望個人獨立。”[43](#_43_11)

毋庸贅言，這與他周圍那些有教養的德國猶太人的普遍態度對比多么鮮明，更不用說與西歐其他地方那些與他有著類似出身、社會和思想條件的人對比了。當人們回憶起愛因斯坦的早年生活，遠離猶太人事務，畢生信奉理想主義的國際主義，痛恨所有使人產生分歧的東西——在我看來這證明了非凡的洞察力、現實主義和道德勇氣，今天他的猶太同胞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畢竟，其他杰出的德國猶太科學家，那些在個人誠信方面無可指責的可敬的人，弗里茨·哈伯、馬克斯·玻恩、詹姆斯·弗蘭克的反應很不相同。同樣，施尼茨勒、斯蒂芬·茨威格、馬勒、卡爾·克勞斯或韋費爾這些作家和藝術家的反應也很不相同，他們都很熟悉維也納的反猶主義。

我不希望讓人以為，愛因斯坦必然認為被大多數人的文化同化總是不光彩和注定要失敗的。顯然，猶太家庭的孩子們可能發現他們如此遠離他們的共同體和傳統的東西，即便他們認為這些很重要，他們也難以從心理上去重建真正的聯系。愛因斯坦是清楚的，在一個文明社會里，每個人必須自由地按照自認為最好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只要這樣做不危害別人。他沒有責怪這些懷有不光彩或懦弱動機的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在他看來，他們的人類尊嚴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他們的自我理解。

正是他不會自欺欺人或逃避，正是他愿意直面真理，并且如果需要的話，會反對公認觀念的潮流，這使得愛因斯坦以大膽拒絕牛頓體系的核心要素而聞名。他在其他領域中的行為也體現了這種獨立性。他拒斥習慣看法。他曾經說：“常識就是十八歲之前心靈中沉淀下來的偏見。”如果某樣東西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同樣在數學上沒有讓他不舒服，他不會否認、逃避或忘掉它；他會對之加以調整、重組或修修補補，希望它能維持下去；他不會等待彌賽亞——世界革命、理性和正義的全球統治——來解決難題。認為鞋子要是不合腳，穿一段時間就會感覺好一點，或者應該改變腳的形狀，這是沒有用的；說痛苦是一種幻象，現實是和諧的，因此沖突、不公正、野蠻屬于表象的秩序，對此高級精神應超然，這同樣是沒有用的。如果他的哲學導師休謨和馬赫正確的話，那么就只有一個世界，就是人類經驗的世界；只有它是真實的；這個世界之外可能是奧秘；他承認并且完全相信這個事實，即宇宙作為最大的奧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那些否認人類直接經驗的理論沒有一個是有效的，這些直接經驗包括通過遠非有意識的途徑產生的想象性頓悟。

正是這種實在感使他免于空談，盡管他有深刻的信念。當他知道的東西與正統學說發生沖突時，他不否認他來自道德、社會或政治感受的直接證據。他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德國不受歡迎，因為他放棄了德國國籍。但是在1933年，他接受了抵抗希特勒和納粹的必要性，認為需要的話就應訴諸武力，這嚇壞了他那些和平主義的盟友。他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一個民主主義者，有社會主義傾向。愛因斯坦對于保護個人免受國家壓迫的需要有如此強烈的感受，以致認為如果那些受過教育、富有經驗和權威的精英不能有效地抵制大多數人的愿望，那么《人權法案》就會受到踐踏。他稱贊美國憲法，特別是其中關于總統、國會和公眾輿論之間的權力平衡（他早年的政治學老師，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阿德勒·弗里茨對美國憲法很不認可）。他痛恨排他主義這種橫亙在人類之間的高墻。但是當德國和波蘭大學中的猶太學生受到民族主義者追捕時，他宣布魏茨曼是正確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解決辦法徒勞無益；猶太人必須行動起來，在耶路撒冷建立他們自己的大學。

他畢生痛恨民族主義。但他承認民族存在的某種形式對猶太人是極為必要的。首先，他認為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很明顯，他很看重政治忠誠。他曾兩次宣布放棄德國國籍。當他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發現無法忍受繼續持有德國護照時，如果不是感到自己能夠完全忠于這些民主國家，他在年輕的時候是不會選擇入籍瑞士，或在希特勒上臺后接受美國公民身份的。正是這種社會敏感性和對人類生活本質的確切洞察的結合，使他脫離了空想的狂熱；也正是這一點，使他具有道德說服力。

他是一個天真的人，有時我甚至想，他會上那些傻瓜和騙子的當。但是天真有它自己的感受方式：它有時會通過自己的眼睛看東西，而不是透過習慣智慧或某些未經批判的教條所提供的眼鏡。這樣一種獨立性，既促使他拒絕公認的物理時空概念，并且不顧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的反對大膽提出了引力波和光量子的假說，也使他獲得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由。

結果，這位喜歡獨處的人，這位完全沒被五大洲的敬仰和無與倫比的聲名腐蝕的人，這位相信通過辛勤工作來揭示自然界秘密——這些秘密可以通過人類理性奇跡般地得到分析和解答——以獲得救贖的人，這位溫和、害羞和謙虛的人，卻讓很多機構不高興：德國民族主義者、仇視德國的法國人、極端和平主義者、猶太同化主義者、正統的拉比、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樣還包括那些絕對道德價值的衛道士——愛因斯坦實際上也堅信這些價值。

他既不是主觀主義者也不是懷疑論者。他相信，科學概念和理論是人類想象力的自由創造，而非培根或密爾或馬赫所認為的那樣來自對經驗數據的抽象。但是，科學家試圖利用這些概念和理論去分析或描述的，從科學上看，本身就是一個人類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客觀結構。道德的和審美的價值、規則、標準、原理，無法從科學中推導出來——科學處理的是實然，而不是應然。但是，對愛因斯坦來說，這些價值、規則、標準、原理都不是由階級、文化或種族的差異引起的，也不受其支配。它們也無法從自然法則中推導出來，它們對所有時代的所有人是普遍的、不偏不倚的，可以為人們共同的道德或審美洞察力所發現，體現在偉大的世界宗教（不是神話）的基本原理中。

像斯賓諾莎那樣，愛因斯坦認為那些否定這一點的人只是為激情所蒙蔽；實際上，他認為斯賓諾莎與他性情相投。像斯賓諾莎那樣，他認為上帝就是自然界中的理性，從字面意義上講，是神圣的和諧，神即自然（deus sive natura）；同樣，像斯賓諾莎那樣，他對貶抑他的人沒有怨恨，也沒有妥協——他保持著平靜和理性，富有人情味，寬厚，不武斷。他不想控制追隨者，也不需要盲目忠誠。如果他認為什么運動總體上是有益的，或至少益處大于危害，他就支持——比如，國際聯盟或美國的左翼團體。

對猶太巴勒斯坦也是這樣。他痛恨沙文主義；他對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對待阿拉伯人的態度提出批評，有時甚至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但這并沒有使他偶爾像別人那樣退縮；他公開抨擊艾森豪威爾政府損害以色列的利益去取悅阿拉伯國家，他認為這是美國的一項帝國主義政策。他批評希伯來大學的一些政策：比如，他認為，從法西斯歐洲逃出來的學術移民中的年輕人，不是那些年齡大的和有名氣的，也應該得到任用。但這并沒有減弱他的忠誠。他沒有準備放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雖然該運動的個別領導人有缺點。他的猶太復國主義基于這樣的信念，人類的基本需求有權得到滿足：人類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免于饑餓、凍餒、恐懼、不公正，也免于無家可歸。

他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漂泊者。在致他的朋友馬克斯·玻恩的一封信中，他說他沒有根；在每一個地方他都是一個陌生人。按他的說法，他是一個寂寞的人，本能上拒絕與人親密。他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家，不愿意為人所知。他深深憐憫和同情那些政治迫害、社會歧視、經濟剝削的受害者，很顯然，這是他的世界觀的核心要素；或許，這種憐憫和同情部分地彌補了他在建立親密人際關系方面的困難。

像多數以某種方式同原子彈的生產相聯系的物理學家一樣，愛因斯坦在晚年受到科學家責任感的壓迫，因為他們引進了一種恐怖的毀滅世界的新手段；他譴責他所入籍的國家使用原子彈，在他看來，這就走向了危險的帝國主義道路。對反動分子和法西斯的暴行和野蠻的痛恨，使他相信左派中沒有敵人——這是許多體面和慷慨之士的幻象，他們中的一些人為此付出了生命。

也許，他作為科學家的非凡天賦誘使他匆匆忙忙去大而化之地處理現實問題——包括那些沒有清晰答案的、不適合進行數量分析的、復雜的政治和文化問題，以致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復雜細節。因為在我看來，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才能可能存在某些差異。經常有人指出，大的發現和發明——相對于證明其有效性——需要對答案必定在何處的高超想象力和直覺感受，而不是理性分析，這與藝術家的幻想、天才歷史學家或學者對過去的同情式洞察并無二致。這個判斷很可能是真的。那些與人類及其事務打交道的人，需要對所有的人類經驗和活動的根本性質有某種意識，對男人和女人可能是什么或可能做什么的限度有一種感覺；離開了對自然所施加的這種限度的某種意識，就不存在用于拒斥那些數不清的邏輯上可能，但實際上荒誕的歷史或心理學假說的標準了。

關于何謂人類理性，亞里士多德、康德、伏爾泰和休謨很可能是對的：對人類事務中什么是可能、什么是明顯不可能的感受，關于觀念的正常聯結，關于諸如過去、將來、事物、人、因果次序、邏輯聯系等的基本概念——組織細密的范疇和概念網絡，這些人類理性（也許還有理智）實際上所依賴的。可以設想一下，離開這些東西，在超現實主義的畫家或詩人，或者心存僥幸的作曲家看來，可能是有趣的，但這是對理性的故意反對。

但是在數學或理論物理中，這種實在感看起來并不是必需的。事實上，有時需要的可能是相反的東西。偉大的發現——比如，虛數，或非歐幾何，或量子理論——正是擯棄了那些通常使用的觀念，就是說，背離了某些對于普通人類經驗必不可少的范疇。看起來需要這樣一種天賦，即構想那些原則上無法想象、也難以用日常語言來表達的東西，這涉及日常交流，涉及人類生活的事實和需求。這種對日常實在的脫離甚至蔑視，構成了抽象思想家的大眾形象——泰勒斯走路不小心掉進了井里，還有把手表當作雞蛋來煮的心不在焉的教授。

遁入抽象——一個以純粹形式組織起來的理想世界，這純粹形式是以特意發明的象征主義表達的，而這個世界排除了日常經驗的不規則性和不均勻性甚至基本假定，有時或許是與早年生活中某種移情類型的精神不安聯系在一起的。愛因斯坦在慕尼黑上學時精神崩潰，同牛頓和達爾文的童年生活經驗是一致的，他們在精神上也有些難以接近。這些思想家也談論過愛因斯坦所描繪的經驗類型：在自然界嚴格的因果結構中顯示出來的神性面前，有一種深沉的宗教情感。這是任何東西都動搖不了的實在的幻象：愛因斯坦是一個堅定的決定論者，從來不認為不確定性原理是自然知識的一個最基本范疇，或者是客觀自然界的一個屬性，而認為它只是我們對自然界的暫時的和不完全的分析的一部分。

這種對于純粹抽象和普遍性的癡迷，有時影響到了與他人發展密切的人際關系和充分享受社交生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似真的假說。愛因斯坦可能就是這樣。他在個人生活方面保留的，都給予了世界。不僅他的成就的名聲，而且他的形象、他的面龐，都為世人所熟知。他的外表成為天才科學家形象的一個視覺符號、一個模式，正如理想化的貝多芬成為有創意的藝術家的商業化形象。有多少人知道其他天才科學家，比如說普朗克、玻爾、盧瑟福長什么樣呢？或者牛頓、伽利略甚至是達爾文長什么樣？愛因斯坦那帶著樸素的、仁慈的、發癡的、憂郁的表情的面貌，在所有地方都打動了人們的心。他極為出名，實際上就是一個人間英雄。他的形象就像查理·卓別林那樣為人熟悉和受到廣泛愛戴，在很久以前就被印在了美國的郵票上或以色列的紙幣上。

最后，我們把話題轉回以色列這個國家。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像以色列國一樣，在今天比以往受到更多的攻擊，既有來自周邊國家的，也有來自內部的；有時是理性或公正的，多數時候缺乏理性或公正。愛因斯坦對于背離人類尊嚴，特別是背離自己民族的行為毫不寬容——他相信這個運動，相信這個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支持它，直至生命終結，但他有時也批評特定的人或政策——這個事實，可能就是本世紀一個國家或一場運動可以引為自豪的最高的道德證明。一個真正的（和知識相當淵博的）好人堅定的公開支持，與他社交和思想圈子里那些人（他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有共同的道德和政治觀點）對此幾乎完全缺乏同情形成對比，也許這本身并不足以證實一個學說或一項政策，但絕不會否定它；它有一定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大價值。

# 伊扎克·薩德赫

伊扎克·薩德赫今天主要是作為以色列獨立戰爭的英雄之一而聞名。毫無疑問，這是他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然而，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尋常，充滿了奇怪的反差，這使我們對他早年生活的興趣分毫不減。

他的父親雅各布·蘭德伯格是一個富商，一個頗有魅力、活潑而快樂的人，生性好色，這使他難以忍受正統猶太婚姻的束縛，結果他拋棄了妻子麗貝卡——她是當時最出名最神圣的拉比之一的女兒，漂亮、衣著華麗，是他所在俄屬波蘭[44](#_44_11)盧布林市市民的偶像；他過著無精打采、憂愁苦惱但并不乏味的生活，這期間他將巨額的財富揮霍一空，據說他在貧窮和疾病中死去。

他的兒子在童年時有些被寵壞了，長大后成為一個富有、帥氣、體格健壯、早熟的男孩，深得母親喜歡。他一到成年就決定擺脫當時猶太富裕中產階級家庭中、充斥著世俗名望和傳統宗教的令人窒息的氛圍，擺脫他們深深的狹隘見解：反對那些他有生之年強烈抨擊的規矩限制。

伊扎克是一個任性、倔強、極其英俊的年輕人。他接受了正規的俄羅斯學校教育，但拒絕上大學，他認為這是浪費他的天分[45](#_45_11)。他極其厭惡那時將俄羅斯猶太人禁錮于其中的龐大貧民區，對強健自己的體魄產生了狂熱的愛好，成了一名拳擊手、摔跤手，這在世紀之交的俄國實在是非常少見的。他還成了一名狂熱的足球運動員，只要有空他就會去踢球，也教別人踢球。在他（和我）的家鄉里加，他成了一位體育明星。

在當時的里加市，占主導地位的是德國文化。德國文化來自波羅的海男爵家族——他們擁有巨額不動產，形成了俄羅斯君主政體可靠而狂熱的仆從階層；也來自穩固的德國中產階級——在里加他們創建了19世紀德國文化的前哨陣地，包括一家德國歌劇院、一家德國劇院和一套抗拒俄國君主所有同化努力的民族主義觀點。社會的底層是這個國家的原住民——列托人（Letts），這是一個簡樸、勤勞、受壓迫的路德教派農民群體，他們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形成自己的知識階層，在版畫和造型藝術上尤其取得很大進步。居于這個社會結構的夾縫里的，是統治位于波羅的海地區的省份的少數俄國官方機構，其次是猶太人。他們分為說德語、有著德國習慣的上層（還有一些彼得大帝前瑞典時代的猶太人的幸存后裔），以及下層說意第緒語的俄國猶太人，他們的孩子說俄語并順應當時俄國猶太人的主要發展趨勢，就是分裂為三個群體：自由的資產階級分子、社會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

伊薩克·蘭德伯格的至親曾對我們說，他以同樣的蔑視態度看待這些運動和群體。他充滿了個人自我實現的浪漫主義理想：這首先表現為身體上的自我完善；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他就會追求道德和知識上的自我教育。他切斷了同父母的聯系：他們當時已離異——他瞧不起他母親的第二任丈夫伊扎克·金斯貝格，幾乎沒有提到過此人——他帶上父親留給他的錢財，決定開辟自己的生活和職業。除了拳擊、摔跤和足球外，他一無所長。他生性懶散、放蕩不羈，不愿意學習任何一門專業技能。后來，他決定成為一名藝術經紀人——這讓他周圍的人很吃驚，像他所設想的那樣，這使他有機會過上一種充滿幻想的自由生活，可以會晤畫家、雕刻家和其他精神上無拘無束的人，過著獨立、放縱，最重要的是非猶太人的生活，擺脫他們家族里猶太商人和學者所過的拘謹、過于知性的正統生活。

他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他的商店上午不開門，他要去拳擊、組織足球比賽、摔跤、做畫家和雕刻家的模特。他對自己的相貌引以為豪，他健美的體魄不時會引起里加市的一些年輕自然主義畫家和雕刻家的興趣，這使他深感榮幸。一想到自己的這種異端行為會怎樣深深地觸怒他的母親和親戚，他就會感到開心。他讀過尼采的著作，決心培育自己天性中的酒神風格。這段時間，他在兩性方面似乎相當節制，但他后來成了一個因不忠而出名的多情男子。

1912年，他與我父親的堂妹葉夫根尼婭（葉尼婭）·伯林結婚，他們的母親是姐妹[46](#_46_11)。這位女士，在所有方面都與蘭德伯格正好相反，是一位打算畢生致力于改善工人農民生活的社會主義者，有兩個專業學位，她一本正經、真誠、可敬、充滿理想，沒有任何柔弱的女子氣質，極為樸素；她的一只眼睛有點斜視，這令她看起來極為古板。蘭德伯格樂于炫耀自己身上那股迷人的野性氣息，這使她狂熱地愛上了蘭德伯格。他沒有回報她的熱情，但是她的思想素養，她敢于激怒父母和有聲望的朋友們而參加1905年的革命活動，以及她被警察追捕兩年的事情，給蘭德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答應與她結婚。婚禮是按照中產階級最佳風格舉辦的聚會，規模巨大，非常得體，這讓他們那些凡俗的親戚們感到寬慰。婚禮上，新郎有點喝醉了，新娘則既感到得意又擔驚受怕。拳擊、摔跤、藝術經紀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14年。

戰爭一爆發，蘭德伯格馬上志愿參軍。因為他是獨子，又成了家，按法律規定他不必參軍：他的有錢親戚立即把他從軍隊里弄了出來。他允許人們將他帶回可愛的妻子和女兒阿霞身邊。過了幾個星期的平靜日子后，他再次離開了妻子，秘密參了軍。他再次被“弄了回來”。他又第三次參軍失蹤——他的親戚對他前兩次逃跑感到泄氣，就不再為他費事了。

他1917年以社會革命黨黨員的身份出現在彼得格勒，獻身于窮人的事業，握著碩大的毛瑟手槍，戴著國民自衛隊隊員的臂章。此刻，他對于自己的新制服、手槍和革命勁頭充滿了熱忱和孩童般的自豪。他來到他極為尊重的妻兄和堂兄門德爾·伯林和他妻子瑪麗——我雙親——在彼得格勒的公寓，天真而陶醉地向我們吹噓了他的革命功績，對當時正在上演的劇烈社會動蕩他像嬰兒一樣喜歡，讓我們都很著迷。女主人，即他的堂嫂，把他的手槍拿走浸在涼水里，仿佛它會走火。他不介意自己被下槍，在我們的公寓里坐到凌晨三四點鐘，高興地講述他對自己和同志們革命英雄事跡的令人驚奇的看法，他把我們逗得不亦樂乎；他們的最高領袖是平哈斯·魯滕貝格（當時叫彼得）。魯滕貝格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看法與他相同。我記得，他告訴我們，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一對危險的狂熱分子，應該被鎮壓。他夫人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更為嚴肅，但仍聽任自己陶醉于丈夫的興高采烈、不管不顧與不負責任。

他脾氣很大，是一位天才的演員和偉大的追求者，尤其是追求女人。他被眾多女性崇拜者們追隨，在革命集會上發表演講，雖然那些聽眾從來不會記住他演講的具體內容。他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言語熱烈，說服力強，詞藻華麗，鼓舞人心：他同時具備詼諧樂觀和憤世嫉俗的輕浮品質，這與19世紀所有俄國革命激進隊伍中最偉大的米哈伊爾·巴枯寧并無不同。蘭德伯格像巴枯寧一樣，基本屬于追求享樂的無政府主義者，所有的關系和清規戒律都讓他感到苦惱；在追求他醉心的目標時，他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充滿熱情，讓人一目了然。

1917年，他在彼得格勒四處大放厥詞，很可能未產生任何影響。布爾什維克革命后他再度消失，有幾個月他妻子不知他的去向，只得靠親戚接濟度日。他未給她留下任何謀生方法，似乎對妻兒毫無興趣。后來大家發現他加入了紅軍，他后來告訴我這僅僅是他因為喜歡行動，他在參軍離家期間周游了俄國中部和南部。然后他又重回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看望與她兄弟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妻子見到他喜出望外，只字未問，他對孩子的病表現出關心，但幾乎同時又失蹤了，并許諾很快回來。他發現紅軍過于暴虐殘忍后，正式退出紅軍，并于1919年初在某處加入白軍隊伍。當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但他對此似乎并不以為然。他的一個同父異母兄弟因為商業投機而被槍決，另一個加入了契卡[47](#_47_11)，這些事都未讓他感到絲毫憂慮。他與兩個兄弟都不聯系，繼續若無其事地開心游蕩，宣告共產主義的罪行。他跟隨一支白人軍團到達了位于黑海岸邊的西奧多西亞的郊區。

此時，他的妻子費盡周折知曉了他的行蹤，帶孩子與他團聚。見到妻兒他流露出喜悅之情，設法讓白軍司令給他們分了一套當地港口居民丟棄、無人居住的房子。他的女兒日漸衰弱，實際上正被呼吸困難折磨得奄奄一息。女孩的母親只關心自己的丈夫，盡一位心不在焉、不切實際的知識女性之所能，照顧女兒，在革命、農民、工人、馬克思主義者與反對者，和她丈夫對紅軍白軍的奇怪搖擺之間為難。他們討論過加入綠軍[48](#_48_11)的可能性，綠軍是瘋狂掠奪、同時反對紅軍和白軍的無政府隊伍。在討論的過程中，他的女兒阿霞死亡。她的母親痛不欲生，但蘭德伯格似乎無所謂。

在這個時期，他對音樂產生了強烈興趣，在不行軍或不反向行軍時，會參加一個業余的四重奏組，其中有尼古拉斯·納博科夫，此人后來成為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和音樂作家。納博科夫記得，蘭德伯格是聚會的少數幾位非正式聽眾之一，在黑海岸邊、內戰期間聆聽這個四重奏組。他回憶道，蘭德伯格是一個率真、熱情的人，魅力十足，讓人無法抗拒。

蘭德伯格參加了幾場紅軍與白軍之間不重要的戰斗。在一個夜晚，當他與一小群白軍軍官圍坐在篝火旁時，他聽到了白軍戰士的一個主要話題——他們痛恨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決心摧毀俄國的國際密謀組織成員，還要謀殺沙皇；所以，無論是在不久的將來，還是在完全戰勝黑暗勢力之后，都要不顧一切代價將猶太人斬盡殺絕。

這使他感到恐懼。彼時彼地，他決定遠離這些危險的組織（同盟）。他帶上妻子，蒙混進了一艘從黑海港口駛向土耳其的難民船。尚不清楚在沒有必備文件手續的情況下，他是如何設法登上這艘輪船的。然而他足智多謀，具有樸實的魅力，在當時和后來，顯然打動了那些負責人的心。

他決定前往巴勒斯坦。他過去從來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確，他過去一直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猶太資產階級典型的愚昧想法，目的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場上，建立一個可敬的最保守的維多利亞式的國家或組織，并使他們的壓迫者最庸俗、最尖刻和最邪惡的社會特征永遠保持下去。然而，他突然認定巴勒斯坦正在為猶太人開辟一個新世界，重新發現了他的猶太身世和情感，在克里米亞加入了猶太復國主義先鋒組織——赫查路茨。當這個組織的著名戰士，曾經組織過反抗俄國屠殺猶太人的自衛運動的約瑟夫·特魯佩爾多離開克里米亞奔赴巴勒斯坦時，蘭德伯格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該組織的領袖。

1920年初，他率領三十一名先鋒隊員抵達雅法，攜著他的妻子，帶著一小捆行李，口袋里裝了兩枚貶值的盧布。他們帶著英國當局簽發的集體簽證旅行。他后來說，他們把自己作為從巴勒斯坦歸來的難民；當別人問起他們當了多久難民時，他們的回答是“兩千年了”。這是當時俄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典型態度。

與其他移民一樣，他們被帶到了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接待營，受到善待。有人問他愿意選擇什么職業時，他表示自己喜歡體力勞動。他如愿以償，成為采石場的一名碎石工人。聽說他此后與猶太修正主義領袖亞博京斯基的追隨者一起參加了雅法的反英暴動。在當時，亞博京斯基暴烈的浪漫愛國主義與蘭德伯格夫婦的信仰正好相反。但是，凡是有暴力的地方，他就會被吸引，毫無抵抗能力。英國人支持一切中庸、有限、無聊、正式、浮華和無生機的事物。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支持阿拉伯人，欣賞中東地區的半封建制度。修正主義者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中的極右翼，代表著激情、好斗、抵抗、一意孤行、傲慢和神秘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從未加入修正主義者，仍然與哈加納組織保持聯系。

蘭德伯格不會持久執著于某種理想或某個人物。他愉快而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觀點、生活方式以及與他有關的一切；樂于嘗試任何新事物；欣賞自己為任何事物吹擂，穿著任何服飾，只要它足夠華麗的能力；對他而言，生活就是狂歡節，為了振奮自己和別人的精神，必須改變自己的裝扮。因為參加暴動，他不出所料地被逮捕入獄。當時巴勒斯坦高級專員赫伯特·薩繆爾爵士的夫人探監時，問起他做了什么事。她說：“我是薩繆爾夫人。”他馬上回答道：“我是伊薩克·蘭德伯格。”說著用隨和又傲慢的眼光盯著她。她問：“你犯了什么罪？”他答道：“我到處為自由而戰。所有官員都是我的敵人。我與紅軍一道打白軍，也與白軍一道打紅軍，我同猶太人一起反抗英國人。我也準備好了，打算將來與阿拉伯人一同反抗猶太人或其他任何人。”他的這種傲慢被認為是不可原諒的，因而刑期加倍了。

出獄后，他的碎石工作非常出色，很快被任命為一個猶太合作企業索萊爾·波恩采石場的經理。他的家人從未聽到他的消息。1924年，他致信我的父親（那時住在倫敦），說他是一名幸福的愛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具有光明前途，并力勸我父親全家來這個輝煌的新世界定居：在這里，平等、和睦和自由占主導地位，它雖然是個小國家，卻能成就幅員遼闊但行動緩慢的國家無法成就的事業。

同年，他作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代表，出現在倫敦溫布利帝國博覽會的巴勒斯坦展館中。他無比幸福。他拜訪了我父親，送給正在上學的我一本他所愛的作家奧維德的原文書（拉丁文是他的幾個古怪的學術造詣之一）和一本沃德·福勒的書《西塞羅時期的羅馬社會生活》，他認為這本書適合學生閱讀。他充滿活力，妙語連珠；趣味不俗，魅力無窮，心情愉快，無憂無慮，是世上最令人愉快的朋友。他教我們最新的希伯來歌曲。他教了我《以色列人出埃及》這首歌的一個新曲調（門德爾松曾譜成另一個迥異的風格），還有其他戰爭前后的希伯來語歌曲。他談吐異常活潑、充滿想象，他的俄語詞藻華麗，話題無所不包。我完全為他傾倒，自那時起一直如此。他邀請我家人參觀了溫布利博覽會巴勒斯坦展館。在那里，我們發現他盤腿坐在巴勒斯坦地圖石雕上，吃著巴勒斯坦水果沙拉，一瓶接一瓶地喝酒。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并不情愿與猶太人共用這個展館，他們用好奇又恐懼的目光望著他。

他與同時代的猶太人不同，是位令人愉快的伙伴，頭腦聰明、有感召力、性情極其溫和。他夫人知道自己丈夫的目光四處游蕩，又懷疑猶太復國主義價值觀，因為那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概念，與她的社會民主理想毫不相關，所以心情憂郁。1905年她為這個社會民主理想受難，但她心中并未放棄這個理想。她試圖和丈夫一樣，無拘無束、天真愉快，但沒成功。這惹怒了她的丈夫。他向我父親告狀，說他的堂妹性格呆板，缺乏想象力，因循守舊，如果這樣持續下去，他就不得不離開她，這是為了擔負起他對新國家的責任，他必須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服務。她無法提高自身，卻限制了丈夫的自由。我父親擔心堂妹被拋棄的后果，就與他理論。雖然丈夫對她不感興趣，抱怨她缺乏生活的樂趣，但她繼續以最熱烈的方式愛著丈夫，熱情與日俱增。

溫布利博覽會后他回到巴勒斯坦，繼續在采石廠工作。沒過多久，他就拋棄了妻子，與其他幾位女士交往。有如此迷人、放縱、浪漫、身材魁梧的男人為伴，這些女士喜出望外。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對于猶太人的態度完全是外在的，盡管他的血統和教育都是猶太的，但在行為上他是一個幸福的共產主義同情者：偶然的事件將他帶到了陌生的海灘上，他同情那里的人和他們的理想，盡管他從內心深處與他們并不親近（雖然有血緣關系），但還是樂于與他們合作，用最大的善意幫助他們實現目標。

很多年間，關于他的心理狀態無任何消息。這期間，他的這些狀況可能發生了改變。他的領袖才能、他獅子般的魯莽勇氣、對一切無所畏懼（他逃離白軍的事，只能說明他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豐富的想象力、對部下的愛護和不折不扣的孩子氣，使他獲得多人青睞。魏茨曼博士1936年訪問巴勒斯坦時，請蘭德伯格親自擔任保鏢。魏茨曼發現他是一位隨和、活潑、聰明的俄國人。這使魏茨曼從周圍緊張憂慮的面孔中，從通常使他受攻擊的政治問題和政治陰謀之中解脫。他們的友誼持續到最后。戴維·本——古里安把蘭德伯格當成一名危險的權力追逐者，在我看來并非如此。

他的妻子對重獲他的感情絕望后，回到莫斯科的兄弟家里。她專注于慈善活動，由于過度勞累、身體衰弱而過早離世。她的親戚們因為蘭德伯格拋棄她，按照他們的道德標準很難原諒他。可想而知，他們無視他的英雄品質。他生來就是游擊隊員，非流動定居人群的規則對他不適用。20世紀30年代，當猶太人的自衛組織逐漸統一成哈加納——猶太地下武裝時，他順理成章地當了一名新兵，成為突擊戰術的首席教官。他是猶太突擊隊——帕馬奇——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這是早期組織在1941年的延續，他將帕馬奇視為反抗外族統治的抵抗活動的核心。我猜想，阿拉伯人絲毫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就像沒有引起巴基斯坦地區猶太居民[49](#_49_11)的興趣一樣。

他成為哈加納的主要領袖之一。戰爭爆發時，他同英軍一起作戰（英軍與哈加納結成聯盟），被稱為“大伊扎克”，在黎巴嫩和敘利亞參加了反對維希武裝力量的戰斗。戰爭結束后，他蓄了胡子，隱居了起來，參加了猶太人反抗英國委任政府的斗爭。他遭到懸賞緝拿，但從未被抓到。

1934年，我第一次去巴勒斯坦時試圖找到他。但我認識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當時他可能正在組建帕馬奇的前身，可我對此一無所知。后來，1947年我與魏茨曼博士住在雷霍沃特時，我得以與他會晤。這次會談使我對俄國的親戚們產生了興趣。我向魏茨曼提到伊扎克·薩德赫（他1938年開始改用此名）時，魏茨曼說認識他，為他深深吸引，并帶著微笑稱他為“伊佐克先生”。對伊佐克先生不很喜歡戴維·本——古里安一事，魏茨曼并不很沮喪。他說，他想自己能夠找到我的姑父和表兄弟，但不太容易，因為巴勒斯坦警方正在抓他。然而，我還是如愿在特拉維夫的一個咖啡館后面秘密地與他會面，與他開心地聊了兩個小時。他的精神狀態極佳，告訴我他為英軍建立的功勛。他安慰我，沒有人會向當局告密，說出他在哪里。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說到他與英國人的關系，他說他沒有絲毫反感，他喜歡某些英國人，非常佩服他們的素質。但是，既然英國人的政策如此，他就別無選擇——他們必須拼死反抗。殖民官員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屈從于阿拉伯人，這是不可想象的。他說他受夠了20世紀20和30年代巴勒斯坦政府的那些官員，即使他們心懷好意，并不公開反對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但是他們想法太刻薄、過于迂腐、心胸狹窄。總之，他們太俗氣，缺乏他所說的真正的文化。除了少數幾位外，根本不可能和他們談論書籍、思想、音樂、歷史，尤其是猶太人的悠久傳統。兩者過去從未聯合過，將來也決不會有任何聯合。徹底分開得越早越好——也許分開之后，兩者的關系會得到改善。

我剛認識薩德赫時，他身材高挑、舉止優雅，對自己的外貌頗為自信；現在他體態臃腫、留著胡須、衣衫襤褸，顯然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了——他對生活的舒適毫無興趣，他傾心的是行動——他非常享受自己神出鬼沒的生存狀態。當我在這個咖啡館與他見面時，他當然是個幸福的人，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緊張、畏懼或對未來的真正憂慮——每天都有每天的問題，每天都有每天的歡樂——他只是懷著對生命的強烈熱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險境。

英國人1948年離開巴勒斯坦后，他擔任一個流動部隊的司令員，奪取埃及堡壘，俘虜埃及士兵。我們從他手下的官兵（如那位他傲慢對待的薩繆爾夫人的孫子）那里了解到，他的辦法就是雙手握著手榴彈，突襲埃及前哨，高聲喊叫著讓手下照著做。埃及人很快逃跑，鞋都跑丟了。基本不需要戰斗，他就收繳了自己看到的武器。

他收藏的戰利品——槍支、匕首、彎刀——后來把他在雅法的家裝點得很氣派。獨立戰爭之后我到那里拜訪過他。可以說當時他已經是一名民族英雄，他給我看了很多自己攻打埃及部隊和堡壘時的照片。當我告訴他，他是猶太人的加里波第（19世紀反抗奧地利的意大利民族英雄）時，他興高采烈。

后來的事表明，他對加里波第了如指掌。薩德赫說，他一直迷戀著加里波第的生平和參加過的戰役。隨后不久，在寄給我的明信片上，他的簽名就是“加里波第”。他養了一只羊，拴在花園里的一棵樹上，這并非因為他需要羊奶，而是由于以色列新頒布的法律禁止養羊；而他的信條則是挑戰這個白癡的規定。盡管當時他已經非常出名，但在我眼里他則完全未變：他并未被沖昏頭腦；他依然單純、快樂、不拘小節、熱情絲毫不減；最重要的是，他仍擁有不減的活力，熱愛生活的方方面面、熱愛行動、熱愛變化和事件，熱愛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他痛恨無聊平靜穩定有序的生活。他的桌子上擺了一大瓶伏特加酒——他說：“這是給蘇聯大使準備的。”

他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他所做過的其他事情完全一樣，都是漫不經心和不負責任的。仰慕他的孩子們在街上高興地盯著他看，他的同情者和共產主義者在他的安息日沙龍聚會。他和蘇聯使館的人一起喝酒，思忖著他是否應該訪問莫斯科，看看他離開期間發生的事情。他對自己親蘇聯態度的解釋是：他深信美國人和英國人決不會轟炸以色列，但俄國人可能會轟炸以色列，所以需要不斷地討好蘇聯——他拒絕承認思想意識上的同情。在雅法，他告訴我：“俄國人希望一個強大的阿拉伯聯盟能納入我們這個小國家——但那不可能——我們永遠不當共產主義者。以色列共產黨是個荒唐可笑的黨，阿拉伯人也不當共產主義者，無論他們說什么。與蘇聯搞好關系是有可能的，但永遠無法與共產主義搞好關系。我們的問題無關政治，而是和阿拉伯的關系，這是道德與個人問題。我曾經相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有可能聯合建立一個雙民族國家，但現在我認識到這不可能——他們太恨我們了，我非常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分開生活。當然，我們應該努力盡最大可能善待阿拉伯少數民族，但恐怕這也不會讓他們與我們和解。但誰知道呢——將來歸將來，所有的事都能發生，人不能放棄希望，最重要的是不能心懷恐懼，一個人必須把一切事情簡單地視為構建生命的材料，盡可能使生命豐富、完整。”

他特別引以為豪的是他與追隨者的友誼。他非常喜愛摩西·達揚和伊加爾·阿隆，曾經有一次公開拍賣一張他摟著兩位勇士肩膀的有名照片。他下決心不要搞得過于嚴肅。他極其喜歡講述他的功績，像一名墨西哥革命派的退休將軍——然而即便如此，他表現出的虛榮心是如此單純，如此迷人，以至于沒有人會感到嫉妒。

在他成功的歷程中，他放棄了很多女士；當時他和一位崇拜他的知名女士幸福地結為伉儷。我拜訪他時，他關切地詢問起他家人的情況，熱情地向我講述了他輝煌的過去。像所有的開拓性團體一樣，在這個彌漫著沖突、焦慮和熱切意圖的國家，這位大男孩帶來了一絲完全自由、難以抑制的詼諧、輕松、魅力和天生的優雅；這一半是自由奔放的，另一半則高貴典雅；太多了會破壞秩序；但這些要素，對任何自由和值得生存于其中的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生活中，他是個怪物；他在戰爭和革命中的表現非常精彩，他厭倦平靜、有序、枯燥無味的生活。托洛茨基曾說，那些想要過平靜生活，卻出生在20世紀的人，運氣糟透了。伊扎克·薩德赫肯定不愿過平靜的生活。他非常欣賞自己，將自己的快樂告訴大家，激勵他們、振奮他們、鼓舞他們。我非常喜歡他。

他的功勛——他對以色列士兵的訓練以及與士兵們的友誼，他傳奇般的英雄事跡——不僅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更屬于以色列獨立戰爭和建國的歷史。我試圖做的是講述一些與他密切交往的回憶和他早期生活的軼事。他是個慷慨大方、敢于冒險的人，在自己國家的歷史中，盡到了他自己的責任。他的缺點和他的美德，都讓我著迷。我謹以這篇回憶聊表我對他深情誠摯的紀念，他將永遠受人崇敬與緬懷[50](#_50_11)。

# 劉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

本篇對劉易斯·納米爾的介紹不是來自調查研究，而是純粹由回憶組成。納米爾是我們時代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是一位享有盛譽和有影響力的人。他作為一個史學家的成就，尤其是他對英國歷史研究和編寫的決定性影響，與他非同尋常的人生一樣，應得到充分而細致的研究。我勝任不了這一任務。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盡己所能描述這位我所認識的最杰出人物之一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主張。我從來都不是他的密友，但那些跟我一樣雖不常見到他，但仍與他定期會面并交談或者聽他講一些他所感興趣的話題的人，都不可能忘記他直接的思想和道德影響。我希望記錄下來這種印象，以期對那些不認識他但可能對他這一類人感到好奇的人們有所幫助。

我想，應該是在1929年，我還在牛津讀本科時第一次偶然知道他的。有人給我看了一篇他在《新政治家》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是現代歐洲猶太人的生活狀況[51](#_51_11)。這是我所見過，或者我懷疑是所有人曾讀過的有關這個主題最好、最引人注目的文章。那時，有不少文章都涉及這一主題，但大多數只是還算不錯的新聞作品；能集智識、歷史視野和寫作這樣簡潔有力的文章所需要的能力于一身的人，在該主題的作者中，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如果說有的話，也很少見。這篇文章在各個方面都非同尋常。人們讀到它時就會認識到它是無可替代的，那是一種突然間碧波蕩舟的酣暢。納米爾將東歐猶太人比作一座冰川，其中一部分仍封凍著，一部分已在啟蒙運動的陽光下蒸發掉了，而余下的部分已融化并且匯合成了民族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激流。他以無比的想象力和明確的歷史概括能力來展開這篇文章，這種能力使得他能夠既深入到具體事實，歷史視野又非常寬廣，且從不忽視那些令人不安的影響。我想知道這位作者究竟是誰。有人說他是一位歷史學家，作品曾在學術界引起過轟動，但他至多算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學者，不能跟陶特、巴克爾或費希爾齊名，更不用說跟哈勒維或特里維廉相比了。那就是說，作者并不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只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享有很高聲譽。直到1932年我被選入全靈學院，再沒聽到過更多有關他的消息。

在全靈學院，我發現我那些新的歷史學同事們——G.N.克拉克、理查德·佩爾斯、A.L.羅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對納米爾評價甚高。從他們那里，我了解到納米爾的一些真正成就。我進入全靈學院這件事顯然引起了納米爾的興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幾年，他自己有機會但沒能成功獲選[52](#_52_11)。我收到一個便箋，是用很大的大寫字母寫的，說作者打算在下周某個下午拜訪我，希望我能有時間接待他，落款是劉易斯·伯恩斯坦·納米爾。在我那里，他用緩慢、從容、有些生硬的語氣告訴我，他之所以希望見我，是因為他的朋友理查德·佩爾斯跟他說我對卡爾·馬克思感興趣，可他對這個人評價很低。他想知道為什么我熱衷于寫一本關于馬克思的書。他尊敬全靈學院的研究員們，他相信除了他不愿提及的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研究員的才能可以勝任真正的研究工作。在他看來，馬克思不值得受到如此關注，他只是一個被仇恨蒙蔽的微不足道的歷史學家、一個毫無價值的經濟學家。為什么我不寫弗洛伊德呢？弗洛伊德對歷史學和傳記學的重要性至今沒有得到充分認可。跟馬克思寫的東西不一樣，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天才作品，比馬克思寫的好得多。除此之外，弗洛伊德還在世，能夠接受訪問，而馬克思已經去世了；馬克思的追隨者們，尤其俄國那些人，毫無思想，寫作拖沓，在這方面堪比德國的哲學家，后者既缺乏分寸感，又缺乏文學天分和品位。

他站在房間中央，用緩慢低沉的、催眠似的嗓音，以一種非常強調的口吻連珠炮似的說著，每句話中間少有停頓，帶著很重的中歐口音，表情冷峻。他一動不動地注視著我，時而皺皺眉頭，發出奇特的牛鳴聲（我后來才意識到他這是在換氣，可表面上卻看不出來），這奇怪的聲音填上了他每句話之間的空隙，根本不可能打斷他的話。我也沒有妄想插言。所有這些都太奇怪了，他說的可真多。我感覺自己就像被一位嚴厲的校長盯著，他完全知道我在干什么，不贊成我的做法，決心將我扳回正道并使我遵循他的教導。終于，他停了下來，沉默地瞪視著我。我請求他坐下來。他坐下了，可還是盯著我看。我結結巴巴地為自己事實上在做的事情進行辯護，但他幾乎沒有聽進去。“馬克思！馬克思！”他嚴肅又緩慢地繼續說道，“他就是一個猶太‘江湖郎中’，抓住一個好的思想把它往死里用，只是為了向非猶太人泄恨而已。”我問他，他這種看法是否跟馬克思的猶太血統有關系。這個問題刺激了他，使他陷入了對自己經歷的陳述中。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充滿了樂趣，他幾乎一直在說話。

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叫伯恩斯坦，一個猶太人，在波蘭管理著一片很大的地產，并且他父親已經轉信羅馬天主教，他說這在他家庭所屬的階層和周圍環境中很普遍。他自己則接受了一個年輕的波蘭大地主所應受的教育，因為他父母相信，如果一個人足夠渴望轉變信仰的話，為波蘭天主教的行為模式同化就是一個完全可行的、讓人憧憬的過程。他們認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唯一阻礙就是信仰不同，如果消除這種差別的話，那些由此在歷史上產生的社會和文化的障礙就會消失。轉變信仰能夠使猶太人完全融入社會主流，結束孤立、模糊的狀態。的確，猶太人所受的迫害使得這種理性的做法看似很明智。伯爾內、海涅，以及海因里希·馬克思、艾薩克?迪斯累利（兩人都是著名兒子的父親）跟納米爾父母的想法實質上一樣，這使得他們接受了基督教。而在納米爾看來，這個假想毫無根據，而且有辱尊嚴。在他還很年輕（當時他的名字是路德維克·伯恩斯坦），十六或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逐漸如此認為了。他感覺自己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并且認為，他周圍改宗的猶太人實際生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中——他們忘掉了祖先們長久以來的悲劇，卻發現自己處于兩個陣營之間一塊無人的空地上，兩邊都不討好。他父親傳統的中產階級人生觀總讓他感到厭惡。他決定返回猶太人團體（無論如何他自己是這么想的），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試圖割斷自己與過去的聯系是一種自我毀滅，是可恥的行為，也是無論如何都行不通的；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表達對他的家庭以及他們毫無價值的觀念的蔑視。他的父親認為他不懂得感恩、愚昧無知、頑固不化，不再繼續供養他。他去了英格蘭，他同許多中東歐猶太人的感受一樣，認為那里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性化的社會，也是一個對傳統包括對他自己的傳統非常尊重的地方。他認為，他父親的生活方式跟統治奧匈帝國的墮落、虛偽和壓抑很有關系。作為對那種生活方式全面反抗的一部分，他開始為社會主義所吸引。他父母以及他們周圍圈子所過的那種虛假、屈辱的生活，在他看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對自身及所處位置尤其是周圍波蘭人（不管是奧地利化的波蘭人還是那些民族主義者）對他們的態度持有完全錯誤的認識。當如此多的假象都企圖掩飾一種基于對真正的（大多是經濟的）事實漠視或曲解的不合理、不公平社會秩序時，馬克思主義反駁了那些自由幻想并給出解釋，在這方面它是一種主導的哲學思想。

他到倫敦后，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名學生。這所大學當時的主流是韋伯夫婦、格雷厄姆·沃拉斯和他們的追隨者，這些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好戰的反自由主義者。在學習過程中，他認識到自己只不過是簡單放棄了一種欺騙性的意識形態，轉向了另外一種。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普遍原理跟它想要代替的思想一樣，愚蠢且不現實。唯一的現實只能在個人及其有意或無意的基本需求中找到，尤其是后者，它被一系列道義上的遁詞抑制和合理化了。雖然馬克思主義也察覺到了這種基本需求，但卻用它本身的幻想取而代之。個人心理學，而非社會學，是關鍵所在。人類行為（和普遍意義上的社會現實）只能通過對人類個體行為的根源進行大膽和冷靜的科學考察來解釋，這些行為根源是基本驅動力，包括人類對食物、住所、權力、性滿足、社會認同等的永恒渴求。人類歷史，特別是政治史，也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來解釋。

他沒有對英格蘭失望。這里正如他設想的，人們以一種人性化、文明的方式，尤其是嚴肅、不夸張、基于經驗的方式來理解生活。在他看來，英國人比其他大多數人更關注人類生活的真正目標，那就是快樂、公平、力量、自由、榮譽，支撐愛國主義和遵循傳統的人類團結；最重要的是，他們厭惡抽象的原理和概括的理論。對未經查證的神秘原因的關注（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學家已經著手研究這些神秘因素）能夠解釋人類的動機。實際上這些公開的想法（這些考慮在一個普通英國人的思想里比一個普通德國人或波蘭人要多很多）解釋了大量的人類行為，比“意識形態家”所解釋的范圍要大得多。在這次談話的某個時候，納米爾以一種克制的憤怒說道（他此后也經常這么說），那些愚蠢的人們企圖通過引用觀念的影響來解釋人類行為。觀念只是頭腦對根深蒂固的動力和動機的闡釋，頭腦太怯懦或太保守而不能直面它們。觀念歷史學家是最沒用的那種歷史學家。他問我：“你是否記得那個反猶太的維也納市長盧埃格爾在被問到自然科學補貼時，曾經對維也納市民說了什么？‘科學？那是一個猶太人抄襲另一個猶太人的東西。’[53](#_53_11)這就是我說的觀念史。”也許他看到我臉上的不滿，因為我清楚地記得他將前面所有講過的話用更嚴肅的語氣又說了一遍，然后慢騰騰地拖著聲音反復強調剛才的話，跟他在以后的場合中做的一樣。

在他離得很遠時，倫敦經濟學院就不是他所欣賞的英國，當他面對面接觸時，這種感覺就更強烈了。這里是歐洲大陸愚昧思想的一個可悲分支。他于是轉學到牛津巴利奧學院，在那里向阿瑟·萊昂內爾·史密斯及其他人學習歷史。牛津（他繼續說道）對意識形態不那么堅持，在這里他可以自由地表明他所認為的現代歷史最深刻的因素，那就是基于歷史的民族主義觀念。有人認為：有理性的人們（猶太人或非猶太人）或者獻身一種宗教（有組織的弄虛作假——拉比就是靠欺騙過活，比神父更差勁），或者拋棄他們的信仰，或者移居海外，或者做出所有其他人類團體都不會做的事情，即把他們自己組織成政治團體然后尋求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以此人們都能過上一種完美的生活。這些看法純粹是胡說八道。不管是在歷史中還是在個人生活中，自我理解就是一切。這只有依靠審慎的經驗主義才能達到，那就是不斷調整假說使之適應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扭曲和模糊。因此，他尊敬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學理論家，包括他非常信任的筆跡學家。他不欣賞馬克思，雖然馬克思確實正確地診斷出了病癥所在，但卻開出了一個庸醫的藥方。然而，馬克思還是比柏克和邊沁要好一些，他們宣揚的僅僅是毫無依據的理念，因此并不被理智和現實的政治家們所信任。

納米爾再次開始講述自身的經歷：他在英國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對待，他應當擁有一個牛津的終身職位，卻沒能如愿以償。許多著名學者并沒有公正地評價他，因為知道他會讓他們“現眼”。但是，英國是唯一能夠居住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這里盲從少一些，更接近經驗主義的現實，政治傳統中有一定程度的現實主義——有人稱之為犬儒主義，這種現實主義比歐洲大陸上所有乏味的理想主義以及愚蠢的自由主義要好得多。一些英國人被這些歐洲大陸的“主義”給欺騙了。這里，他講了一些優秀同僚的名字，但他認為他們相對還是少數并且不太有影響力；大多數明智的人還是會遵照習慣和經過實驗的現實規則，對理論保持清醒頭腦，因此他們就避免了很多荒謬的思想和野蠻的行為。他無法跟在英國的猶太人談論猶太復國主義，因為他們是一群可悲幻想的犧牲者，就像是把頭埋在低等沙土里的鴕鳥一樣，是愚蠢可笑、根本不值得去挽救的一群人。但是英國人理解猶太復國運動的訴求和理由。魏茨曼是他所見過的唯一能在這方面跟英國人相提并論的人，也是唯一一個他特別尊敬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至此，他結束了與我的談話。就如我所推想的一樣，他已經充分地了解了我的想法——雖然他對我偶爾的提問毫不在意。然后，他出了我家，準備去跟巴利奧學院的肯尼斯·貝爾喝茶。“他的家人很喜歡我，”他補充道。

我因他的來訪受寵若驚，對他的談話印象深刻，但也感到一些迷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五年左右的時間里，我見過他不止一次。他猛烈抨擊綏靖政策。他感到他們的現實感和他們的經驗主義明顯背離了英國的統治階級。希特勒跟他本人所講完全相同，他所寫的《我的奮斗》會被逐字實現，并在籌劃打一場征服戰爭。對這一切視而不見，是典型德國或者猶太式的自我欺騙。塞西爾家族的人“還好”，他們了解現實，代表了英格蘭最典型的品質。溫斯頓·丘吉爾也是這樣。那些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人跟那些反對丘吉爾及民族反抗政策的是一群人，他們是：杰弗里·道森——《泰晤士報》的主編、張伯倫、哈利法克斯、湯因比、外交部官員、坎特伯雷大主教蘭、大多數保守黨人、絕大多數商業聯合會成員。塞西爾家族、丘吉爾、真正的貴族、驕傲、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傳統美德、反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個人輝煌、簡單直接的現實主義，所有這一切在他腦海里融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混合物。他認為支持德國和支持阿拉伯的就是一伙人。

他對我講了很多有關猶太復國主義的事情。毫無疑問，那是因為他認為我同情猶太復國主義（我的確如此）。我逐漸確信猶太復國主義已深深刻在他的腦子里，并且他是以絕對的驕傲來參加猶太復國運動的。他認為猶太人的地位很屈辱，他不喜歡那些忍受或假裝這件事不存在的人。他想要自由而有尊嚴的生存。他足夠聰明，認識到擺脫自己的猶太教信仰、偽裝一層保護色、融入非猶太人的世界，所有這些都是行不通的，是可悲的自我欺騙。如果他不降低到他的大多數同胞（他對這個整體是蔑視的）的層次，如果他就像在歷史上不可避免的一樣不得不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那么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他們必須被提升到他自己這個層次上來。要是這件事不能通過緩慢的、漸進的、和平的、友好的方式來實現，那么就必須通過迅速的，（如果需要的話）甚至是有些激烈的方式來達成。在遇到魏茨曼之前，他并不相信這種迅速的方式有可能實現。他像崇拜英雄般仰視魏茨曼，至少有那么一個猶太人，他不會覺得跟他聯系（實際上，甚至追隨他）是件丟臉的事。但是其他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對他來說好像不存在，而他并不愿費勁去掩飾自己的這種看法。他稱他們為“拉比”，說他們不比神父和牧師好到哪里去——在他看來，這是一種辱罵。他的猶太復國同道們對他評價很高，但也很難期望他們對他公開的、言辭尖銳的蔑視會感到高興。盡管魏茨曼欣賞他，但他還是沒能當上世界猶太復國執行委員會終身成員，而他對此抱恨終生。盡管他一直在強調現實主義和歷史方法，但他仍然具有一種政治上的浪漫氣質。我不敢說他是否沉湎于這樣一種想象：他自視為猶太復國主義者鄧南遮那類人物，騎一匹白馬跨過約旦河追兇。他將猶太民族運動看作一種意大利復興運動；即便他當不了它的加里波第，他也會做一名加富爾的參謀和戰士——加富爾智慧、現實、高貴、歐洲化，他幾乎就是英國的魏茨曼。

我曾私下里認為，就性格（而非思想）來說，納米爾跟他的“眼中釘”卡爾·馬克思并非完全不一樣。他同樣也是一個極具智慧、偶爾具有攻擊性、具有政治頭腦的知識分子，他對教條的憎恨帶有一種教條式的固執。跟馬克思一樣，他自負、驕傲、瞧不起人、沒有耐性、動輒易怒、在自己的專業上能力極強、對自身能力極為自信、從未有哪怕是一丁點的傷感和自我憐憫。跟馬克思一樣，他常讓對談者著迷，也會讓他們感到壓抑。如果你碰巧對他所談話題感興趣（比如，波蘭對1848年革命的一些決議，或者英國的鄉村房屋），那么你很幸運，因為他的闡述非常有學識、精彩絕倫而又極有創意，而你不可能再次聽到有關此事的如此精彩的言談了。但是，如果你對此不感興趣，你也逃不掉。因此，那些跟他見過面的人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群，一部分人認為他是一個天才、一個光芒四射的談話者，而想從他身邊走掉的那些人則認為他是個讓人煩得要命的人。事實上，他兩者都是。在他的學生和支持者中，他獲得了欣賞、熱情和喜愛；而在那些不贊成其觀點的人中，他則引起了不安的尊敬和尷尬的厭惡。如果他偶然遇到不顯山露水的反猶太主義者，他會激起他們的怒火；倫敦俱樂部的人（他經常天真地追隨他們）認為他很討厭。他所攻擊的學術圈里的人和公務員們，也討厭和詆毀他。學者們則認為他是一個有驚人力量的人，雖然有時候面對他會有些神經緊張，但還是深深地欣賞他。

跟他待在一起，我從來不會（即使在他最生硬沉悶的時候也不會）感到厭煩。他所談論的一切話題，不管他是怎么說的，在我看來都是有趣和重要的；他總是妙趣橫生地談論這些話題。他說話的時候帶有專斷的意味，言論通常很絕對，對其他學者事實上是對絕大多數其他人都表示輕蔑。在還活著的人中，完全免于受他蔑視的只有這些人：溫斯頓·丘吉爾，在他眼里丘吉爾是不會做錯事的；魏茨曼，他在魏茨曼面前就像孩子般單純、虔誠，對魏茨曼不加批判，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還有他偉大的朋友布蘭奇·達格代爾，她是貝爾福的侄女。有人說她在場的時候他就像變了個人似的，但我從未見過他倆在一起。對于他為了檢查契據和家庭文書而去鄉下，我也不知道他在那些鄉間宅第感覺如何，都說了些什么。他喜歡待在鄉間宅第里，部分原因是他在有生之年一直都懷有對英國的浪漫熱愛。對他來說，英國的貴族沐浴在天光里。他對歷史的興趣當然不足以解釋這種燦爛的憧憬。也許是另外一個原因：他對英國議員們各自的歷史（那時，他們中很多人是有權有勢、極具天賦的輝格黨成員或與輝格黨成員有緊密聯系）感興趣，是因為他把那種生活理想化了。有時，他被指責為一個勢利的人。納米爾確實有一點這樣，但他的勢利是普魯斯特式的——在他眼里，那些貴族和精英們富有、驕傲、沉著、獨立、熱愛自由到了反常的地步，這樣的英國人就是藝術品，他是懷著極大的熱忱（實際上是一種狂熱的關注）和一絲不茍的態度來研究他們的。他并未沉迷于他所關注的這一世界的魅力，不像奧斯卡·王爾德，或者甚至不像亨利·詹姆斯表現出來的那樣。他滿足于作為一個局外人。他對他所看到的英格蘭的民族品性，包括優點和缺點都感到榮耀，對這一人種畢生都懷有無比的熱情，他終生都在分析和（不可避免地）贊美英國人（從心理學角度說，弗洛伊德當然也無助于他理解這種熱情）。他詳細地研究英國統治階層的生活，就像馬克思研究無產階級一樣，不是為它本身而研究，也不是把它當作一個令人著迷的觀察對象，而是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來研究；他每次都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來觀察，都沒有去強調或否認什么。

他的出身讓他感到困擾。他對順從的極端憎恨，跟他對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記憶有關，并經常以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有一次他在火車走廊上見到我，出人意料地說：“我去看望德比勛爵，他跟我說：‘納米爾，你是個猶太人。為什么要寫我們英國人的歷史？為什么不寫猶太人的歷史？’我回答說：‘德比！根本就沒有現代猶太人的歷史，只有一部猶太人的殉教史，這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好玩！’”他稱猶太人為“我的同族人”，而且對這個詞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身上產生的尷尬效果感到很滿意。在全靈學院，有一天下午有人當著他的面——他當時是作為客人出現在公共休息室里——為德國人宣稱的殖民地進行辯護，當時那是一個尚無定論的話題。納米爾站起來，瞪著眼看了一圈屋里的人，然后用蛇怪般的眼神死死盯住那個人（跟他一樣也是客人），他當時以為此公是德國人——后來證明他認錯了，大聲用德語說：“我們猶太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不這樣認為。”他很得意這些驚人之語所產生的效果。他是個徹底的民族主義者，從不隱瞞對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敵意，對這些人，他的立場比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同僚們都更加冷硬。我很清楚地記得，在一個耶路撒冷大學招聘英語教師的會上，納米爾用敵意的、惡狠狠的眼光瞪著一個有些膽怯、好像是從諾丁漢來的講師，說道：“利維先生，你會打槍嗎？”——那個應聘者喃喃地說了句什么話——“因為如果你獲得了這個職位，你就必須開槍。你不得不向我們的阿拉伯表親們開火。因為如果你不向他們開火，他們就會向你開火。”一片震驚的沉默。“利維先生，你能否回答我的問題，你能打槍嗎？”有些應聘者退出了。沒有人得到聘任。

當20世紀30年代過后，西方國家的處境逐步惡化時，納米爾的性情則逐漸變得更加悲觀、更加狂暴。他會到全靈學院拜訪我，后來是到新學院；說既然戰爭已不可避免，他希望能夠死得夠本，希望畫出用各種邪惡的辦法消滅許多納粹黨人的富有想象力的畫卷。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立場——他認為他們那時只是英國外交政策的犧牲者中的一群——使他愈發沮喪。他眼中的惡棍，不是那些保守黨領袖（他們中有些人是貴族，在一定程度上就免于被責難了），而是那些熱愛阿拉伯的“外交部耍筆桿子的人”和“殖民地部里偽善的白癡”。他隨時恭候他們（特別是后者），以雅典娜的名義。他會把某個毫無戒備的官員拉到吸煙室的角落，在那里進行一番令聽者印象深刻的可怕說教，而這也許會增加這個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總體上已有的強烈反感，尤其是對納米爾的反感。

約翰·沙克伯勒爵士，殖民地部副大臣，沒少被納米爾當作戰爭之路上的目標。有一次，納米爾用他輕柔但尖銳而冷酷的聲音跟沙克伯勒談話，后者想逃掉，但沒成功；當時我在場。納米爾跟他出了房間，緊跟著走上大街，然后到了約克公爵路，也許跟到了殖民地部。對他的黨派來說，納米爾是政治上的負累，同樣也是智識上的資產。他最終的和對待最殘酷的受害者是殖民大臣馬爾科姆·麥克唐納。1939年，張伯倫政府關于巴勒斯坦的白皮書（它似乎使所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希望都破滅了）發表之后，納米爾來全靈學院跟雷金納德·卡普蘭德用午餐。卡普蘭德是關于巴勒斯坦的《皮爾報告》的實際作者，這個報告也許是關于這個惱人課題的最有價值的報告。卡普蘭德痛苦地談到英國政府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可恥背叛，并說他會給《泰晤士報》寫一封信，指出張伯倫和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的錯誤所在。納米爾說他對付這種事有他自己的辦法。他曾經在倫敦某個地方見到了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我跟他說話。我從一個笑話開始講。我說在18世紀，貴族們把他們的老師都變成副大臣，但在20世紀，副大臣們把他們的老師變成貴族。他沒有明白，我也就沒解釋。[54](#_54_11)然后我說了些他能明白的東西。我對他說：‘馬爾科姆’——你知道，他對我來說仍是馬爾科姆，我跟他非常熟——‘我正在寫一本新書。’他說：‘什么書呀，劉易斯？’我回答道：‘我會告訴你是什么書的。我已經把它叫作《兩個麥克唐納：關于背叛的研究》。’”我不知道納米爾是否確實是這么說的；他當作他說過，而且他確實能做得出來。又一次，在報復心極強這一點上，他跟卡爾·馬克思像極了；他的攻擊跟馬克思一樣，是帶刃見血的。然而，他卻對自己被這么多人害怕和不喜歡感到驚奇。

1941年，我受雇于情報部，駐紐約，在那里我遇到馬克斯·哈默林，他對我談了納米爾年輕時的一些事情。哈默林的父親跟納米爾的父親約瑟夫·伯恩斯坦有些關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多年就在加利西亞的倫貝格附近管理地產。馬克斯·哈默林熱心地同情英國人，他跟我聯系是希望能在英國抗擊希特勒的戰斗中提供幫助。談話時，他問我是否認識納米爾教授，聽到我肯定的回答他感到有些驚奇。他說早些年常常見到納米爾，但后來就中斷了聯系，他很希望知道納米爾的情況。哈默林告訴我，他父親移民到了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取得了紐約好幾種外語期刊的控制權。年輕的納米爾于1913年第一次來到紐約，研究美國獨立戰爭，當時還依靠父親供養，他幾乎沒有什么錢。約瑟夫·伯恩斯坦跟他的老伙伴商量好了，后者雇用納米爾寫一些社論，翻譯后刊登在期刊上。納米爾晚上寫文章，白天到紐約公共圖書館工作，以此保持身心一致。據馬克斯·哈默林說，納米爾極為討厭奧匈帝國的繼續存在，他是《英法協約》的有力支持者。老哈默林有很多羅馬天主教讀者，很不希望疏遠美國的羅馬教會——他們基本上是支持奧地利和孤立主義的。納米爾的文章變得干涉意味太強烈，他被告知應讓文章溫和一些，但他并不理睬這種暗示和要求，于是沖突白熱化了，雇傭關系到1914年春天結束了。因為沒有明顯的維持生計的辦法，納米爾就回到了英國，在那里得到巴利奧學院的資助，這樣他就可以繼續從事研究。納米爾告訴我，暗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是杰弗里·道森（《泰晤士報》主編）在全靈學院一次午餐上告訴大家的。納米爾碰巧也在那里，對道森和朋友們宣稱戰爭馬上就要來臨了。道森說他不相信（他在1938年到1939年間又有類似的錯覺），轉到了其他話題上。

宣布開戰后，納米爾自愿加入了英國軍隊。他顯然不是一個出色的士兵。因此，某位明智的人就把他從軍隊調到外交部，當一名波蘭事務顧問，向外交部歷史顧問約翰·黑德勒姆——莫利爵士負責。“我記得，”納米爾跟我說，“1918年卡爾皇帝求和的那一天，我對黑德勒姆——莫利說：‘等等。’黑德拉姆——莫利對貝爾福說：‘等等。’貝爾福對勞合·喬治說：‘等等。’勞合·喬治對威爾遜說：‘等等。’他們等著的時候，奧匈帝國分裂了。[55](#_55_11)可以說是我親手把它撕成了碎片。”

除了確信波蘭國家民主黨正在籌劃暗殺他，納米爾很喜歡他在外交部的工作。戰后，外交部并沒有表示出要他留任的愿望，財政部也沒有——他當時也臨時為財政部工作過。牛津巴利奧學院也不愿意，曾有一陣讓他當一個臨時講師——他牛津的學生粉絲來自那段時間。于是，他離開英國到了維也納，在那里掙了幾千英鎊。20世紀20年代初，他帶著微薄的資金回到倫敦。在這里，他獨特的性格特點得到充分展示。他沒有做其他人會去做的事：在尋找謀生手段時，他并沒有想著要盡可能少花錢；他知道自己可以寫出一部原創性的重要著作，并且決定就這么做。他將此事告訴了朋友和支持者（其中的一些人與自由帝國主義者的圓桌集團有聯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納米爾贊同自由帝國主義者的思想）。他告訴他們他需要錢來寫一本書；他沒有作出任何還錢的承諾：錢被當作是一項學習的投資，僅僅如此。菲利普·克爾是納米爾在這件事上所接觸的一個人，他對我說（那是1940年在華盛頓，他當時是羅西恩侯爵，是英國駐美大使）他沒發現自己跟納米爾志趣相投，但被其獅子般強硬的個性所折服，認為他是一個才智非同尋常的人。他和朋友們為納米爾爭取了一項資助，同時納米爾還得到至少一筆私人資助。納米爾接受這樣的資助并沒有感到曲意的羞愧：這些資助在18世紀后期這個最好的時期通常是足夠的。他認為他有著與柏克一樣的權利，或如過去任何一個天才作家一樣，有錢有勢的人都會為資助這樣的人感到驕傲。他認為他的“贊助者”都應當有這種想法，總是認為他們沒有理由對他們的慷慨感到遺憾。他的著作確實如他所愿，改變了英國歷史學的學術標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史學寫作的風格）長達至少四分之一世紀。

完成著作之后，20世紀20年代末，納米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政治工作中。這使得他充分發揮了他令人嘆服的天賦：他的辯才、他的歷史感、他的驕傲、他的民族主義，以及他對揭露他人缺點、懦弱、謊言、無價值動機的喜好。他從這些工作中獲得極大滿足。期間，他使得一些不那么能干的同事感到不快和丟臉，讓英國知識界的一些人印象深刻、另一些人震驚和氣憤，常常使一些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有影響的官員心煩和憤怒。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他對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同僚長期而傷人的輕視，如果成立了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他當然無法成為指導者之一。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于是，他放棄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治活動，并不改變道德或政治立場。他回到史學研究上。他盼望（并非沒有道理）可以在母校得到一個職位，但沒有成功。每當一個歷史學（或國際關系學，在這方面他同樣是一個頂尖的專家）教職空缺時，他的名字總是不可避免地被提起，卻又適時地被否定。牛津那些負責任免的人常說，有三四個職位顯然是合適的，但某個遴選小組不任用他，而他顯然是優秀、足以勝任這些職位的，這是一件特別讓人羞愧的事。不過，輪到說這些話的人時，這些評選者或顧問做得跟前任一模一樣。納米爾總是被刷掉。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他的專業領域太窄了，他在政治上行動過度（比如他過于宣揚猶太復國主義，或對戰前英國外交政策的評價明顯很低），他會傲視同事、苛求學生，他會成為無聊的人，會在午餐時間使學院的某個同事無法忍受。對他的才華，人們沒有爭議：但這不能被看作一個充分的任命理由。他樹了一些難以和解的敵人。然而，盡管很敏銳，他仍然是一個天真的人，在個人事務方面表現得比較遲鈍、率真、孩子氣。他很容易上當受騙，會把恭維當成真心話，察覺不到誰在跟他作對，完全不會耍心眼和詭計。他的一切成就都是單靠卓越的才華取得的。他會錯誤判斷人們的動機，常常無法區分朋友和敵人。他掉進了陷阱，并且直到去世都覺察不出來。他是一個奧賽羅，在不只一個小的學術伊阿古前面保持自信。得不到一個牛津職位讓他很傷心，一如其他受到同樣對待的人。“我來告訴你他們是如何在牛津選拔教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他在莫德林學院韋恩福利特講座授課的那段時間，他痛苦地對我說，“18世紀有一個叫古蘭的俱樂部，成員資格是去過東方。它發現有很多它希望吸收為成員的人沒去過東方。因此規則就從‘去過東方’改為‘表達過想去東方的愿望’，這就是他們在牛津怎么選教授的，”他補充說道，“別太過分了。”他繼續在曼徹斯特教書，但最終還是轉到了倫敦，受議會歷史研究部委托，以他自己的方式來做——詳細而微觀地研究所有曾當過議員的人的生活。在英國內外，他獲得了很多榮譽，但是沒有什么能彌補牛津早先帶給他的失望。巴利奧學院聘任他為榮譽研究員。牛津授予他兩個榮譽博士學位。他主持羅馬尼斯講座。雖然這些都讓他高興，就像他的騎士身份一樣，但老傷疤一直留在那里并讓他難過。

正是在這期間，他第二次結婚了（他第一次婚姻持續時間不長——據說他妻子是個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世了）。他皈依英國國教的信仰，跟朱莉婭·德·博索布勒的婚姻終于結束了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開始的極度寂寞和個人痛苦時期，這些因難得的驕傲和喜悅時刻而緩解。杰出的奧地利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魏斯曼是納米爾在維也納生活期間遇到的人，他告訴我他此生從未碰到誰比納米爾在才智上更具天賦、更敏銳、更有吸引力，或者更深地沉浸在無望的悲傷和孤寂中。

他轉信基督教使他失去了魏茨曼的友誼，魏茨曼并不想考究個中原因，只是對動機不可能體面的叛教行為作出了本能反應，就像他父親之前會做的那樣。當然，這件事讓納米爾很受傷，但婚姻給他帶來了新的生活，他更容易承受這種事情了。在魏茨曼去世后，他訪問過以色列，被深深感動，但仍然執拗地反對拉比，抱怨祭司的專制。當我輕視這一點時，他沖我翻臉，嚴肅地說：“你不像我那樣了解拉比和祭司——他們可以毀掉任何一個國家。牧師是不會惹什么麻煩的。沒有人會說落入牧師之手跟受耶穌會士控制是一樣的，恐怕現在應該說不會跟受拉比控制一樣。”這段時間里，他偶爾會從劍橋來跟我見面。隨著年齡增長，他變得更成熟了；他更幸福了，因為他的私人生活是平靜的，也因為他終于贏得了足夠的認可。他仍像以前一樣對批評感到痛苦：當他的朋友和追隨者阿蘭·泰勒在《曼徹斯特衛報》上發表一篇對他的一個作品集不夠謙恭的評論時，他就像馬克思一樣，把這作為評論家能力下降的象征。

他在不多的個人友誼上花費了很多精力，關系惡化讓他很痛苦。他跟泰勒的友誼就遭到了很大破壞，主要是泰勒認為他在選擇維維安·亨特·加爾布雷思的繼任者成為牛津大學欽定歷史教授這件事上起了作用。泰勒沒有得到任命，他指責納米爾沒有在力所能及時充分支持他，中斷了兩人的友誼。納米爾是真的喜歡他——與大多數人比起來，他更喜歡他。他告訴我他在泰勒家里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并說一個人必須要對他的人際關系小心謹慎——比他曾做的要更加小心。雖然泰勒天資非凡，但納米爾對他沉迷大眾雜志感到失望。“如果我傷害過你的感情，”他對我說，“我也道歉。我經常不太小心。”這是一個感人的和大方的說法：我曾送給他一份關于抽象問題的講座的打印稿，他以這句話告知收悉：“你確實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知道你自己在寫什么。”這是對歷史哲學的典型嘲弄——他認為曾經是我講座主題的歷史哲學是偽造的。我對他的來信感到高興。任何一個普通人都不會視它為攻擊，更不要說那些認識納米爾并樂見其偏見和荒謬的人。愛德華·哈利特·卡爾，一個普通朋友，碰巧在我收到信的那天來拜訪我，我津津樂道地給他讀了納米爾的信。此后不久，納米爾的評論就出現在《每日快報》的談話欄目。納米爾震驚了，馬上寫信給我，說他并不是想要侮辱我或者我講座的這個主題。我的保證并沒有說服他：他（毫無根據地）懷疑卡爾把這個嘲笑透露給了《每日快報》——卡爾對此斷然否認。當然，對于嚴肅的報刊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泰勒、卡爾、不列顛學會成員，這些嚴肅、博學、有天賦的人對歷史研究花費了很大心血，如何會與學術敵人（不論多么有趣）為伍而損害自己的職業（或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尊嚴？而且還是以如此公開的方式？至少巴特菲爾德，比任何人受到的誤解都多，就沒這么做。納米爾的懷疑常常（就像這件事一樣）沒有根據，但他依然如此。我的辯護他根本沒聽進去：一個理想化的形象，他大半生都持有的學者形象，可能也是英國人的形象，以某種方式受到了損害，這幾乎比個人攻擊更讓人痛苦。

他經常談到學術尊嚴：談到需要保持學問的純粹，保護它免于受到業余主義、新聞濫用、沉迷于教條這三個最大敵人的傷害。他的一句名言是：“業余者是考慮自己多于考慮其課題的人。”他提到一個年輕同事，懷疑這個人刻意炫耀。他熱切信任每一個領域的專業水準：他反對精心雕琢的文章，以及那些嚇唬讀者的想法，無論作者是一名普通人還是一位學術人士。他憤怒地談到，有些人指責他為挫敗輝格黨、攻擊他們的價值觀和英雄，而希望重新評價喬治三世的性格和歷史影響。他會嚴肅而很真誠地向我保證，他的唯一目的是重構事實，并用經過檢驗的、嚴格的經驗方法解釋事實。他不相信18世紀的黨派標志和政治理想的專業性的唯一理由是，他堅信——基于無可辯駁的文獻和其他事實證據——這些標志和專業性通常在代理人面前掩蓋了真相。他的心理學原則——這些揭示部分立足其上，在他看來，一再被歷史證據（政客及其代理人和親屬的實際交易）所證實，這能作為一個且唯一一個真實的解釋。不管在這個事情上他是否被誤解，他堅信他不是由理論來指導，而是由事實且只由事實來指導。關于什么是事實，什么構成了證據，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這是他嫌惡抽象、反對哲學的天性全力避開的問題。

對一個學者來說，新聞報道——對娛樂、出名的渴望，只是不負責。“不負責”，在他的字典里是最難聽的詞匯之一。他對歷史學家和學者道德責任的信念在嚴肅和真誠方面通常是康德式的。至于脫離實際的困擾，對他來說像是一種有罪的自我放縱——肆無忌憚地擺脫嚴格遵循由“事實”構成的、常常是復雜而令人費解的經驗路徑的責任，逃入歷史學家為滿足他自己的形而上或道德偏愛而虛構的對稱模型；或者，是一種近似病態的思想困擾，使得歷史學家簡直無法看到“如實直書”。因此，納米爾討厭或嘲諷哲學歷史學家；重點在于物質因素，而不信任理想因素。對于本身就受很多理想乃至偏見支配的人來說，這是很奇怪的：這些偏見包括民族主義和民族性格、對傳統之“根”的熱愛、“土地和亡靈”、對知識分子和學說家效能的懷疑、對個體心理學甚至是筆跡學的信賴。但事實就是這樣。

也許區分他本質上的縮減傾向并不過分——他總傾向于將一般命題和歷史學家的印象主義還原到堅硬的顆粒狀“事實”，傾向于討論所有問題的實質——這是他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主導思潮的一部分。畢竟，在維也納，馬赫闡述了“思維經濟”原則，并盡力將物理現象還原為一組可辨認的、幾乎是獨立的感覺；弗洛伊德在尋找“質料”，即心理現象可驗證的原因；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們提出了實證原則，作為對付模糊、先驗論、神學、玄學的武器；包豪斯清晰合理的線條可在阿道夫?魯斯及其弟子的思想中找到源頭。維也納是反對形而上學和反對印象主義的實證主義新的中心。不管納米爾是否知道這些——沒有誰對這些意識形態的分類的抗議更加激烈——他就是從這里走出來的。維也納最具獨創精神的思想家們強烈反對德國玄學，支持英國的經驗主義。在哲學領域，維也納思想與英國思想共同成長，取得了顯著的累累碩果。納米爾是將這一方法運用到歷史中的最大膽和最具有革命性的先驅之一。這個方法——尤其是在他追隨者的作品中——被批評為走得太遠了，“使思想脫離了歷史”。這種批評同樣也針對相應的哲學、藝術、建筑、心理學學派。不管這種評論是否公平，即便是最尖銳的批評也很難否認這種新方法早期影響的價值和重要性。它打開了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新的地平線露出來了，讓人們看到了之前沒有看到的東西。在這個宏大的建構——解構運動中，納米爾是一個主要人物。

納米爾性格的最大特點是堅持不懈地積極思考、獨立、勇敢，并且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選定的方法做事。他運用這個方法取得了豐富成果，不會僅僅是因為它在折中主義者或門外漢看來似乎是極端或狂熱的而去修改它。就像馬克思、達爾文、弗洛伊德一樣，他強烈地反對折中主義。他也不相信為了避免被指責為極端主義、取悅明哲之人而搞中庸或引進條件。事實上，他從不急于以任何方式取悅（更不用說姑息）評論家，這不是他的風格。他相信能發現客觀真理，并且在歷史研究中找到了發現真理的方法；他相信這種方法就是一種“點畫法”（一種微觀方法），它將社會事實分割為個體生命的細節——就像原子實體那樣，其生涯可被準確證實；他相信這些原子能夠組合成更大一些的整體。在歷史研究中，這是離科學方法最近的一種方法，不管受到什么樣的批評、付出多大的代價，他都堅持使用這種方法，除非他確信這種方法因其內在標準的不完善而無法得出研究已證實的結果。這個精神上的笛卡爾主義是他對付各種印象主義和淺薄的武器。康德曾經說過，大自然只有在被拷問、被提出具體問題的時候，它才會披露自己的秘密。在歷史研究中，納米爾堅信這一點。問題是以可回答的方式表述出來的。

納米爾是一個實證論、通貨緊縮、反浪漫主義時代的產物，他深沉的自然浪漫主義在另一個方面——政治上——表現出來。作為一個專注的歷史學家，他刻意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原子事實上。他確實把歷史材料分解還原為細微的碎片，然后再以一種奇妙而充滿想象力的概括把它們重新整合起來，就像那個時代其他歷史學家一樣。他不是一個敘事性的歷史學家，低估了觀念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他贊賞個體力量，鄙視平等、平庸、愚昧。他崇拜政治自由和個人解放。他對經濟事實的態度多半是矛盾的：他在歷史寫作中是個半心半意的決定論者，不管他會在理論文章里就此說些什么。他受到了來自唯物論和極端決定論的批評，但這些批評更適合那些使用這種方法卻沒有天賦、迂腐、怯懦的歷史學家，而他則勇于創新、充滿直覺、無拘無束。他考慮到很多因素。他不會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因為他積累了大量森林的材料并做了細微分析。在他黃金時期的著作中，目的從未被忽視。讀者不會被細節弄亂頭緒，從不會感到他是一個貪婪的、不放過任何東西的事實收集者，一個狂熱的、無法判斷物品重要與否的古董商。也許，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樹木甚至灌木已經開始遮掩他望見森林的視野。但是，他在最得意時很可能就像馬克思（他對馬克思缺乏尊敬，但馬克思的方法實際上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樣說過：“哦，納米爾可不是一個普通人。”

# 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牛津

我想那是在1933年秋季學期的第二個星期，是10月里的一個下午，我因為要還一本書就打電話給羅伊·哈羅德，并去了他在牛津基督教堂學院的房間；在那里，我第一次見到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我之后進來的是西爾維斯特·蓋茨，接下來是一位我認識的倫敦律師；有個人跟律師一起進來，個子不高、衣著整潔、舉止利落，被介紹說是法蘭克福特教授。說來慚愧，我對他的名字一點也不熟悉，我只是模糊地將這個名字跟新政和羅斯福聯系起來，但也不是很清楚這中間的關系，我想這也可證明我孤陋寡聞和不關心國際大事吧。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是伊斯特曼講座訪問教授，我不知道他的突然到訪是否在牛津法學院引起了轟動，我所能證實的就是他是悄然到此的。在牛津，國外大學名教授們的訪問并不少見，現在依然如此。無論來訪者多有名氣，他們都不會被當作名人來推崇；有時對他們的關注確實太少了點（不管社會學是如何解釋這種現象的，這種情況總會讓一些人感到放松，而讓另一些人感到頗為懊喪和失望）。無論如何，當我被引見給法蘭克福特時，我很想了解他的個性和特點。要知道蓋茨是一個極其挑剔的人，而且確實是我所遇到的最聰明、最有才識和最有修養的人之一。他帶來的朋友，那位法學教授，毫無疑問也是專業領域中的杰出人才——我當時就了解這些。但還不到五分鐘，我們的話匣子就打開了。我們談論了政治、人物性格、斯廷森先生（顯然，這位教授很了解他）、約翰·西蒙爵士、薩科和萬澤蒂事件、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哈佛校長洛厄爾以及他對哈羅德·拉斯基的做法，等等。那位我不太認識的教授津津有味地參與了所有話題，他的談話把知識和趣味性極好地結合起來，既特別又引人入勝；我雖然一開始并沒有打算在此逗留，但后來被他的談話完全吸引了，就安靜地在那里聽他說話（而我其實是習慣打斷別人的）。大約過了一個小時，我因為一個緊急會晤不得不離開，那次就沒來得及探究他是怎樣一個不尋常的人。

幾天后他應邀在全靈學院（也正是我所在的學院）參加聚會。我記得那次聚會的主人是杰弗里·道森，他是《泰晤士報》的主編，也是當時英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這次我搞清楚了這位不尋常陌生人的身份。我意識到，道森和他圈子里的人（那次道森和他的朋友們都邀請了一些客人）認為他不止是一個學者，而在更大程度上是把他看作一個在華盛頓有影響力的人物，一個美國總統的親密朋友和顧問，一個由于明顯的公共原因顯然值得去結交的人。法蘭克福特對此招待反應極為平常，沒有不自然。我不認為他不愿意成為這種關注的對象——在全靈學院，尤其是在那個時期，很多杰出的公眾人物，包括一些非常有權勢的人都在這里聚會——但他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傲慢，言談不虛夸、不武斷，也不像一個名人通常在跟和他地位一樣高的人討論國家大事時那樣顯得小心謹慎又鄭重其事。他很自然而愉快地說了很多話，給人一種親切又愉悅的感覺。當時在場的有些地位高的人，坐在他周圍想引起他的注意，他們拘謹、一本正經，還有些虛榮、自負；而法蘭克福特的方式就跟這些人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他輕松地發表看法，觀點鮮明，對自己的各種觀點和政治意見非常堅持、毫不讓步。顯然，他的某些觀點對在座較保守一些的公眾人物來說太激進了，但我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即年輕的研究員們卻非常歡迎和贊同他的想法。于是我們成為了他的外圈聽眾。并且，關于那天我們談到的大多數政治和社會問題——日本侵占中國東北、“銀行家”詐騙、法西斯主義、希特勒、失業、經濟衰退、公共安全（接下來還有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問題），我們與多數年長一些的聽眾有著不可調和的觀點分歧。

大概談論這些嚴肅話題兩個小時后，法蘭克福特掃了一眼四周，決定休息片刻。他明顯地有些煩躁不安，從椅子上站起來，離開座位，好像是朝著一張擺放著一排排威士忌、白蘭地和蘇打水的桌子走去。他還遠遠沒走到桌子跟前時——他其實顯然不需要那些飲料來刺激自己——他幾乎就是拉住一個看上去活躍且很合他意的年輕人，并開始與他談論一些輕松話題。道森、西蒙、萊昂內爾·柯蒂斯及其他高官們試圖讓他回來談談英美關系，但沒能成功，法蘭克福特就是不離開那個年輕人——我想那是彭德雷爾·穆恩，后來在印度問題上，他有獨到見解，而且無所畏懼，讓人欽佩——并且堅持談論一些純學術話題，而這些是政客們毫無興趣的。不久他又轉到房間的一個角落，年輕研究員們正在那里自顧自地聊天。談話間他流露出無比的喜悅和孩子般快活的天性，看起來對任何年輕人喜歡的話題都感興趣，他們就這樣一直聊到了凌晨。

只要在牛津的晚宴上碰到法蘭克福特，我都發現有一個同樣的現象：總有一幫人盡力去吸引他的注意，他們認為他是對美國法律和政府有影響力的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有權利和義務去跟他交談；而這個講座教授則保持一貫的禮貌，但并不熱情。他顯然并沒有意識到，某些人要比另一些人重要得多；他以同樣的親密態度對待每個人，這使得最重大場合中的氣氛也能輕松起來，也讓年輕的聽眾們感到愉悅。

20世紀20和30年代初的牛津，跟現在比起來更嚴厲、階級意識更強、等級更嚴格、更以自我為中心（當然，也許是因為我那時太年輕才這么認為，但我相信對此也有很多客觀證據）。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的非同尋常的能力能夠融化拘謹、打破壓抑，還解放了他所接觸到的人們。只有那些確實自以為了不起、愛炫耀的人討厭他的做法，他們確實是非常討厭這種做法。我聽說梅納德·凱恩斯——一個自命不凡和詭計多端的著名的、毫不手軟的迫害者，也是這方面經驗豐富的專家——認為法蘭克福特是這種技巧的大師。的確，他說過在他認識的美國人中，法蘭克福特在這方面排名第一，雖然他覺得霍姆斯更可怕、更沒有同情心。

的確，法蘭克福特有他的弱點。他是個真正的親英人士：無論他怎么看英國的公共政策，就單個英國人而言，在他眼里是不會做錯什么的。一個英國人要做不少愚蠢、缺德的事，或險惡、粗魯，才會在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心里產生不友好的感覺。總體上說，他喜歡一切可能被喜歡的東西，什么都喜歡；他極為討厭不得不討厭某些事物。每件事情都讓他高興：一所學院里退休研究員之間的關系；查爾斯·凱·奧格頓對倫敦餐館的態度；在英國的德國流亡者在追求學術東道主上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及其滑稽可笑的社會后果；薩爾韋米尼貶低哈羅德·拉斯基向柏克所表示的夸張的敬意；他自己在倫敦和牛津所取得的成績。他對荒謬事物的感覺是直接而敏銳的，他對奇思怪想的欣賞是抑制不住的。他不是所謂的好聽眾；他太忙了，就像一只從無數花朵（對有些人來說只是野草）中采集花粉的蜜蜂，他散布花粉，讓一些從前沒有指望的植物霎時開花。他用鉛筆寫的、幾行字長的簡單備忘錄，通常附有剪報或報章上某頁的復印件，攪動了一潭死水；他所展現的社交才華簡直就是天才。

還是回到牛津這個話題上吧。那些對自己的位置敏感、擔心得不到充分認可、恐懼任何不敬行為的人，抱怨這位伊斯特曼講座教授舉動過于輕率、缺乏品位、笑聲吵鬧、幼稚、一口美式英語、表現了不成熟的熱情，對整個歐洲特別是牛津的獨特品質不敏感（不夠莊重，蔑視這個地方的天才人物），等等。這些指責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的客人不會為不敬而不敬。實際上，他很欣賞牛津，如果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他的欣賞太深切太熱忱了，比批評者的感受要強烈得多。他理解那些需要理解的東西。如果他偶爾發表了一些尖銳的言論，這么做也是有目的的，而且那些說法在下一個四分之一世紀牛津核心傳統的大多數繼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多數英國學術人物的耳朵里，并非是刺耳的。我不知道他對牛津的律師們或那些去聽他課的大學本科生們有什么樣的影響。對我和我的朋友們而言，他的天賦是慷慨的思想和情感金雨——在朋友們面前淋灑，解放了那些需要解開自身枷鎖的人。在第一次和之后的訪問中，無論何時我在學院或私宅晚餐上遇到他，總能看到同樣的現象：他是中心，是一圈熱切的和高興的人們的活力和靈魂所在，他生氣勃勃，有著無窮無盡的快樂，對任何才智、想象力或活力的表現都感到喜悅。他使人們得到最大的快樂和滿足（用他不喜歡的一個人的話來說）。難怪甚至是我們中間最冷淡的怪人，盡管他們自己并不情愿，也對他有良好的反應，發現自己對他尊敬又喜愛。只有那些最自負、最疏離（一個當時還不常用的詞）的人，才不受他這種特別的活躍所影響，或對此感到厭惡。在我看來，可以把對待他的態度作為一個簡單而不充分的標準，用來判斷一個人是喜愛還是反對生命力。我的意思完全不是要把它作為一個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有些最寶貴的道德、審美和智力品質，似乎與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并不相容；我只是把這個區別當作事實來陳述。

他又來過我們這里兩次，一次是純粹的私人訪問，另一次是為了接受榮譽學位。每次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對他的歡迎確實是非常熱烈的。我記不起來他說過或別人說過關于他的什么特別難忘的話。在我的記憶里只有兩次很有特點。一次是在基督教堂學院的晚宴上。我現在想不起來誰是主人——大概還是羅伊·哈羅德，能想起的只是我們中一些人的餐后表演。那個貴客是如此活躍，以至于這個表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它跟18世紀一個善妒的法國侯爵和他出軌的妻子有關）極富激情。我并不會說出演員的身份，現在他們都很有名。菲利克斯對演出報以熱烈掌聲，鼓動演員直到他們完全進入角色。我不會忘記在那個不尋常的場合上，那些臉上的表情、那些姿勢、那些聲音的音調變化。因為牛津導師們——他們是一個非常拘謹而矜持的社會中一群最拘謹、最矜持的人——沖破了束縛，只有最強有力的力量才能做到——那是一種強大到足以打破最神圣魔法的靈丹妙藥。在我看來，這種解放力量自菲利克斯的職業生涯一開始，在他所有的行為中，從最私下的場合到最公共的場合，都表現得非常明顯。牛津，從自然和人為角度來看都是這股力量最巨大的可能障礙，證實了這股力量的確不可抗拒。

第二個場合他在回憶錄中提到了：他和他夫人[56](#_56_11)在位于公園路上的伊斯特曼講座教授學舍舉辦晚宴，參加人有西爾維斯特·蓋茨、弗雷迪·艾耶爾、勒內·艾耶爾、戈倫韋·里斯、莫里斯·鮑拉以及一兩個其他人，我記得有著名的僑民蓋伊·伯吉斯——那時他還在牛津，在謀求一個我們不太了解的職業，發表過一封關于理財建議的市民公開信或者這類東西——無論如何，他是極好的伙伴，在那些日子里，是我以及在座的其他幾個人的朋友。

要向別人介紹一個特定場合（特別是私人場合）發生的讓人高興或記得住的事情，總是很困難的。有些人這樣寫道，“我們笑死了！眼淚從我們的臉頰上滑落”，或“他誘人的方式和獨特的智慧使我們所有人突然發出一陣歡笑！我們那時是多么愉快啊，那么年輕、那么快活、那么興致高昂！我們周圍的陰影何其少啊！反思后來的結局是多么感傷啊！這是怎樣的一個夏天啊！”等等。沒有什么比這樣寫給讀者傳遞的信息更少或更令人作嘔的了。根據菲利克斯自己有些模糊的回憶，這個晚上是在一個賭局中結束的。弗雷迪·艾耶爾和西爾維斯特·蓋茨打賭，“對于不能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這句話在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中是出現了一次還是兩次。弗雷迪說他認為只出現了一次，后來坐出租車回他在高街的家里去查看原文，回來說維特根斯坦確實就像蓋茨所說的那樣寫了兩次，一次在前言中，一次在正文里，為此他掏了十先令罰金。

為什么這樣的場合如此難忘？唯一的原因是在牛津這樣矯揉造作的氛圍中，由這些和其他晚宴帶來的知識樂趣和普遍幸福感是很少見的。在牛津，自我意識與人們的職業相伴相生，牛津并非以人類情感和學術自由而著稱。勇氣，坦率，誠實，聰慧，對他人才智的熱愛，對觀念的興趣，不裝模作樣，活力，愉快，對荒唐之事非常敏銳的感覺，熱心腸，思想和情感上的慷慨，討厭愛炫耀、虛偽、自以為是、守舊的人，不喜歡刻板、怯懦，對地位很高而又性格如此的人尤其不喜歡（但可能對于他們這又是不可避免的）——到哪里還能找到另外一個這樣的混合體？他還是一個令人感動和愉快的英國迷——孩子般狂熱地喜愛英國、英國的機構和英國人；喜愛所有理性、優雅、真實、文明、溫和、和平、不野蠻、得體的人和事；喜愛自由和憲法的傳統，在1914年它們對心靈和想象力是那么重要，特別是對那些在東歐和中歐長大的人，尤其是對那些受壓抑的弱勢群體——他們對自我缺失的感覺達到了一個痛苦的程度，他們寄希望于英國，有時候是美國（英美是一些持反對意見者的避難所）；喜愛所有保證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東西。有時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被認為是勢利眼——這是對他性格的一個極大誤會——而實際上他是前面所述的那樣的人。在巴勒斯坦動亂期間，他對英國的感情承受了壓力。他是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在牛津與雷金納德·卡普蘭德——皇家巴勒斯坦問題調查委員會《皮爾報告》（至今為止，是對那時的巴勒斯坦問題最好的闡述）的主要作者，就這個問題的言論并沒有被記錄下來。卡普蘭德經常談到，在這個問題上，他從法蘭克福特那里要比從那些專門向他報告情況的官員那里獲益還要多，也談到他的觀點的勇氣和坦率無疑給自己樹了很多敵人。菲利克斯對這件事的參與，就跟他對法律的貢獻、對新政的影響、成為教授前在美國政府部門的工作、對薩科和萬澤蒂事件的支持，以及他總體上的公眾生活和影響一樣，也許比我前面所談的他那些個人品質更值得評論和贊賞。但正是最后這些特質，而不是那些使他在熱情招待他的英國大政治家眼中變得很重要的那些品質，讓他在牛津學術圈中產生了最深刻的影響。

從來沒有人讓這個看上去令人生畏的堡壘中的頑固成員們著迷過，他迷倒人的速度之快、數目之眾，讓人難以置信。訃告通常會提到死者的“友誼精神”。在我看來，菲利克斯最寶貴的個人品質，絕不是這種陳詞濫調中有些令人疑慮的“友誼精神”，而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去解放被習俗、壓抑和社會暴力的冰冷外殼所拘禁的人類。正是這樣的品質，沖破了我們的防線——其實是一座壁壘，它阻止并很不必要地挫敗了很多心懷善意、有好奇心的、聰明的好人。

# 理查德·佩爾斯

我與理查德·佩爾斯相識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那時他還未婚，是全靈學院研究員，傾力于教學和學術研究，生活規律，規行矩步。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就像一個靦腆、出色、聰明的大學生，直到辭世還擁有一副機敏而年輕的面龐。他的才智顯而易見、卓越不凡、令人敬畏，無人質疑其優雅和影響力。他極具魅力，熱愛風格和形式獨特的東西，極具鑒賞力，幾乎像女性那樣挑剔，他諷刺性的幽默常使敏感的同事們愉悅和警醒。他與人們保持著距離，只有密友才能進入他的內心世界；但他極具天賦，作為學者和人都同樣出類拔萃，具有堅定的道德和精神原則，富于創造力，個性強悍，這些使他成為全靈學院中年輕人和改革派的天然領袖。他對同事們有著很大的道德影響力。他長于言辭：他的成功部分地來自于他作為學院演說家的天賦。他那創造性的思想、具有諷刺感的機智和收放自如的激情，總是以恰當、典雅流利的語句表達出來，這樣的講話令人印象深刻，不止一次改變了學校討論的內容和方向。我記憶中，沒有人（無論老少）不尊重他的智力、正直、尊重傳統和制度卻不失獨立見解的作風——他會為自己深信不疑的一切事物辯護，比如：歷史知識、純潔的友誼、他所在學院或大學的嚴格規定。雖然他驕傲、才智過人、智力和性情上過分講究，他仍然是和善、熱情和愉快的。他的道德感（他從不試圖隱藏）并沒有使他變得挑剔和自負，而是與他深刻和批判性的審美感結合在了一起。他選擇18世紀作為歷史研究的領域，部分原因是被那個時代的秩序和禮儀之美所深深吸引（后來他也偶爾抱怨，他經過研究發現那時的人比他設想中的野蠻、粗俗和令人厭惡）。他反復研讀簡·奧斯汀、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崇拜莫扎特，這種藝術敏感性和理解力融入他所有的人際關系中。

因此，他屬于溫徹斯特公學并且更屬于巴利奧學院的中堅主流：他有著溫和的社會道德意識，贊賞熱忱和公共精神，為人正直，樂于畢生承擔自我強加的各種責任；結果他為科研、教學，后來為國家事務耗盡了心血。但他并不因嚴格的自我約束而變得無趣；他喜歡享受愉悅和歡樂；對任何形式的藝術和智力上的精湛技藝都感到愉快。有時他表現出性格上的某種脆弱和冷漠，這時需要其他人的熱情并且得到了，對此他會報以感激和持久的愛。他對快樂有熱切的感覺；盡管他對固有的價值觀有一種“溫徹斯特公學式”的虔誠、判斷審慎、執著于規定，他卻熱切歡迎幾乎任何形式富有創意的天賦，只要喚起了他偶爾出現的多愁善感的情緒，無論它們如何過度或古怪。

但我想，他并不依賴這樣的時刻，只是把它們視為意外之喜，并不期望太多。在資質平平的學生面前，他仍然是一位富有責任心、嚴格、和藹、激人奮進的導師，絕不會去逼迫或嘲笑他們，不會忽視他們的努力，更不會輕視他們。他厭惡的只是懶散和說謊的學生。對于表現出超凡才能的學生，他的反應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期望：他對學生們想象力的自由發揮表現出了最深切的理解和最大限度的鼓勵。這里說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成形的思想。他對哲學的厭惡（他大學期間閱讀了偉人們的著作），發展成為對普遍觀念的不信任。他也不喜歡在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上耗費時間和精力，總是有一個可預見的界限是他拒絕邁過的。他的價值觀為理智和他有意相信的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權威性所強化。如果有人質疑基本問題，無論是個人的還是歷史的，他總會用簡短而生硬的語句打斷它；如果有人繼續堅持，他就會失去耐心甚至煩躁起來。

他可能是牛津大學里那些同輩的教師中最受崇拜和敬仰的一位。他跟學生聯系密切，對他們后來的職業發展也頗為關心。但他從不與人過分親近，總是跟人保持距離，他為一種矜持環繞，幾乎沒有敢人去打破它。他從不尋求控制他人，不拉幫結派，也不會沉浸于學生們對他的崇拜中，而這種崇拜是易得的。在外界的政治或社會觀念上，他樂于接受不同的思想；而在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內部城堡中，他驕傲、自足、獨立，從不受他人影響。

從完全意義上來講，他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那個偉大的年代。還在巴利奧學院上學時，他就是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好朋友，而且是那個著名團體（成員們常在他巴利奧學院的房間和阿爾卑斯的木屋會面）的一員。特別是漢弗萊?薩姆納、羅杰?邁納斯、湯姆?博厄斯、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約翰?莫德都成了他的朋友。其中，斯利格爾的自律生活、堅定信念以及寬以待人的品格，給理查德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期間，他與一些重要而才華出眾的人物關系密切，包括西里爾·康諾利、伊夫林·沃、約翰·蘇特羅，事實上圍繞他形成了一個圈子。雖然后來理查德下意識地離開了年輕時的伙伴，成為一個嚴肅而勤奮的學者，但這種無法改變的、美好的精致趣味一直陪伴他一生。他放棄了曾經熱情追求的東西，盡管他對曾經放棄的東西一直懷有欣賞的態度。他培養了徹底、實用、公正追求真理的態度；他也常常告訴自己，不要指望發現的真理總是趣味橫生。他捍衛著乏味的美德：一直以來都厭惡夸張的修辭、炫耀賣弄和言之無物。雖然他深信和堅持這些觀念，但卻不會過于嚴肅；他時常表現出極度的快活和歡樂，在他高雅的趣味和智慧中會不時顯現出奇特但可愛的孩童般的純真和幻想。

他對自己學術生涯和價值觀的終身信仰具有皈依者一般的虔誠；他并不期望得到外在的認可或回報。他天生具有廣闊和宏大的視野，非常富于想象力，幾乎懂得所有的事情；因此他有意界定了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是一種自我賦予的淡泊——選擇了作一名大學教師，并為此放棄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興趣。大學校園就是他的家和他的世界。戰爭期間他成為一名出色的政府公職人員；在那里，他的同僚們也很尊敬、敬佩和喜愛他。但他后來卸任并重返學術生活。他在愛丁堡大學授課，跟以往一樣，課程生動活潑、喜歡使用第一手資料、對事物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贏得師生們的喜愛。但當全靈學院授予他最著名的研究員資格時，他還是辭去了愛丁堡的教職——他的麻痹疾患使得教學變得很困難——并高興地回到了牛津。他在學術界聲望顯赫，擔任了英國學術院成員、巴利奧學院的榮譽研究員，主持福特講座，這些都令他感到欣慰。后來他幸福地結了婚，與女兒們相處愉快。在他健康狀況允許的條件下，他盡可能在全靈學院繼續從事教學。他坐著輪椅在學院會議上發表的演講同樣言辭犀利、令人印象深刻，且帶著他一貫的權威感。他的談話仍然聰明機敏、令人愉快。

學識淵博、工作勤奮、不懈追求真理，甚至還有卓越的表達能力，所有這些品質加在一起，也并不能說明理查德的獨特之處。真正讓人驚奇的是，他的思想和心靈細膩到了極致，具有最高等的智慧，嚴格自律與對他人敏銳的洞察和理解并存，有著罕見的個人魅力，對生活中有趣的事情一直有一種嘲諷式的愉悅，傾向于快樂而出色地展示自己某種藝術天賦特有的想象力。所有這些特點，加上他的榮譽感、高尚的靈魂、純潔無瑕的品格、愛和奉獻的精神，使他的道德品格獨一無二，他的典范作用和影響力在那個年代超群出眾。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一直都對公共事務很關心，但這并不是他生活的中心。就他所有清晰的政治觀點來看，他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有些中間偏右；但他的心不在政治上。他生活在一個自我圈畫的世界中，一個能夠由著自己對秩序和統一的意愿來布置的整齊花園，和諧而封閉：那是一個由歷史研究、人際關系以及他自己的全部內在生活所構成的空間。在這個私人世界里——也許是20世紀20年代溫徹斯特公學和巴利奧學院最后的繁榮時期——所有東西各歸其位，有著自己的名稱以及與他的特別關系。這并不是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活免受外部混亂的干擾的一種嘗試：在這個“私密花園”里，他仔細地將客觀真實與他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區別開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高度才完全顯現出來。這一年，他逐漸對自己的身體失去了控制，先是軀體，然后是肌肉。他（所稱呼的）可愛而善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們照料著他。他知道自己的最后時刻不久將來臨，他面對死亡時所表現出來的寧靜，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匯來描述。雖然他生前并不總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但面臨死亡時卻像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最值得欽佩的人。

#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靈學院

當1934年休伯特·亨德森第一次來到全靈學院時，學院的很多研究員都還不認識他。我想，戴維·哈欽森·麥克格雷格，一個跟亨德森一樣來自劍橋大學的德拉蒙德講座教授，跟他有一些相識；羅伯特·亨利·布蘭德（后成為勛爵）和亞瑟·索爾特爵士與他交往頗深，一兩個資深研究員在社會活動中也接觸過他。但對在學院中占大多數的年輕研究員來說，他沒什么名氣。他看起來溫和、靦腆，說話有一點含糊不清。他對人彬彬有禮、和藹可親，但有些刻板和拘謹，好像還有一點迷茫和不知所措。全靈學院一直都很特殊，人們很難預知它對那些來到這里的人會有什么影響。亨德森曾專注于公共事務，擔任《國家》雜志的編輯，還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聯合秘書長。在他看來，全靈學院也許就是一個奇怪、隱蔽的地方，跟劍橋或他曾待過的更大一些的地方完全不同。他花了一陣子時間來適應這里，在調整好自己后，便很快在學院里占據了一個重要而獨特的位置。他喜歡交談，話題范圍廣泛，只要人們對他自己超脫、不偏不倚實際上是中立的觀點作出反應，他便會愉快地與人探討；他對他人的贊同并不特別地期望或喜歡。他是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思路清楚，心態平靜。他善于雄辯，論據清晰而且堅持己見；自從擺脫一本正經和自命不凡，樂于談論一切感興趣的話題之后，他還同樣樂于分析人物性格、抽象命題和政治問題，這時他態度謹慎，但有時講得也很生動。他不僅健談，而且談話時彬彬有禮，甚至在面對激烈挑釁時也不失禮節；不管是比他年輕還是年長的人都不會感到他把他們分成不同的派系，他自己也不覺屬于某一派系。這使得與他交談，無論只是兩個人的對話還是一大群人的談話，總讓人感到特別愉快又收獲頗豐。我想沒人認為他的想法屬于學院中某一個特定派別，如年輕派或年長派、學術派或倫敦派、保守派或激進派。他具有完全獨立的人格，對人和事都有自己敏銳的見解，在談論時不帶敵意、不帶主觀色彩、判斷問題不偏激、極具智慧、舉止自然有禮。

我詳細講述他的談話特點，是由于全靈學院——曾在這里工作的人都不會忘記——是一所談話者的學院，而他自身對交談和辯論的熱愛使得他能夠輕松融入這里的氛圍。他喜歡把一個問題說透徹，喜歡辯論；他希望向別人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并盡可能清楚和準確理解別人的觀點；他具有超凡的敏銳和真誠，懷有對發現真理的真切渴望，確信通過合理的討論有時能夠發現真理，因此，他慣于持久地辯論，堅持己見、全神貫注、充滿感染力。有時，他認為對方的觀點是稍有理智或知識的人都難以想象的，這時他臉上會呈現出困惑的，有時是迷茫和懷疑的表情。他會理理頭發，聲調上揚，比劃出絕望的姿態，但不管時間有多晚，他都仍會繼續。他從不主動結束討論。無論對方如何令人氣憤，他從未發怒、舉止粗魯或氣惱。有時討論持續到很晚，甚至到午夜，他身旁的煙灰缸填滿杜穆里埃香煙的煙蒂，甚至冒了出來。有時，在對方的猛烈抨擊下，辯論已經無法進行，他會變得沉默并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如果對方言辭過于激烈，他便閱讀報紙或者靜靜地離開房間。如果不是在禮貌、智慧、溫和、善意的氛圍下，他是不會感到舒適和愉快的。

他有強烈的幽默感，特別是在牛津大學還展現出搞笑的、孩子般天真的脾氣，他還討厭各種形式的感傷和胡說。對于那些比他年輕的人而言（我可以自信地對他們說），與他相處要比與幾乎任何一位前輩相處都要容易得多：他從不炫耀、毫不虛榮、極易相處；胸懷寬闊、心腸仁慈。他平等待人，與他的交流是直截了當、令人愉快的。他無意說出的話，從不會讓別人感覺到他自己在紛繁復雜事務中的杰出表現，也不會讓別人想到一些不適宜涉及的特別信念或偏見。他喜歡被逗樂，他不想給人們的熱情潑冷水，或挑剔他人的無知乃至某種程度上的愚昧荒唐，他并不排斥古怪的行為。簡而言之，他喜歡洋溢的生命，不僅增加了生命的快樂，而且他本人就是他人快樂的一個原因。他最崇尚的是把創新意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在全靈學院他發現了大量的這種例子。在委員會里，他的出色判斷力、不偏不倚、清晰原則、無所畏懼以及和善的脾氣（有時，他會在激動的時候提高嗓門，但那并不能代表他平日的行為）都是寶貴財富，特別是在這些風范已經逐漸被人們淡化的時候，就顯得更加可貴。在學院召開的會議上，他講話帶有權威。全靈學院是一個大學院，一個人要想在學院會議上令人印象深刻，就需要具備一定的演說才能。亨德森雖然不具備這種能力，但由于他顯而易見的公正、獨立，以及他所受到的廣泛喜愛和尊敬，大家總是滿懷敬意地聆聽他的講話。我甚至懷疑在他當選為院長之前，他是否了解人們對他的普遍喜愛：要知道他不會花時間去想別人對自己的態度或感覺；而且，對他自己的個性或地位，他既不虛榮也沒有成見。令所有人難過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的身體狀況出了問題，但后來他似乎完全恢復過來并繼續擔任在學院里的職位，包括擔任委員會成員和經常擔任遴選經濟學研究員的助理考官。就我記憶所及，他作為一個考官的敏銳判斷在所有情況下都非常可信，并證明是正確的。

在1951年薩姆納院長突然逝世后，他于當年6月當選院長，接替薩姆納的工作。他并未謀求這個職位。長期以來他并不希望自己被考慮為院長人選，如果擬一份“不情愿候選人”名單的話，那亨德森一定在上面。最后他同意自己作為候選人，也并不是因為他有野心，甚至也不是出于責任感（我確信他不覺得謀求和擔任這樣的職務是任何人應盡的職責），而是由于他與生俱來的謙和使得他不會太激烈地拒絕朋友們的要求。我懷疑他是否考慮過自己有無當選的機會。我確信他并不關心自己勝出的機會到底有多少。我仍清晰地記得在當選的那一刻，他對突如其來的榮譽顯得有點迷惑和不敢相信，但隨即被人們的信任和熱情深深打動了。

他幾乎沒有上任。當選后沒幾天，在校慶典禮那天，他在謝爾登尼亞劇院突發心臟病。我前往阿蘭克療養院探望他，他還是那么富有魅力、令人愉悅，正如副校長在紀念他的演說里所評價的“從容的歡樂和率真的善良”[57](#_57_11)。他不僅善良，還擁有純真的個性、杰出的才智和情感、公共責任心、對個人關系和私人生活的熱愛，另外在含糊和溫順之下，他還擁有蘇格蘭人的堅硬性格，這賦予他出人意料的意志力量。他所擁有的這些個性特點，有些人認為，是全靈學院全體師生都應該具備的：他聰明，對普遍觀念有興趣，但他絕不糊里糊涂、不賣弄學問、也不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中。他一直擔任公職，并將畢生精力貢獻在公共事務上；但他并不是學術的門外漢，他不會用世俗規范來衡量學術圈，反之也不用學術圈的標準衡量世俗世界。他尊崇實踐經驗和管理能力，尊敬每一位專家、每一個技術行業，對自己學科的抽象概念和理論表示非常懷疑——因為他認為它實際上是應用學科，不是“純理論”。另一方面，他反對知識分子并沒有到好戰的地步；他喜愛精神力量和精神優雅；免于遭受學者們那兩種臭名昭著的“專業情結”的折磨——對于取得顯赫的世俗成功和影響力的被壓抑的渴望，以及學術界對于渴望成功之人的怨恨。

他對待大千世界的態度是平衡、和諧的。他很少對官方聲譽感到不安，樂于和任何他認為聰明有趣、令人愉快的人交往；他很擅長判斷這些特征。他盡量避開愚昧和令人生厭的行為，很少給它們冒犯自己的機會。他喜歡思考本身，當有親密朋友陪伴時，他會寫一點富有想象力的小詩來描寫老朋友或者他在劍橋及倫敦的生活片斷。他舉止得體、不搞怪、不失態、不擺架子、不刻意展示魅力、也不喜歡炫耀；但對這些行為，他不羨慕、也不反對。他不會憎惡或討厭他人的小聰明或小怪癖，也不抱怨別人的悲觀和迂腐。但是他厭惡矯揉造作、空洞和虛偽；他喜歡平淡而非煽情，喜歡清晰而非模糊，不管它是多么明顯或隱晦。在他出席的場合，他樂于狠狠抨擊那些愚昧和虛假的論調。他的觀點非常敏銳、具有諷刺性的幽默感，受到他人的攻擊時也非常堅定，你根本不能怠慢或威脅他。我認為他并沒有野心，但他很有尊嚴，能正確認識自身價值，這種價值從未受到侵犯，靜靜地散發出自身的光輝。沒有想法前他絕不開口，因為他經常一開口就講很多，他不喜歡簡短的發言，因此經常保持沉默。他的思想公正、敏銳、自由、鮮明、嚴肅、人性化、沒有任何個人和社會偏見。總之，他是一個格外和藹的人，一個精神獨立的人，與一般學術界的人都不一樣。不管對全靈學院還是對牛津大學，他的早逝都是一個巨大損失。

# 約翰·蘭肖·奧斯汀和牛津哲學的早期起源

后來被稱作“牛津哲學”的哲學潮流，主要起源于1936年到1937年間某個時候開始的一小群年輕牛津哲學家每周一次的小組討論。參加討論的人中間，年齡最大的是二十七歲。J.L.奧斯汀作為發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迫使討論結束之前，一直是討論的靈魂人物。1933年秋天，奧斯汀當選為全靈學院研究員，當時他還沒有決意從事哲學研究。他深信，而且過去常說，牛津傳授的哲學思想對年輕人是一種極好的訓練；沒有更好的辦法讓年輕人變得理性——這是他當時的最高評價——即使僅僅因為哲學賦予年輕人一種批判的、本質上是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這是對他稱之為“蠢笨”的特質的唯一治療辦法。他隨后改變了觀點：在他看來，即使是他講授的哲學也不能對抗一些非常優秀的學生抱有的傳統虔敬和天真想法。他悲嘆他的所有努力非但沒有動搖他們的傳統觀念，反而還讓他們大部分人可敬得無可救藥，公正得近乎乏味。他知道自己具有作為一名教師的卓越才能，但是仍渴望從事一些更具體、更實際的有成果的工作，這樣到頭來能有更多的成就可資炫耀。他過去常對我說，他很遺憾以前花了太多時間去研究古典作品，而沒有學習作為一名工程師或建筑師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不過現在已經太遲了，只得退而求其次，當個理論家。他熱衷于準確真實的信息、嚴密的分析、可驗證的結論和分析歸納事物的能力，厭惡含混晦澀、概括抽象，以及用暗喻、修辭、專業術語或形而上學的空想來逃避問題。從一開始他就下決心把任何可簡略的事物用平實的文字表達出來。

盡管他欣賞有實踐經驗的專家，但實際上他自己卻沉溺于純粹的哲學研究。他剛來全靈學院時，好像不考慮別的問題。他最欽佩的兩位當代哲學家是羅素和普里查德：敬佩羅素天才的創造力、獨立的思想以及強有力的表達；贊賞普里查德，是因為他認為普里查德是當時牛津最嚴謹、最縝密的思想家。奧斯汀對普里查德的前提和結論都不贊成，但是欽佩他論證的專注和嚴密，贊賞他在反駁古今哲學里晦澀和前后矛盾的思想時所表現出來的冷峻和對偉大人物的蔑視。對我來說，他自己關于語詞的施為功能的理論似乎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普里查德痛苦的自問。比如，關于許諾的邏輯特性，“人們認為，如果我說我‘同意’這個或者那個，那么我就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權利，”普里查德會說。“創造了權利？這是什么意思？我可不這么認為。”奧斯汀并不認為普里查德的這個觀點及其關于道德責任本質的討論，是不重要的或闡述得不好。他在1933年到1935年間（對我）談了很多這方面的想法。

我們的談話通常是在全靈學院的吸煙室進行，從早餐后開始。我要給學生上課時，我們的討論一般在上午十一點結束，我記得沒課時我們常常會聊到午餐時。那時他還沒有固定的哲學主張，也沒有可傳播的學說。他只是抓住一些當時的話題，作家或演講家發表的命題，以相當的技巧和智慧將其分解成越來越小的命題。在聽到G.E.莫爾的演講之前，我從沒遇見其他人有他這樣的技巧。在20世紀30年代，牛津大學最受敬佩的哲學家應該說是亨利·普賴斯，他的演講以清晰透徹、觀點新穎和措辭優雅而吸引了眾多聽眾，他還對知覺問題成為牛津哲學當時的中心議題起到了主要作用。受其影響，年輕哲學家們對作為宇宙知識源泉的傳統哲學的所有觀念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反抗。這以A.J.艾耶爾為首，他的一篇論述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論文——我記得是1932年春讀到的，是聲勢浩大的實證主義運動的開場白。《語言、真理和邏輯》當時尚未出版。賴爾的觀點也沒有超越至少是沒有公開地超越《系統性誤導的表達式》[58](#_58_11)。然而，實證主義者的攻擊，特別是約翰·威茲德姆當時發表在《心靈》雜志上的早期文章，成為激勵啟迪更年輕的哲學家們的源泉，對其前輩們造成很大中傷。當時反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風靡一時，人們很快皈依經驗主義。普賴斯盡管當時在某些方面是牛津的實在論者，但他本人還是對新運動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并得到新運動成員的尊重——好像是身處敵營的盟友一樣。

實證主義運動快速發展，侵入了《心靈》，并擁有自己的內部刊物《分析》。這令大多數有影響力的老一輩牛津哲學家，如普里查德、約瑟夫、喬基姆，感到非常苦惱甚至絕望。他們的反應各不相同。喬基姆是溫和的大陸唯心主義最一絲不茍、最有教養的最后代表之一，他活在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布萊德利的世界中，視這次運動為脫離傳統而不予理睬，認為它暫時退回了原始落后的非理性狀態——這是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的觀點，而科林伍德和穆爾則更激烈地表述了相同的看法。但科林伍德認為艾耶爾是一個比約瑟夫、普里查德及其弟子們更值得尊敬也的確更危險的對手。至于普里查德，他蔑視這種長期存在、反復發生的謬誤，而且對它沒有任何興趣，認為它遠比他年輕時偉大的哲學家（布萊德利和鮑桑葵）就反對的實在論哲學還要粗糙得多。但是，他沉浸于試圖（如他所說的）“解決問題”的憂慮之中，痛苦地意識到，他自己不能對那些折磨他的認識論（來源于庫克·威爾遜）和倫理（來源于康德和新教傳統）問題做出充分闡述；因此，他沒有時間理會晚輩們的困惑和錯誤，他認為其中多數都是在浪費時間，并且他對其中任何人都不甚感興趣。

最感痛苦的人很可能是約瑟夫。他具有敏銳的傳統意識，覺得自己有責任去保護他從他深深敬仰的大師庫克·威爾遜承襲來的好傳統——雖然他的弟子很努力（即使他們仍健在），但威爾遜的名氣和聲望都未超出牛津范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某種意義上的唯理論者，還有庫克·威爾遜，約瑟夫在有生之年都在為之辯護。與實在論形而上學勢不兩立的死敵不再是唯心主義，他贊成學生普里查德的意見，認為唯心主義者已經走到盡頭了；死敵應該是經驗論者和懷疑論者，他們以“謬論之父”休謨為首，隨后是密爾、威廉·詹姆斯、羅素及其他顛覆真理和道德的作家。約瑟夫以駁斥和根除他們的學說為己任，他畢生致力于為哲學花園鏟除雜草；我相信，有好些次，他認為他受命的恢復古老真理的偉大使命終于完成了（至少在英語國家）。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驚恐地看到叢生的雜草再次出現了——尤其是在牛津，草籽主要從劍橋飄來——拉姆齊、布雷思維特、艾耶爾及其同盟者傳播著謬論，并受到美國各種實用主義者的煽動和支持。所有這些陳腐的異端邪說再次四處播散，明顯地影響了年輕人，就好像這些邪說的淺薄和華而不實從未被庫克·威爾遜忠誠的弟子們反復揭露一樣。他在新學院花園發表的最后一次演講，是對羅素及其同僚的一次猛烈抨擊。我以為，他是在絕望的精神狀態中死去的——真理被淹沒在謊言的海洋里，這是一場他自己從未解釋明白的災難。

奧斯汀就是這些危險的經驗論者之一，雖然在這一階段他不是一個好斗的爭論者；當然他的經驗論也沒有因為恪守任何特定的傳統而受到壓制。他不是空談理論的人。他不贊同這些運動，不希望為了一個學派的利益而破壞另一個學派。當看到問題的時候，他總是一件件地分別處理，而不是把問題看作系統性再解釋的一部分。至于他所做的努力（當然他確實試圖創立一個有關哲學方法的連貫學說）則是很久以后的事。我想在這一時期，即戰前，我從未聽他講過，明確支持任何類型的系統觀點。我不知道他在莫德林學院的學生能否證實我所說的，但我認為，他似乎在致力于一些作為當時牛津正常課程的一部分而沒有明顯革命意圖的論題。當然，他思路清晰、頭腦敏銳、富有創造力，并且他講話時，他和所評論或講解的主題之間顯得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傳統評論的積累、沒有特定學說的羈絆——因此，他常常使人產生一種問題由他第一次明晰提出來的感覺：那些似乎模糊、老套的東西，或書中的傳統規則都突然消失了，問題突然被釋放而凸顯出來，清晰明確、意義重大但沒有答案。分析問題的方法像手術刀一樣鋒利，而且把握十足、技術嫻熟。

當他理解別人對他所講的內容時，他總是（至少在當時）使用對方的術語來回答，從不假裝問題不清楚，需要轉換為他自己的語言，某些屬于他自己的特殊術語。私下里，他從不使用任何修辭技巧，并表現出一種特殊能力，能夠將對方談話中那些真實有趣的觀點和那些虛假無趣、喋喋不休的理念或神經兮兮的困惑區別開來。他在公開場合往往相反：反對意見能使他斗志昂揚，在課堂或社團會議上，他爭強好勝。但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在私下交談中，至少在那些他感到輕松和沒有威脅感的人面前，他從不這樣。我并不是說他不固執己見，實際上，這是他的天性。但是他耐心、彬彬有禮地進行辯論，如果未能說服別人，就會三番五次地回到論題，并提出極富想象力的新事例和第一手的論據，無論它們是否令人信服，都令人精神振奮。在這整個時期，除了把哲學視為一種教育手段，他仍然懷疑它的價值。但是他根本離不開哲學：在20世紀30年代，無論我們何時會面，他總是能找到機會提出一些哲學問題，與其說他留下了一些論證充分的堅定觀點，不如說他留下了布滿沿途的哲學疑問，使聽眾無法舒服自在地墨守成規。我認為他在戰后變得更加武斷獨裁，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設想出完整的辯論計劃且對任何反駁都勝券在握之前，他從不提出自己的觀點，至少在公共場合是這樣。我認為對他公允的一條批評是，他拒絕進步，而不去直面可能駁倒自己的哪怕是最小風險。盡管如此，他私下里并不是完全如此（僅就我自己來說）。20世紀30年代，他的自豪感和對自己立場的意識體現得并非如此突出，他也不把哲學設想為他用以完成改變無知者和被誤解者這一使命的一套學說和方法。直到后期，他的哲學活動才變成有計劃的傳播真理的運動。

1936年，艾耶爾的《語言、真理和邏輯》一書出版時，奧斯汀先表示出對它的極度欣賞，然后開始對它加以批判。在我們下午散步的時候，他逐頁、逐句地進行批判，并不希望討好別人（據我的記憶，第一章之后他就沒有繼續下去了）。當然，后來他的好斗行為明顯減弱，至少涉及他同代人的作品（我們從中得到滋養的《心靈》或《分析》上的文章）時是如此。1936年，也就是在他到莫德林學院一年后，一天晚上他來到我在全靈學院的房間，問我在讀什么書。問我是否讀過蘇聯哲學，其中是否有值得一讀的？他去蘇聯旅游過，并留有深刻印象。他注意到那里身著灰色服裝、面色冷淡的男女，他們生活簡樸、作風嚴峻、甘于奉獻，察覺到民族主義（他對此不贊同）的滋長和對努力反抗強大對手的偉人（如馬克思和列寧）的崇拜（他對他們也很欣賞）。我認為，他對共產主義創始人的贊賞是短暫的。他后來最欣賞的精神品格的典范，是達爾文和弗洛伊德。這并不是因為他特別贊賞他們的觀點，而是因為他認為，一旦一個人確信自己的學說值得追求，他就應當堅持到底，無論結果如何，絕不會由于害怕被人視為怪異或囿于俗見而躑躅不前。如果實際上該邏輯結果站不住腳，他將能夠根據無可辯駁的證據撤消或修改他的學說；但如果對于一個假說，沒能堅持探索直到得出全面的邏輯結論，真理將永遠被怯懦的體面所打敗。他說過，無所畏懼，頂著抱怨、警告和批評，堅定不移地沿著自己道路前行的思想家，是令人欽佩和值得效仿的典范；狂熱離奇勝過懦弱畏縮，想象力勝過乏味的理智。

蘇聯思想怎么樣？我回答說，除了拉爾夫·福克斯（唯一一位奧斯汀讀過或認為值得一讀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我還沒有讀過真正值得推薦給他的當代共產主義思想家的作品。但一兩年前我讀過一本關于哲學思想的書很有趣，《心靈與世界秩序》，是哈佛大學教授C.I.劉易斯寫的，在之前我從未聽說過他。這本書對牛津（及當時其他英國大學）哲學的孤立和自我中心多有說及，我和同事們確實對美國哲學了解得太少了。我在布萊克威爾書店的柜臺上偶然碰到這本書，打開后覺得它很有趣。我買了這本書，讀后認為它對康德倫理學的實用主義轉化是獨特新穎且富于成效的。奧斯汀借了書后，幾乎立刻就離開了。雖然他通常會在每天晚上拉小提琴，彈奏無伴奏的巴赫變奏曲，但他告訴我說他那天不拉小提琴了而是馬上開始閱讀這本書。三天后他向我提議，我們應該針對這本書開一門課，他對此書同樣印象深刻。

我可能對此誤解了，但我想在牛津這是第一次為一位當代思想家開設課程或專題討論會。那時，奧斯汀作為一名教師的聲望已相當大，不少本科生每周都到我們全靈學院來聽課。當時我對如何進行聯合授課毫無概念，以為授課者之間先要就原文提出的觀點進行對話，這樣他們能彼此表現出牛津大學討論哲學問題時常有的對他人近乎夸張的尊重。奧斯汀一開場就請我闡述主題。我選擇劉易斯具體的可感特性——劉易斯稱之為“感受性”（qualia）——理論談了想法。奧斯汀嚴肅地瞪著我說：“你不介意再重復一遍吧？”我重新講了一次。奧斯汀慢吞吞地說：“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完全是廢話。”那時我意識到，這里沒有客氣的、與假想敵人的擊劍練習，只有你死我活的戰斗——死的那個是我。毫無疑問，奧斯汀在我們課堂上的表現，至少對某些聽課的人有深遠的影響。他們中的一些人后來成為顯赫的職業哲學家，足以證明奧斯汀這種表現的超乎尋常的力量和效果。毋庸置疑，這種表現類似于莫爾在亞里士多德學會和心靈協會聯合會議上的年度課程。奧斯汀堅定地反擊聰明或愚蠢的批評和反對，沉著、嚴厲、令人敬畏。這個過程中，他使得課堂上真誠的哲學家們被唯名論觀點的簡潔和明晰所激勵鼓舞（他反對劉易斯，支持唯名論），而不是被壓制或挫敗。“如果這張紙上有三個朱紅色的斑點，那么有幾種朱紅色呢？”“一種，”我說。奧斯汀說：“我認為是三種。”這學期的其余時間我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上課時，奧斯汀就像一位難對付的哈佛法學院教授。他在課堂上發問，如果因為害怕每個人都不敢說話，他就會伸出一根纖長的手指，緩慢地來回晃動一會兒，然后就像一把手槍的槍口，突然隨便指著某個人，神經質地大聲說：“你來回答！”有時，被提問者會被嚇得說不出話來。奧斯汀意識到這一點之后，就自己來回答，恢復到我們正常的討論狀態。盡管有時候會有點讓人害怕，但聽課人數絲毫未減，大家對他的課仍然興趣強烈。那個學期我們一直在討論唯名論。這是我上過的最好課程。對我而言，這也標志著奧斯汀真正開始了作為一名獨立思想家的生涯。

1936年夏末，奧斯汀向我建議舉辦定期的哲學討論會，討論我們倆和同時代的牛津哲學家們所感興趣的論題。他希望這一小組不要正式集會，不要抱有任何公布我們“成果”（如果我們有的話）的想法，除了凈化心靈和追求真理之外，不要抱有任何其他目的。我們商定邀請艾耶爾、麥克納布和伍茲利（這三位當時都在牛津教授哲學），也同意斯圖爾特·漢普希爾（已當選為全靈學院研究員）和唐納德·麥金農（已成為基布爾學院研究員）加入。會議是在1936年到1937年的某個時間（我想是在1937年春）開始的，持續到1939年夏（間斷過幾次）。每次都是禮拜四晚餐后，在我全靈學院的房間里舉行。回想起來，這些會議是我參加過的最富成效的哲學討論會。論題沒有經過仔細準備，事先不一定預告，但我認為我們這一周大概會知道下一周要討論什么論題。主要論題有四類：認知，如普賴斯和布羅德討論的感覺材料理論；先驗真理，即看起來必然為真或假，但明顯不能還原為規則或定義的命題；反事實命題的證實和邏輯特性，我想那個時候我們稱之為沒有實現的假說或反真實性；個人同一性的性質和標準，以及我們對于其他思想家的認識的話題。

當我提出把知覺作為一個論題的時候，我應該已經說過，我們討論的主要是現象論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實證理論，艾耶爾對此有特征鮮明的、眾所周知的強烈主張。奧斯汀抨擊了所有關于感覺材料的術語，并質問感覺材料同一性的標準是什么：如果某人的視野里有七條虎皮狀的黃黑相間條紋，那么它是包含七個黑色和七個黃色的感覺材料（或者是由七個黑色和七個黃色的感覺材料構成），還是一個連續的條紋材料？感覺材料的平均大小是多少？平均壽命是多長？何時能認為單個感覺材料變色、褪色或消失？或者，是否有與色調、色飽和度，或音色、音調一樣多的數據？如何計量？是否有“最小的可感物”，它們是否因觀察者而異？除了如何分析觀察者這個當時熟知的問題外，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新的。

艾耶爾為實證主義辯護，他希望知道，如果放棄現象論，將用什么來取代它。奧斯汀是否假定存在無定形的基質，或是原始而粗糙的洛克式感覺意義上的，或如某些當代科學家和哲學家（他們主張或預設存在同樣不可證實的、形而上學的實體，但比洛克更糊涂，遠不如洛克連貫和誠實）所主張的？我不記得奧斯汀曾經嘗試對這些問題提供任何正面的答案，或者至少形成了任何自己的學說；毋庸置疑，他更喜歡對別人提供的解決方案進行批判。我記得，在一次質疑攻擊中，關于純粹現象論的還原論命題的論述被奧斯汀駁倒四五次之后，艾耶爾大聲說：“你就像一只自己并不想跑而只喜歡咬別的狗的灰狗，害得它們一個都不能跑了。”[59](#_59_11)

奧斯汀身上肯定有某些這樣的東西。我不記得，他在戰前是否完全從現象論的困境走出來了。但即使在那時，他確實開始說他看不出關于外部世界所用的日常語言有那么多錯誤。例如，光幻覺引起的問題（如重影、棍棒在水中彎曲、透視錯覺等等）應歸因于哲學家的語言含糊和錯誤分析，而不是難以置信的非經驗的信念。在這一點上，他反對洛克和休謨，欣賞貝克萊，認為貝克萊是正確的。“真正”彎曲的棍棒當然不同于“在水中彎曲”的棍棒，而且發現了光的折射定律之后，就不必發生混淆：彎曲是一回事，看起來彎曲是另一回事；如果將一根棍棒投入水中卻不顯得彎曲，那才是真正令人驚奇的。感覺材料語言是一種子語言，它用于特定目的（如描述印象派畫家的作品，或用于醫生請患者描述他們的癥狀等），是由日常語言引申出的人為用途，這種語言足以滿足多數日常需要，且本身沒有誤導傾向。

可以想象，艾耶爾以及我們當中的其他一些人，堅決抵制對莫爾和羅素、布羅德和普賴斯觀點的正面攻擊，抵制對知覺理論的英國學派整個架構和術語的拋棄。這些討論催生了“牛津分析”，這與其說是奧斯汀特定論文的結果，不如說是對我們全體當時呼吁研究普通語言用法的回應。據我回憶，當時我們并沒有有意識地援引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學說，即使“藍皮書”已在劍橋傳開，我想它進入牛津是在1937年前后。

類似的方法被用于討論反事實陳述句（它們的外延及它們與實證原則[60](#_60_11)的關系），同樣也用于討論個人同一性及其與記憶的聯系。如果我沒記錯，關于后者我們選擇的主要例子就是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中的男主角。一位旅行商人名叫格里高爾·薩姆沙，他有一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怪異的甲蟲，但還清晰地記得他作為一個普通人時的生活。我們是將薩姆沙看成一個長著甲蟲身子的人呢，還是看成一只有著人的記憶和意識的甲蟲？奧斯汀說：“都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不知道怎么說才對。這正是只要我們一開口，‘言語就會失效’的時候。現實的確如此。我們需要新的詞語。原有的已不再適用，它們表達的意思沒法包含這種情況。”由此，我們談到了說話者在分析他自己觀點時與分析別人觀點時的不對稱或顯著的不對稱。奧斯汀和艾耶爾從各自的不同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逐漸成為持有兩種不可調和觀點的對手。在我看來，正是在那些星期四的晚上，在不斷地對比、反駁艾耶爾及其支持者的實證主義和還原論的過程中，奧斯汀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哲學主張。我并不是指奧斯汀和艾耶爾完全控制了討論會，而其余人大多數時候都在當聽眾。我們所有人都談論了很多[61](#_61_11)，但是如果我問自己說了什么或相信什么，我想除了批評實證原則和純卡爾納普式的邏輯實證主義，很難說還有別的東西。所有我能回想起來的就是，大家的觀點每周都在變化，沒有形成固定的派別；只是艾耶爾和奧斯汀很少（如果有過的話）意見一致。

簡言之，關于我應稱之為先驗陳述句的問題的討論起因于1935年羅素在劍橋倫理學俱樂部（奧斯汀和我都加入了該俱樂部）宣讀的一篇關于“經驗論的局限性”的論文[62](#_62_11)。論文的內容是，當諸如“同一對象（或表面，或我視野所及的部分，或由此替代的任何事物）在同一地方不會同時為紅色和綠色”之類的論述看來具有不容置疑的、不可能被證偽的真實性時，它們的反命題似乎并不是自相矛盾的。這是因為，這些命題的真看起來并不來自字面定義，而是來自顏色詞語的意義，其用法是通過指稱行為習得或得以解釋的——通過當時被稱為“實指定義”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把這些命題的反命題描述成荒謬、無意義或不可理喻的似乎更好一些，而不能描述為術語上的矛盾。這引起了很多長篇的討論，涉及詞語和非詞語定義、卡爾納普的句法屬性與語義屬性的關系、語詞——語詞關系與詞語——事物關系之間的差異等。

奧斯汀和艾耶爾方法之間的不同再次表現得非常清楚。如果艾耶爾意識到一個特定理論引起了他所確信錯誤或荒謬的結果，例如無形實體的存在，或其他對實證原則的明顯違背，即使是以“輕微”的方式，他就會感到整個論證過程必定是遵循了錯誤的方向。他會著手否決這些前提，盡力想出一些能避免這些不良后果的新前提。而奧斯汀不管看到什么東西，都隨時準備接受。

后來他的一些批評者（至少在對話中）認為，奧斯汀這種哲學的自發性和不受先入之見束縛的明顯自由并不是完全真實的。事實上，這是煞費苦心的蘇格拉底式謀略，其中隱藏了一個他還沒有準備公之于眾的發展完備的實證學說。我認為這些批評者的看法是不對的。1936年到1939年，他在哲學上是思想開放的。的確，他那時對任何先定的學說都充滿了懷疑。如果說有他不懷疑的說法，那就是他似乎樂于提出那些他認為正確或至少看似合理的觀點，無論它們對《認識》或《分析》中作家的系統觀點可能造成什么樣的破壞。當然他在大肆抨擊那些精心構建的哲學教條時，難免會產生一絲惡意的快感——他確實喜歡咬其他的獵狗。但在我看來，他當時及后來的主要目的是確立特定真理，旨在以后能從中概括或推導出一些原則來。他當然希望“拯救現象”，在此意義上，他追隨了亞里士多德和貝克萊，而不是柏拉圖和休謨。他不喜歡明確清晰的二分法——比如普遍性和特殊性（正如劉易斯書中所區分的），描述性語言和情緒性語言，經驗真理和邏輯真理，可證實和不可證實、可修正和不可修正的表達式——所有關于這些鮮明而徹底的對比的斷言，在他看來，都沒有完成它們所預期的任務，即對詞語的普通用法進行分類。那時（后來也是這樣），他認為意義的類型和區別常常在日常語言中反映出來。日常語言不是絕對可靠的向導，它充其量用于指示語言所描述或表達的主題，或指示某些以其他方式與此相關的事物。這些重要區別，會被全有或全無之類的哲學思想提出的明確清晰的二分法所抹殺，而這些哲學卻引導出關于“有什么”和“人意味著什么”的人們無法接受的教條來。因此，當羅素等人舉出一些例子，如斷言劉易斯的“感受性”（顏色、聲音、味道等）中具有不可還原的不兼容性的命題，那些看起來既非分析也非經驗的命題，或主張單個的反事實陳述句盡管難以看出（即使在原則上）如何加以證實，仍不僅可以被人理解事實上也會被人相信時，奧斯汀就會抓住這些例子，極力并且聰明地加以挖掘。我想，他主要是想發現否定的例子，這些例子像扭曲模具一樣，輕易摧毀那些用以聯系事物復雜難控特性的一般命題。他極度尊敬自然科學，但他相信，學習各種行為、知識、信念、經驗的唯一可靠方法，是對關于實際用法的資料的耐心積累。在以某種確切可靠方式反映現實，或作為克服混亂和錯誤的妙方的意義上，他當然不會視用法為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用法被忽略了，風險則由我們承擔：奧斯汀的確懷有伯克式的信仰，即用法的差異通常反映了詞義的差異，也反映了概念的差異；這是一個定律，由此對于確定意義、概念、事件可能狀態的差別，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相對受到忽視的方法，有助于在發現真理的過程中廓清混亂、消除障礙。最重要的是，哲學并非一套以粗略措辭為養料的機制，而是有條不紊、明晰透徹、清清楚楚、剔除了虛妄的屬性。

在這個意義上，奧斯汀不太信任特定的哲學技術——一堆處理難題的小技巧。奧斯汀對語言和哲學的濃厚興趣無疑與此有關，他極高的古典學術修養滿足了他收藏家般的過度好奇心，這有時會以犧牲真正的哲學問題為代價。然而，他對能夠反映實在結構的邏輯上完美的語言的學說的含蓄拒斥，起源于與維特根斯坦相似的哲學視角。奧斯汀那時可能已經看見了維特根斯坦的沒公開發表但已私下傳播的觀點，雖然我認為，他在戰前并沒有嚴肅地關注這些觀點。當然，據我所知，他首次發表的哲學論文——一篇體現了他的很多實證論觀點的關于先驗概念的文章[63](#_63_11)——跟他知曉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完全沒有關系，除非或許通過約翰·威茲德姆的文章（他肯定閱讀過），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有一點非常間接的關系。

參加星期四晚上討論的人，偶爾會談到道德問題。但從主題的嚴格要求來看，這被當作是一種消遣，因此并不經常這么做。我們當然討論過自由意志，在討論過程中，奧斯汀低聲對我說（以免激怒當時的決定論者弗雷迪·艾耶爾）：“他們都在談論決定論，聲稱自己信仰決定論，可我這輩子從來沒遇見過一個決定論者，我是指真正信仰決定論的人，就像你我都相信人都不免一死一樣。你呢？”這點使我很喜歡他。在一次散步時，他對我的問題的回答也讓我喜歡他。我問道：“倘若一個孩子想要見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的拿破侖，我說‘這做不到’，孩子又說‘為什么做不到？’我回答‘因為事情發生在過去，而且你在一百三十年前和現在不可能都活著，你也沒法保持年齡不變’，以及諸如此類的話；這個孩子繼續催問‘為什么不行呢？’于是我說‘因為我們用詞語來表達人能同時在兩個位置或者“回到”過去，是沒有意義的’，而這個精明的孩子說‘如果這僅僅是詞語的問題，那難道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改變我們的語言用法嗎？這樣做我是不是就能夠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看到拿破侖，并且，我當然也能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停留在現在？’——應該對那個孩子說什么呢（我問奧斯汀）？是否簡單地告訴他，這樣做就混淆了物質和形式的模態？”奧斯汀回答：“不要這樣說。告訴這個孩子努力回到過去。告訴他沒有任何法律禁止這么做。讓他嘗試。讓他嘗試，然后再看會發生什么事情。”現在，跟上次戰爭之前一樣，我認為奧斯汀了解哲學的本質，即使他過于迂腐、過于謹慎，并在辯論前就嚴防死守——他比大多數人都明白什么是哲學。

這些討論頗有成效的原因有這么幾個：參加討論的人數少（從未超過七人，而且通常少于七人）；參與者彼此了解，交談非常自由，沒有炫耀的意圖；參與者完全順其自然，他們知道就算他們走的是一條通往懸崖或沼澤的錯路，那也無關緊要，因為無論何時只要他們愿意，就能在以后的會談中沿原路返回。此外，奧斯汀和艾耶爾的知識時時更新、力量強大，雖然他們處于幾乎連續的沖突狀態之中——艾耶爾像一枚勢不可擋的導彈，奧斯汀像一座巋然不動的堡壘——但結果并不是陷入僵局，就我所知是最富有情趣、最自由自在和最生動活潑的哲學討論。

這些討論的一個不足之處，在我看來，是從總體上影響了牛津哲學的某些做法，至少當時如此。我們過度以自我為中心，唯一希望說服的人是自己敬佩的同僚們。我們沒有任何發表論文的壓力。因此，當我們自己認為的一些獨創或重要的觀點（無論正確與否）被一個哲學同僚接受乃至理解時，我們會在愉快的幻覺中產生一種完全徹底的滿足感，至少我經常如此。我們覺得不需要發表自己的想法，唯一值得去滿足的聽眾就是一幫在我們附近、愉快地定期會面的同僚。我想，我們當中沒有人像20世紀初莫爾的弟子們（凱恩斯在一本關于自己早期思想的回憶錄[64](#_64_11)中談起過他們）一樣，認為自己是最早發現知識本質的真相或其他事情的人。但跟他們一樣，我們認為，這個神秘圈子（我們這里是指牛津、劍橋、維也納）以外的人不能教給我們很多東西。對別人來說，這是自負愚蠢的，而且我相信也是令人生氣的。但是我猜想，那些從未體驗過這種幻想的魅力（甚至片刻也沒有體驗過）的人，都不會懂得真正的精神愉悅。

# 約翰·佩特羅夫·普拉門納茲

約翰·普拉門納茲于1912年出生在黑山首都采蒂涅。他的父母都是那個工業革命前半田園式的舊社會中的一員。雖然他一生幾乎都在英國生活，但他的想象和情感都為對故土的深深依戀所占據。在1917年，也就是他五歲的時候，父親帶他到了法國。后來，很快又來到英國，在距溫徹斯特很近的克雷斯莫學校上學，他父親認識那里的校長。他在那兒待了十一年——雖然學校總是搬來搬去的——一直待到1930年進入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他長期離開家庭，并且習慣了孤獨，雖然有時他父母叫他在假期里去馬賽或維也納看望他們。他在奧里爾學院讀了四年書，由于生病，他拿到一張疾病診斷書，而沒能完成“哲學、政治和經濟”專業的論文；但一年后，他的歷史課程得了第一名。他在1936年被選入全靈學院，成為繼迪爾在20世紀初因論文獲選之后又一個因論文被選入全靈學院的人。

此后他一直生活在牛津，而他的著作和影響力已經成為英國和牛津大學知識分子歷史的一部分。在他一生中，他總有一種流亡的感覺。他從未完全把自己跟英國或牛津大學聯系在一起，當他說“我們”的時候——比如，“這是我們的思考方式”，或“我們是這么看的”——他通常指的是黑山人。他曾跟我說，他和一些英國人交上了朋友，跟兩三個人在一起時他會有家的感覺；但當聚會多于兩三個人時，就會感覺英國人相互之間存在某種關系，而自己則有種受排斥感。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他根植于一種遙遠的文化，他在孩童時代突然離開故土——移民到國外的陌生環境——使他被迫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孤立起來。那些認識他的人可以證實這一點：就像約瑟夫·康拉德（某些地方跟他有些相似）一樣，他一生都表現出一種流亡貴族的自豪感和獨立感。

“表現”這個詞匯用在他身上其實是個錯誤：約翰·普拉門納茲什么也沒表現，他很含蓄和沉默，據我所知，他從不自以為是或把個人意志強加于人。他總是坦率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謙恭有禮是他重要的性格特點。有時人們很難真正明白他的心思——那是有關他的遙遠而不可及的一些東西，但當你對他逐漸了解后，這些就都不存在了——他是一個溫暖和親切的朋友。但不管友誼是否存在，他都沒有對人的性格和動機熟視無睹；他感覺敏銳——即使有點近視但可以看到許多。偶爾他也會被有些人和事情所蒙蔽，但這種情況很少。總之，他并不急于做出判斷。他評論個人或社會現象時，有時會用一些幽默的諷刺，但基本上表現得很寬容——這只有那些非常有教養和善良的人才能做到。當然，有一些品質是他無法忍受的：他討厭假冒、瑣碎、賣弄、尖聲刺耳、粗俗、投機取巧；他厭惡粗魯；他對缺乏禮貌的行為感到不安和難以理解。他尤其珍視隱私和私人交往。他是溫和、有尊嚴的，而且完全不喜歡競爭。他對他人的性格感興趣，對他人的情緒也很敏感，特別是對那些像他一樣在社會上孤獨行走、對既定社會模式很難適應的人。他與這些人交流更容易一些。批評者認為他們不善交際或缺乏吸引力，而他會為他們辯護。我想，他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理解孤獨、不幸和脆弱。戰前，在全靈學院到處都是政治家和學者們對當前炙熱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熱烈討論；但約翰·普拉門納茲總是避免類似的聚會，他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和對其他很多事情的興趣一樣濃厚，他對他們的理解有時更敏銳，但他不喜歡喧鬧、玩笑、對抗、詭辯、情緒高漲之類的東西——不管是真還是假。他很少參加宴會。

學院的會議則是另一回事。他會認真對待這些會議；雖然他說得很少，但只要他參加進來就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他說話平靜，讓人信服，從不虛辭夸飾。除非有重要內容要表達或提問，他一般不發言：他動機單純而且非常真誠，因此他看似簡單的陳述或問題，卻能透示辯論題目的核心，并達到極好的效果。“正直”這個詞大概是為他發明的。他的言辭令人起敬，如果哪次他感覺被真正打動了，他幾乎總像打了勝仗似的欣喜。他的獨立、他對真理的謹慎態度，以及他公正的判斷力，對每個他所屬的團體而言都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道德資產。他在全靈學院時是這樣，聽說在納菲爾德學院時也是如此。

他提交的博士論文被審查人判定為不及格，原因據傳是“缺乏判斷力”。這簡直是一種諷刺。正是這篇論文讓他被選入全靈學院。論文發表后，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后來一些年，他自己對這篇論文也持批評態度。然而，在權威的評論家們看來，那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牛津大學關于政治理論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在眾多的著作中，它也是第一部比任何其他單一因素都能改變整個牛津大學政治理論討論水平的著作。他的這部著作提高了嚴肅的哲學辯論水平。因此說它不合格，大概是我們這代人的學術評定中最重大的失敗。他那時當然也受到了傷害，但最后還是忽略了它——因為并沒有留下明顯的創傷。

他的思想武器來自他導師威廉·高爾德·麥克拉根所信奉的嚴肅的、前實證主義和前語言學的現實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也是20世紀30年代初在牛津大學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它的方法是在陳述自己或他人主張，特別是過去一些大思想家的主張時，用盡可能清晰的方式，避免一切含糊、晦澀、夸飾和混淆；是揭示不一致性；是運用理性的方法來達到合理、嚴格的結論。他深信并維護著這種方法，并且一生都在實踐。他的目的是闡明和批評那些作家的觀點，對他而言，他們似乎無論何時何地都在思考關于人類的最重要的話題。像馬基亞維利一樣，他發現了一扇通往過去偉人們所在世界的大門，那里不受時間的影響；他向他們詢問，試圖理解他們最基本的觀念、他們對人類和社會的看法、他們本人曾經是怎樣的和應該是怎樣的。他從不賣弄學問，也不吹毛求疵。即使他研究的思想家在他看來是無知、糊涂甚至不誠實的，只要他們哪怕有一點東西對人類的本質、目標、道德和政治經驗或需求是重要的或深刻的，他就會堅持研究下去。他發現行文清晰的作家如馬基亞維利、霍布斯或功利主義者，就算說不夠和藹，但至少是容易打交道的。他與那些令人敬畏、深奧的理論家們斗爭——在這些人身上他看到了天才之光，比如黑格爾、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們，就像雅各與天使摔跤，一定要得到祝福，才讓天使走。

他關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文章，是以英文寫就的對這些思想家最為清晰和最有價值的闡述。他以極大的堅韌態度反復閱讀、一再重寫這些文章，認真對待來自朋友和同事們的評論，而他對自己的文章比別人要更為苛刻。出現爭議時，他會非常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會回到文章或他自己的評論中，加以審視。如果這些批評里有任何公正的意見，他會完全認同并改變自己的看法。在他關于功利主義的著作的第二版中，就包括了他自己對第一版的評論，嚴格程度遠遠超過任何他人的說法。他的目的不是去發現他人思想的不一致性，或只是解釋和揭示錯誤，而是至少要找到復雜的、難懂的真理中一些觀點的起點，在他看來，他所尊敬的那些思想家都是由某個角度出發來達到這些真理的。他的文章使整個學科在英國變得更體面，也間接地影響到每一個講英語的國家。

他不但深受學生愛戴，也受到那些著名對手們的尊敬，但他沒擔任任何顯赫的職務，也沒有創辦什么學校。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總是在他語氣平和又認真的散文里，以真理所需要的一切特質，來簡單闡述他認為真實的東西；他沒有因為要附和某個體系而改動或修正自己的想法，沒有追求一致的歷史或形而上學結構，從未因想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重視而夸大其辭或過于算計。因此，那些尋求體系和完整思想大廈，想依附其上的人，到頭來總不會滿意。他沒有野心要出名，或戰勝對手、改變他人信仰，或發起一項運動。他只想發現和說出真理。實質上，他的方法是英國式的，而且具有他年輕時牛津當地的特點：但它們被添加上一種與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專家們（比如普里查德、羅斯以及其他人）非常不同的氣質和外表。他對人性以及人的目的和潛力的看法，不僅來自對古典哲學家作品的閱讀，同樣來自他的教養和他對故鄉、對那個處于前封建制度的地區的風土人情的眷念；也來自他終生熱愛的法國文學與思想——比起英國文學來他更認同法國。他喜歡多恩、赫伯特、華茲華斯，但孟德斯鳩的散文帶給他一種自然的愉悅。18世紀的法國戲劇——馬里沃、讓——巴蒂斯特·盧梭、博馬舍等的作品——都使他熱情高漲。他在寫給一份雜志的信中，為馬里沃所受到的認為其膚淺和虛假的批評作辯解，稱贊馬里沃的洞察力以及他對人類羞怯天真的心理活動的細膩描寫，而這封信本身就是一篇關于文學情感的杰作。

他對那些孤獨和不幸的思想家給予最深切的理解，這些思想家對人們的生活準則、挫折、孤獨和疏離有深刻的理解。其中，他最喜歡的是帕斯卡、讓——雅克·盧梭——孤寂的思想家總是進行痛苦的道德和精神上的自我探究，而非理性的自我審視。他對蒲魯東給予肯定和贊揚，認為普魯東對工人或下層階級很了解，知道他們的需求和受苦的原因，這是因為他本人是真正理解他們的；不像天才馬克思，只給出一些適合工人的理論模型而未付諸任何實際行動。他對英國經驗主義持肯定態度，同時對人類苦難抱有非英國式的浪漫觀點，這賦予他的作品一種，在我看來是任何其他英語作品都表達不出來的不安。他的表達從不是完全客觀的：因此，在數頁嚴肅的、牛津式的闡述和論證之后，突然間出現一條敏銳、有創意、極富個性的評論——正如他所做的評述：“從德國馬克思主義到俄國馬克思主義，就像我們送走了馬而迎來騾子一般。”[65](#_65_11)在這意外的、經常具有諷刺意味的言語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聽出他的心聲。在他的個人文章中，通常有一些非常新鮮而極其直接的東西。的確，他的作品真實可信，就像手工制品一樣：平衡、不夸張、精雕細琢，從不機械或遵照一個模式。他的著作給人的印象就是好像這個題目從來沒有被寫過似的。他寫給學生的東西也是一樣：從不夸張，從不依照慣例，它們為敏銳的心理洞察的火光照亮，令人信服。就是這個直接的品質，加之所有其他屬性，使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戰爭中斷了他的寫作。他聽從萊昂內爾·柯蒂斯的建議，成為一名特殊的防空部隊成員，這使他的諷刺力得以完全施展開來。隨后他轉到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成為彼得王朝戰爭內閣的一名成員。他寫了一本小冊子來回應貶低米哈伊洛維奇將軍的人（它作為內部讀物出版）[66](#_66_11)。戰后，他作為研究員又回到全靈學院，開始創作一系列關于政治思想的文章和著作。1951年，他被授予納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資格，1967年他當選為全靈學院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

他告訴我，幾年后，他的一些從黑山來的、做走私生意的親戚來拜訪他——我想應該是在巴爾干的某些地方走私。他們對他說：“你是牛津的教授，而一個黑山人做這個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補充說，親戚們是對的；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是教授。他認為行政職務的責任很重，他經常強迫自己工作；雖然他會出席委員會、參加考察，但從中完全得不到愉悅和滿足感。他喜歡的是閱讀、寫作及教書。他與學生的關系非常好，與同事們相處融洽。對他而言，個人生活比單位里的繁忙工作要重要得多。全靈學院比納菲爾德學院更適合他，因為對他時間的要求更少一些。但他對納菲爾德學院很感激，因為它在他陷入困境時伸出了援手；而且一些摯友也是在那里結交的。照看學院的花園給他帶來了真正的愉悅。但他最喜歡的還是隱居。他大概很贊同帕斯卡的觀點，認為很多疾病是由于人們不能安靜地待在屋子里造成的。

與英國人相比，在某些方面他更喜歡接觸美國人：就像很多內向、沉默寡言的學者一樣，他為那種開放、反應強烈、熱情、天然而不受拘束的坦率，以及美國學生和同事們的毫無偏見的態度所感動；也為他們在求解知識或政治問題時所表現出的追求真理的深切而真實的渴望、他們努力了解他的思想和言論的做法而感動。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感到尤其高興。在他長達七年的教授生活中，他都渴望得到解放。但他并沒有不滿意。的確，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四年里，我覺得他更輕松了、表現得更為本真。在他看來，友誼以及對妻子的愛和奉獻是最重要的。他告訴我他喜歡住在鄉下，因為那里的鄰里關系比在學術飛地這個人為環境中的人際關系，更自然、更令人滿意、更像人類時時處處的生活。

他自1933年以來第一次生病，就是被最終診斷為致命的心臟病突發。他在1975年2月19日去世，五十六年前他是在同月同日從多佛踏上英國的土地。

他的獨立精神，他對學校生活所有吸引人的事物的疏遠——那些試圖使他卷入某種陰謀的想法簡直不可思議，他慷慨大度、不會算計的性格，他對于那些歪曲、不顧甚至文飾事實的事情采取的不妥協態度，他作為思想家的出類拔萃，他的高貴品質，都已經被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他很有自豪感，但從不虛榮和勢利，平等對待所有的人：對年老的或年輕的、重要人物或不重要的人物、才華橫溢的或愚鈍無趣的，他都莊重有禮。他具有一種（我只能描述為）與任何人接觸時都會令人愉快的道德魅力。他——與他非常欣賞的作家——的作品與所有其他人的作品都不一樣。總之，他具有最好的和最罕見的品質。

# 莫里斯·鮑拉

莫里斯·鮑拉是一位學者、批評家和行政官員，也是當時英國最有智慧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寬厚仁愛，他強大的人格魅力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和想法。根據在切爾滕納姆的一位同輩的說法，到1916年離校參軍時，他已經完全成熟。他總是帶著深厚的感情，以尊重的口吻談起他的父親，他像父親一樣堅定；但又不完全像父親，他在性情上還有反叛的一面。當他1919年來到新學院時，便成為那些智力超群的同輩們的自然領導者，激烈地與組成戰前牛津觀點的傳統智慧和道德準則對抗。自那以后，他對所有現存規則保持批判態度。

鮑拉熱愛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喜歡太陽、大海、溫暖、光明，憎惡身體、精神、道德和政治上的陰冷及黑暗。他一生都喜歡自由、個性、獨立，憎恨那些阻礙和壓抑人性活力的勢力，無論自我壓抑的禁欲主義取得了什么樣的精神成就。他對地中海及其文化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他喜歡幸福快樂、生氣勃勃、大自然和文明最豐碩的果實、人類感情的完全釋放，而不愿意受到摩尼教罪惡觀念的束縛。因此，他很難同情那些在生命力量面前畏縮的人——那些小心謹慎、喜歡算計、墨守成規的人，那些在激情和活力前退縮、太容易被熱烈和直率所嚇倒的過分拘謹或故作正經的人。因此他難以忍受學術界、政府和商業界的大多數平庸之輩，也難以忍受文化圈子里那些在他看來是淺薄、古板、他不贊同的人。他相信生命的豐盛。浪漫主義的夸張——比如他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圍繞德國詩人施特凡·格奧爾格形成的圈子中發現的——對他的吸引力遠甚于英國人的沉默寡言。他有跟前輩們（如溫斯頓·丘吉爾、托馬斯·比徹姆）類似的性格，他仰慕才華橫溢、光輝燦爛、能言善辯、恢宏的格調，也不害怕管弦樂的宏大，他不喜歡布魯姆斯伯里的室內音樂。他在古典的世界里發現了理想愿景：希臘是他始終如一的愛。他的第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著作就是對荷馬的研究，這也是他最后一本著作的主題，直到完成此書他才離世。[67](#_67_11)盡管他的文學興趣非常廣泛——從中非的詩歌到當時最年輕詩人的創作——但他傾注最深感情的還是希臘抒情詩人品達、索福克勒斯。在他看來，默里和維拉莫維茨不僅僅是學者和其他文學的批評家。

憑借機智靈敏的頭腦、強有力的個性、沖動的內心、滿溢的快樂、才華橫溢又具諷刺精神的個性，以及對所有沉郁、自負和懦弱的輕蔑，他很快在朋友和熟人圈中廣受歡迎。然而，他終生為某種程度的不自信困擾：他需要不斷地樹立信心。他做事很有條理，有信心和能力做好艱苦和條理性的工作（這也是他大部分時間在從事的工作），尊重專業化，討厭淺薄；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由于極度缺乏自信而采用的防御武器。而且，他那最貼近內心的浪漫主義價值觀的拜倫式諷刺也起到了同樣的防御作用。新學院嚴厲的哲學導師霍勒斯·威廉·布林德利·約瑟夫，打擊了他對自己智慧和能力的信心，而他的另一位哲學導師阿利克·史密斯——對他幫助很大，后來他們成了終生的朋友——也不能完全使他重建信心。

鮑拉將生活視為需要跨越的一系列跳欄，需要不斷克服障礙：有許多著作、文章、評論要寫，有許多學生要教，有很多課要講，還要參加各種委員會，甚至出席各種社交場合。要迎接這么多挑戰，絕不亞于真正的磨難：滿懷敵意的批評家的攻擊、人際關系的疏遠、健康所受的威脅。在幾個他所能信任的忠誠密友陪伴下，他才得到放松，并常常表現得從容、文雅、平和。但是外部世界充滿了在奔跑中需要跨越的障礙；他有時會跌倒和受傷：他冷靜地對待這些挫折，然后立即精神飽滿地轉向下一項任務。因此，也許他需要和渴望得到認可，并且從獲得的許多榮譽中他得到了相應的快樂。他出版的作品在風格和內容上是單調、平淡、清晰、有序的，有時是傳統的，這也許是因為他對自己真實、卓越的才華缺乏信心。他的私人信件、私人文章和所有的談話都與他的出版物非常不一樣。那些僅僅通過他的出版作品來了解他的人，完全體會不到他的天賦。

作為一名談話者，他可能是無人能及的。他的智慧表現在口頭上且與日俱增：語句簡短尖刻，而且集中火力、切中要害；比喻、雙關、隱喻、打油詩似乎在一連串絕妙想象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有時會發展成極其夸張、滑稽的幻想。他獨有的語調、慣用語、聲音、句子結構都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典范，其魅力折服了許多人，也影響了他們的講話、寫作，也許還有情感。對某些牛津培養出來的、我們這一時代最著名的作家，也有著顯著的影響。但他的影響還要更深遠：他敢于講出別人想到或覺察到、但囿于規章制度或個人禁忌而不愿講的話。莫里斯·鮑拉突破了某些社會和心理障礙，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那些受到他自由的談吐吸引而聚集在他周圍的年輕人，也讓他們自己的心靈得到了自由。

鮑拉是一股強大的解放勢力：他談話的范圍極廣，藝術、人性、詩歌、文明、私生活，無所不涉，他無視既定的規則，對朋友熱情贊揚，對敵人肆意譴責，這些都產生了令人陶醉的效果。有些人，特別是一些年長的教師，對如此的自由言論感到驚奇。它們完全被誤解了。無論內容如何沒有意義，結果都有著深遠、持久的影響力。它夸大了錯誤、虛偽、荒謬；達到了宣泄的效果；它有利于真理、人類情感并使人精神振奮。作為主人（無論在自己的房間還是他人的房間，他永遠是主人），他有著積極的個性；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所有這些談話中沒有任何有害、頹廢或使人痛苦的內容，無論它如何無禮、輕率、夸張或無視公正。

作為學者，特別是作為一名批評家，鮑拉有其局限性。他最寶貴的品質就是對所有年代、所有民族的文學，尤其是詩歌，都懷有難以抑制的熱愛。革命之前，也就是在他的學生時代，他曾穿越俄羅斯來到他在中國的家；在俄國旅行的經歷，使他對俄羅斯詩歌產生了終生興趣。他學習俄國的文學語言，并且幾乎獨自在英國快樂（而成功）地分析了俄羅斯詩人最晦澀的一些詩句，如同他分析品達或阿爾凱奧斯的詩一樣。他閱讀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著作，對世界文學有一定的了解，這片蒼穹綴滿了天才人物的作品，他一直在努力揭示它們的特性。他是少數幾個同時被帕斯捷爾納克和夸西莫多、聶魯達和塞弗里斯熟知并高度評價的英國人之一，并以此為傲。對他來說，所有這些只是針對陷入四面楚歌的庸俗、迂腐的學問、狹隘的心胸而進行的戰爭的一部分。然而他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波士頓所有聽說過他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當英格蘭只是受到一點輕微批評的時候，他也會表現出愛國主義。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任何公共職位可以提供給他，這件事使他非常苦惱。而沒有被聘為牛津大學希臘文系教授（哈佛大學及其他著名大學發出了邀請），也讓他非常失望。但是后來他將此視為塞翁失馬。因為他之后當選為瓦德漢姆學院院長，這彌補了他之前的遺憾，可以說遠遠超過了彌補遺憾。

忠誠或許是他最欣賞的一個品質，也是他自己所擁有的品質。在他不那么世俗的后半生中，他在牛津特別是瓦德漢姆學院全心地工作。他為瓦德漢姆學院作出了很大貢獻，而學院也給了他很多。他以瓦德漢姆學院的學生（包括高年級的和低年級的）為傲；在學院人數快速增長的同時，他似乎跟每個本科生都保持著極好的關系；他指導和幫助他們，并暗中施行許多善舉。在他后半生中，待在教員休息室或招待同事和學生，是他感到最快樂的事；年長或年輕的朋友環繞身邊，享受可信賴的喜愛和忠誠，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時候。

在瓦德漢姆的任期結束后，他將熱情和精力投向了牛津大學：他擔任過學監、七日理事會及許多其他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學校新聞代表，最后擔任副校長。在年輕時他被認為是一名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沒有比他更玩世不恭的人），而現在他逐漸被人們認為是最勤奮、最高效、最進步的學術權威之一。他有非常強烈的學院精神：他在英國學術院擔任院長的日子是他生命中非常快樂的一段時光。在他的開明領導下，學術院得以繁榮發展。但他對牛津更加忠誠，牛津的發展給予他更強烈和持久的驕傲。牛津和瓦德漢姆是他的家和生命，他的靈魂與之關系密切。在所獲得的許多榮譽中，他自己所在的大學授予他的名譽博士頭銜是他最滿意的一個：他同事的看法對他而言頭等重要。快到退休時，他對學院讓他可以繼續住在校內而深懷感激。他的繼任是一位老朋友，這讓他感覺到了友愛和關注。

身體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和耳聾剝奪了他許多快樂，其中主要的是做委員會委員和參與日常管理事務，也讓他錯過了很多現在難以獲得的社交生活樂趣。然而他仍然保持著勇氣和快樂，并決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剩余的機會。他的對荒謬事物的感覺仍然十分敏銳：他豐富的想象力成為他的主要支柱。新面孔們繼續滿足他對生活的喜好。最重要的是，他現在很喜歡與年輕人打交道，他了解年輕人的思想和心靈，理解他們對反抗權威的渴望，他本能地分享了他們反抗強加于人的無益規則的渴望并勇敢地支持他們到底。年輕人感受到了他的心思并給予他回應，這使他非常快樂。

他的注意力不在政治上。但從性格上來說，他是一個激進分子，是一個不遵守傳統規范的人。他真的厭惡保守觀點，既不喜歡也不尊重任何堅決擁護既定制度的行為。他很同情參與1926年大罷工的工會：在牛津的一次會議上，他猛烈批評了1934年陶爾斐斯在維也納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他厭惡（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的）壓制和鎮壓，對獨裁者尤其深惡痛絕。與休·蓋茨克爾的友誼是他快樂的一個源泉。如果誰在他面前表達出他認為退步或錯誤的政治意見，他不會沉默，而會表現出憤怒。他并不喜歡由此導致的爭論，但認為逃避是不光彩的；他具有高度的公民勇氣。他支持所有自由主義事業，特別是尋求自由或獨立的少數派，越不受歡迎他就越支持。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他每年都參加希臘游覽，這也是他的一個主要樂趣；但當希臘的軍事政權接管國家后，他就放棄了這項活動。

他對宗教的態度更加復雜難懂：他對宗教經歷有好感，毫不同情實證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的信條。但是試圖用一個詞語來概括他在這方面的看法卻是愚蠢和自大的。他當院長時，據說幾乎從沒有錯過一次禮拜。

他生命中最后一個夜晚，是在跟同事和學生們的歡樂聚會上度過的。他死于心臟病，這最后一次聚會也許加速了心臟病的惡化；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正是他所希望的：在活著時，他就希望生命能在成為一個痛苦的包袱之前干脆利落地結束。

在他的盛名時期，他是自喬伊特以來人們議論最多的牛津學者，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他都值得人們關注和紀念。

# 戴維·塞西爾

戴維·塞西爾是索爾茲伯里侯爵四世的次子，他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在位于海特費爾德的家中度過。在他小孩子的記憶中，那時家里總是有許多談話——犀利、清晰而風趣。他講起那時每次討論都是圍坐在好客的父母的餐桌前進行的，氛圍完全自由，可以自發地討論任何事情，尤其是當羅伯特叔叔、休叔叔（偉大的維多利亞時期首相的政治之子）、威廉（未來的埃克塞特主教）在場時更是這樣。他們談論政治、歷史、宗教、英國內閣成員的故事、議會軼事（包括嚴肅的和滑稽的），詳盡分析公眾人物間的人際關系——所有這些都是這個享有盛譽的家族每日的精神食糧。

當他們那經常到訪的表兄——首相阿瑟·貝爾福在場時，談話變得尤其生動、熱烈、率性和親密，但也不時有一些對道德和宗教信仰原則等問題的討論。接觸這些使得戴維·塞西爾與生俱來的敏銳、熱情和聰慧較早地開始發展。他同時還獲得了各種觀點，擁有了準確和清晰表達的能力，還能將抽象觀點與公眾、社會和個人生活的變遷聯系在一起，將個體特點和信條與它們的公共環境和歷史地位聯系在一起——所有這些都是一個自然而不受拘束的過程。

家里書隨處可見，散文與詩歌都有。他有空時就讀書，并沒有規律的時間，也沒有特別的次序。就這樣，他熟知了克拉倫登、狄更斯、斯賓塞、莎士比亞、簡·奧斯汀、卡萊爾、蘭姆、拜倫、雪萊、麥考利、狄斯累利。就讀伊頓公學期間，他讀了大量他們的著作、文章和段落。當他還在學校讀書時，各種證據表明，他魅力非凡、舉止自如、詼諧愉悅，對人類的天賦和弱點都坦然接受。但他是個書生氣很重的男孩，這對他在伊頓公學并不特別有好處。因此，他并不喜歡在伊頓的那些歲月。跟他同時代的愛德華·薩克維爾——韋斯特（后來成為了著名的樂評家）回憶道，塞西爾是從離開伊頓公學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后才得以真正發展的。在伊頓公學，文化方面對他影響最深的也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臨時校長），赫胥黎時刻關注著詩歌領域，這對他來說很新鮮；而塞西爾一生都喜愛英國詩歌，特別是基督教詩歌。

在牛津大學，塞西爾對英國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尤其是斯圖亞特王朝和托利黨的崛起，后者與他家族的命運有著緊密聯系——他那博學而敏銳的歷史學導師基思·費林對他學習歷史給予了很大鼓舞，他認為塞西爾是他所認識的最聰明和最有吸引力的學生之一。的確，塞西爾具有天生的魅力和聰明的才智，他思路清晰、頭腦精明，對他所讀所寫的均持有批判精神，對人（不只是思想）和想象力（不只是智慧）均有著無窮的興趣。這些特征在他身上任何時候都表現得很明顯。

他總是能在這等級分明的英國社會，對自己的出身和社會地位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他曾經講過英國的貴族很難成為有創意的藝術家或作家，這是因為，除非他們的成長環境很不尋常，他們都容易被培養成無所不能的人；他認為，這給創造性藝術創作所需要的隱逸和專注設置了障礙——托爾斯泰、拜倫或許還有雪萊都是例外。他認為，那些跟他受相似的教育長大的人，更傾向于對他們周圍的個人和社會生活感興趣，很難致力于艱難的、需要終生投入的事情。他畢生著迷于各種各樣的個體經驗，以及各種書籍，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小說、詩歌、故事和隨筆。這樣，他除了去描述它們及其所表達的生活，還提出自己的看法，從自己理解的角度傳達它們的思想；而這就沒有為他所渴望的那種自我修煉、全神貫注的創造性工作留下任何余地。

在他的歷史課得了牛津大學第一名后，他嘗試申請全靈學院，但他沒能成功，而是被聘為瓦德漢姆學院的研究員，他在那里從1924年待到1930年。他教英國文學（有時也教歷史），這個時候他開始運用他理解他人思想的非凡能力。他發掘學生們的想法，讓他們精確了解他們自己的所想、所感和所究，也了解他們自己的身世和目標，反過來，他向學生們講述自己思考、理解、認識前文提過的作家及其作品而產生的生動而充滿想象力的具體感覺。他能從看似發育不良的種子中看到特別的花朵，這種能力使他（特別是他成為新學院教師后，他1939年到1970年是教授）在學生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大批學生也成長為牛津大學或其他學校英國文學方面的著名老師，他們一直都特別喜愛和欽佩他。在牛津大學文學領域最杰出的人物中，就有至少五位認為在學術和情感上都極大地受益于塞西爾——這個善解人意和鼓舞人心的教師。他的講座一直非常受歡迎，直到學術風潮改變。

他的興趣不在學術上，然而他從未輕視細枝末節的學問，也不蔑視最細心的文本及文獻調查，更不用說對過去思想的創造性重構了：他對此很重視，并把當時牛津大學最著名的文學學者看作大師和密友——C.S.路易斯、J.R.R.托爾金、海倫·加德納、F.P.威爾遜、海倫·達比歇爾、蘭斯洛特·帕特里克·威爾金森、內維爾·科格希爾——他們也非常喜歡他并尊重他的看法。但他的心并不在學問上。他對文學研究的真正目標有非常明確的看法，至少如他所想，盡管他并不排斥其他可能性。他不喜歡從歷史、傳記、社會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待一個作家，也反對根據上述標準去解釋自己的作品。他站在美學的角度，就像T.S.艾略特一樣，他認為藝術作品閃耀著光芒，而了解藝術家的生平使其增色甚微。跟普魯斯特一樣，他反對圣伯夫的方法。他不在乎埃德蒙·威爾遜，或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茲的語義學，或弗蘭克·雷蒙斯·利維斯的文化道德主義（利維斯曾猛烈地抨擊過他）。這并非他所欲為，即使他承認這本身并不錯。他認為一個評論家或一個文學教師的任務，是將作者的創造過程弄清楚并傳達出來，尤其是那些特別富有想象力的創作過程，不論它們是遵循規則，是偏離范例，是有悖于其他表達方式，還是由自己創造出的。他覺得這個任務就好像一個在音樂藝術學校里講授作曲的教師，描述貝多芬奏鳴曲的創作過程，或瓦格納管弦樂力量的組織及其與創造的關系。這就需要富于想象的洞察力和必要的精準知識，而洞察力本身就能顯示出一篇作品的本質，傳達其獨特的品質、內在的情緒、詩意的想象和變化的形式——這些是作品意義的一部分，也是藝術家達到藝術效果的方法。正是他與注意對象之間毫無障礙的愿望，以及相應的對文學理論和美學體系（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方法學的理論）的厭惡，賦予塞西爾的教學和寫作以獨特個性。也正是這種個性使得塞西爾常常能夠支持獨特的方式，并建議學生沿著自己的思路或想象繼續走下去。他從不試圖灌輸或強加正確的方法；這跟他的一些不那么優秀的同事不一樣，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末期，他們看起來很喜歡進行灌輸。

塞西爾的著作，反映了他最濃厚的文學和生活興趣，表明他最喜愛的是英國人生活和文字中最具英國特色的東西，以及在他看來，最具備英國最可貴品質的任何英國之外的事物：親歷生活的感受、內心深處的感觸、對寧靜鄉村生活的詩情畫意、對獨居生活和它在英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所扮演的角色與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作用的復雜的自我關注，尤其當這些觀察是真實的并涉及個人隱私時，還有由災難和錯誤價值觀造成的扭曲與破壞。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受傷的鹿》（1929）寫得很漂亮，它對一個憂郁、內省、半孤獨的、感情豐富的、在這個國家度過一生的基督教詩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塞西爾與不舒適、與世隔絕、充滿幻想、精神富足的生活，以及它們帶來的深深的、難以抑制的抒情沖動有著天然聯系——這正是考珀、格雷、蘭姆、勃朗特姐妹（正如他1934年的《維多利亞早期小說家》中所寫）、一個世紀前的多蘿西·奧斯本（《兩個安靜的生命》，1948）所感受的——這通過《詩歌和短篇小說家》（1949）中最好的篇章，通過他關于沃爾特·德拉·瑪麗的文章，尤其通過他關于托馬斯·哈代的令人感受深刻、富于創意的出色演講體現出來了，后者大概是他著作中最出色的部分。

但他并沒有受到這個流派的局限：他很風趣地描述了司各特早期對社會階級的沖突以及對動蕩社會中的個人沖突的領會，這跟盧卡奇毫無關系。他在1955年關于沃爾特·佩特的演講又是另一種東西——是對觀察生活的美學方式的極度欣賞，這對他來說意義重大，他在不利的社會環境中為之辯護，就像他在就職演說中所做的。跟當時潮流不同的是，在1949年和1957年，他宣稱藝術的中心目標是傳遞快樂，不是指導、干預、解釋、贊揚或譴責一個運動、思想或政權，不是為了將一個教會、團體、國家、階級變得更好，而是用光輝照耀人們的心靈，這種光輝是上帝賦予藝術家來散發的，賦予讀者或聽者來接受、理解和感到愉快的，而人們也因此離神圣的上帝更近了。

他生命中的真愛當然是簡·奧斯汀。在1935年，他還是一個自由作家的時候，他就寫了關于她的文章。1978年從牛津大學退休后，他又寫了《簡·奧斯汀肖像》，那是他對她最完整的研究。她的任何事情都吸引著他：她對人類心靈的清晰、公平、深刻的理解，她對認知的人類及他們所生活世界真正本質始終不渝的追求，她平靜的良好感覺和堅定的正直評判，她的沉著目光，她的輕快考究的語調，她對每個詞的精確運用，她隨處的諷刺和看似平靜的口吻，她在那些舉止典雅、有教養而迂腐的頭腦和心靈中傳達感受、激情與痛苦思想的能力。塞西爾嘲笑社會批評家的狹隘，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什么，不提法國革命或工業革命嗎？不提窮人的狀況嗎？或拿破侖？或階級斗爭？或者不提改變她聲稱所描寫的社會中的一切的技術變革？只寫了個人經歷、人際關系、兒童、青少年、婚姻、無數不可名狀的感覺和暗示？似乎這還不夠，不是生活和藝術的本質？

他懂得和了解她筆下的英國，他也回應了那些對它作出天才般描寫的人。他對蓋斯凱爾夫人的評價稍差一些，對當時的瓊·里斯也是如此。他認為喬治·艾略特是個天才，但對他來說太無美感和過于意識形態了。為此他遭到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指責，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他當然熟悉布盧姆斯伯里。他娶了德斯蒙德·麥卡錫在布盧姆斯伯里腹地長大的女兒，也參加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聚會。他對團體成員們的機智和不拘小節感到愉快。利頓·斯特拉奇對他有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他認為斯特拉奇是傳記的創始者，因為由斯特拉奇開始，傳記才作為一種與小說并列的有意識的藝術形式；而且在傳記寫作方面，他認為自己是斯特拉奇的弟子。《年輕的墨爾本》和它的續集《M爵士》大概是他最廣為流傳的作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斯特拉奇。使輝格貴族的顯赫世界生機勃勃的因素的部分基礎正在于，塞西爾熟知在戰前他自己的社會世界，可能也由于同樣的原因有點不合時宜，像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描寫的社會一樣。他們兩人的書讀起來都很有趣——斯特拉奇也許會更具諷刺和惡作劇的意味、更殘酷一些，會將事實以漫畫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體裁是相似的：塞西爾更顯生氣勃勃、更和善、更傳統一些。他喜歡帕特里奇夫婦，認為E.M.福斯特聰明、有趣、靈巧，但他不贊同他們的道德觀——它們顯然與他自己的宗教或更應該說是世俗價值觀有沖突。他把福斯特與屠格涅夫相比并不恰當，后者在他看來同樣有天賦（實際上更有天賦），同樣聰明、有洞察力、有人情味，但不如福斯特有抒情的想象力。

他以某種諷刺意味來看待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把它看成一個宗派，一個封閉的、不切實際的小社會，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信條和專家，就像羅馬天主教徒、馬克思主義者或弗洛伊德學派者一樣。但在布盧姆斯伯里團體中，他最欣賞的，而且幾乎不加批判來看待的，當然是弗吉尼亞·伍爾夫。他認為她的小說表現出不可否認的天賦，但對他最具意義的還是她的評論文集《普通讀者》。這些評論文形成了他的理想模式——揭示各式各樣的實際創作過程，類似講授作曲——在他的一生中，他都對這種模式深信不疑并且都在盡力用它來寫作。他把自己對伍爾夫耀眼天賦的感受拿來跟他的終身朋友伊麗莎白·鮑恩分享，后者的小說對他很有吸引力。他認為伊麗莎白·鮑恩，以及他的摯友、小說家L.P.哈特利，以一種對生活品質的敏銳超越了其他的人，而這也是契訶夫在極高程度上所擁有的天賦。相比較于福樓拜極度的憤世嫉俗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無休止的沖突和陰暗面，他更喜歡托爾斯泰——他特別喜歡他那陽光普照的世界——“托爾斯泰確實是世上最聰明的人”，塞西爾這樣評價他。在他看來，人類最寶貴的品質，是自我理解的能力——應該明白什么可以做而什么不可以。就算是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的天才也沒有完全擁有這種能力，而維塔·薩克維爾——韋斯特，以及其他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成員，盡管在文學上有很大影響力，但這種能力一點也沒有。他無比精明、不易被蒙蔽，超脫地將這個文學標準視為消遣，嘲笑這些成員在社會和藝術方面自命不凡（甚至對他的英雄，斯特拉奇和伍爾夫也同樣尖銳），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缺陷。

臨近暮年時他做了很多其他事。他對馬克斯·比爾博姆的一生做了精彩描述（《馬克斯》），就是在臨終之時要遺孀向他求婚的那一位。他還寫了他自己的家庭和家里的房子，最初在20世紀50年代，然后是在他的晚年，1973年。他寫了他的岳父德斯蒙德·麥卡錫；他在1940年編了贊美詩的選集，1935年編了自選集（《圖書館的鏡子》）。他寫了《幻想與夢想》，是關于畫家塞繆爾·帕爾默和伯恩·瓊斯的事情（1969年），且在美國做了關于他們的演講。他對“當代運動”——T.S.艾略特、喬伊斯、溫德姆·劉易斯、埃茲拉·龐德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們——沒什么興趣。新的學派——解構和它的繼承者、形式主義、新弗洛伊德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等——在他看來或者是索然無味的學術習作，或者是神秘主義鼓吹者頭腦中模糊的奧秘。他非常高興，并沒有去揭穿它們。

總之，他是他那個時代最聰慧、最具魅力、最有才華、最令人愉悅、最機敏、最才華橫溢的文學巨匠之一。他埋頭于那些自己喜歡、仰慕和贊賞的事物，以偉大的天賦描寫它們，闡述自己的理由。他快速而準確地看穿了虛偽和哄騙。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具有無可爭辯的魅力、風格和特性，但是缺乏原創性，他雖然寫得很好但他的觀點經常是人們已經熟知的。這個評價不公平。他文筆犀利、批判深刻，勝于更強壯的鈍筆。無論如何，他無疑是眾人愿意結交的最可愛的人物。

# 回憶弗吉尼亞·伍爾夫

我記得那是在1933年，弗吉尼亞·伍爾夫受她的表兄赫伯特·艾伯特·勞倫斯·費希爾之邀到他家過夜，他是新學院的學監。

費希爾夫人告訴我她不是很喜歡弗吉尼亞，認為她有些傲慢。但赫伯特·費希爾就算撇開他們的親密關系，他對她的評價也很高。晚宴設在學監的住所，出席人員除了弗吉尼亞·伍爾夫、主人及費希爾夫人以外，還有約翰·斯帕羅、一個全靈學院的研究員（那就是我）、理查德·克羅斯曼——深受費希爾夫人青睞的人物、C.S.劉易斯——一位不喜歡女性作伴尤其不認可女作家的人，以及一位來自于布雷斯諾學院的典型的老師——他叫艾倫·卡爾，我想他是費希爾家的朋友。弗吉尼亞·伍爾夫是我之前曾經甚至后來一生見過的最美的女士。她看上去極度不安和茫然，她雖沒有被家具絆倒，但卻是很猶豫地走向桌子。我坐在費希爾先生左側，她坐在他的右側。費希爾夫人在克羅斯曼和劉易斯之間，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費希爾的女兒瑪麗·費希爾（現在的本涅特夫人），被她表親的魅力折服了。她和她的朋友雷切爾·沃克也在座。

伍爾夫夫人仍顯緊張，當坐在她旁邊的布雷斯諾學院的紳士向她詢問伍爾夫先生是否會來時，她沒有回答。這顯然可以解釋為倫納德·伍爾夫先生確信費希爾應在某種程度上對虛構1921年愛爾蘭王室警吏團平定愛爾蘭叛亂這件事負責任，所以拒絕與如此惡劣的勞合·喬治內閣成員同處一室。

伍爾夫夫人沉默，主人也沉默。為了打破僵局，他發問：“你平時看書嗎，弗吉尼亞？讀小說嗎？比如司各特。”她回答道：“不，不看，司各特的小說簡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知道戴維·塞西爾剛剛做了關于他的演講，天知道他從他身上找到了些什么，我同樣不喜歡那個演講。”說完之后，又是沉默。

“你散步嗎，弗吉尼亞？”費希爾先生近乎絕望地問。“是的，我散步。在倫敦比較少，大部分是在鄉下。”

“散步時你注意最多的是什么？”

“我大多數時候注意到山上的羊群，它們看起來是那么虔誠。”

與此同時，桌子另一端的人們在高聲談話，在說他們是如何喜歡阿賓漢姆學校（我不能擔保我記憶里的具體用詞沒錯）。

“我喜歡誠實的學校，”克羅斯曼說，“那兒沒有像你們一樣冒充懂得藝術的人，但在我原來待的地方溫徹斯特就有一些，不過并不是很多。伊頓當然就更差些。”我想費希爾夫人一定認同他的觀點。

劉易斯說他發現很難教那些莫德林學院里性格內向的人：“附庸風雅，那很好：本杰明、普賴斯——瓊斯，我感覺他們并沒有真正領會詩歌和散文，現代的和近代的，他們離開的時候我覺得如釋重負。”

他的音調、音量、情緒都使伍爾夫夫人畏縮，費希爾先生趕緊插話。他們開始議論共同認識的人、意大利旅行等話題。我已記不得這位年輕女士說的是什么了。隨后我們來到畫室，在那兒聚集了至少四五十個來自新學院的在讀的或已畢業的大學生，他們被認為適合前來拜見這位大作家。

她站在學生面前，沉默而緊張，凝視著遠處的某個地方，遲遲不說話——那簡直有些像是一次處決或者像個非常害羞的主教準備確認一班的男生或大學生。最后她終于開口了。

“有誰讀過《簡愛》？”她問道，眼睛先是看著屋頂，然后是窗戶，試圖不看學生們的臉。

一位男生舉起了手。“能講講情節嗎？”伍爾夫夫人問。

男生盡量講了，用了十分鐘或更長的時間。

“那有人讀過《呼嘯山莊》嗎？”

同樣的過程重復著。

“那《月亮寶石》呢？”也有人讀過。

“你們喜歡偵探小說嗎？”答案五花八門。之后她看起來是完全沒有主意了，說道：“對不起，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讓我們放松自然點。”之后我們照做了。

將近晚上十點鐘，費希爾夫人宣布她要去睡覺，但愿意留下的客人盡管留下。費希爾先生問伍爾夫夫人她否喜歡韓德爾、莫扎特、海頓、貝多芬。她說都喜歡——“你的愛好真是廣泛，”他說道。之后我們分成了幾個小組，她和兩三位年輕女士在一個角落里親切交談，也許她的表親瑪麗也在那里。后來我們就都去睡覺了。

過了很久，我想是在1938年，伍爾夫夫人邀請我到她在泰維斯托克廣場的家中用晚餐。她在明信片上寫道：“若你敲響我灰色的小門，我會打開它。”

到場的除我之外，就只有倫納德、本·尼科爾森和薩莉·格雷夫斯。她是羅伯特·格雷夫斯的侄女，婚后變成奇爾弗夫人，后來成為牛津瑪格麗特夫人學院的院長。伍爾夫夫人明顯對她很熱情，而且還盤問她年輕人之間是否有自由的戀愛：有女同性戀之說嗎（是奇爾弗夫人告訴我的）？還有類似的問題。我倒認為她也同樣盤問過她侄女——她有種對當時的英國知之甚少的感覺。

伍爾夫夫人開始描述皇家公主到鄧肯·格蘭特的畫室的一次拜訪——我想應該是碧翠絲公主，并講到那次拜訪多么令人高興。倫納德用他顫抖的雙手摸索著點燃了氣爐，說道：“我真不明白你為什么這么想。皇室成員與大家一樣，他們與普通人并沒什么不同。”“你大錯了，倫納德，”她說，“他們的確不同，相當美好和奇妙，根本就不像普通人！我在那個場合非常激動，一點也不為此覺得難為情。”說完后她轉向本·尼科爾森——總有某個人是伍爾夫夫人明顯喜歡捉弄的。她說道：“本（他是英鎊的副主管），告訴我們你進白金漢宮或溫莎城堡時穿正裝褲子嗎？你鞠躬鞠得很低嗎？你下跪嗎？你在皇室和你說話前開口嗎？你問問題嗎？你離開國王時退著出來嗎？”等等。

本盡可能地回答了她的問題，神情嚴肅，不過最后他終于爆發了，說道：“弗吉尼亞，你總是捉弄我。我永遠也忘不了你問可憐的休·沃波爾他的車是否鑲著金邊？”

然后她轉向我：“你進來時拿的是什么書？我看見了。”

我說那是亨利·詹姆斯關于霍桑的書。

“我想你是神經不正常了吧，伯林先生？我看你并不像喜歡做夢或幻想的人，你是這樣嗎？”

我記不清當時是怎么回答的，我希望那時我含混地逃脫了那種窘境。她談到了神魔的存在。雖然我沒法重復她的談話，但那的確充滿了美妙的想象和類比，聽起來比我所遇到的任何人的談話都要吸引人。而帕斯捷爾納克是唯一相似的人。

“亨利·詹姆斯，”她說，“當然，現在大家都讀他的書，但當我遇到他時，他只是一個冷酷的老怪物。我沒有讀很多現代小說，甚至那些我和倫納德出版的也沒讀。我們出版了那本斯蒂芬·斯彭德說寫得非常好的勞倫斯的小說《在某省》。我認為寫得相當得體，但精彩嗎？不。你讀過或者看到過《大教堂謀殺案》嗎？我倒更喜歡它。”

“我讀到一半時就停下了，我受不了它，”倫納德說，“托馬斯·艾略特真是蒙人，都是些宗教的荒謬。”

我記不得太多，但和這個不是很有同情心，也不是很和善但非常出色的天才作家一起，我度過了在我生命中非常有意義的三個小時。我現在仍這么看待她，當我重讀她中期的作品時，我就更認為她是天才。

# 埃德蒙·威爾遜在牛津

我第一次見到埃德蒙·威爾遜，我想是在1946年早春的某個時候，從莫斯科回來結束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華盛頓待過，我的朋友俄國作家尼古拉斯·納博科夫和他的表兄弗拉基米爾都是威爾遜的朋友，納博科夫猜想威爾遜也許愿意結識我（我曾說過我非常欣賞《阿克瑟爾的城堡》和《三重思想家》），愿意跟我談談俄國文學和其他話題。但威爾遜拒絕見我。他斷定希望見他的英國官員全都為了將他拉入英國的宣傳機器。他是個敏感的孤立主義者：他認為英國再一次試圖將美國拖入一場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戰爭中，這加劇了他本來就很強烈的仇英心理，因此他不愿意見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代表。但是，當戰爭結束后，他顯然覺得自己被拐騙去支持英國行動的危險已經消除，于是就邀請我在紐約的普林斯頓俱樂部共進午餐。

我當時被他的樣子嚇了一跳。我不知道我想象中的著名文學評論家會長什么樣子，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粗壯、紅臉、大腹便便的人，外表跟胡佛總統有點像。但是他一開口講話，差不多在我們入座之前，我就把除他談話以外的東西全忘了。他講話的聲音有些古怪，像是被憋住似的，句子斷斷續續，似乎思想在內部擠壓著、顛簸著，爭先恐后地要跑出來，形成了短促爆發和斷音，點綴著溫和、低沉、連唱般的敘述。他以一種動人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來談論他那一代的美國作家，談論但丁，也談論俄國詩人普希金對他的意義。他講述了1935年對蘇聯的訪問，以及這次訪問對他的驚人影響，因為，跟許多其他美國知識界人士一樣，他曾經將共產主義政權理想化。

他那次訪問的高潮部分是他與D.S.米爾斯基的會面。米爾斯基是一個在俄國文學領域用英語寫作的極富創造力的出色作家，他在英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他后來回到俄國，并很快出版了一本書抨擊英國作家和知識界人士，其中有一些還曾是他的朋友。威爾遜發現他在莫斯科處于非常可憐和不幸的境況中（兩年后他被捕，待在監獄里直到去世）。米爾斯基的潦倒和可憐的處境給威爾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痛苦地談了很久他自己政治迷戀的消逝。然后他概括地談論俄國文學，特別是契訶夫和果戈理，以及我所聽過的其他任何人談論的任何文學話題。我徹底被他迷住了，我為能夠認識這位極具天賦又有良好道德的人感到很榮幸，并與他成了朋友。直到1949年我才又回到美國，在哈佛大學任教，并于那一年在威爾遜和妻子埃琳娜位于韋爾弗利特的居所里，與他度過了一個晚上。在20世紀50年代，我曾多次去看望他們倆。

他1954年來到英國，在機場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想去牛津并在那里跟我待上一兩天。我表示歡迎。我當時尚未結婚，一直住在全靈學院。威爾遜在一個不是特別好的學院宿舍（他在他的日記[68](#_68_11)中用很尖銳的話描述了這一點）里跟我待了兩個晚上。他顯然還處在仇英情緒中。第一天上午，在午餐前，我們走著去參觀牛津的學院。當我們路過基督教堂學院時，他看著圖書館——那個有些破舊的建筑（它還沒有翻新，后來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重新裝修了），說：“哦，大多數建筑看起來都很糟糕，我看它們都快倒了。”而他看起來很高興。“我認為在英國有很多事情都跟這些建筑一樣，”他繼續說道，“我想你的國家需要倒下一些東西。”

然后他開始了長時間的對學術生活和學者們的總體批判，認為他們是（經典的、中世紀的和現代的）文學和藝術中生動而真實的東西的謀殺者。我問他是否沒有學者是他喜歡或欣賞的。他說還是有一些的：其中一個是他在普林斯頓的老師，叫克里斯蒂安·高斯，他很欣賞他的課和他本人；另一個是諾曼·肯普·史密斯，他曾是普林斯頓的哲學教授，現在已退休居住在蘇格蘭。（威爾遜曾在1945年訪問英國時去看望過他，他對英國的訪問在《導游書以外的歐洲》中的英國部分能夠找到。）除了這兩個，他短時間內想不起來還有其他人。

他繼續譴責（我不知道這是牛津誘發的負面情緒，還是他一貫的態度）：他認為沒有比在大學里工作更糟糕的事情了，特別是如果這份工作跟文學研究有關的話。他聽說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正謀求成為或已經成為某個學校的教授，是哈佛吧？這簡直是笨蛋才想要的（我曾經讀過威爾遜的令人難忘的滑稽模仿文《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的雞蛋卷》，知道這個詩人不是他所喜歡的）。然后是哈佛可笑的泰德·斯賓塞，斯賓塞想找到他，但在還沒有搭上線之前就死去了；還有斯賓塞的門生哈里·列文，那是一個聰明人，閱讀廣泛，總有很多有趣的事可講，威爾遜認為他要是沒有選擇在哈佛教書，是會成為一個人物的，但哈佛將他變成了一個埋首瑣事的學究式教師、一個枯燥無味的學者，將什么事都變得瑣細乏味。“哦，但是我無法解釋這件事，”他說，“我跟他講過豪威爾斯，但他完全不認為豪威爾斯有什么好的。”他繼續說，盡管如此，哈里·列文不算很差勁，他也許感覺敏銳，也很有趣，但在豪威爾斯這件事上是可笑的。在我印象中，威爾遜和列文是朋友（事實上我感覺他們肯定是），我被他說列文的這些話嚇了一跳。我很欣賞列文，認為他關于司湯達的文章是篇杰作。但他好不收斂。他的下一個目標是佩里·米勒；然后是C.S.劉易斯；他毫不留情地說個沒完。也許丁尼生在談論丘頓·科林斯并稱其為文學圈的寄生蟲時，也用過這種方式。我想不出理由他不會以相似的方式來談論我，這顯然就是他的一部分。我喜歡他的本色。

他問我是否在午餐或晚餐時會見到更多的牛津學者。我跟他說午餐時不用擔心，客人是斯蒂芬·斯彭德和另一個文學界人士（我記不得是誰了）。但如果他想在全靈學院進晚餐的話，他應該會碰到更多學者。我問他是否想在飯店里吃晚餐？他說，不，他想看看瀕死的英國學術界到底有多么陳舊、腐朽和保守。我記得他的原話。“從現在開始不會太久了，”他預言，“我想我們現在就在這條道上了。”我沒有請他展開這個話題，而是盡力將他引到別的話題上。但沒用。他繼續說，在英國、在倫敦，作家及文學圈的其他一些人形成了多個派系，各派系里的人相互戒備，都在設法把別人擠出去；這里沒有真正的文學圈子；伊夫林·沃跟彼得·昆內爾（一個舉止得體大方的作家）水火不相容；他們都在說西里爾·康諾利的壞話；奧登則被完全孤立了；沒有人為麥克尼斯或安格斯?威爾遜說一句好話，等等。在我看來，這些看法大多很荒謬。為了讓他不再繼續談這個話題，我問他——后來證明這個問題很不明智——他上一次訪問英國的情況怎么樣。但那時已到午餐時間了，我們就沒有繼續談論下去。他看起來挺喜歡這些客人，他批評了《黨派評論》的作家們，說菲利普·拉夫雖然很有才能，但卻用文學手法來表達政治觀點，其他作家也是這樣；他贊揚了普里契特，說他是少數思想自由且言之有物的評論家之一。

午餐過后他記起我先前的問題，跟我談論了他前一次訪問倫敦時發生的事情。當時他是以一個類似戰地記者的身份來到這里的，英國情報部安排官員哈米什·漢密爾頓（知名的出版人，也是半個美國人）陪同他。漢密爾頓組織了一次英國文學精英的聚餐。威爾遜在晚會上看到了T.S.艾略特、西特韋爾三姐弟中的一兩個人、西里爾·康諾利、西格弗里德·薩松、哈羅德·尼科爾森、彼得·昆內爾，我想還有羅莎蒙德·萊曼。他不想跟他們中的任何人說話。“T.S.艾略特，”他說，“是個很有才華的詩人，但他某些地方卻像個惡棍。雖不常見，但我看到他時沒法跟他待在一起。我不想見到他，雖然我認為他的一些詩作寫得非常好，很吸引我，但僅是他的詩而已。”他認為西特韋爾姐弟無趣而把他們打發走了。在那里，他唯一可以與之說話的人是坎普頓·麥肯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和戰時，他們之前交流過生活中的故事——他認為這個老冒險家的外表、舉止和談話都相當迷人。

我逐漸明白過來，威爾遜在某種意義上屬于上一代文學界，而非現在的英國文學界。他喜歡的那些人都是愛德華時代的，是一些身強體健、具有男子氣概、雖有時顯得粗糙（甚至有點缺乏教養）卻充滿活力的文學家——而這正是坎普頓·麥肯齊所屬于的那一類人。德斯蒙德·麥卡錫曾跟戴維·塞西爾和我描述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參加過的一次宴會——那是在一個叫“改革”（也許那時叫“旅行者”）的倫敦俱樂部舉辦的典型晚宴。在場的人有魯德亞德·吉卜林、H.G.威爾斯、馬克斯·比爾博姆、希萊爾·貝洛克、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阿諾德·本涅特、蕭伯納，還有亨利·詹姆斯和年輕的休·沃波爾。宴會中的談話不涉及文學或藝術、友誼、自然、道德、人際關系、死亡——這些是布魯姆斯伯里團體談的話題。他們完全不談論任何模糊的、有關審美的話題。談話很熱烈，他們講貴族、出版商、桃色事件、愚蠢的冒險行為、社會丑聞以及名人軼事等等，夾雜著很多笑聲、雙關語、打油詩、相互沖撞，以及有關錢、女人和外國人的笑話，還會喝很多酒。那里的氣氛是一種活躍、幽默、有點粗俗的朋友們聚在一起的男性俱樂部的氛圍。他們是當時最著名的作家，布魯姆斯伯里的人根本不喜歡也不欣賞這些人，認為他們是“瞎子領路者”。我認為，埃德蒙·威爾遜，就他準確無誤的品質感和道德的執著來說，跟這些大師們很相似。我不認為他會喜歡跟弗吉尼亞·伍爾夫喝茶，或與利頓·斯特拉奇共度一個夜晚。

因此，在倫敦的文學聚會完全不適合他。在跟E.M.福斯特敷衍了幾句關于簡·奧斯汀的話之后，他跟哈米什·漢密爾頓說他想盡快離開。于是他在跟坎普頓·麥肯齊聊天之后很快就離開了，這讓某些受邀請的人很失望（漢密爾頓后來這么跟我說）。他所想做的只是去蘇格蘭看望他的導師——肯普·史密斯。哈米什·漢密爾頓，也許從來沒聽說過這位康德學派的學者，盡他所能安排了去蘇格蘭的旅行。威爾遜確實去看望了導師，告訴我他們在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共同回顧了曾經在一起的快樂日子，談論了歐洲學術標準下降的情況。然后他返回倫敦，并在車站見了周到而不知疲倦的漢密爾頓，他勸威爾遜坐出租車回酒店。那是晚上了，威爾遜確信（他是這么告訴我的）漢密爾頓的主要焦慮是不想讓他看到倫敦街上數量眾多的妓女（這是別人跟他說的）。他盡量躲開漢密爾頓，從那時開始漢密爾頓就成為了那些他強烈、毫無道理地不喜歡的人之一（就這一點漢密爾頓回應了他；他在后來見到我時跟我說，威爾遜是他所見過的最讓人討厭和最難以相處的人之一）。威爾遜確實坐進了出租車，但五分鐘后就下車了，然后確實在街上特別是在公園路上走了走，并確實看到了妓女。他覺得他已經把那些被送過來陪同他的官員打敗了，他認為他們跟俄國秘密警察一個樣。

我盡量勸解他，說哈米什·漢密爾頓想做的是表達某種禮節，這里的文化認為那是他的責任。威爾遜一點也不這么想：他認為漢密爾頓肯定是試圖在倫敦誤導他，阻止他見那些不適合的、但他實際上很可能想見的人。這個想法——他認為在英格蘭有一個大陰謀，類似蘇聯，不讓他見不適宜的人——使他很惱火。我問他是否不喜歡在倫敦見到的每個文學界人士。他說：“不，我最喜歡伊夫林·沃和西里爾·康諾利。”為什么？“因為我認為他們是如此可惡。”這也許指的是后來的見面，因為我不知道伊夫林·沃戰時是否在倫敦，那時他在軍隊服役。他也喜歡安格斯·威爾遜，認為這是一個像美國人一樣真心實意的人，讓人感覺輕松。唯美主義、謹小慎微、傲慢自大、派系分割、單薄、尖聲尖調、毫無生氣、在生活和文學中過于關注自己的情感——他（不亞于戴維·赫伯特·勞倫斯）認為這都是布魯姆斯伯里的特性——這些都讓他很不舒服。他認為整個英國文學界都有這些毛病。我不知道他會怎么說約翰·博因頓·普里斯特利——我認為，普里斯特利也許屬于他所認為的布魯姆斯伯里這類學者。他不能忍受赫胥黎·奧爾德斯或朱利安的思想。

夜晚降臨，我們到全靈學院公共餐廳用晚餐。用餐時他的一邊坐著我，另一邊坐著全靈學院高級研究員、歷史學家A.L.羅斯。雖然羅斯想跟他說話，但他幾乎不跟羅斯搭腔。他突兀地轉向我，跟我談起我們在美國的共同朋友——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和他的妻子、尼古拉斯·納博科夫和他的妻子們、劇作家山姆·貝爾曼、瑪麗·麥卡錫（威爾遜娶了她）、康拉德·艾肯、阿瑟·施萊辛格、賈奇·勒尼德·漢德等等。然后他不情愿地轉向另一邊，聽羅斯說話，只作“嗯”、“哦”之類的回應。喝完咖啡，我們回到我的房間，他抱怨晚餐時羅斯滔滔不絕地對他進行英國民族主義宣傳，而他不想在牛津受文化沙文主義的影響。我想后來當羅斯到美國訪問并見到他時，他們也許相處得要好一些——但他這次處于一種抱怨的情緒中，而且根本不想停下來。

他又講到這次“虛偽的盛宴”——他說他知道全靈學院的侍者為什么會這么快撤走盤子，快得他一盤食物都沒吃完過，那是因為他們都有階級意識，仇恨主人，服務時就盡可能態度粗魯，希望盡快從他們憎恨的位置上離開。他說，他注意到，階級意識在那棟古老的大樓里非常猖獗。我沒有同他爭論——我想，跟其他問題一樣，他在這一點上也對自己的想法極為確定。當然，他所說的顯然是一派胡言。大多數侍者當時是（也許現在仍是）當地最保守的居民；他們是古老的學院傳統的忠實繼承者，是老派的仆從（如果曾有的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當然是在那個時候——拒絕加入工會，因為這是對他們所認為的自己的地位和特別職責的侮辱。

顯然，威爾遜那天——跟其他很多天一樣——一直很生氣，特別是接觸或談到有關英國的問題時。雖然我很喜歡他，一生始終對他懷有欣賞和尊敬之情，并對我們的友誼一直感到驕傲，但是我也知道，一旦他開始說話，跟他爭論就是沒用的。晚餐過后，我邀請了我的同事戴維·塞西爾、小說家艾麗絲·默多克及她的評論家丈夫約翰·貝利、哲學家斯圖爾特·漢普希爾跟他一起見面聊天。那不是一個愉快的晚上。他與屋里的每個人作對。他把貝利錯認為了評論家漢弗萊·豪斯（他也許跟豪斯相處得還不錯），幾乎不搭理貝利等人。他變得無精打采，對他人的話以“哼”、“嗯”、“哦”作答，高興時呵呵兩聲，喝了很多威士忌，用厭惡的眼神看著大家。雖然非常禮貌和善意的艾麗絲盡量讓談話進行下去，有趣的談話者約翰·貝利也在盡力，但這只老熊還是躲在他的洞穴里，時不時惡意地瞪著他人，以喝酒來打發自己的無聊時光。于是這個晚上早早地結束了。在快結束的時候，他說了一些沒什么意思的話——跟文學打交道的貴族是無能的，牧師都是臉色蒼白的教士——跟所有的話題都搭不上邊。我想我為什么沒能邀請少數很有膽量的學者中的一位，比如阿蘭·約翰·珀西瓦爾·泰勒（他希望見到泰勒，因為他喜歡泰勒的激烈論戰）？我說我認識并喜歡泰勒，盡管我們之間有一些冷談，因為他對我剛出版的一本書寫了一篇表示輕蔑的評論，但我還是樂意給他們安排一次見面——我在第二天就這么做了。

泰勒對我們都很友善。威爾遜說他對在泰勒的莫德林學院房間里的會面感到很愉快。但之后泰勒帶他去聽史蒂文·倫西曼關于拜占庭的演講，那讓他感到很厭煩；他又一次聽到了布魯姆斯伯里那種過度講究的、在他看來非常壓抑又有些尖銳和單薄的聲音，他難以忍受（我真不知道他到底聽了多少）那種聲音。我也為他安排了與猶太歷史學家塞西爾·羅斯的會面，因為那時他對猶太歷史很感興趣，并正在學習希伯來語——這是在他的書《死海古卷》出版前不久。會面進行得很好，特別是我之前提醒他羅斯雖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很有見地的研究古物的人，但他卻有些讓人討厭。這些溫和的、有點貶義的詞已經足以讓威爾遜喜歡上他了。他嘀咕著說，他被人們（就是在說我）阻止與自己欣賞的人見面，因為那些人就是想要“黑”他們——想的越多，就越偏執。

他一旦形成了社會和心理上的假設，就會特別倔強地一直認定這個假設，而不顧所有證據。他告訴我，在英國他所真正想見的人，除了他的老朋友西爾維斯特·蓋茨（他很多年前在哈佛就認識他了），還有康諾利（又是因為康諾利說話時是如此懷有惡意）、泰勒、羅斯和安格斯·威爾遜。其他人都讓他厭煩。“坎普頓·麥肯齊呢？肯普·史密斯呢？”“是的，他們也不錯，但這已經是全部了。”他說，他最討厭的英國人是溫斯頓·丘吉爾，他只是一個典型的低等的美國新聞記者。如果不是因為西爾維斯特·蓋茨和我，他是不會到英國來的。牛津不是還有一個可笑的、趾高氣昂的叫莫里斯·鮑拉的家伙——他與蓋茨一起見過威爾遜，這個人壓根兒就不明白什么是文學？很明顯，鮑拉熱愛文學——遺憾的是，威爾遜完全沒有興趣去談論這個東西。他推想鮑拉是我的朋友：這是怎么回事啊？鮑拉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是空洞無聊的，他就是經常喊叫。他不能理解像西里爾·康諾利和伊夫林·沃這樣的作家怎么會被說成受惠于這個夸張的門外漢——他們至少很有才能，而鮑拉就是一個滑稽的“英國佬”。他的嘲諷還在繼續。這時他已經醉了，眼睛快閉上了。我費了好大勁兒才讓他回到他的臥室里去。

第二天，他很安靜、很紳士。我們談論了俄國作家，談了他在泰科特威樂的生活——他勸我跟他一塊兒去那里，他談了希伯來的緊張局勢和匈牙利語的結構（他打算學這門語言），談了他對W.H.奧登的詩的極度欣賞，談了《紐約客》在美國文化生活中的有趣位置，還談了歐洲人對美國文化、對像沃爾特·惠特曼那樣的大詩人和赫爾曼·梅爾維爾、亨利·詹姆斯那樣的作家的怪異且傲氣十足的態度（不只是可憎的英國人，還有法國人甚至意大利人都這樣）——這些文學家其實是得到認可的，但在他看來，他們是美國人的事實總是被搪塞掉或使人感到遺憾。但美國會讓他們看到美國的成就。美國涌現出了一代優秀的年輕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他們自信、富有才干、頭腦清晰、整潔、穿著精干工服（我記得這個怪怪的描繪），是精良設備的發明者；這些人在創建一個新的、有獨創性的、高度現實的文明，這種文明適應了目前人類的需求，將會為人類開創更加令人驚嘆的、更為舒適的生活，而這將會取代迅速衰落的、狹隘、自高自大、骯臟的歐洲文化。不過，比起前一天來，他的怪念頭要溫和得多，也少得多。當時威爾遜心情要平靜和愉快些，他非常放松。他解釋說，他的生活就是（而且總是）文學和作家，音樂[69](#_69_11)甚至美術都不甚被提及，雖然它們確實非常重要：馬爾羅在雕塑上極具才華。俄國大師們對他在生活和藝術上（還有其他對他來說重要的東西，比如政治等）的思想影響是最大的。普希金開始比莎士比亞更能打動他，但還是比不上但丁；奧威爾寫的有關《李爾王》、托爾斯泰的東西完全是胡說八道。他說在倫敦和牛津見到“內八字”的那些人后，他就更討厭英國人了。他問我是否認識他的朋友詹森·愛潑斯坦。他說他自己夠憤世嫉俗了，但愛潑斯坦更甚——對人類懷著驚人的厭惡。他喜歡愛潑斯坦，也喜歡他的這個特點。

之后他就離開了。他的來訪說不上是一次成功的訪問。盡管如此，他后來還是與妻子埃琳娜一起回到牛津，并與我們夫婦待了兩三天（那時我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小心地不邀請牛津學者們來見他，不管他們對他有多么熱切和欣賞。而我更喜歡在波士頓、倫敦和紐約跟他見面。

在我眼里，他是一個偉大的評論家，一個高貴、令人感動的人，我喜歡他、尊敬他，希望他對我有一個好的評價。在他去世前不久，在他韋爾弗利特的房子的窗戶上，他讓我用鉆石題寫《圣經》中的一句話，那是他為朋友們保留的特權，這令我非常感動。我選的那句話來自以賽亞的一首詩。他堅持認為，我顯然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就是以賽亞——這又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幻想。他的這個想法非常頑固，正如他頑固地認為我描寫托爾斯泰的唯一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是一只想變成刺猬的狐貍，而且確實相信自己能成為一只刺猬。對這個荒謬的說法，我未說半個不字，這也未給他留下絲毫印象。他的看法是，我“像所有的猶太人”一樣，追求團結和形而上學的有機完整世界。我的實際想法恰恰相反。他內心世界的觀念抗拒所有的外部證據。他時而激烈地狂想，時而荒謬地猜想，時而無理地愛憎。在很多地方，我和他的偏見是基本一致的，這是我對他產生深切同情和善意的理由，也正是將我們聯系在一起的最重要原因。

他經常做出古怪判斷、得出荒謬結論，但他是一個完全正直的人道主義者。當他突然改變話題時，談話可能隨處結束。我認為他在《紐約客》雜志上關于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的評論，是所有語言中寫得最好、最容易理解的；但在后來的一篇文章里，他對該小說中各種各樣的名字和象征的看法，卻是相當古怪的。[70](#_70_11)他盡力將自己對異己文化的深刻見地和奇特想象，與洶涌的偏見、仇恨和大量的胡言亂語攪合起來；有時他離題萬里，根本沒有擊中目標；然而他的大多數指責都言之有理。他是約翰遜、圣佩夫、別林斯基、馬修·阿諾德傳統的最后一位重要評論家。他的目標和實踐是為了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和文化框架中考察文學作品——這個框架包含著對作者人格、目標、社會和個人根源，周圍的道德、知識和政治環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質等方面的專注、犀利、直截了當、發人沉思的觀點——也是為了將作者、作品及其復雜的背景呈現為一個錯綜的整體。在訪問中他告訴我，現代的趨勢是追求純粹的文學成就，經常故意對作者所處的生活和社會環境視而不見，對他來說這缺少一切真實的內容。我熱切贊同他的看法。對他來說，藝術散發著光芒，但不僅是通過它自身的光線。他人是走了，但并沒有離開他的伙伴們。

# 奧伯倫·赫伯特

1946年早春，我還是一名政府職員，曾有機會到巴黎，作為來自英國大使館的客人在那兒待了一段時間。當時，大使館由極其好客的達夫和戴安娜·庫珀主持。在巴黎最后一夜的晚宴上，我發現對面坐著一名身穿制服的官員，他的金屬肩章表明他是一名波蘭軍人。他個子高，身體結實，有著一副優雅的羅馬人的胸膛和頭顱，看起來（如某人描述的那樣）像是溫和的尼祿皇帝。在我看來，作為一個波蘭人（這是我的推斷），他的英語發音非常純正，詞匯豐富而富于想象力。我問他一些諸如曾在何處服過役的問題，這引發他以往昔更莊嚴的世界的風格，滔滔不絕地開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憶。雖然我自己遠非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這一次，傾聽著我也很滿足了。他生動鮮活、有些正式而又富于感染力的講述，如山洪般奔涌，會帶走擋在前面的任何東西。雖然偶爾會由于其他客人的提問或插話而偏離方向，但都只是暫時的，講述的激流總是會回歸原路，沖開或是繞過前進方向上的任何障礙，直到全部講完他的戰時歷險記。

我非常高興他在晚宴后繼續與我交談。就像“婚禮客人”一樣，我被這個陌生又顯然富有才干的波蘭人挽留下來，在主人已上床休息后很久，他還一杯接一杯地與我對飲。我最后終于找到理由向我的臥室走去，為了能睡上幾個小時，汽車早上五點就要來接我去布倫。可這沒成功。我的新朋友一直跟在我后面，他坐到我的床邊，繼續談論起來。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有些過分，可我并沒有這種感覺。我認為這是一個奇特但卻讓人愉快的經歷。

通過這一次接觸，我知道他就是奧伯倫·赫伯特，也了解到在他懂事前他的父親就已去世，他非常愛自己的母親和姐妹們。因為體檢不合格，他被自己國家的軍隊拒絕入伍，所以就參加了波蘭軍隊。我也了解到，就在不久前，他還差點在與加拿大士兵的摩擦中喪命。他有著驚人的語言天賦，除了會波蘭語、烏克蘭語、荷蘭語，還會法語、德語，以及一點俄語（這足以表明他對這個國家體制的極端不滿）和一些捷克語；當然，還能說意大利語，畢竟他曾在他家位于波多菲諾的房子里待過好多個月。他也掌握了一些熱那亞語和普羅旺斯語。我們發現彼此有許多共同的熟人，他準備逐個進行一番辛辣尖刻的簡單描述。他用很多地方傳統統治階層的古老標準來判斷這些人，比如他們是否有勇氣，道德和才智是否突出，是否品格高尚，是否慷慨大方，是否具有個性美，是否擁有個人魅力和良好教養，最重要的是，是否具有正確的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他以精細而夸張的言語和表情，自信、直接、堅定地使用這些判斷標準。我發現，他針對我們這些共同的朋友和熟人的判斷，常與我的判斷大相徑庭。他非常謙恭地聽我的解釋，但卻沒有太在意：顯然，他所認識的每個人，都在他以自己極強的想象力所構建出來的協調的、色彩生動的世界中，有著各自的位置。但他的這個世界，有時在我看來，卻與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知的現實世界有一定距離。

這次偶然的碰面讓我們熟識了對方，并且萌生了友誼。我們偶爾在倫敦和牛津碰面。有時，他想邀請我（那時我還是單身）去皮克斯頓，但總是由于有事阻撓而難以成行。從我們第一次在巴黎會面，十年過去了。我于1956年結了婚，就在那年九月份，我夫人和我以及一些朋友一起來到波多菲諾。在那里，我們常去看瑪麗·赫伯特和奧伯倫，他們對我們所有人都很熱情周到，我們也非常高興與他們在一起。比在英國更甚，在波多菲諾，奧伯倫堂吉訶德式的一面表現得無比明顯。他有著高貴的靈魂，對道德苛求，毫無畏懼地堅持著他對高尚的騎士品質及可以使它們發揚光大的秩序的推崇，盡管這些品質就像他自己一樣為現代社會所排斥，但他卻從這想象中的舊世界找到了避難所，在這里，他主張的社會、道德和宗教規約都可以得到應用推廣。就像堂吉訶德一樣，他超越了所有事情，用那已經過時的概念來說，是一個紳士。他與自私、卑鄙、瑣碎、投機取巧等被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稱為“低級行為”的東西完全扯不上任何關系。在我看來，他對自己以極度個性化的方式支持的被壓迫者的事業懷有強烈的感情，這主要源于他那與自己俠義本能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宗教信仰。堂吉訶德也許沒有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是在一個平凡的社會中，他的一生就是對基督精神的極端崇信。堂吉訶德和奧伯倫都不是現實主義者。然而，當一個人說“恐怕我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通常的意思不過是打算撒謊或是作出卑鄙的事情而已。奧伯倫與這種事情相距十萬八千里。那些在他看來顯得古怪、有時還可笑的事情，源于他無法對自己難以完全愉快生活于其中的時代或是地方的獨特“現實”價值作出讓步。

這一點在波多菲諾體現得非常明顯。在利古里亞海岸的這部分居民不具有夸張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們冷漠、現實，不會有過度的情感，并且只關注眼前利益，在這方面超過了意大利其他省份的居民。在某種意義上，奧伯倫非常清楚這一點，他也經常就此談笑，但他對生活在一個理想社會的嗜好使他去放大這個度假勝地的居民們的一些小陰謀，以及自己與鄰近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把它們描述為極端的仇視或完美的聯盟。這種結果，如同斯科特、曼佐尼、瑪麗·雷諾作品中描寫的世界一樣，或有時甚至源于J.R.R.托爾金的想象，奧伯倫非常沉迷于這位作家的作品。這么做，他就可以坦然地生活，而沒有太多的道德煩惱。他對生活的看法充滿了（圍繞教皇寶座的）陰謀與反陰謀、邪惡的政治團體、秘密聯盟和人們（這些人有時忙于波多菲諾或熱那亞或羅馬的地方利益）的秘密行動，或是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或金融詭計——這些詭計讓無情、邪惡的人引誘無辜者，導致他們毀滅。無論如何，就沖著利古里亞當地人的伎倆，他相信自己無論如何都有能力看穿甚至挫敗這些詭計，以維護他自己或其他好人的利益。

所有這些，他都是帶著極大的歡愉、想象，有時是讓人迷惑的傳奇說法來講述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聽完的），同時也帶著對其不完全的現實性的突如其來的半吊子覺悟。在我看來，在（激勵他一些“繁忙”活動的）幻想之后，接下來他會清醒地認識到，他描述給自己和他人的這個世界也許并不完全像他所堅持認為的那個樣子。他的世界里充滿了大量為信念而犧牲的英雄和烈士，當然還有他熱忱幫助的那些受壓迫的人，包括波蘭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我不知道這些運動的成員究竟是怎樣看待他的，但看到有人如此熱心、大公無私地愿意為自己服務，他們應該感到幸運，何況他還動員來了好多自己的朋友。這些朋友雖然困惑，但對他絕對忠誠——忠誠得不去思考，只是追隨，從而被他裹進各種各樣的不太可能出現的困境當中，或在公眾場所，或在陌生之地，追求一些往往是烏托邦式的目標。

奧伯倫不但心靈純潔，慷慨大方，行為可敬，耽于奇妙的切斯特頓式幻想，而且非常熱心、道德感強，對朋友的思想和命運、感情、情緒、歡樂和不幸等總能迅速反應。他的政治信念是如此堅定和富有激情，以至于對贊成《雅爾塔協定》的人，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愉快地與之談話；他認為那些容忍鐵幕東邊極權政體的人不是傻子就是惡棍，因而不愿搭理他們，但對友誼的訴求甚至超越了這些阻礙。雖然他在政治上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黑白分明，但這從未蒙蔽他的雙眼，他能看清所遇到并逐漸認識的人們的本性。無論所遇之人政治或宗教觀念多么可悲，他通常都能認同他們的誠實、善良和心靈的純潔。但是，他有時也會被騙，并且他的信任也會遭到背叛，尤其是那些他幫助過的人，不止一次無恥地壓榨他或不懷好意地指使他。可他竟沒怨恨，也沒有心生憤恨。他完全與怨恨或是惡意這些東西扯不上關系。但是，如果我的話容易讓人想到一個孤僻的夢想家的性格——只顧自己、遠離塵世、只生活在自己所幻想的封建中世紀里，那么我就難以描述奧伯倫的真正形象。他絕對不是道貌岸然或假裝正經、高尚但缺乏幽默感的人，而且他與這個世界并不是對立的。與堂吉訶德不同，他對于不協調以及實際上荒謬可笑的事物，即便在他騎士般的游俠行為中，也保持著敏銳的感知。他很清楚自己競選議員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對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活動進行了娛樂般的、自貶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他明白，對于自己所支持的波蘭和烏克蘭團體，他能做的很少；并且他周圍的許多人，也并不像他對自己和他人宣稱的那樣值得支持；他也知道，整個事業雖然在道義上很偉大，但在這個世界上嚴肅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其基礎并不牢靠。

也許，正是這種浪漫特質，讓他傾力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向這個世界索要它無法給予的東西，從而達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也讓他諷刺性地保持清醒，認識到這些訴求很難真正實現。而這種對現實的清醒認識，使得當他察覺到其他人（包括他所喜歡和尊敬的人）對他的宣傳充耳不聞，或是把他看成政治上的低能者時，他都不會動搖或被激怒，無論他們個人是否喜歡他，或是否被他所堅持的正直感動。他準備好了看輕自己的努力，同時堅持努力。他想象中的那個世界，是他如此激動、如此英勇和痛苦地生活過的半封建的、懷舊的、歷史上的浪漫世界，這已成為他的第二本性；他雖有敏銳的自我意識，能夠承受現實打破夢想的痛苦，但這也許已成為他的基本特點和天性。

他富有天賦，舉止文雅，有著良好的教養，在憎恨所有事情上采取妥協和中庸的態度。他強烈反對功利主義者，那些人不但極端追求個人利益，而且蔑視不像他們那樣做的人。相對于撒謊者、野蠻人或是狡猾奸詐的冒險者，他更反感庸俗者、警察、膽小懦弱者和吹毛求疵者。他極其欣賞個性、沖動和無比的勇氣。他具有18世紀那種良好教養。除了語言天賦，他對語言學的冷門領域頗有研究，尤其是關于半湮沒的當地人（巴斯克人或熱那亞人或馬耳他人或盧薩蒂亞人，或達爾瑪提亞人，或大希臘的希臘異族人）的語言和方言，并且對偏僻之地的歷史知識有著豐厚儲備，從而滋養了他被過去導向的想象力和他敏銳的審美感。他的生活令人愉快地混亂，他在英格蘭和意大利居住的房子美妙而獨特，這些都彰顯出他無懈可擊的品位；而他的行為，不管是微醺或清醒時，也同樣如此。他會開很棒的玩笑。他從未說過讓人畏縮的話。他有時會顯得有些單調或呆滯，但從不會局促不安。他是一個忠誠而又親切的朋友，對待那些為他工作的人也很好。

他在皮克斯頓的生活，他對所擁有的廣闊但總體上并不富饒的土地的管理，他在鄉下的情趣，他打獵和通過他母親表現出來的慷慨好客，是他為盡力維系舊世界的傳統所作的努力。在這個世界中，他呼吸更自由，痛苦少一些。他對母親非常忠誠，或者說太忠誠了，在母親去世之后，他也很快離開了人世。他有了挫敗、凄涼，以及深刻的孤獨感。他那深刻、天真、不會因任何真正的懷疑而苦惱的信仰（如果像我一樣不信這種信仰的人提起它），以及指引他整個人生的至高價值觀，保護著他，使他遠離極端的絕望。尤其是，他是一個非凡的好人，這一點通過他所做和所說的每一件事體現出來。我并非他的密友，但我了解他，熱愛他，敬佩他，并且哀悼他的去世，懷念隨他一起消逝的幻想世界。

# 奧爾德斯·赫胥黎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圣保羅學校八年級古典和歷史的中高級課程安排得非常精巧。但這不是那些嚴肅、憂郁、缺乏想象力的大師們（這里有一個例外：一位古怪、熱忱、不是很有名氣的同僚，也是利頓·斯特拉奇的追隨者）所直接促成的。雖然他們中最有素養的大師給我們推薦了蕭伯納、威爾斯、切斯特頓、吉爾伯特·默里、弗萊克、愛德華·托馬斯、薩松和《倫敦信使報》，但是我們讀的是喬伊斯、弗班克、愛德華·卡本特、溫德姆·劉易斯、席勒的“邏輯”[71](#_71_11)、哈夫洛克·靄理士、艾略特和《規范》；在阿瑟·考爾德——馬歇爾（他大哥當時在美國，很喜歡這些人的作品）的推動下，還讀了H.L.門肯、卡爾·桑德堡、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我們也對谷克多、《轉變》以及早期的超現實主義很有興趣。我們不喜歡德斯蒙德·麥卡錫編輯的《人生與文學》，認為它平淡且保守。我們的思想解放者主要是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埃茲拉·龐德和奧爾德斯·赫胥黎。

我不能宣稱自己的思想是被任何一個人所解放的；如果我當時思想禁錮，那我也必然是被他們所束縛的。但是，文學家們——由他們的領袖人物伏爾泰領導——在18世紀拯救了很多思想受壓抑的人；拜倫或喬治·桑、易卜生、波德萊爾、尼采、王爾德、紀德，也許還有威爾斯或拉塞爾這么做；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則受小說家、詩人和關注時代中心問題的評論家們的影響而找到了自我。有時，社會和道德勇氣能夠比情感或創造力更有決定性的影響。我有一個同僚，他是一個特別誠實、有智慧和道德責任感的人，以前被某種不確定的社會地位和他父親所信仰而令他痛苦的清教徒主義所禁錮和折磨；他讀了奧爾德斯·赫胥黎（特別是《點對點》和一兩個小故事）后，獲得了道德自由（跟其他人通過心理分析，或阿納托爾·法朗士，或生活在阿拉伯人中一樣）。在他看來，光明驅走了黑暗，禁止的東西被明白地說了出來，私密的身體經驗（過去常常使他非常難受、使他有一種犯罪感，并且很難見到這樣的介紹）被詳盡地介紹出來了。從那時開始，我的朋友在智識上進步極大，并最終成為當時最受尊敬和成果最豐富的知識界人士之一。赫胥黎雖然常被人批評缺乏個性和創造力，但他是少數能如此自由快樂地表達思想的作家之一，他使已經能夠看穿蕭伯納或切斯特頓的讀者們極為佩服和興奮；因此，赫胥黎作品非常吸引我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取得如此成就的背景是，當時質樸的道德信仰相對比較少；雖然它們為科技成就的輝煌所遮蔽，但它們一直在那里，很容易辨認，像一個單調、持久、連續的固定低音，通過精巧的智識展示，在十七八歲年輕人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不管年輕人認為自己的青春期是如何復雜、頹廢，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是熱切的，道德上也容易受到影響。

這種固定低音——赫胥黎道德和精神哲學的簡單重復的模式——在他后期小說里變得越來越具有強迫性，毀滅了意氣風發的、令人愉快的、“現代的”、新古典主義音樂的高音，雖然小說本身寫得非常好，但我懷疑其影響已經減小了。20世紀40和50年代那些嚴肅、高貴、仁慈、隱忍的人物獲得了普遍的尊敬和欣賞。但是，這種轉化的力量（即影響）屬于“憤世嫉俗”、否認上帝的早期的赫胥黎，是家長和老師們所害怕和不認同的東西，是令人討厭的無政府主義——那些誠懇的、伴有甜蜜傷感的段落，特別是關于音樂的段落，被年輕讀者們高興地完全接受了，這些年輕人認為自己沉迷于打破戰后時期舊俗的那種最危險和最奇異的罪惡行為。赫胥黎是我們年輕人偉大的文化英雄之一。

我1935年（或1936年）在劍橋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羅斯柴爾德勛爵家里見到了赫胥黎。我原本以為會被他嚇住，或會被斥責，但事實上他非常客氣，對在場的每個人都很親切。大家一起玩腦力游戲——在我看來，人們幾乎在每頓飯后都會玩，而大家很高興用這種方式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知識。赫胥黎對這種活動平靜地表示贊同，但他不去競爭，并保持親切和疏遠的態度。當游戲終于結束后，他用一直以來的低沉、單調的聲音開始說話，談論關于人類和思想的話題；感覺他好像是從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去描述他們，把他們看成奇怪但有趣的物種——古怪，但并不比被他看作某種博物館或百科全書的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物種更古怪。他說話平靜、誠懇、使人放松，而且語言非常簡潔。他的談話中沒有惡意，也沒有絲毫的故意嘲弄，只有一些最友善、最溫和、最無害的反語和笑話。他喜歡描寫預言家和秘法家，但甚至是對他不太喜歡的凱澤林伯爵、鄔斯賓斯基、葛吉夫這樣的人，他也給了應得的或其實是更好的評價；甚至對米德爾頓·默里也比在《點對點》中對他的評價要更為真誠和溫和。赫胥黎講得很好：他需要專心的聽眾和安靜，但他并沒有自我陶醉或盛氣凌人，房間里的每個人都感受到他平靜的力量，這里充滿了智慧的光芒，每個人都變得平靜、嚴肅、專注和滿足。我所試圖描繪的場景也許傳遞了一個信息，即由于所擁有的高貴品質，赫胥黎（跟一些非常好的人和具有才華的作家一樣）好像是一個無趣的或傳教士似的人物。但從我跟他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來看，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道德高尚、極為正直，正是這些罕見的品質（就跟與他完全不同的G.E.莫爾所具有的品質一樣），而非卓越和獨特，完全彌補了他缺乏光彩的性格，也彌補了他講話時的平靜、安穩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單調（我們都很喜歡且以尊敬的態度聆聽）。

赫胥黎所寫的社會生活幾乎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摧毀，他的主要興趣看起來已從外部世界轉向了人的內心生活。對所有這些，他的方法是嚴謹的經驗主義，直接聯系到在演講或寫作中記錄下來的個人經歷的事實。這只在以下意義上才是推測性的和想象的：在他看來寶貴的人類經驗的范圍常常被設想得過于狹隘；他所喜歡的關于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假設和思想（比傳統生理學或心理學更好地闡明所謂超自然的現象）與他認為不適合的模式聯系在一起。他有一個努力目標，就是使讀者、科學家和外行們認識到被人為分類的不同領域之間迄今為止沒有被充分考察和描述的（身體的和思想的、感官上的和精神上的、內在的和外在的）關系。他的大多數作品——小說、散文、演講、論文——都圍繞這個主題來展開。從“人道主義者”這個被嚴重濫用的詞的最真和最高尚的意義上講，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對（18世紀哲學家所認為的）人類作為自然界的物體很感興趣，他關心人類本身。他對人類的希望寄托在自我認識的提高上：害怕由于人口爆炸或暴力，人類會毀掉自己；從這個角度講，只有更多的自我認識——尤其是，在他看來由科學和宗教共同花費如此多精力尋求的、對思想和身體力量緊密關系的理解，以及對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的理解——能夠拯救他們。

他對所有試圖將事實碎片系統化的人都予以懷疑，這種事實被賦予神秘主義者和有遠見的人，即他所認為特別敏感、有才能或幸運，且視野能夠通過專心而刻苦的訓練得以培養和擴展的人。他意識到沒有超自然的恩賜；他不是一個有神論者，也不是一個傳統的基督徒。他所有的作品，不管激發他寫作的原因是馬爾薩斯式的恐怖，還是強制和暴力帶來的仇恨，或是他所謂的盲從（對某些單一價值或規范盲目崇拜，把其他價值或規范排斥在外，就像超過合理限度的批評和討論一樣），或是印度教和佛教經典，或是西方神秘主義者和有精神或心理洞察力的作者——曼·德·比朗、卡夫卡、布洛奇（赫胥黎是一個不尋常的創造才能的發現者），或是作曲家、雕塑家、畫家，或是他所讀過其作品的各種語言的詩人——無論他的目標或他的心情怎么樣，他總是會回到他后期的唯一中心主題上來：20世紀人類的狀況。一次又一次，他將兩個方面進行比較：一方面是使人類創造具備前所未聞的力量和優點的事物并過上美妙生活（那是一個人類從未見識過的更寬廣、更光明的未來）的新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無知和由此而被非理性偶像和毀滅性的情感——那是原則上所有人都可以控制和引導的力量，而一些人已經確實如此做了——奴役，人類相互摧毀和全體毀滅的可能性。也許，從斯賓諾莎之后就沒有人如此狂熱地、始終如一地完全相信這個原則了：僅僅知識本身就能解放，不只是物理、歷史、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知識，而且是一幅十分寬廣的知識全景畫（包括公開的和神秘的力量），而這是這位博聞強記的讀者在榮譽和希望的交替中一直找尋的。

他后期的作品、小說和小冊子——界限有時不太明確——在每個地方都得到尊敬；尊敬，但并沒有非常熱情。那些認為他是翻版盧西安或皮考克的人抱怨：在他的作品里，機智、精湛技巧、對事實和思想的綜合運用以及諷刺的眼光全都不見了；那個憂傷、聰明、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好人只是一個已在英國文學史上取得穩固地位的作者的高貴幻影。簡言之，有人說他變成了一個在俗的傳教士，就像其他詩人和預言家一樣，已經被靈魂所拋棄了；因此，像牛頓和羅伯特·歐文、華茲華斯和斯溫伯恩一樣，他到最后也是言之無物、聽眾越來越少，但仍興致勃勃、榮耀、不厭其煩地講著。這些批評至少在一個基本概念上是錯誤的：如果他是一個預言家的話，那么他是真正的預言家。狄德羅的《達朗貝爾之夢》和《布干維爾游記附錄》（特別是前者）展望了19世紀和20世紀在生物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新發現，并大膽推斷一些自然科學的重大進展，而奧爾德斯·赫胥黎也是如此，他以一種置身事外的藝術家有時所具備的對未來的敏銳感觸，站在甚至超越了當代知識的前沿。他是創立新心理物理學（目前還沒有一個更恰當的術語來稱呼這一領域，我們權且稱之為身心關系）的先驅，這一學科必定會成為本世紀或下世紀的偉大進展。在這一領域，目前對神怪故事和宗教儀式、對社會和個人行為的心理學基礎、對語言學的生理學基礎和邏輯基礎的關系、對超自然的心理現象以及心理治療之類的研究，都才剛剛起步。

赫胥黎很清楚這一點。他知道自己站在淡出舞臺的古老占星術和即將到來的作為人類科學開端的新天文學的交界線上。他因此受到很多指責：他背叛了原來的理性主義卻轉向一種混亂的神秘主義；為了逃避自身痛苦和個人絕望，可悲地陷入了非理性主義；為了支撐朦朧、膚淺、偽宗教思考使人舒適的晦澀，軟弱地放棄了自己從前對清晰、準確、切實的信仰。他平靜而耐心地承受了這些指責。他非常明白人們說的是什么：實際上，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如果他愿意的話，他能準確畫出一幅關于這些態度的諷刺畫。他堅持己見并非因為他不再具備從前那出眾的才智，而是因為他確信在自己所選擇的領域里，人類將會取得最偉大的變革性進步。

在我最后一次見他的時候，他（至少公開地）沒有涉及其他話題，只是談論被科學和生活嚴格分隔的事物應該重新整合：人類要恢復與非人的自然界的接觸，必須有一種方案，解決人類在觀察、評判、理論等方面的不均衡發展問題，扭轉感覺、“生魂”（vegetative soul）、人與支票物共性的不和諧發展傾向。其他人也談到了這一點。在現代，反對疏離，不但是因脫離了自然進程，而且因缺乏社會和諧與共同目標。但顯然，赫胥黎不相信通過制度變革（不管是漸進的還是革命性的）來修復這種結構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僅僅通過心理治療就可以修補，雖然他認為心理治療很重要。他相信，在土著人和非歐洲文化中存在不同形式生活的區域，或者說，無論如何那些區域并沒有完全消失；對這些區域基于傳統和經驗的重新發現，會提供一種比議會法案、社會革命、機械發明，甚至他所深信的教育革新都更為簡潔和明確的道路。從人類未來經驗的角度看，他所談的很多內容也許有一天會看起來含糊不清或不真實，而且也會有很多內容被證實具有誤導性或不切實際，就像在先驅和那些對未來之事有直覺的人身上經常發生的一樣。但我必須承認，我認為他把自己的出色才智用在心理物理關系和心理（或是他更喜歡稱為精神因素）控制這樣的問題上是完全正確的，他認為在這方面古代和現代的印度人都超過了西方人。

他的警告（不管是在《美麗新世界》中——該書顯然是描寫對純粹科技進步的幻滅的最有影響著作，還是在其他小說和文章中）和預言，即使是最平淡和最缺乏藝術感的那些預言，都足以創造一個新的風格。那是一種令人害怕的悲觀烏托邦空想，至今仍為很多無批判力的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所信奉；在愛德華·哈利特·卡爾自負的評論中，它被稱為“進步中的古老信仰”。這些小說通過接近西方當代經驗之骨（腐爛之骨，他會說），造成了一種真正的不安。他是一種普遍而深刻的痼疾的受害者。他準確無誤地覺察到，很多問題的當代處方，過去和現在都毫無用處，因為它們太實用，因而過于短視，或者所用的概念對于人性——特別是對于他所寫的那些（他認為非常重要）仍然隱藏著的、被忽視的力量——來說過于膚淺、過于粗糙和短暫、過于粗俗和無禮。他對當代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中的這個致命缺陷有清醒的認識。他的作品中沒有連篇累牘的勸導說教。他對人類的生存需求和需求變化有明確的意識，我對此是確信的。如果我是正確的話，他那些作品——甚至讓他的仰慕者搖頭、難過、不以為然的作品——總有一天會得到公正的評價。

我很高興于1961年在印度與他邂逅，當時他和我都作為代表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會議。他談了他經常講到的話題，即作為預言家——能夠察覺常人用眼睛無法看到東西的人——的詩人在字面意義上對先知能力的訴求。當然，在一個他因信仰而與之關系密切的國家，他受到了極大尊敬。我們（赫胥黎、美國代表路易斯·昂特邁耶和我）參加了一個接待會，有六七百名學生來此對他表示敬意并索要簽名。他站在臺上看著下面的觀眾，感到有些突兀和尷尬，臺下則鴉雀無聲。這時，一個年輕男孩打破了沉寂，帶著嘲諷的口吻說：“在印度人心中，泰姬陵是僅次于甘地先生的最寶貴的財富。赫胥黎先生，為什么你在你的書《幽彼拉多一默》中，是以一種輕蔑的語氣提到它呢？我想問一下，先生，你現在是否仍然堅持你令人不快的觀點？”赫胥黎被逗樂了，同時隱約有點不高興。他回答說，也許他談到泰姬陵時有些過于苛刻，但他并不愿意傷害任何人的感情，而審美是一個不確定的領域，趣味并不能用同一標準來衡量。然后他逐漸從這個危險話題轉移到了他中心的托爾斯泰主題——人類今日生活的非自然狀態。后來他有些懷疑自己也許并不公平，所以我們決定再次訪問阿格拉。我們是分開走的：他和他妻子跟著名的印度小說家穆·拉·安納德一起走，而我和我妻子在另外一輛車里。我們在阿格拉會面，然后一起去法塔赫布爾·西格里，阿克巴的死城。赫胥黎很喜歡那里。他用夢游者的緩慢、穩健、有點滑行的腳步在那里走著，他的莊嚴和文雅很有魅力，很能打動人、令人愉快。

在去法塔赫布爾·西格里古城途中，他講述了自己1920年對印度的訪問，那時他是跟一個牛津同僚（一個杰出的人物，現在是印度上議院的議員，這次也很歡迎他的到訪）一起來的。他描述了尼赫魯的父親莫逖拉爾，說他是一個外表優雅、舉止得體的人，襯衫要送到巴黎去洗，屬于富有、熱衷權勢的貴族，他們會為自己的利益來利用甘地；但是貴族們發現甘地比他們更聰明，企圖控制這股偉大力量，或至少是甘地使之成形的民眾情緒的洪流被證實是根本沒有用的，他們發現結果并不如自己所愿——最后是甘地掌控了他們。赫胥黎以一種善意的嘲諷意味、平穩的語調，以緩慢、從容、使人愉快的語氣來描述這些著名的、專制的婆羅門貴族與甘地的關系。他接著詳盡敘述了他（在加利福利亞或印度）使用的巧計和策略，以逃避那些脅迫自己生活的討厭的人和事。他很直率、平靜，大家很容易與他交談。幾個星期前，他的房子和所有的書被燒毀了，這件事好像一點也沒有讓他煩惱，也一點都看不出來他已經知道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他抱怨了他的視力（他的舊疾），但并沒有提到致命的癌癥。

當他終于再次看到泰姬陵時，他變得溫和了，認為它不像自己曾以為的那么難看，相反，它是一座值得稱贊的建筑（除了那些宣禮塔——“像一個個煙囪頂帽”，他始終認為那是個錯誤）。那天晚上我們是在一起度過的，法國作家讓·格埃諾好像當時也在那里待了一會兒。格埃諾是一個憂郁和有趣的理想主義者，不太可能——他也不打算這么做——讓誰精神振奮；因為供電出了點問題，酒店里燈光很暗。也許有人會認為，如果這個場合算是高雅的話，那也一定是極為令人沮喪和壓抑的。但事實不是這樣。赫胥黎直率、坦然，也不以自我為中心，他所談都是一些不尋常但又絕對真實的事情。他是如此真誠和有趣，以至于這個場合十分令人愉悅，還使人——至少是我——產生了對他的持久喜愛和近乎崇拜的尊敬。

赫胥黎花了很多時間來搜集事實。比起觀點來，他更喜歡獲知事實——因為他能夠自己形成觀點。盡管如此，他并沒有像寫一本百科全書般寫作。顯然，他并沒有因清教徒和禁欲主義者憎恨他作品中的個別色情描寫而耿耿于懷；他的談話也并非充滿奇怪、武斷、抽象知識的雕蟲小技；他也從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地位顯赫的作家。他彬彬有禮、嚴肅認真、充滿魅力，他的舉止和語言都充滿人性，具有高貴的品質，跟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他的普遍印象毫不相關。與他的作品（就算在最佳狀態，也有一點機械感和缺乏創意）比起來，他本人似乎更有趣，盡管他舉止謹慎，但他的思想更直接、更自然、更打動人心，也更個性化、更真實。但是在我余生中，都留在腦海里的將是，他是一個非常文雅、善良、嚴謹的人，是所有我能想到的最特別的人之一。

# 1945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

每一個追求連貫記憶的嘗試，到頭來都是作假。人們的記憶無法按照順序逐一重溫舊事。書信和日記經常于事無補。

——阿赫瑪托娃[72](#_72_11)

## 一

1945年夏天，我還在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當臨時官員的時候，被告知下一步要被派到駐莫斯科大使館幾個月，說是那里缺人手，而我會俄語，并且在（此前不久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上多少了解一些美國對蘇聯的官方和非官方態度，可以補缺到年底。戰爭結束了。波茨坦會議并沒有使勝利的盟友之間出現公開裂痕。雖然西方一些地區有不祥的預感，但在華盛頓和倫敦官方圈子里總的情緒還是審慎樂觀；在公眾中間和媒體上是滿懷希望甚至是熱忱：蘇聯人民在抗擊希特勒的戰爭中表現出來的非凡勇氣和作出的令人吃驚的犧牲，為他們的國家贏得了廣泛同情，在1945年下半年，這讓很多批評蘇維埃體制及其做法的人三緘其口，人們廣泛而熱切地期待著互相理解和全方位合作。我在這樣一個蘇英雙方充滿美好感情的季節里，動身前往莫斯科。

從我家1920年離開（當時我十一歲），我就沒有回過俄國，也從未訪問過莫斯科。我初秋時節來到這里，在衡平法院（Chancery）分到了一張辦公桌。雖然我每天早上要在大使館報告工作，但我唯一的任務就是閱讀莫斯科的報刊，做新聞摘要和評論。這項工作并不費勁：與西方報刊比起來，這里的刊物內容單調、重復而可以預知，實際上是千篇一律。這樣我就有了大量空閑時間，就去參觀博物館、古跡和建筑、劇院、書店，在大街上閑逛。與大多數從西方來的非共產主義訪問者完全不一樣的是，我很幸運地會見了幾位俄國作家，他們中至少有兩位是杰出的天才。在敘述我與他們的會面之前，有必要介紹一下我在蘇聯的十五周時間里所看到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文藝界的情況。

俄國詩歌的繁榮始于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藝術上許多大膽而具有創造性、影響廣泛的實驗。新運動中的主要潮流，包括繪畫和雕塑上的符號主義、后印象主義、立體主義、抽象派、表現主義、未來主義、至上主義和構成主義，戲劇和芭蕾中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特別是詩歌中的阿克梅派、自我未來派和立體未來派、意象派、“超感覺”等等，并沒有被戰爭和革命所拘束，而是繼續從新的視角汲取活力和靈感。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藝術趣味是保守的，但那些給予布爾喬亞趣味“當面一耳光”的東西受到了支持和鼓勵：這為激動人心的宣言，為所有藝術和評論上大膽而存在爭議、富有天分的實驗開辟了道路，這些不久之后就對西方產生了很大影響。那些作品在革命后幸存的文藝家中，最具有原創性的詩人有：勃洛克、伊萬諾夫、別雷、勃留索夫和稍后一代的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赫列布尼克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最具有原創性的畫家有：波諾瓦、羅列赫、索莫夫、巴克斯特、拉里歐諾夫、岡察洛娃、康定斯基、夏卡爾、蘇丁、克林、馬勒維奇、塔特林、利西茨基；最具有原創性的雕塑家有：阿爾奇片科、伽勃、佩夫斯納、利普契茲、查德金；最具有原創性的制片人[73](#_73_11)有：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泰羅夫、愛森斯坦、普多夫金；最具有原創性的小說家有：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巴別爾、皮利尼亞克。這些人的名字在西方廣為人知。他們并不是一座座孤立的山峰，而是被大片的丘陵烘托著。俄國20世紀20年代發生了一場真正的文藝復興，這與其他國家藝術界的情況是不同的。小說家、詩人、藝術家、評論家、歷史學家、科學家之間互相借鑒，這造就了一種具有罕見活力的文化，形成了歐洲文明中非同尋常的上升時期。

坦白地說，所有這些好得過了頭，難以持續下去。戰爭和內戰的破壞、饑饉、獨裁統治對各種生活和機構的系統性破壞，其政治后果就是結束了詩人和藝術家自由創作的條件。經過實行新經濟政策那一段相對寬松的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變得強大起來，足以挑戰并在20年代后期粉碎所有這些非組織的革命性活動。社會需要的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無產階級藝術。評論家阿維爾巴赫帶領一幫馬克思主義狂熱分子，反對所謂放縱的個人主義的文學異端，或所謂形式主義、頹廢的唯美主義、對西方卑躬屈膝、反對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迫害和清洗開始了。但因為勝負難料，這在一段時期里給文學生活帶來了某種不祥的動蕩。終于，在30年代初期，斯大林決定結束所有這些政治——文學爭論，他顯然認為這些爭論只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左翼狂熱分子被清算了；再也聽不到關于無產階級文化或集體主義的創作和評論，也聽不到各種形式的反對聲音。1934年，黨（通過新成立的作家聯盟）直接管理文學活動。國家控制的正統觀念帶來了一片死寂：不再爭論；人們的思想不再躁動；注意力集中在經濟、技術和教育上——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世界這個敵人的物質成就。當務之急，是把沒有受過教育的廣大農民和工人組織成為一個軍事和技術上不可戰勝的現代社會。新的革命秩序被千方百計要毀掉它的敵對世界所包圍。政治上的緊張氣氛，容不得高水平的文化和爭論，也容不得關注公民自由和基本人權。旋律必須由體制權威來確定；那些影響猶存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按照這個旋律起舞。

一些人表示順從，一些人多多少少不順從。一些人對國家監督感到很壓抑，其他人則接受甚至表示歡迎，因為他們都知道，這會賦予他們一種被市儈而平庸的西方人所否定的地位。1932年出現了一些寬松跡象，但并未成為現實。隨后是恐怖：大清洗，這從1934年基洛夫被暗殺之后的鎮壓和臭名昭著的政治公開審判開始，在1937年至1938年的葉若夫恐怖——瘋狂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個人和集團，后來是對所有人的濫殺——達到高潮。當時在黨和國家具有巨大聲望的高爾基還活著，起到了一種緩沖作用。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作為“革命的聲音”的名望和聲譽堪比高爾基，他在1930年自殺了——高爾基六年之后去世。稍后，梅耶荷德、曼德爾施塔姆、巴別爾、皮利尼亞克、克留耶夫、評論家D.S.米爾斯基、格魯吉亞詩人亞什維利和塔比澤——這里提到的只是最知名的人物——遭到逮捕并被處死。幾年后的1941年，剛從巴黎回來不久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自殺身亡。告密者和非法監視者的活動無孔不入。自我否定、屈意招供、屈服于當局或主動合作，也常常不能使這些知名人物逃脫毀滅的命運。至于其他方面，它給一些從恐怖時期幸存下來的人們，留下了一段永遠難以忘卻的痛苦而又屈辱的回憶。

有關這個危險時期——這在俄國的歷史上既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知識分子生活的真實記錄，我們可以從N.曼德爾施塔姆、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等人的回憶錄，以及在另一層意義上從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安魂曲》中看到。遭到流放和殺害的作家和藝術家數量如此之多，以至于1939年的俄國文學、藝術和思想界，就像遭受了可怕的狂轟亂炸，只有幾座像樣的建筑還相對完好，孤零零地矗立在滿目瘡痍、荒無人煙的街道上。斯大林終于停止了各種迫害活動：有了呼吸空間；19世紀的經典作品再次受到尊重，舊街名代替了革命的街名。但在這個恢復期，創造性和批判性的藝術實際上是一片空白。

接下來是德國的入侵，情況再次發生變化。這樣一些在大清洗中幸存下來并且努力保持形象的優秀作家，對愛國主義情感的洪流反應熱烈。某種程度的真實性回到了文學中：所有戰爭詩歌，不僅僅是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所寫的詩歌，都源于深厚的情感。在所有俄羅斯人都卷入民族團結高潮的那些日子里，關于清洗的噩夢被關于愛國的抵抗和英雄般殉難的悲壯而令人解放的感覺所取代。俄國的作家，無論老少，都表達了這一點，特別是他們中那些真正有風格的詩人，都被當作偶像來崇拜，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令人驚訝的現象發生了：那些詩人的作品曾經被當局看不順眼，因而很少出版并且版本非常有限，現在他們開始收到許多前線戰士的來信，信中所引用的通常是他們那些表達個人情感的、與政治幾乎無關的詩句。據說，勃洛克、勃留索夫、索洛古勃、葉賽寧、茨維塔耶娃、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被戰士、軍官甚至是政治委員們廣泛閱讀和背誦。曾經長期生活在某種國內流放狀態中的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收到的前線來信數量驚人，這些來信引用他們的詩歌，既有公開出版的，也有從未發表過的，多半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傳；有索取親筆簽名的，有求證手稿真實性的，有尋求作者對各種問題表態的。最終這一現象深深觸動了一些黨的領導人：這些作家作為愛國聲音——祖國有一天會感到驕傲——的價值，被文學界的官僚們逐漸認識到了。結果是詩人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人身安全也獲得了保障。

在緊接著的戰后歲月里，事實上直到生命的終結，老作家中最杰出的人物發現他們的處境很奇怪，就是他們成了讀者的崇拜對象，也得到了當局半信半疑的寬容：一座小而逐漸消失的帕納塞斯山[74](#_74_11)，由年輕人的傾慕支撐著。在各種私人聚會和派對上憑記憶背誦詩歌，在大庭廣眾之下朗誦詩歌，在革命前的俄國都很普遍；新奇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也都向我講過，就是當他們對著濟濟一堂的聽眾朗讀詩作時，偶爾會在一個句子上停頓下來，現場經常會有許多觀眾馬上提示他們——提示的作品有已經出版的，也有尚未出版的（并且在公開場合是找不到的）。沒有一個作家不受感動，或不因這種誠摯的敬意受到鼓舞。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是獨特的，這種萬眾矚目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會讓西方詩人艷羨。大多數俄國人覺得俄羅斯的特點是開放、熱烈、自然、“博大”，西方人則是干巴巴、精明、文雅、羞怯、世故——這很大程度上是被斯拉夫文化崇拜者和民粹主義者夸大了。雖然存在這樣的對比，但很多人仍然相信西方文化并沒有枯竭，而是充滿了多樣性和自由創造的個性，不像被突然的鎮壓行動所打斷的蘇聯日常生活那樣愈加灰暗。我所說的一切——大約三十年前[75](#_75_11)我說過了——都不會動搖這種熱切的信念。

不管怎么說，著名詩人這個時候在蘇聯是英雄人物。很可能現在也是這樣的。可以肯定的是，識字率大幅提高，俄羅斯乃至外國經典作品廣泛流傳，特別是被翻譯為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不同語言，引起的公眾反應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可能到現在也還是。很多證據表明，那個時候，大多數外國名著的書迷認為英國和法國的生活與狄更斯或巴爾扎克的描寫很相近。他們對于這些小說家生活的熟悉程度，在感情和道德上的參與，對小說人物命運孩童般的著迷，在我看來要比英國、法國或美國這些國家小說讀者的反應更直接、鮮活、生動，也更富有想象力。把作家當作英雄的俄國式崇拜——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與此有密切關系。我不知道現在怎么樣了，或許已經大不相同了。我可以作證的就是，1945年秋季，人滿為患的書店里，貨架上的書總是供不應求，政府職員表現出如饑似渴的閱讀興趣——簡直就是狂熱——甚至像《真理報》和《消息報》這樣的報紙在報亭一露面，不出幾分鐘就銷售一空，這些事實都進一步證明了蘇聯公眾對文藝的饑渴。嚴格的書刊審查以及更多別的措施，打擊了充斥西方火車站報刊攤的那些色情書刊、粗制濫造的驚險小說，使蘇聯讀者和劇院觀眾比我們更純潔、更直率和更樸素。我注意到，上演莎士比亞、謝里丹或格里鮑耶多夫的戲劇時，觀眾（其中一些明顯是鄉下人）很容易為舞臺上的演出所觸動，演員所說的臺詞——例如，格里鮑耶多夫詩劇《聰明誤》中壓韻的對句——馬上會引來贊成或不贊成的大聲議論；有時，觀眾情緒之強烈，在西方來訪者看來既新鮮又令人感動。這些人或許和歐里庇得斯或莎士比亞寫作時代的那類普通觀眾沒有什么區別。在劇場里，從我鄰座同我說的話看，他們仍然用聰明伶俐的青少年那種機敏的想象和無邪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他們正是劇作家、小說家和詩人心中理想的公眾。或許恰恰是由于缺少這種公眾的反響，才使得一些西方先鋒派藝術顯得死板、乏味、矯揉造作。由此來看，托爾斯泰對不少現代文學藝術提出的指責，雖然顯得籠統、武斷、固執己見，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蘇聯公眾對任何可信、新鮮，甚至真實事物的超強接受力和興趣——批評性和非批評性的，和官方作家提供的低劣精神食糧形成了巨大反差，這讓我吃驚。我對各個層面上的平淡、沉悶和循規蹈矩并不感到意外。在官方層面，包括評論界，的確如此；但在劇場和電影院里、在演講中、在足球比賽中、在火車上、在有軌電車上、在書店里，卻不是這樣。

在我動身去莫斯科前，在那里待過的英國外交官向我提出忠告，說要見蘇聯平民是很困難的。他們說，在官方的外交招待會上會遇到一定數量經過精心挑選的高級官僚，這些人一般來說會重復黨的話，避免同外國人進行任何真正的接觸，至少是避免同來自西方的那些人接觸；芭蕾舞舞蹈家和演員偶爾也會被允許參加這樣的招待會，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藝術家中腦子最單純的、最沒有思想的人，最不可能受到非正統思想的影響，或出賣什么情報。簡言之，我的印象就是，撇除語言障礙不說，對與外國人尤其是那些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發生聯系的恐懼，加上關于共產黨員不準參加這類活動的特殊命令，使得西方使團從文化上被隔絕起來；使團人員（以及大多數新聞記者和其他外國人）生活在動物園里，各個籠子里的人可以相互聯系，但卻被一堵高墻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我發現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與我的預期不完全一樣。在我短暫停留期間，我見到的不僅僅是在所有招待會上都會出現的一群經過嚴格管教的芭蕾舞演員和文學官僚，還有幾位真正的天才作家、音樂家和制片人，他們中間有兩位是天才詩人。這些人中有一位是我最希望見到的，就是帕斯捷爾納克，我對他的詩歌和散文十分欣賞。要是找不到理由的話，我是無法去結識他的。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他的姊妹們，她們住在倫敦，其中一位請我帶一雙靴子給他的詩人哥哥。這就是借口，我極為樂意辦這件事。

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剛好趕上大使館組織的一次宴會，慶祝它的俄文新聞刊物《英國同盟》創刊一周年，蘇聯作家受邀參加。席上的主賓是約翰·博因頓·普里斯特利，他那時被認為是蘇聯當局的鐵桿朋友；他的著作被大量翻譯，我似乎回憶起來了，他的兩部戲劇那時正在莫斯科上演。那個晚上，普里斯特利看起來有點不高興：我認為，他是被過多安排的集體農莊和工廠之行弄得精疲力竭——他告訴我，雖然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還是發現這些官方參觀十分乏味；除此之外，他的版稅被終止了。他通過翻譯的談話極為矯揉造作，總的看來，他并不快樂，很疲勞，盼著回去休息。不管怎么說，大使館的翻譯私下里對我說的就是這樣；他提出要送主賓回旅館，并問我可否設法填補普里斯特利早早離去留下的尷尬空白。我欣然同意，發現自己就坐在著名導演泰羅夫，以及同樣有名的文學史學家、評論家、翻譯家和很有靈氣的兒童文學家K.茹科夫斯基中間。我對面就是全蘇聯最著名的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他看起來有些沮喪：我后來聽說，個中原因不難找到。[76](#_76_11)我問他什么時候覺得最幸福。他回答說，革命勝利后的初期，在他作為一位創造性藝術家的生活中是最美好的一段時間，很多其他人也是這樣。他意猶未盡地說，那個時候可以不受懲罰地做荒唐和令人驚奇的事情。他特別愉快地回憶，在20年代初，他們有一次把豬涂上油脂放到莫斯科劇院的觀眾席中。豬到處亂跑，跳上座位，嚇著了觀眾；人們尖叫，豬號叫。“這正是我們的超現實主義場景所需要的。在那些日子里，活躍的大多數人都愉快地生活和工作著。我們年輕、目空一切，充滿思想。不管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形式主義者，抑或是未來主義者，都沒有關系——畫家、作家或音樂家——我們全都會面、爭吵，有時候非常激烈，還會彼此激勵。我們真的很快樂，也創作出了一些東西。”

泰羅夫說的幾乎相同。他懷念地談起了20年代的實驗劇院，談起瓦赫坦戈夫和梅耶荷德的天才；談起了短命的俄羅斯當代運動的大膽和活力，在他看來，這遠比皮斯卡托、布萊希特或戈登·克雷格在舞臺上取得的成就更為有趣。我問他是什么終結了這場運動。他說：“世事無常，但這是一個精彩的時代；不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聶米羅維奇的口味，但絕對精彩。”他說，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們現在受的教育不夠，不能理解契訶夫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樣子：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的態度、舉止、口音，他們的整個文化、眼界、習慣，這是當前處于上升階段的演員們完全不能理解的東西；沒有人比契訶夫的遺孀奧爾嘉·克尼佩爾對此有更多的認識，當然也沒有人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有更多的認識；從那些日子里活下來的最偉大的演員卡恰洛夫是出類拔萃的，但老得很快；隨著現代主義的逝去和自然主義的衰朽，他也很快要退休了，或許有新的事情發生？他懷疑地說：“剛才我對你說‘世事無常’，但也世事無變。這甚至更糟糕。”接著他陷入了陰郁的沉默。

泰羅夫說的都對。卡恰洛夫當然是我平生見到過的最好的演員。當他扮演契訶夫《櫻桃園》中的加耶夫站在舞臺上時（在最初的演出中他扮演學生），他確實迷住了觀眾，其他演員也無法轉移觀眾的目光：他的聲音優美，他的動作富于魅力和表達力，使得觀眾希望一直盯著他，永遠聽他說下去。這可能會打破戲劇的平衡，但是那天晚上卡恰洛夫的表演，就像我一個月后看到的烏蘭諾娃在普羅科菲耶夫的舞劇《灰姑娘》中的舞蹈（和多年前看到的夏里亞賓在《鮑里斯·戈都諾夫》中的表演）一樣，在我的記憶里都是用以判斷后來的所有演出的無法超越的高峰。就舞臺上的表現力而言，在我看來在20世紀沒有人能與這些俄羅斯人比肩。

坐在我右鄰座的評論家K.茹科夫斯基以少見的風趣和愉快談論起俄國和英國作家。他說，他被尊貴的客人斷然拒絕，讓他回憶起美國記者多蘿西·湯普森對俄國的訪問。同她一塊兒來的，有她的丈夫辛克萊·劉易斯，他在30年代的俄國名氣很大：“我們幾個人到他在賓館的房間里去拜訪他——我們想告訴他，他的精彩小說對我們是何等的重要。他背對我們坐著，在打字機上打字，并沒有立即轉過頭看我們；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這有某種莊嚴的氣氛。”我竭力讓他相信，他的作品被說英語的國家里的俄羅斯學者比如莫里斯·鮑拉（他在回憶錄里敘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他會面的情況）、奧利弗·埃爾頓（我當時知道的唯一一個對俄國文學有興趣的英語作家）閱讀和深深欣賞。茹科夫斯基給我說起他對英國的兩次訪問，第一次是在20世紀初，那時候他很窮，打臨時工掙幾個先令——他通過閱讀卡萊爾的作品《過去與現在》、《舊衣新裁》學習英語，第二本書花了他一便士，他當時從背心口袋里掏出來給我看。在那些日子里，他是詩歌書店的常客，書店有名的老板詩人哈羅德·門羅引他為朋友，并把他介紹給許多英國文人，包括奧斯卡·王爾德的朋友羅伯特·羅斯，給他留下了愉快的記憶。他說，他在詩歌書店感到很輕松，但在英國任何別的地方就不行了；像赫爾岑那樣，他欣賞英國的社會結構和英國人的行為舉止，覺得很有趣，但同他一樣在英國也沒有朋友。他喜歡特羅洛普，“多么了不起的牧師啊！迷人、古怪——在古老的俄國沒有那樣的東西；在這里他們陷入怠惰、愚蠢和貪婪。他們是悲慘的一伙人。革命以來他們有過一段困難時期，目前要好得多：他們至少還可以讀書和寫作；一些人是體面和可敬的人。但是你永遠見不到我們的牧師——你為什么想去見呢？我肯定，英國的牧師仍然是世界上最討人喜歡的人。”然后，他對我說了他的第二次訪問，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俄國記者代表團成員來報道英國的戰爭努力。在一個周末，他們在諾斯利市受到德比爵士的款待，他發現與爵士的共同點很少，他極為有趣但并不恭敬地講述了這次款待。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悟性很高的作家，革命前他就成名了。他是一個左翼人士，對革命表示歡迎；像任何一個心靈獨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也受到蘇聯當局的困擾。在專制之下，有不止一種方式來保持個人的精神健全：他以性格上一種諷刺性的超然、謹小慎微和坦然淡定做到了這一點。他決定把自己局限在風平浪靜的19世紀俄國和英國文學，致力于兒童文學和翻譯，這至少使他和家人免于他幾個最親近的朋友所遭受的厄運。他說，他渴望閱讀特羅洛普的自傳；如果我可以滿足他的話，作為回報，他愿意為我做幾乎任何事情。他的朋友艾薇·利特維諾夫當時正住在莫斯科——她是前外交部長和駐美國大使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的妻子，找不到自己那本書，考慮到與外國的所有關系都受到極度懷疑，她認為從英國訂購是不安全的；我能否給他搞一本？幾個月后我給他弄到了，他很高興。我說，作為交換，我最希望的是去拜訪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他住在別列杰爾金諾作家村，茹科夫斯基在那里也有一套別墅。茹科夫斯基說自己很欣賞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但他與這位詩人的關系有些別扭——他對涅克拉索夫平民詩歌和19世紀后期平民主義作家的興趣，常常激怒帕斯捷爾納克——這是一位與蘇維埃制度不協調的純粹詩人，對任何形式的應命（參與現實）文學都特別反感。不過他此刻與帕斯捷爾納克的關系尚好，愿意安排一次會面，并且也熱忱地邀請我當天到他那里看看。

我很快就發現，這即便不說是魯莽，也是有勇氣的行為：與外國人接觸是被堅決禁止的。西方國家大使館的人員都被蘇聯當局特別是被斯大林視為間諜。認識到這個事實，我后來在與蘇聯公民私下見面時就小心翼翼，有時候覺悟得太晚了——這種會面使他們處于一定的危險之中，而這種危險并不是所有愿意見我的人能完全意識到的；有些人意識到了，知道同我會面有危險，但他們寧可如此，因為他們渴望接觸西方生活。其他人小心謹慎，我尊重他們理由充分的恐懼。我竭力少見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被他們在國外的聲譽保護的人，唯恐讓他們陷入危險境地。即便如此，我或許也在不經意間損害了我偶然碰見的無辜的人們，或者因為他們有時候向我保證見面不會給他們帶來危險，但事實證明他們的保證錯了。不管我什么時候聽到他們中一些人后來的遭遇，我的良心都感到不安，責備自己沒有抵制住誘惑，去會見一些我曾經遇到的最純潔、討人喜歡、機靈、令人感動的人——他們擁有異于常人的智力品質，對國外的生活很好奇，急于同一個說著他們語言的外國來訪者建立純粹的人際關系，在他們看來，這個外國人理解他們，他們也理解他。我沒有聽說出現監禁或更糟的情況，但我知道有些人由于同我會見而遭到騷擾和迫害。這一點很難說清楚，因為受害者常常永遠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受到懲罰。只能希望幸存者不要因為所受傷害過于怨恨外國訪客，我們或許在無意中成為他們受到傷害的原因之一。

在我遇到茹科夫斯基的那個晚宴一周之后，安排了對別列杰爾金諾的訪問。同時，在為普里斯特利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對他的出席我仍然心存感激，因為這幫我打開了門），我遇到一位匈牙利裔的美國舞蹈家阿菲諾格諾娃夫人，她是在1941年莫斯科空襲中“光榮”犧牲的一位劇作家的遺孀，她顯然是被許可——也許是受命——為有文化興趣的外國訪客組織沙龍。不管怎么說，她邀請了我，我在那里見到了幾位作家。他們中間最有名的就是詩人伊利亞·謝爾文斯基。（“謝爾文斯基曾紅過，謝天謝地，他很快就過時了，”帕斯捷爾納克后來對我說。）他曾經天真地建議，如果說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想象性寫作的正確類型，那么發展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文學或許同樣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矛盾——這是對想象力更自由的使用，同樣充滿對蘇維埃制度的絕對忠誠。他最近受到官方的嚴厲斥責，我見到他時他顯然還很緊張。他問我是否同意五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是莎士比亞、拜倫、狄更斯、王爾德和蕭伯納；接下來或許就是彌爾頓和彭斯。我說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當然沒什么疑問，還沒等我說完，他就問我他們感興趣的格林伍德和奧爾德里奇怎么樣，問我是否知道他們的一些情況。我意識到這些是當代作家的名字，但說老實話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寫了什么作品——這或許是因為我戰爭期間大多數時候在國外的緣故。

這顯然不能令人信服。我后來發現奧爾德里奇是一位澳大利亞共產主義作家，格林伍德曾經寫過一本叫《施舍之愛》的流行小說；他們的作品被譯為俄語，出版了很多版本。普通的蘇聯讀者對其他社會群體的價值標準了解很少。受黨的中央委員會文化部指導的一家官方文學社團，決定所要翻譯的作品和發行范圍，那個時候當代英國作品事實上主要以A.J.克羅寧的《哈特的城堡》、薩默塞特·毛姆和普里斯特利的兩三部戲劇，以及（似乎是）格林伍德和奧爾德里奇的小說為代表。格林厄姆·格林、C.P.斯諾、艾麗絲·默多克和“憤青”——這個流派的作品此后被大量翻譯——的時代尚未出現。

給我的印象是，當我說我對他提到的兩位作者一無所知時，我的主人認為我有點不老實，因為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代理人，因此只好對左翼作家的優點視而不見，很有點像他們自己被迫真的或假裝忽視大多數流亡國外的俄國作家和作曲家一樣。“我知道，我知道我們在西方被稱為循規蹈矩者。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發現每當我們偏離了黨的指導的時候，結果總是黨是對的而我們錯了。情況總是這樣。不僅僅是在于他們說他們更了解情況：他們確實是；而且他們看得更遠：他們的眼光要比我們更敏銳，視野更開闊。”謝爾文斯基用激烈的語氣大聲說道，好像他是在向廣大聽眾發表演講似的。房間里其余的人看起來很不安：這些話似乎是有意對著隱蔽的麥克風說的，如果沒有這個麥克風，我們的會面肯定可以更自然一些。在獨裁體制下，公開表達意見和私下表達意見是不一樣的；或許是出于對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但謝爾文斯基的發作是過于笨拙和夸張了：隨后就是一陣尷尬的沉默。那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爭辯說，自由討論——即便是關于政治問題的自由討論，對于民主制度也是沒有危害的。“我們是一個科學調控的社會，”一位曾經給列寧做過秘書、后來嫁給一個著名蘇聯作家的健美女士說，“如果說在物理學中沒有自由思想的余地——一個懷疑運動定律的人顯然是無知或愚蠢的——那么，為什么我們這些發現了歷史社會定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允許社會領域中的自由思想呢？犯錯誤的自由就不是自由；你似乎認為我們缺少政治討論的自由；我簡直不理解你說的是什么。真理是明擺著的：我們這里要比你們西方更自由。”這里既引用了列寧的話，也引用盧那察爾斯基的話。當我說我記得奧古斯特·孔德著作中有這類命題，這也是19世紀法國實證主義者的論題，但馬克思或恩格斯肯定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時，房間里人頗為掃興，于是我們就轉到了無害的文學閑談。我得到了教訓。只要斯大林當政，關于思想的爭論，從一些人那里得到的都是可以預料的答案，而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受到威脅。我后來再也沒有見到阿菲諾格諾娃女士或她的客人。我的行事方式顯然很不老練，他們的反應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二

幾天后，在與作曲家分居的妻子莉娜·伊萬諾夫娜·普羅科菲耶夫的陪同下，我坐火車來到了別列杰爾金諾。我聽說，這塊地方是高爾基主張提供給知名作家居住的，使他們有一個能夠安靜寫作的環境。這個好心的方案雖然很有創造性藝術家的氣質，但它并不總能帶來和諧共存：即便是像我這么一個對情況一無所知的陌生人，也能感受到某些人際的和政治的緊張。我沿著林蔭道走著，這些路通向作家們的房子。在路上，我們被一個挖溝人攔住了；他跳將出來，說他的名字叫亞茲維斯基，問了我們的名字后，說了好一陣子他寫的一部著名小說《宗教法庭的火焰》，熱切地把這部小說推薦給我們；說我們應該讀一讀他的一部更棒的小說，他現在還正在創作，是關于伊萬三世和中世紀俄羅斯的。他祝我們走運，就去挖他的溝了。我的同伴認為這有些不禮貌，但我被這不期而遇、直率、開放而讓人徹底輕松的獨白迷住了。它沒有正式場合中普遍存在的客套和應酬，純樸而直率——盡管很幼稚，是討人喜歡的。

那是初秋一個溫暖而陽光明媚的下午。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妻子和兒子列昂尼德正圍坐在別墅后面小花園里一張粗陋的木桌旁。詩人熱烈歡迎我們。他的朋友、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曾這樣描述他，說他看起來像是一個長著馬臉的阿拉伯人：從他的許多照片和他父親的畫像中，我們已經很熟悉他的臉龐：黝黑、憂郁、富于表情，帶有鮮明的民族特征。他說起話來慢條斯理，聲音低沉而單調，始終保持同一聲調，發出一種介于蜂鳴和風笛低音之間的聲音，那些見過他的人幾乎都提到了他的這個特點：每一個元音都拉得老長，就像柴可夫斯基歌劇中凄婉哀怨的詠嘆調一樣，只不過底氣和力道更足罷了。

我笨手笨腳地把我手里的靴子遞給他，說這雙靴子是他姐姐莉迪婭讓我捎給他的。“不，不，這都是干什么呢？”他說，看起來很窘迫，似乎我遞給他的是一件施舍品，“肯定搞錯了，它一定是給我弟弟的。”我也極為窘迫。他的妻子季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試圖讓我放松，問我英國是否正在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沒有等我回答，帕斯捷爾納克就插話說：“我30年代，就是1935年，到巴黎參加反法西斯大會，返回途中路過倫敦。讓我給你說說當時發生的事吧。那是夏天，我在鄉下，兩位或許是來自內務部人民委員會（NKVD）——我認為肯定不是作家協會——的官員拜訪我。那時我們還不很害怕這樣的拜訪。其中一位對我說：‘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有一個反法西斯代表大會要在巴黎召開，你受邀去參加，我們希望你明天就出發。你將經停柏林，在那里待幾個小時，可以見見你想見的任何人：你會在后天到達巴黎，晚上在大會上演講。’我說我沒有合適的衣服出訪，他們說他們來辦。他們給了我一套大禮服和幾條帶條紋的褲子、一件板袖翼領的襯衣和幾雙很合腳的黑漆皮鞋。但我獲準穿著普通的衣服前往。我后來得知，是安德烈·馬爾羅，大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一直堅持邀請我。他對蘇聯當局解釋說，不送我和巴別爾去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猜測，因為我們在西方知名度很高，那時歐洲和美國自由派人士感興趣的蘇聯作家還不是很多。于是，雖然我一開始沒有出現在蘇聯代表團的名單里——我怎么可能出現在這個名單里呢？但他們還是同意了。”

他去了柏林，在那里見到了他的姐姐約瑟芬和姐夫，并且說他趕到大會的時候，許多重要知名的人物——德萊塞、紀德、馬爾羅、福斯特、阿拉貢、奧登、斯彭德、羅莎蒙德·萊曼和其他貴賓都已經到了。“我做了演講。我說：‘我知道這是一次作家的聚會，目的是組織起來共同抵抗法西斯主義。我給你們說的只有一件事情，不要搞組織。組織是對藝術的扼殺。只有個人獨立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1789年、1848年還是1917年，作家們都沒有組織起來去擁護或反對什么。不要組織，我懇求你們，不要搞組織。’我想他們一定很奇怪，但我還能說什么別的嗎？我原以為說了這話回國后會惹出麻煩，但沒有人再與我提起過這件事。[77](#_77_11)隨后我到了倫敦，在那里見到了我的朋友羅蒙諾索夫，一個極為迷人的人物，正如他的姓氏那樣，是一位科學家——一位工程師。我坐我們的一艘船返回列寧格勒，與謝爾巴科夫住一個艙，當時他是蘇聯作家協會書記，頗具影響力[78](#_78_11)。我沒日沒夜地嘮叨。他央求我停下來讓他睡覺。但我還是不停地說。巴黎和倫敦喚醒了沉睡的我，我無法停下來。他求我可憐他一會兒，但我毫無所動。想必他一定認為我精神錯亂了；或許我該感激他作出的這個判斷。”帕斯捷爾納克沒有明說，被認為有點瘋或至少行為非常古怪，可能幫助他在大清洗中逃過了一劫。但在場的其他人說他們完全明白這一點，以后會解釋給我聽。

帕斯捷爾納克問我是否讀過他的散文，特別是他的那篇我十分欣賞的《柳威爾斯的童年》。我說我讀過了。“我能從你的表情看出來，”他不容分說，“你一定認為這些作品做作、令人頭疼、自以為是、現代得讓人惡心——不，不，不要否認，你確實是這么想的，你的想法完全正確。我為寫出這樣的東西而汗顏——我說的不是我的詩歌，而是我的散文——它受了那些年里流行的象征主義運動中最脆弱、最混亂的東西的影響，充滿了離奇的混亂——當然安德烈·別雷是一個天才，《彼得堡》、《柯吉克·列達耶夫》都包含了精彩的內容——這些我都知道，你不必告訴我——但是他的影響是致命的，喬伊斯是另外一回事，我那時寫的所有東西都像著了魔似的，言不由衷、支離破碎、矯揉造作、毫無價值；但我現在正在寫的東西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是新的、全新的，清新、典雅、比例得當，具有經典作品所必須的純粹和簡約——這是溫克爾曼要求的，也是歌德要求的。這將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這是，是的，這正是我希望人們牢牢記住的作品；我將用我的余生全力寫好它。”

我不敢擔保這些話全是一字不差的原話，但我所記得的就是這樣。那部精心構思的作品就是后來的《日瓦格醫生》。他在1945年完成了前幾章的草稿，他要求我讀一下，并捎帶給他在牛津的姐姐；我照辦了，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整部小說的計劃。說到這里，他沉默了一陣子，我們誰也沒有說話。然后，他告訴我們他是多么喜歡格魯吉亞、格魯吉亞的作家、亞什維利、塔比澤和格魯吉亞的酒，在那里他經常得到充足供應。他友好地詢問我西方的現狀；是否知道赫伯特·里德和他的個人主義學說？他解釋說，個人主義理論基本上來自于康德及其解釋者赫爾曼·科恩的道德哲學——特別是個人自由的思想。他對科恩很熟悉，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馬堡當學生的時候對科恩極為尊重。他問我是否知道康德式的個人主義——勃洛克完全誤解了他，并且在其詩歌《康德》中把他變成了神秘主義者。他問我是否知道斯特凡·席曼斯基，一位曾編輯過一些他的翻譯作品的個人主義者？對于俄國的現狀，他無話可說。我意識到，俄國的鐘已經在1928年左右停擺了（我注意到，不管是他還是我曾經拜訪過的其他作家都沒有用過“蘇聯”這個詞）。那時它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實際上都被切斷了；例如，《蘇聯百科全書》對他和他的作品的描述，就沒有提及他的晚年或作品。

他剛說到一半，著名的老作家莉迪婭·謝芙琳娜突然闖了進來，打斷了他的談話。“我的遭遇跟他完全一樣，”她說，“百科全書上那篇關于我的文章的最后幾行說：‘謝芙琳娜目前正處在一場心理和藝術的雙重危機中’——這句話二十年都沒變。對俄國的讀者來說，我現在仍處在危機中，處在生命中止的危機中。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你和我，我們就像是龐貝城里的人一樣，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埋在了火山灰燼當中。我們孤陋寡聞：我知道梅特林克和吉卜林去世了；但威爾斯、辛克萊·劉易斯、喬伊斯、蒲寧、霍達謝維奇，他們還健在嗎？”帕斯捷爾納克看起來有些尷尬，就把話題換到了法國作家上。他讀過普魯斯特——他的法共朋友送給他普魯斯特的全部作品——他說，他近來重新讀了一遍。他當時還沒有聽說過薩特和加繆[79](#_79_11)，對海明威也不甚了解。（他說：“我想不通為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娃[阿赫瑪托娃]對他什么都知道。”）他熱情地要我到他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去看他——他從10月起會在那里。

他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偶爾也會連珠炮似的突然冒出幾個詞。他的言語常常會越出語法結構的限制——前面幾句還明白易懂，接下來便是狂亂、生動、具體的意象，后面可能是幾句晦澀難懂的話，然后會突然間變得清晰明白起來。在任何時候，他的演講都帶著詩人氣質，和他的作品一樣。有人曾說，有的人寫詩的時候就是詩人，寫散文的時候就是一個散文作家；還有的人不管寫什么東西都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一位天才詩人。他平時談話就像他的作品那樣說明了這一點，我無法描述它的品質。在我看來，唯一一個像他那樣說話的人是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是從我與她的幾次相遇得出的判斷。和他一樣，她的談話也讓人頭腦興奮，以同樣令人愉悅的，甚至通常是令人震驚的方式去顛覆人們對現實的一般看法。

我用“天才”這個詞是有用意的。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要用這個讓人浮想聯翩但又不明確的詞。為了作答，我只能這樣說：有人曾經問舞蹈家尼金斯基怎么能跳得那么高。據說他回答道，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當人們騰空時，大多數人會馬上落地。“你干嗎要馬上落下來呢？為什么不在落地之前多在空中停留一會兒？”他據說是這樣說的。在我看來，天才的標準之一，就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而且也清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們既不知道怎樣去做，也不知道為什么他們自己做不到。帕斯捷爾納克有時說話跳躍很大；他的用詞就我所知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既灑脫又非常感人。毫無疑問，有很多種文學天才：（在我的經驗里）艾略特、喬伊斯、葉芝、奧登、羅素就不這么說話。

我不希望打擾主人太久。當我離開時，我已經被詩人的談吐和個性深深地打動，事實上是被完全征服了。我接著去了鄰近的茹科夫斯基別墅。雖然他富有魅力、友善、饒有趣味，是一位敏銳和有趣的談話者，但我腦子里還是想著一個小時前對談的詩人。在茹科夫斯基的別墅，我遇見了薩穆伊爾·馬沙克。他是拜倫作品的翻譯家，也是一位兒童詩歌作家，因為受到馬克西姆·高爾基的保護而得以避開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風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設法活了下來。他是少數幾個被允許會見外國人的作家之一。我在莫斯科的幾個星期里，他對我很友好，實際上他是我有幸遇到的莫斯科知識分子中最仁慈、心眼兒最好的人之一；他隨意而痛苦地談起了過去的恐怖，對未來不抱信心，更愿意談英國和蘇格蘭文學，這是他喜歡和了解的，但在我看來他沒有什么興趣去說這些。當時還有其他人在場，其中有一個作家，如果別人不說，我記不住他的名字。我問他俄國文學界的情況：誰是最著名的作家？他提到許多作家，其中有列夫·卡希爾。我說：“是Shvambraniya[一部成人幻想小說]的作者嗎？”他說：“正是。”“但那是一部乏味的小說，”我說，“我幾年前讀過了——我認為它缺乏想象力，既枯燥又幼稚——你喜歡它嗎？”“是的，”他說，“我愿意讀這部小說，我覺得它真誠，寫得也不壞。”我表示不贊同。幾個小時后，天黑了下來，我說我不大認路，他樂意陪我到車站。分手的時候，我對他說：“您一整天都對我很好，可我很抱歉沒有記住您的名字。”“列夫·卡希爾，”他說。我呆住了，羞愧、悔恨、為自己的失態而窘迫。“但是，”我說，“您為什么不告訴我呢？Shvambraniya……”“我尊重您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對我們作家來說，碰到真話是很不容易的。”火車來之前，我一直在道歉。在我的經驗中，還從沒有人表現得這么讓人敬佩；此前或此后，我都沒有再遇到一位像他這樣拋卻了虛榮自負或自愛的作家。

等車期間，天下起了雨。站臺上還有兩個人，是一對年輕夫婦，我們擠在一個棚子里，這是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幾塊厚木板搭在一個舊的、廢棄的柵欄上。我們交談了幾句——他們是學生——男的說他學化學，女孩子是一名學習19世紀俄國歷史特別是革命運動史的學生。天完全黑了，站臺上沒有燈，我們甚至看不清彼此的臉；這使他們覺得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談很安全，談得很自由。那個女孩說，教科書上說上個世紀的俄羅斯帝國就是一個大監獄，沒有思想或表達的自由：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真的，但極端分子似乎經常逃掉，不帶恐怖主義的抗議那時通常并不意味著拷問和死亡，甚至連恐怖分子都給逃掉了。我說：“為什么人們現在對社會問題不能說出自己的想法呢？”我承認我說這話的時候并不全然不理解。那個男的說：“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他就會像被掃帚掃掉一樣被消滅掉，我們都不知道他身上發生了什么。從那以后沒有人會再見到他或聽到他的消息。”我們換了一個話題。他們告訴我，現在年輕的俄國人最喜歡讀的是19世紀的小說和故事：不是契訶夫，也不是屠格涅夫，這些人在他們看來都過時了，談的都是他們少有興趣的問題；也不是托爾斯泰——或許因為（正如他們所說的）他們對戰爭中過分強調《戰爭與和平》是偉大的民族愛國史詩感到厭倦。他們讀的是能夠找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迦爾洵的書，以及更容易得到的外國杰作——斯湯達、福樓拜（不是巴爾扎克或狄更斯）、海明威和某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比如歐·亨利。我說：“蘇聯作家呢？肖洛霍夫、費定、法捷耶夫、葛拉德科夫、富爾曼諾夫怎么樣？”我一口氣說出我腦子中想到的當代蘇聯作家的名字。女孩子問：“你喜不喜歡呢？”那個年輕的男子說：“高爾基有時候要好些。我過去喜歡羅曼·羅蘭。我覺得你們國家是不是有偉大而絕妙的作家？”我回答說：“沒有，沒有絕妙的。”但是他們似乎在懷疑，或許他們認為我對英國作家特別嫉妒，或者是一個對資產階級藝術家不屑一顧的共產主義者。火車來了，我們上了不同的車廂——談話不可能再持續下去了。

像這些學生一樣，很多俄國人（至少在那個時候）似乎相信在西方——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文藝繁盛，他們接觸不到。我對此表示懷疑，也從來并不相信：充其量，這只是出于禮貌或厭世的資產階級的無聊。甚至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朋友們都堅信西方有一個金色的文化王國，在那里天才的作家和評論家已經并且正在創造著他們看不到的杰作。這個信念很普遍。我在1945年和1956年見到的大多數作家，像左琴科、馬沙克、謝芙琳娜、茹科夫斯基、因培爾、謝爾文斯基、卡希爾等人，并且不僅僅是作家，還有像普羅科菲耶夫、涅高茲、薩莫蘇德這樣的音樂家，像愛森斯坦和泰羅夫這樣的導演，還有一些我在公眾場合、在蘇聯對外文化關系協會（VOKS）舉辦的官方宴會上以及少數幾次在他們自己家里見到的畫家和評論家，還有我在科學院一次會議上遇到的一位哲學家——那次是我受邀發表演講，主持人不是別人，正是從榮譽和權力巔峰跌落之前的卡岡諾維奇，所有這些人不僅僅極為關心——實際上是十分渴望得到歐洲藝術和文學進展的消息（極少關注美國的情況），而且確信那里從未停息地產生著出色的藝術、文學和思想著作，蘇聯嚴苛的檢查讓他們什么都看不到。所有未知的東西都震撼人心，被夸張放大。我無意貶低西方成就，但我想指出我們的文化進展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令人自豪。可能一些移居西方的人仍然期待著這種豐富的文化生活，否則就有幻滅感。反對“無根世界人”的活動顯然部分來自對這種極端親西方情感的反對，首先可能起自那些返鄉的蘇軍士兵——他們既有曾經的戰俘也有占領軍——對西方生活的謠言，同樣還起自蘇聯報刊和廣播對西方文化一貫的粗野誹謗的自然反應。俄羅斯民族主義被用作對知識群體中不健康情趣的解毒劑，它時常為兇殘的反猶主義宣傳所強化，這反過來卻在知識階層中引發了強烈的、在我看來根深蒂固的親猶太和親西方的情感。到1956年，對西方的無知少多了，可能相應地對西方的熱情也少多了，但還是遠超過合乎情理的熱情。

帕斯捷爾納克回到莫斯科后，我幾乎每周都去拜訪他，對他的了解也逐漸深入。他說話的時候帶著人們難以形容的特有活力和飛揚的想象才能。我不打算描述他在外表、聲音和儀態方面的改變。他談到書籍和作家；我希望當時全部記了下來。隔了這些年，我只記得在現代西方作家中他最喜歡普魯斯特，深深為他的作品所吸引。他喜歡《尤利西斯》——至少在當時他還沒有讀到喬伊斯后來的作品。幾年后，當我給他往莫斯科帶去兩三本卡夫卡作品的英文版時，他沒有產生興趣，后來他告訴我他把書送給了阿赫瑪托娃，她很贊賞這些作品。他談到法國象征主義者，談到維爾哈倫和里爾克，這兩個人他都見過。對里爾克，不管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一個作家，他都很推崇。他熟讀莎士比亞，對自己的翻譯作品特別是《哈姆雷特》和《羅密歐與朱莉葉》很不滿意。在早先的談話中，他說：“我曾試圖完全把握莎士比亞，但并不成功。”他隨后舉了幾處他自認為的失敗譯文，可惜我都給忘了。戰爭期間的一個晚上，他告訴我他正在聽英國廣播電臺，聽正在朗誦的詩歌——他理解英語口語有困難，但他認為廣播里的詩歌是精彩的。他自問道：“這是誰寫的？”——似乎有些熟悉。“什么，是我寫的？”他自言自語道；但實際上是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的片斷。

他說，他是在托爾斯泰的陰影里長大的。他的父親很了解托爾斯泰，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偉大，堪與莎士比亞、歌德和普希金比肩。他的畫家父親曾在1910年帶他到阿斯塔波沃去看臨終前的托爾斯泰。他發現了不可思議的、關鍵性的事情：俄羅斯和托爾斯泰是同一回事。至于俄羅斯詩人，勃洛克當然是他那個時代舉足輕重的天才，但帕斯捷爾納克并沒有從他身上找到默契。別雷更接近他，是一個充滿奇妙和前所未有洞見的人，一個富有魅力的、在東正教傳統中被稱為圣愚的人。他認為勃留索夫是一個自制的、精巧的、機械的音樂盒，是一個聰明的、精于算計的取巧者，根本算不上一個詩人。他沒有提到曼德爾施塔姆。他對茨維塔耶娃最感親切，他和她之間有著多年的友誼。

他對馬雅可夫斯基的感情要復雜得多：他跟他很熟，曾經是親密的朋友，向他學習過。他說，馬雅可夫斯基當然是破除舊形式的巨人，他不像其他共產主義者，他始終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位重要詩人，不是一個丘特切夫或勃洛克那樣不朽的神，甚至不是像費特或別雷那樣的半神。他已經淹沒在時間的長河里。他生活的年代需要他，他是無可替代的，那些時代呼喚并涌現出來的詩人，他們生逢其時，阿謝耶夫、遭到清洗的可憐的克留耶夫、謝爾文斯基，甚至還有葉賽寧。他們滿足了時代的迫切需要，他們的天才之作對于他們國家詩歌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之后他們就不再輝煌。馬雅可夫斯基就是這些人中最偉大的一位——《穿褲子的云》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喊叫得過了頭：他把自己的才華吹得太大，直到把牛皮吹爆。多彩氣球的悲哀碎片仍散在俄羅斯文學的道路上。他有天分，有價值，但粗糙而不成熟，最終成了一位海報藝術家。馬雅可夫斯基的愛情經歷對他來說，無論是作為一個男人還是作為一位詩人，都是災難性的。帕斯捷爾納克一直喜歡馬雅可夫斯基這個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自殺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帕斯捷爾納克是一個俄國的愛國主義者——他感到他與祖國的歷史聯系非常深。他一再告訴我，他對在別列杰爾金諾作家村度過夏天是多么自豪，因為那里曾經是偉大的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尤利·薩馬林地產的一部分。傳統的真實路線從傳說中的薩德柯開始，通向斯特羅加諾夫家族和科丘別伊家族，通向杰爾查文、茹科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萊蒙托夫，再通向阿克薩科夫家族、托爾斯泰、費特、蒲寧、安年斯基——特別是通向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而不是自由知識分子，正如托爾斯泰所堅持的，后者并不知道人靠什么生存。這種希望被看成是一名深深扎根俄羅斯土地的俄羅斯作家的強烈的、癡迷的愿望，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他對自己猶太血統的反感。他不愿討論這個話題——不是因為他覺得難堪，而是并不喜歡：他希望猶太人被同化，不再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除了直系親屬，他對親戚沒有興趣，一直都是這樣。他說他是一個虔信的基督徒——雖然有些特殊。在所知的猶太作家中，他崇拜海涅、赫爾曼·科恩（他在馬堡讀書期間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導師），他顯然認為科恩的觀念——特別是歷史哲學——是深邃的、令人信服的。我注意到如果我提到猶太或巴勒斯坦，他就很不自在：在這方面，他與他的畫家父親很不一樣。我曾經問阿赫瑪托娃她親密的猶太朋友——曼德爾施塔姆、日爾蒙斯基或艾瑪·格爾斯坦——是否對這個問題敏感：她說他們都不怎么喜歡他們出身其中的猶太中產階級，但并不會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去刻意回避這個問題。

他的藝術趣味是年輕時候就形成的，他對那個時期的大師們保持著尊崇。他對斯克里亞賓的懷念令我尊重——他一度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作曲家。我很難忘記帕斯捷爾納克和涅高茲（著名音樂家、帕斯捷爾納克妻子季娜伊達的前夫）對于斯克里亞賓的贊美——他們都受到他的音樂的影響，還有對于象征主義畫家弗魯別利以及尼古拉·羅列赫的贊美——他們將這兩位畫家置于所有的當代畫家之上。無論是畢加索和馬蒂斯、布拉克和波納爾、克萊和蒙德里安，還是康定斯基或馬勒維奇，比起這兩位畫家來似乎都不算什么。

從一定意義上說，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和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是19世紀最后的絕響——帕斯捷爾納克和風格獨特的曼德爾施塔姆或許可以占據世紀之交的位置。只有他們才可被稱為第二次俄羅斯文藝復興運動碩果僅存的最后代表，盡管阿克梅派詩人企圖把象征主義貶低到19世紀，宣稱他們自己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詩人。這場運動基本上與現代運動無關，與他們同時代的畢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喬伊斯無關，即便他們受到尊重。這一運動在俄國因諸多的政治事件而夭折。

帕斯捷爾納克熱愛俄羅斯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原諒祖國的所有缺點，除了斯大林統治的暴行；即便如此，他還是把1945年視為黎明前的黑暗，他盡力用眼睛搜尋晨曦——他在《日瓦戈醫生》最后幾章表達了這個希望。他相信自己與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分擔它的希望、恐懼和夢想，表達它的聲音，就像丘特切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和勃洛克以不同風格所做的那樣（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并不認可涅克拉索夫）。在我訪問莫斯科期間，他同我談話，那時我們總是單獨相處，光潔的桌子上沒有一本書或一片紙，他一再重復說他相信他與祖國的心靈是貼近的，并且堅決而反復地否認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在這方面的作用，特別是前者。他覺得他有一些話要對俄國的領導人說，一些只有他能夠說出來的極為重要的話，雖然這在我看來顯得模糊不清而又前言不搭后語——他經常提到這一點。這也許是由于我缺乏理解力——但安娜·阿赫瑪托娃曾對我說過，當他用這種先知式的語調說話時，她也聽不懂他究竟要說什么。

正是在那時，他以一種亢奮的情緒向我談起他就曼德爾施塔姆被捕與斯大林電話交談的事。那次著名的對話有很多不同的流傳版本，并且仍在流傳。我只能靠記憶來復述他1945年給我講述的這段往事。據說他當時正和妻子、兒子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旁邊沒有別的人，電話鈴響了起來，一個聲音告訴他這是克里姆林宮的電話，斯大林同志想和他通話。他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惡作劇，就把電話掛了。但電話鈴又響了，電話里的聲音不知為何讓他確信這電話是真的。斯大林問他是不是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說正是他。斯大林問他，當曼德爾施塔姆朗誦一首譏諷他斯大林本人的詩歌時他是否在場。[80](#_80_9)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在他看來，他在不在場無關緊要，但能和斯大林通話，他感到十分榮幸；他說他知道這一天會到來，還說必須就一些最重要的問題面談。斯大林接著問他曼德爾施塔姆是否稱得上是一位大師：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他們是風格很不相同的詩人；他贊賞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作，但感到它沒有吸引力；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

在他對我重述這個事件的過程中，帕斯捷爾納克又開始了他關于世界歷史重大轉折點的形而上學臆想；他想和斯大林談的就是這個——他這樣做是至關重要的。我能想象他也是用這種語調與斯大林說的。斯大林再一次問他，當曼德爾施塔姆朗讀那首諷刺詩時他是否在場。帕斯捷爾納克再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和斯大林見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取決于此，他們必須談談關于生死的終極問題。“如果我是曼德爾施塔姆的朋友，我懂得應該如何為他辯護，”斯大林說完就掛了電話。帕斯捷爾納克試著打回去，但不出意料，未能接通。顯然這件事一直深深地困擾著他。他至少在另外兩個場合對我重復了這個故事。很顯然他也用其他形式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其他來訪者。他多方設法解救曼德爾施塔姆，特別是向布哈林求助，可能保護了曼德爾施塔姆一段時間——幾年之后曼德爾施塔姆還是被處決了——但帕斯捷爾納克明顯感到，如果他換一種應對方式，無須講什么理由，就能對曼德爾施塔姆[81](#_81_9)更有利。只要是一個沒有被自大或愚蠢蒙住眼睛的人都會這樣覺得。

說完這個故事他又談起了其他受害者：皮利尼亞克（總是向窗外張望）焦急地等待一個特使來，讓他在一封譴責一個被控于1936年叛國的人的公開信上簽名，但沒有任何人來，這下他意識到自己也完了。帕斯捷爾納克又談起1941年茨維塔耶娃自殺的情形。他認為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當局不是那么絕情。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人跑來要他在一封譴責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公開信上簽名。當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簽名并解釋了原因之后，那個家伙熱淚盈眶，說詩人是他見過的最高貴最圣潔的人，并熱烈地擁抱了他，然后直接到秘密警察那兒告發他。

帕斯捷爾納克接著說，雖然共產黨在戰爭期間，不只是在俄國還在其他國家起了積極作用，但他發現與黨保持任何形式關系的念頭變得越來越讓他厭煩：俄羅斯是艘大船，奴隸船，黨員是監工，抽打著劃槳的奴隸。他想知道，為什么一個當時在莫斯科的英聯邦外交官（這人我應該認識），一個略通俄語并自稱是詩人的人，常常來拜訪他，為什么這個人老是說，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場合帕斯捷爾納克都應該與黨走得更近一些？他不需要從世界另一邊來的紳士告訴他應當做什么——他問我能否轉告那個家伙：他的來訪不受歡迎。我答應照辦，但后來并未這樣做，部分是因為我擔心帕斯捷爾納克本已岌岌可危的處境會更加危險。那位英聯邦外交官后來很快離開了蘇聯，他的朋友們告訴我，他后來改變了想法。

帕斯捷爾納克也指責我，不是因為我試圖強加給他什么政治或其他觀點，而是由于另一些他認為同樣糟糕的東西。我們都在俄國，舉目望去，周邊的每件事都是那么惡心，令人震驚，簡直就像一個令人作嘔的豬圈，而我看上去還挺興奮的。“你四處閑逛，”他說，“看什么都覺得迷惑。”他認為我并不比其他外國來訪者好到哪里去，那些人什么也看不見，被荒唐的假象所蒙蔽，指責貧窮而悲慘的本地人。

帕斯捷爾納克對指責他本人遷就黨或國家的要求極端敏感。他看上去很害怕別人認為，只有他活了下來，這可能是因為他干了一些取悅當局的勾當，為躲避迫害而出賣良心，作出一些卑鄙的妥協。他一再提起這個話題，大費周章地進行解釋，說凡是知道他的人沒有誰會認為他做了錯事。有一天，他問我是否聽別人提起他的戰時詩集《在早班車上》是他向正統觀念示好的一個姿態。我老實回答說我沒聽誰提起過，我認為這種看法是荒謬的。

安娜·阿赫瑪托娃是他的摯友，也是他最敬佩的人。她告訴我，戰爭結束時她從塔什干回列寧格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曾訪問了別列杰爾金諾。她剛到沒幾個小時，就收到帕斯捷爾納克的口信，說他不能來看她——他發燒了——臥病在床呢——沒辦法來看她。第二天又傳來了相同的口信。第三天他來了，氣色非常好，沒有任何生病的跡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問她，是否讀過他那本最新發表的詩集。他問的時候臉上帶著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就機靈地回答說沒有，還沒有看。帕斯捷爾納克的臉上立刻云開日出，如釋重負，他們談得很愉快。不用說，他顯然為那些詩感到害臊。他似乎認為寫那種“市民詩歌”是一種敷衍，沒有什么比那種題材更讓他反感了。

不過，在1945年，他仍然對俄羅斯的偉大復興抱有希望，這復興是戰爭這一滌舊煥新的大風暴的結果——一場橫掃一切的、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大風暴，就像十月革命那樣具有改天換地的力量，是一場超越我們微不足道的道德范疇的巨變。他認為，很難對這樣巨大的突變作出評判。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反復思考，盡可能理解它們。它們超越了善與惡，接受或拒絕，懷疑或肯定。它們必須被視為一種自然力的根本變化，是地震和海嘯，超越了一切道德和歷史范疇。于是，那些關于背叛、清洗、對無辜者進行大屠殺的噩夢，以及緊隨其后的令人恐懼的戰爭，對他來說都成了一種序曲；某種必然的、聞所未聞的精神勝利將隨之而來。

此后的十一年里我再沒有見過他。到1956年，他與他的國家政治當局之間的疏遠結束了。一提到它和它的代表人物，他總是不寒而栗。那時候，他的朋友奧爾嘉·伊萬斯卡婭已經被捕，經過嚴刑拷打后被投入勞改營關了五年。“你們的鮑里斯，”國家安全首腦阿巴庫莫夫曾問她，“你們的鮑里斯討厭我們，不是嗎？”“他們是對的，”帕斯捷爾納克說，“她無法否認也沒有否認。”我和涅高茲還有他與和前妻所生的一個兒子一起去別列杰爾金諾。涅高茲不厭其煩地對我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一個圣徒：他太不諳世故了——他指望當局能準許出版《日瓦戈醫生》的想法顯然太荒唐了——犧牲作者倒更有可能。帕斯捷爾納克是幾十年來俄國出現的最偉大的作家，因而他也會像其他許多人那樣被政府摧殘；這個政府是沙皇政權的繼承者。不管新舊俄羅斯多么不同，在對作家和藝術家的懷疑和迫害上，二者如出一輒。涅高茲的前妻季娜伊達——如今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妻子——曾經告訴涅高茲，帕斯捷爾納克準備在什么地方公開出版他的小說。涅高茲曾勸他打消念頭，但他的話不管用。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對我提起這件事，我會不會——這很重要——不僅重要，還可能事關生死，在那時候誰敢保證呢？——我會不會說服他罷手？涅高茲是對的，帕斯捷爾納克可能確實需要保重身體。

這時我們已經來到了帕斯捷爾納克家。帕斯捷爾納克在門口等著，他讓涅高茲先進屋，然后一邊熱烈地擁抱我，一邊說，在我們分別的這十一年里發生了太多的事，大多數都很可惡。他頓了頓，接著說：“你肯定有些話要對我說？”我極為不明智（簡直就是不可原諒地愚蠢）地說：“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我很高興地看到你別來無恙，最重要的是你挺過來了。對我們一些人來說，這簡直是奇跡。”（我心里想的是過去幾年斯大林對猶太人的迫害。）他的臉沉了下來，非常生氣地看著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列昂尼多維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腦子里在想什么！”他的聲調都變了，有點嚇人——“不要抵賴。我能看透你的想法，比看我自己的更清楚！”“我在想什么呢？”我又問，他的話讓我越來越感到不安。“你在想——我知道你在想——我為‘他們’干了一些事。”“我希望你明白，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我回答，“我從來沒有這么想過——我也從來沒有聽別人這么說過，哪怕是愚蠢的玩笑。”最后他看來是相信了我，但仍顯得心煩意亂。直到我讓他相信，在文明世界里人們都很尊敬他，不僅作為一個作家，也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人，這時他才逐漸恢復常態。“至少，”他說，“我可以像海涅一樣說：‘作為詩人，我也許不值得被記住，但作為一個為自由而斗爭的戰士，我將被人們銘記。’”

他把我帶進書房，把一個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書，”他說，“都在這里了。這是我的封筆之作。請指教。”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一天我都在讀《日瓦戈醫生》。兩三天后，當我再見他時，我問他想怎么辦。他告訴我，已經把書稿交給了一個在蘇聯電臺意大利語部工作的意大利共產黨員，這人同時還為意共的費爾特里內利出版社工作。他已經授權這家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說、他的絕筆，也是他作品中最真實、最完全的（他的詩與它沒法相比。雖然他認為小說里的詩是他寫過的最好的詩）——他希望這部小說能夠傳遍全世界，“用我的語言把人心點燃”（他引用普希金著名的詩篇《先知》）。

這天的某個時刻，當有名的故事高手安德羅尼科夫正對客人津津樂道地說起意大利悲劇演員薩爾維尼時，季娜伊達·尼古拉耶芙娜把我拉到一旁，眼淚汪汪地求我勸說帕斯捷爾納克不要把《日瓦戈醫生》拿到國外出版：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為此受難；我應該很清楚“他們”會干出什么事來。我被這個請求所打動，立即與帕斯捷爾納克談起這件事。我說我可以把他的小說制成縮微膠片，埋在世界各地——埋在牛津，埋在瓦爾帕萊索，在塔斯馬尼亞，在海地，在溫哥華，在開普敦，在日本——這樣即使爆發一場核戰爭，這些膠片也能留下來；他真的打算和蘇聯當局對抗，考慮過后果嗎？

那一周我第二次與他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對我真有點發火了。他說，我說的當然是好意，他感激我對他和家人安全的關心（他說這些時略帶一些諷刺的意味），但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說我比十一年前那個英聯邦外交官更啰唆，那個人曾試圖讓他改信共產主義；他與孩子們談過了；他們已經做好了受難的準備。他請我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讀過了這部小說，知道它（特別是它一經傳播）對他意味著什么。我沒有話好說了。

過了一會兒，或許是為了活躍氣氛，他說：“你知道，我現在不會比你所認為的更不安全。比如，我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已經演出成功：我給你說一個有趣的故事。”他使我想起來，他曾經把我介紹給蘇聯最有名氣的演員之一，利瓦諾夫（他補充說，他的真名叫波利瓦諾夫）。利瓦諾夫對帕斯捷爾納克翻譯的《哈姆雷特》非常熱心，幾年前曾想自導自演。他得到了官方的允許，開始排練。這期間，他還應邀到克里姆林宮參加由斯大林主持的正式宴會。斯大林的習慣，是在晚宴的某個時候，挨桌走動，向人致意并碰杯。當他來到利瓦諾夫桌前的時候，演員問他：“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該怎么演《哈姆雷特》？”他希望斯大林說些什么，什么話都行；然后他就可以拿著斯大林的話來用。正如帕斯捷爾納克所指出的，如果斯大林說“你必須以陰郁的方式來演出”，利瓦諾夫可能就會告訴他的演員們說演得還不夠陰郁，領導人明確指示要陰郁些；他，利瓦諾夫，獨自把握領導人的想法，導演和其他所有人都要聽他的。斯大林停下來說：“你是一個演員？在藝術劇院工作？那么你應該向劇院的藝術指導提出你的問題；我不是戲劇方面的專家。”沉默了一下，斯大林接著說：“那么，既然你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也應該給出我的答案：《哈姆雷特》是一部頹廢之作，壓根兒就不應該上演。”第二天排練就停下來了。直到斯大林去世很久以后，《哈姆雷特》才演出。“你看，”他說，“形勢變了，總是在變。”又是一陣沉默。

然后我們就像往常一樣談起了法國文學。自十一年前我們分別后，他設法搞到了薩特的《惡心》，并覺得它不忍卒讀，它的淫穢描寫令人反感。經過四個世紀不斷誕生創造天才之后，難道這個偉大的民族再也產生不出偉大的文學作品了嗎？阿拉貢趨炎附勢，杜亞美和格埃諾無聊透頂；馬爾羅還在寫作嗎？我還沒有回答，他午餐的客人之一，一個有著天真和甜美表情的女人（這種表情可能在俄羅斯比在歐洲更常見到），一個剛結束十五年的勞改營生涯而被放回來的教師（她僅僅因為教授英語而被關），略帶羞澀地問我奧爾德斯·赫胥黎在《針鋒相對》之后是否還寫過別的作品；另外，弗吉尼亞·伍爾夫還在寫作嗎？——她從未讀過伍爾夫的作品，但從一份神秘出現在勞改營里的法國舊報紙上，她覺得自己會喜歡。

很難形容我因能給這些人帶來外部世界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消息而感到的喜悅，這些消息是他們真正渴望了解的，而他們不可能從別的渠道了解到。我把所有我知道的英國、美國和法國的作品告訴她和其他在場的人，就好像在一座荒島上對一群與文明隔絕了幾十年的失事船民說話一樣。我所說的一切，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新鮮、令人振奮和欣喜。格魯吉亞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偉大朋友蒂奇安·塔比澤死于大清洗；他的遺孀尼娜·塔比澤在場，她想知道在西方的劇院里莎士比亞、易卜生和蕭伯納是否仍然聲名顯赫。我告訴她，人們對蕭伯納的興趣已經減退了，但是契訶夫受到極大的尊崇，他的劇目經常上演。我又說，阿赫瑪托娃曾對我表示她無法理解人們對契訶夫的推崇，認為他的世界完全是灰暗的，陽光從未閃耀，劍光從未閃爍，一切都籠罩在可怕的灰暗迷霧中，契訶夫的世界是一片泥潭，可憐的人們絕望地陷入其中，這是對生命的嘲弄。帕斯捷爾納克當即表示，阿赫瑪托娃完全錯了：“你見到她時請轉告她——我們不能自由地去列寧格勒，也許你能——你代表這里在場的所有人告訴她，所有的俄國作家都在對讀者進行說教：甚至屠格涅夫都曾告訴讀者說時間是一劑良藥之類的話；只有契訶夫不這樣。他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完全融入藝術——他就是我們的福樓拜。”他接著說，阿赫瑪托娃肯定會對我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攻擊托爾斯泰。但托爾斯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斷是對的：“他的小說是混亂的，摻雜了沙文主義和歇斯底里的宗教，契訶夫卻不是這樣——告訴安娜·阿赫瑪托娃，就說是我說的！我深深地愛著她，但我從來不能說服她。”但當我1965年在牛津再次見到阿赫瑪托娃時，我想最好還是不要把他的判斷告訴她：她也許想反駁他呢；但帕斯捷爾納克已經躺在墳墓里了。實際上，阿赫瑪托娃確曾帶著動情的仰慕對我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讓我們回到1945年，描述一下我在列寧格勒與這位詩人（她厭惡“女詩人”這個詞）的會面吧！我聽說列寧格勒“古籍書店”（蘇聯的稱呼）里的書要比莫斯科便宜不少；在列寧格勒封鎖期間可怕的死亡率和用書換取食物的可能性，曾給政府書店引來大量的圖書，特別是那些舊式知識分子的書籍。曾有傳說，列寧格勒的一些居民，因為疾病和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得搬不動整本的書，于是就請朋友幫忙把詩集按篇章扯開：整本書和書的散頁就這樣流進了書店的二手書柜臺出售。我無論如何也應該想法到列寧格勒去一趟，因為我很想再去看看這座我小時候住過四年的城市；書的誘惑也讓我很想去。在慣常的晚點之后，我被準許在老式的阿斯托里亞賓館住了兩個晚上，和我同行的是英國議會駐蘇聯的代表布倫達·特里普夫人——她是一個聰明而富有同情心的有機化學家，我們在11月末的一個陰天抵達列寧格勒。

## 三

從1920年起我就沒見過這個城市了，那時候我十一歲，我家被允許搬回故鄉里加，就是后來獨立的加盟共和國（拉脫維亞）的首都。到了列寧格勒，我對童年的回憶變得格外鮮活起來。看著眼前的街道、房子、雕像、堤岸、市場，還有突然閃入眼簾的一家熟悉的小商店——人們在里面制作俄式茶炊，我家曾住在小店的樓上，房子內院看起來破敗骯臟，一如革命初期的那幾年——我的激動之情難以言表。這些真景實物勾起了我對一些特定事件和經歷的回憶。我仿佛走進了一個傳說中的城市，我自己成了這些依稀記憶的生動傳說的一部分，同時還能從置身事外的有利位置看著這一切。這座城市曾遭受嚴重破壞，但在1945年，它依然保持著難以言傳的美（十一年之后我再次見到它時，它完全得到了修復）。

我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涅瓦大街盡頭的作家書店。我希望這家書店就像當年那樣有兩個部分：外間是給普通讀者的，可以通過柜臺要書；里間是給熟悉的作家、記者和其他有特權的人的，開架自由取閱。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我和特里普夫人獲準到里間。看書的時候，我與一位正在翻看一本詩集的人聊了起來。他原來是一位知名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學家。我們談論近來發生的事件，他向我描述列寧格勒封鎖期間可怕的考驗，以及眾多居民的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他說，一些人死于饑寒交迫，一些人活了下來，主要是年輕人，還有一些撤離了。我向他問起在列寧格勒的作家們的命運。他說：“你指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嗎？”阿赫瑪托娃對我來說是一個遙遠過去的人物；莫里斯·鮑拉翻譯了她的一些詩，向我說起她，說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就仿佛再不為人所知了。“阿赫瑪托娃還活著嗎？”我問。“阿赫瑪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他說，“怎么啦？當然活著。她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豐坦卡運河邊的噴泉宮。你想見見她嗎？”就好像突然被邀請去見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小姐一樣，我差點說不出話來。我結結巴巴地說我確實很想見她。“我去給她打電話，”我的新相識說。他回來告訴我，她下午三點接待我們，讓我下午再來這間書店，我們一起去。我同特里普夫人返回阿斯托里亞賓館，問她是否愿意去見一見詩人——她說她去不了，她下午很忙。

我在約定時間回到書店。批評家和我離開那里，向左拐，跨過阿尼奇科夫橋，再次左轉，沿著豐坦卡河的堤岸走。噴泉宮，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宮殿，是一座輝煌的晚期巴洛克建筑，圍繞著一片空曠的院子而建（有點像牛津或劍橋一個大學院的那種方院子），門上裝飾著列寧格勒那種著名的鐵飾。我們爬過一條陡直昏暗的臺階到了樓上，被領進阿赫瑪托娃的住處。房間陳設極為簡陋，我推斷房間里的所有東西在大圍城時期都被弄走了——不是被洗劫就是被賣掉。只剩下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個木柜、一張沙發，壁爐里沒有生火，上方掛著莫迪利亞尼畫的一幅畫。一位儀態高貴、頭發灰白的女士，肩上裹著一條白色的披肩，款款起身歡迎我們。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瑪托娃氣度無比雍容。她舉止從容，道德高尚，容貌端莊而又有些嚴肅。我鞠躬致意。這是應當的，她的儀容看上去就像一位悲劇中的女王。我感謝她能接待我，并說西方的人們如果知道她還健在會非常高興，因為好多年來都沒有她的消息了。“是嗎？不過《都柏林評論》最近發表了一篇關于我的評論，”她說，“我聽說博洛尼亞還有人以我的作品為題寫了論文。”她身邊還坐著一位朋友，是一位看起來很有學問的女人，她們偶爾會友好地談上幾分鐘。然后阿赫瑪托娃問我大空襲期間倫敦的情況：我盡我所能地回答她，因她那種高高在上的、女王般的威儀而真切地感覺到局促不安。突然，我聽到外面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起先我沒理會——這可能是幻覺——但喊聲越來越大，“以賽亞”這個詞聽得很清楚。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我認出了是倫道夫·丘吉爾。他站在大院子中間，像一個有點醉酒的大學生，正在喊我的名字。我愣了好一會兒，然后回過神來，咕噥了一聲對不起，就跑下樓梯：我唯一的念頭就是阻止他到這個房間來。我的那個批評家同伴緊張地跟在我后面。我們來到院子里，丘吉爾過來向我熱情地打招呼。“X先生，”我機械地說，“我想你還沒見過倫道夫·丘吉爾先生吧？”批評家呆住了，他的表情從迷惑變為驚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開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但看到蘇聯還在出版他的作品，我斷定這次偶然的會面對他無妨。我不清楚自己是否被秘密警察跟蹤，但毫無疑問倫道夫·丘吉爾是被跟蹤的；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在列寧格勒引起各種謠言，說有一個國外派來的特使來勸說阿赫瑪托娃離開俄國；說溫斯頓·丘吉爾終身都很崇拜詩人，專門派了一架飛機來接阿赫瑪托娃去英國，等等。

倫道夫是我的牛津大學同窗，畢業后我就沒見過他了。我快速領他離開噴泉宮后，問他這是怎么回事。他解釋說，他作為北美報業聯盟的記者派駐莫斯科。他來列寧格勒也是為了工作。他到了阿斯托里亞賓館，第一件事就是想找個冰箱放他搞到的一罐魚子醬：但他不懂俄語，翻譯又不見了，最后總算找到布倫達·特里普夫人幫了個忙。她幫他處理了魚子醬，在閑聊中告訴他我在列寧格勒。他說他認識我，并且覺得我會是一個更優秀的翻譯，不幸的是，布倫達·特里普夫人對他說我去舍列梅捷夫宮殿了。接著就發生了剛才的事：因為他不知道我具體在哪兒，就采用了當年在牛津基督教堂學院時屢試不爽的方法，我敢說，在其他場合也管用。他帶著勝利的微笑說，這招真靈。我以最快的速度擺脫了他，從書店老板那兒弄到阿赫瑪托娃的電話號碼，打電話向她解釋我倉促離去的原因并道歉。我問是否還能去拜訪她。“我今天晚上九點等著你，”她回答道。

晚上我到她家的時候，一位女學者——她第二任丈夫亞述學家希列伊科的一個學生——也在場，并問了我一大堆關于英國大學及其組織的問題。阿赫瑪托娃顯然對此不感興趣，大部分時間默不作聲。快到午夜時，那位亞述學者走了，阿赫瑪托娃開始問我那些移居西方的老朋友的情況——我可能認識其中的一些人（后來她告訴我，她敢肯定這一點；她確認，在對私人關系的判斷上，她的直覺從來沒有錯過，只要看上兩眼）。我確實認識他們中的一些人：我們談起作曲家阿爾圖爾·盧里耶，戰時我在美國見過他；他是她的一位密友，曾為她和曼德爾施塔姆的一些詩譜過曲子。談起詩人喬治·阿達莫維奇。談起裝飾藝術家鮑里斯·安列普——我沒見過他，對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裝飾過國家美術館前廳的地板，用的是名人圖像，包括伯特蘭·羅素、弗吉尼亞·伍爾夫、葛麗泰·嘉寶、克萊夫·貝爾、利迪婭·羅帕柯娃等人。如果時間推到二十年后，我還可以告訴她，安列普也把她的畫像添了進去，并命名為“憐憫”。她要是知道這些，會深深為之感動。她給我看1917年時安列普送給她的一枚鑲著黑寶石的戒指。

她問起沙羅美·哈爾佩恩，父姓安德羅尼科娃，她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圣彼得堡很出名——是那個時候有名的美人，風趣、聰慧而富有魅力，與當時的俄國詩人和畫家們交好。阿赫瑪托娃告訴我——實際上我已經知道了——曼德爾施塔姆與她相愛過，把他最優美的一首詩獻給她。我很熟悉沙羅美·尼古拉耶芙娜（和她丈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維奇·哈爾佩恩），給阿赫瑪托娃說了一些她們的生活、友情和觀點。她問了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妻子薇拉，我那時還不認識。我只是1965年在牛津才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她談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對巴黎的訪問，提到她與阿梅迪奧·莫迪利亞尼的友誼，后者為她畫的肖像畫掛在壁爐上方——這僅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在大封鎖期間都給毀掉了）。她說起在黑海邊度過的童年，她把那里稱為一塊未受洗的異教土地，在那兒，人們覺得貼近一種古代的、帶有些希臘因素又有種野蠻人味道的、完全非俄羅斯的文化。她談到第一任丈夫，著名詩人古米廖夫，他盡力扶植她——他認為一個詩人應該與另一個詩人結婚的說法是荒誕不經的，偶爾會尖刻地批評她的作品，但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羞辱過她。有一次，當他從阿比西尼亞旅行（他幾首最奇異輝煌的詩的主題）回來時，她到圣彼得堡的火車站去見他（幾年后她在牛津用同樣的話給我和季米特里·奧博連斯基又講了一遍這個故事）。他看上去很嚴肅：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寫詩了嗎？”“是的。”“那就讀一讀吧！”她讀了。“不錯，不錯，”他連聲說，眉頭舒展開來，然后他們回家了。從那以后，他把她當成詩人看了。她確信古米廖夫沒有參與被指控的保皇黨人陰謀。許多作家都替古米廖夫向高爾基求助，但高爾基不喜歡古米廖夫，從一些記述來看，他沒有為古米廖夫去說情。古米廖夫被捕時，阿赫瑪托娃已很久沒有見過他——此前幾年他們已離婚了。說到古米廖夫死時的慘狀，她雙眼噙滿了淚水。

沉默一陣后，她問我是否愿意聽她讀她的詩。在讀之前，她說她要先背誦拜倫《唐璜》中的兩段，因為這與她后面要讀的詩有關。雖然我對《唐璜》很熟悉，但我很難判斷她選的是哪兩段，因為雖然她讀的是英語，但她的發音使我只能聽懂一兩個單詞。她閉上雙眼，憑借記憶深情地背誦那些句子。我站了起來，向窗外望去，以掩飾我的尷尬。也許，我事后想到，這就跟我們現在讀古典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一樣。我們也會被那些句子感動，但我們讀起來，它們原來的作者和聽眾也會覺得完全聽不明白。接著，她開始讀自己的詩，從《六書》中選出來的《耶穌紀年》、《白色的鳥群》——“類似這樣但遠比我寫得好的詩，卻成為毀滅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詩人的罪名，我愛他，他也愛我……”——她指的是古米廖夫還是曼德爾施塔姆，我不好去問，因為她已哽咽，無法再讀下去了。后來，她接著讀當時尚未完成的《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她的朗讀存有錄音，不必我來描述。即便在那時，我都已意識到我正在聆聽的是一首天才之作。我想當時我還無法像現在一樣完全理解這首詩的多重內涵和絕妙之處，以及其中包含的高度個人化的暗示。她毫不掩飾，這首詩是她為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一生所作的總結性詩歌，獻給圣彼得堡這座成為她生命一部分的城市的過去，其形式如同《第十二夜》中假面人物的狂歡游行；獻給她的朋友們，獻給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也包括她自己的——作為一種大限將至之前的“西緬之頌”[82](#_82_9)。《來自未來的客人》的詩句和第三個獻辭當時還沒有寫出來。這是一篇神秘而深撼人心的作品：它很快被鋪天蓋地的評論掩埋。

然后，她看著手稿朗讀《安魂曲》。她突然停下來，談起1937年和1938年，當時她的丈夫和兒子被捕并被送進勞改營（這已經是第二次了）；談起監獄外日夜守候的女人們，周復一周，月復一月，等待著丈夫、兄弟、父親、兒子的消息，等著被準許給他們送食物或信件——但音訊皆無，那時死亡之幕籠罩在蘇聯城市的上空，數百萬無辜者正在經受著折磨和屠殺。她說話的聲音異常平靜，就像在陳述一個事實，有時會停下來說：“不，我不能再說下去了，這不太好。你來自人的社會，而我們這里被區分為人和……”接著又是一段長長的沉默。“就算現在……”她又一次沉默了。我問起曼德爾施塔姆：她的聲音哽住了，眼里充滿淚水，懇求我不要提他：“自從他打了阿列克謝·托爾斯泰一記耳光之后，一切都完了……”過了許久她才緩過勁來，接著用一種全然不同的語調說：“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喜歡我。當我們在塔什干的時候，他穿著淡紫色的襯衣，談論著我們回來之后能一起度過的好時光。他是一個有天賦的、有趣的作家，也是一個脾氣火暴、魅力十足的惡棍。他現在死了。他無所不能，沒有什么做不到的。他是一個可惡的反猶主義者，是個狂野的冒險家，一個壞朋友。他只喜歡年輕人，喜歡權勢和活力。他沒有寫完《彼得大帝》，因為他說他只會寫年輕時的彼得；對那些老人他該怎么處理呢？他是一個多洛霍夫式的人物。他叫我安娜什卡。這讓我有些尷尬，但我確實很喜歡他，盡管他造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詩人之死。我深愛著這位詩人，他也深愛著我。”（她的用語跟剛才一模一樣。兩相對照，現在我知道她指的是誰了。）

這時大概到了凌晨三點，她沒有要我離開的意思。我也聽得入神，不想動身。門開了，她兒子列夫·古米廖夫走了進來。他對他媽媽很平淡，媽媽對他充滿深情。他解釋說，他是列寧格勒著名歷史學家葉夫根尼·塔爾列的學生，他現在的研究領域是古代中亞部落史（他并沒有提到他原來在勞改集中營里）。他對卡扎爾人、哈薩克人和更早民族的早期歷史有興趣。他曾被準許參加囚犯組成的高射炮部隊，剛從德國回來。他似乎對能夠再次在列寧格勒生活和工作感到高興和自信，給我端來了一盤煮土豆，那是他們拿得出的東西，阿赫瑪托娃為自己沒有什么東西招待客人而表歉意。我請求她讓我抄下《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和《安魂曲》。“沒有必要，”她說，“我的一部詩選明年2月出版，都收在里面了，我會往牛津給你寄一本。”我們知道，這是黨控制的另一種方式。她被日丹諾夫指責（這話并非他的首創）為“半是娼妓，半是修女”[83](#_83_9)，同時受譴責的還有其他“形式主義者”和“墮落分子”，以及發表他們作品的兩種期刊。

列夫·古米廖夫離開后，她問我讀過什么：我還沒有答話，她就數落起契訶夫的“泥漿色世界”，他那枯燥無味的戲劇，他的作品缺乏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缺乏深度、厚重和崇高——我后來給帕斯捷爾納克說這是情感誹謗，她說在契訶夫那里“劍光從未閃爍”。我說托爾斯泰喜歡契訶夫的作品。“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被逼致死？”她問道，“她一離開卡列寧，一切都變了：在托爾斯泰眼里，她突然之間成了茶花女那樣的墮落女人，一個娼妓。當然也有一些精彩篇章，但基本的道德傾向讓人惡心。誰懲罰了安娜？是上帝？不，是社會，是托爾斯泰一直在批判的這個偽善的社會。最終他告訴我們安娜甚至厭棄了渥倫斯基。托爾斯泰在撒謊：他知道還有比那更好的結局。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觀念就是托爾斯泰妻子的道德觀念，是他那些在莫斯科的姨媽的道德觀念。他比誰都更清楚，但他強迫自己可恥地遵守低俗下賤的陳規陋習。這一切都是他個人生活和人生際遇的直接表現。當他還沉浸在婚姻的幸福中時，寫下了《戰爭與和平》以歌頌家庭生活。當他開始憎惡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卻不能同她離婚的時候——因為離婚會受到社會的譴責，或許也會受到鄉下人的譴責，他寫下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離開卡列寧而懲罰她。當他上了年紀，對農家姑娘的性欲不再強烈時，他就寫了《克魯采奏鳴曲》，主張完全禁欲。”

或許這種總結并不特別嚴肅，但阿赫瑪托娃對托爾斯泰說教的厭惡卻是真的。她把他看成是一個極為虛榮的利己主義者，一個愛和自由的敵人。她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和他一樣對屠格涅夫不屑一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是卡夫卡（“他寫書獻給我并寫關于我的故事。”1965年她在牛津告訴我，“喬伊斯和艾略特都是很棒的詩人，但他們要遜色于卡夫卡”）。她談起普希金，說他當然理解一切：“他是怎么知道，又怎能知道所有東西的呢？這個頭發卷曲的沙皇村年輕人，胳膊下夾著帕爾尼的詩集？”她說起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說起故事中那個臉色蒼白的陌生人按觀眾提出的主題即興賦詩。她毫不懷疑這個人物的原型就是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支，普希金與他的關系好壞參半。波蘭問題使他們分道揚鑣，但他常能發現他同時代人中的天才人物。勃洛克有點相像，有著獨到的慧眼和超凡的天賦，他也可算是一位即興詩人。她說，勃洛克偶爾也會寫詩稱贊她，但從來沒有喜歡過她，但俄國所有的女教師都相信并且還會繼續相信，他們之間有過一段戀情——“文學史學家也會這么看——這可能都源自我1914年寫的題獻給他的《拜訪詩人》那首詩，或許源自我講‘灰眼睛國王’之死的那首詩，盡管這首詩寫在勃洛克死前十多年。還有其他一些詩。但他不喜歡我們中的任何人”——她談起阿克梅派詩人，特別是曼德爾施塔姆、古米廖夫和她自己——又說勃洛克也不喜歡帕斯捷爾納克。

接著她談到了她所深愛的帕斯捷爾納克。她說，只有當帕斯捷爾納克處于低潮的時候，他才會表達與她在一起的愿望。然后他會到她這里來，常常會在一些感情投入之后發一陣子狂，精疲力盡，他的妻子會很快趕來把他領回去。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都很容易陷入戀愛。帕斯捷爾納克偶爾會向她求婚，但阿赫瑪托娃都沒有嚴肅考慮過。他們從來都不可能真正地愛上對方。雖然沒有戀愛，但他們都深愛和敬慕對方，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死后，他們都成了孤身一人。得知對方還活著并且還在創作，對他們兩人來說都是莫大的安慰。他們彼此批評對方，但從不允許其他任何人這樣做。她敬慕茨維塔耶娃。“瑪麗娜是一個比我還優秀的詩人，”她對我說。但是現在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都已經走了，她和帕斯捷爾納克還在沙漠中孤獨地活著，盡管他們被無數蘇聯男女的熱愛和忠誠所包圍，這些人用心體會他們的詩歌，傳抄著、傳播著、朗誦著。這給他們帶來了自豪和快樂，但他們都還在流放中。他們深沉的愛國主義不帶一絲民族主義的色彩，都接受不了流亡的想法。帕斯捷爾納克希望去西方訪問，但如果因此不能返回祖國，他就不會去。阿赫瑪托娃對我說她哪兒都不想去了：她打算終老在自己的祖國，無論將遭受怎樣的苦難。她從來沒有打消這個念頭。他們對西方豐富的藝術和思想文化抱有奇妙的想象——一個金色的世界，充滿創造性的生活——都希望去看一看并與之進行交流。

黑夜悄悄流走，阿赫瑪托娃變得越來越活潑。她問及我的個人生活，我毫無保留地作了回答，似乎她有絕對的權力知道。她回報給我的是精彩的敘述，包括她在黑海之濱的童年生活，她與古米廖夫、希列伊科、普寧的婚姻，她與年輕時的同伴的關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圣彼得堡。僅僅依據這一點，那些意象和符號的序列、假面戲劇、《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中的所有假面舞會，及她對《唐璜》和即興喜劇的反應，都可以得到理解。阿赫瑪托娃再次談到沙羅美·尼古拉耶芙娜·哈爾佩恩，她的美貌、魅力、才智，她不能為二三流詩人所容（“這些人現在成了四流詩人”）；談到在“迷路狗”表演歌舞的那些夜晚，以及在哈哈鏡劇場的演出；談到她對象征主義的故作神秘的反感，雖然波德萊爾、魏爾倫、蘭波、維爾哈倫都對她印象深刻。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是一個無比優秀和雅致的人，他的趣味和判斷力絕對沒有問題，批評能力極為出色，但在她看來，他的詩作冷漠而缺乏同情心。安德烈·別雷也是這樣。至于貝爾蒙特，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忽視——他當然是自負和自大得可笑，但很有天賦。索洛古勃善變，但有趣而富于原創性。簡樸而講究的沙皇村學校校長因諾肯季·安年斯基要比這些人更偉大，他教會她很多東西，甚至比他的弟子古米廖夫教她的還要多，他去世的時候大多數編輯和批評家對他都沒有怎么注意，他是一位被遺忘了的大師：沒有他，很可能就沒有古米廖夫，沒有曼德爾施塔姆，沒有羅津斯基，沒有帕斯捷爾納克，沒有阿赫瑪托娃。她談到音樂，談到貝多芬最后三部小提琴奏鳴曲的莊嚴和優美——帕斯捷爾納克認為它們比貝多芬身后公演的四重奏更偉大，她認同這一點，并以全部的天性感受樂章中蘊含的劇烈情感變化。帕斯捷爾納克把巴赫和肖邦畫等號，這在她看來顯得奇怪而迷人。她發現同他談音樂要比談詩歌更容易些。

她說到了自己的孤獨和孤立，既有人際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戰后的列寧格勒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朋友們的墳場：就像一場森林大火之后的殘跡——剩下的幾棵燒焦的樹使它顯得愈發荒涼。她有些忠實的朋友——羅津斯基、日爾蒙斯基、卡德茲夫、阿爾多夫夫婦、奧爾加·貝爾格霍茲、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艾瑪·格爾斯坦（她既沒有提到迦爾洵，也沒有提到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我那時對他們的情況還一無所知）——但支撐她的，不是這些朋友，而是文學和關于過去的意象：普希金的圣彼得堡；拜倫、普希金、莫扎特、莫里哀作品中的唐璜；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巨幅全景畫。她靠翻譯過活。她曾請求允許她翻譯魯賓斯的書信，而不是羅曼·羅蘭的，最終獲得同意。我見過它們嗎？我問她是如何理解文藝復興的，是一段被不完美的人類所棲居的真實歷史，還是一個想象中的世界的理想化幻象？她回答說當然是后者。所有的詩與藝術，對她來說——這里她引用了曼德爾施塔姆的一句話——都是一種懷舊的形式，都是對普世文化的渴望，正如歌德和施萊格爾認為的那樣，是關于已經變成藝術和思想的事物，關于本性、愛、死亡、絕望與殉難，關于一種不受歷史限制，沒有任何例外的真實。她再次談起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那是哺育了她的城市；談起此后包裹著她的漫漫長夜。她的聲音平靜而連貫，沒有絲毫的自憐，就像一個放逐中的女王，高傲、郁郁寡歡、難以接近。

她向我講述她人生中一個又一個悲劇，遠遠超出了人們曾經向我所作的描述，回想起來歷歷在目、令人心痛。我問她是否想為她的文學生涯留下一個記錄。她回答說她的詩就是記錄，特別是那首《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她又給我朗讀了一遍這首詩。我再次懇求她讓我記下來。她還是婉謝了。我們的談話徜徉于文學和藝術之間，觸及了彼此生活的隱私，持續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我取道列寧格勒和赫爾辛基從蘇聯回國時，順路又拜訪了她一次。我在1946年1月5日下午去向她道別，她送了我一本她的詩選，扉頁上寫著一首新詩——這首詩后來成為組詩《詩五首》中的第二首。我發現這首詩一開始的敘述，靈感直接來自我們早先的那次會面。在《詩五首》和別的詩中，還能見到許多我們會面的影子。[84](#_84_9)

當我第一次讀到這些詩歌的時候，關于會面的暗示對我而言是清楚的：但阿赫瑪托娃的密友維克托·日爾蒙斯基院士，一個杰出的文學學者，她身后出版的個人詩集蘇聯版的編輯之一，通過與我的書信交流，準確地證實了我的印象。他曾經與作者閱讀了文本：她既對他談了三篇題獻、其日期及含義，也談了《來自未來的客人》。日爾蒙斯基帶著一些尷尬向我解釋為什么寫給我的最后獻辭——照他的說法，這個獻辭在俄國廣為讀者所知——在正式版本中去掉了。我很理解這樣做的理由。日爾蒙斯基是一個十分謹慎的學者，是一個勇敢而誠實的人，曾為堅持原則而受苦。他向我解釋說，他迫于政治環境而忽略了阿赫瑪托娃關于這方面的具體說明，為此而苦惱。我試圖說服他這無所謂：阿赫瑪托娃的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她的自傳，她的生活環境闡明了她詩句的意義，這比很多其他詩人的情況要好一些。不過，事實不可能被完全遺忘——正如在其他有著嚴格審查制度的國家，口頭傳統很可能把這些知識保留下來了。這種傳統可能朝不同方向發展，可能不會脫離傳說和寓言，但如果他希望讓那些小圈子里感興趣的人知道真相，他完全可以寫一個說明留給我或其他某個西方人，等到安全的時候出版出來。我懷疑他是否聽進去了我的忠告，但他一直為他在審查制度下當一名編輯的無力感到傷心，再三致歉。他訪問倫敦期間每次見面都這樣。

我的拜訪給阿赫瑪托娃帶來的影響，對我而言主要是由于這樣一個偶然的事實，即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我之前，她僅接待過一個外國訪客[85](#_85_9)。我認為，我是第一個來自外部世界的說俄語的人，可以給她帶來隔絕了很多年的世界的消息。她的才智、批判能力和諷刺性的幽默，與引人注目而有時有遠見和預見的現實感，似乎是并行不悖的。在我這里，她似乎看到了一位不祥的、可能是致命的世界末日的信使——對未來的悲劇性暗示給她造成了深遠影響，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她創造才能新的噴發。

我1956年再次訪問蘇聯的時候沒有見到她。帕斯捷爾納克告訴我，雖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希望見到我，她的兒子在我見到他之后又被逮捕，前不久剛剛從勞改集中營釋放回來，她因此對見外國人非常敏感，特別是她把我1945年的拜訪看成是她受到黨的強烈指責的部分原因。帕斯捷爾納克說，他懷疑我的訪問是否給她造成了傷害，但因為她確信已然造成傷害，并且被勸告要避免有害的交往，她就不可能見我了。但是她希望我給她打個電話——這是安全的，她的所有電話都受到監聽，他的電話也一樣。他告訴她，他在莫斯科見到了我的妻子和我，認為我的妻子討人喜歡，并為她不能見到我的妻子而遺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莫斯科待不了多久了，我很快給她打了電話。

“你住在哪里？”他問我。“在英國大使館。”“你決不能從那里給她打電話——你必須用公用電話——不能用我的電話。”

那天晚些時候，我打通了她的電話。“是的，帕斯捷爾納克告訴我你同你妻子在莫斯科。我不能去看你，你對此一定會理解的。我們可以這樣說話，因為他們都知道。你結婚多長時間了？”“時間不長，”我說。“那你結婚的準確時間是什么時候？”“今年4月。”“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不，她有一半法國血統，一半俄國血統。”“我明白了。”接著是長時間的沉默。“我很遺憾你不能來看我，帕斯捷爾納克說你妻子很迷人。”又是長時間的沉默。“你是否看到了我翻譯的朝鮮詩集？里面有蘇爾科夫的導言？你可以想象我懂多少朝鮮語；這是一本詩選，不是我自己選的。我會送你一本。”

此后，她給我講了一些自己作為一名受責難的作家的經歷：講了曾被她認作是可靠朋友的一些人所拋棄，也講了其他許多人的高尚和勇氣。她重讀了她曾那么嚴厲抨擊過的契訶夫的作品，說至少在《第六病室》中他準確地描述了她和其他人的處境。“帕斯捷爾納克（當向我說起來的時候，她總是這么稱呼他，這長期以來就是俄國人之間的習慣，從來不說‘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可能已經給你解釋了我為什么不能見你：他自己也有困難的時候，但沒有像我的處境這么讓人苦惱。誰知道我們這輩子還能不能見面呢！你還會給我打電話嗎？”我答應說會的，但等我再給她打電話的時候，我被告知她已經離開了莫斯科，帕斯捷爾納克強烈反對我試圖往列寧格勒給她打電話的想法。

1965年我們在牛津再次見面時，阿赫瑪托娃給我詳細描述了當局對她的指責。她告訴我，斯大林本人曾對這樣一個事實大發雷霆：她這樣一個不關心政治、很少出版作品的作家，一個在革命早期設法低調以求安全的人，竟然冒著被投入勞改集中營或被處決的風險，在沒有正式許可的情況下會見外國人，而且不僅僅是一名外國人，還是一名資本主義政府的雇員。“這么說我們的修女現在接受外國間諜的拜訪了。”據傳他是這么說的。他接著說了一些下流話，語言之難聽她一開始都不知道該怎么轉述給我。我從沒有在任何情報機構工作過，不過這一點無關緊要：在斯大林看來，所有外國大使館或使團的人都是間諜。“當然，”她接著說，“這個老頭子那時已經神志不清。那些看到他對我的事暴跳如雷的人，毫不懷疑他是一個給別人帶來苦難的迫害狂，這是其中一個人后來告訴我的。”我1946年1月6日離開列寧格勒的那一天，穿制服的人站在她樓梯的入口處，他們把一個麥克風安裝在她房間的天花板上，這顯然不是為了收集情報，而是恐嚇她。她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幾個月后，日丹諾夫宣布取消她和左琴科作協會員的資格。她把她的不幸歸因于斯大林個人的妄想狂。她在牛津對我說，她確信我們——就是說，她和我——不經意間，僅僅由于我們的見面這個事實，就開啟了冷戰，由此改變了人類歷史。她說的真的就是這個意思，并且像阿曼達·海特在她書中所證明的[86](#_86_9)，始終對此深信不疑，認為她自己和我命中注定要在一場驚天動地的歷史沖突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事實上，這在她當時的一首詩中也有所表現）。我不敢反駁她說，即便斯大林當時的暴怒是真的，即便其后果是可以想見的，她也在某種程度上高估了我們的會面對于世界歷史的影響，因為她會覺得這是對她作為一位兇事預言家的悲劇形象的侮辱，是對她詩歌中表現出的歷史——形而上學視野的侮辱。于是，我沉默了。

然后她談到去年到意大利的旅行，當時她去接受陶爾米納文學獎。她說回國后就遭到了蘇聯秘密警察的調查，問她對羅馬有何印象：她在作家中聽到過反對蘇聯的態度嗎？她會見了蘇聯流亡者嗎？她回答說，在她看來，羅馬似乎是一個異教與基督教仍然處于爭斗之中的城市。“什么戰爭？”她被問道，“提到美國了嗎？”當被問到英國或牛津，問到在謝爾登劇院同她一起接受榮譽的詩人西格弗里德·薩松或者其他受獎者是否有什么政治記錄時，類似的問題擺在她面前，她該如何回答呢？最好的方式，不就是把她自己局限在談論對當年亞歷山大一世在拿破侖戰爭尾聲接受默頓學院榮譽學位時送的豪華洗禮盆的興趣嗎？無論有什么事等著她，她都會回去的，因為她是俄國人。蘇聯政權是她祖國的現行體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意長眠于此。作為一名俄國人理當如此。

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俄羅斯文學。她說，她的國家在她一生中不斷帶給她的嚴酷考驗，催生了極有深度的優美詩歌，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多半還沒有發表。她說她不愿談到那些作品在蘇聯出版的當代蘇聯詩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當時碰巧也在英國，給她發來賀電祝賀她獲得牛津榮譽博士學位。電報來的時候我在場——她讀過之后，憤怒地把它擲到廢紙簍里：“他們都是些小混混，糟蹋自己的天賦，都是些利用大眾趣味投機取巧的人。馬雅可夫斯基對他們的毒害太深了。”她說，馬雅可夫斯基當然是一個天才，不是一個偉大詩人，而是一個偉大文學發明家，是一個用詩歌當炸彈炸毀了古老結構的恐怖分子，一個性情超越了才能的偉大人物——一個破壞者，滌蕩了所有事物。破壞當然是應該的。馬雅可夫斯基聲嘶力竭的吶喊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性。他是情不自禁。而他的模仿者們——她提到了幾個當世詩人的名字——是將他作為一個流派效仿他的風格，他們都是些平庸的朗誦者，在他們身上找不到一星半點真正詩歌的影子。俄羅斯聽眾已經習慣了這些現在被稱作“說話大師”的人們的喊叫。

老一代詩人中現在還活著的，她以贊許的口吻談到的唯一一個就是瑪麗亞·彼得羅維赫。但俄羅斯現在還有許多有天賦的年輕詩人：他們中最杰出的就是約瑟夫·布洛茨基，她說他是她一手培養起來的，他有一部分詩歌已經出版。他是一位備受冷遇的偉大詩人，其原因不言自明。還有其他一些很有天賦的詩人——但他們的名字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他們的詩歌無法出版，正是他們的存在證明了俄羅斯的文學想象還沒有枯竭。“他們會讓我們這一幫人都黯然失色，”她說，“相信我吧！包括帕斯捷爾納克、我、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我們都是從19世紀開始經過長期苦心孤詣的結果。我的朋友們和我都認為我們是以20世紀的聲音說話。而這些新的詩人譜寫了新的篇章——盡管他們現在還難逃藩籬，但他們遲早會掙脫出去，并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她以這樣一種預言的口氣說了一陣，然后轉回馬雅可夫斯基，朋友們的背叛把他推向絕望的深淵，但他一度還是民族的號角，代表著人民的心聲，雖然對其他人來說是一個失敗的例子。她本人沒有從他身上學到什么，但從安年斯基那里得益良多，他是一位最純粹、最優秀的詩人，遠離文學政治的喧鬧，很大程度上被先鋒派刊物忽視了，幸運地得以善終。生前他的作品沒有得到廣泛閱讀，而隨后這也成為其他偉大詩人的命運——今天這一代人對詩歌要比她那個時代的人敏感得多：在1910年，誰真正關注過勃洛克、別雷、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或者，又有誰關注過她本人和她那個流派的詩歌？但今天的年輕人對所有這些都了然于心——她還收到很多年輕人的來信，其中許多是傻乎乎的、癡迷的小姑娘，但單是信件的數量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帕斯捷爾納克收到的來信甚至更多，并且更喜歡信件。她問我是否見過他的朋友奧爾嘉·伊萬斯卡婭。我說沒有。她覺得無論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妻子季娜伊達還是他的情婦都讓人難以忍受，但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自己是一個迷人的詩人，是俄羅斯土地上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寫的每一個句子，不管是韻文還是散文，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不像她聽到的其他文字。勃洛克和帕斯捷爾納克都是超凡脫俗的詩人。沒有任何一位現代法國人或英國人可以與他們相比，梵樂希和卡萊爾都不行——波德萊爾、雪萊、萊奧帕爾迪方可與他們相比。像所有偉大的詩人一樣，他們對其他人的品質缺乏認識——帕斯捷爾納克常常贊揚一些比較差勁的評論家，發現一些想象中的隱藏起來的天才，鼓勵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稱職但缺乏才氣的作家——他對歷史有一種錯覺，認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有時也會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比如《日瓦戈醫生》中的葉夫格拉夫（她強烈反對這個神秘人物的原型是斯大林的說法；顯然她認為這是無法想象的）。他沒有真正讀過當代作家的作品——沒有讀過巴格里茨基、阿謝耶夫、瑪麗亞·彼得羅維赫，甚至也沒有讀過曼德爾施塔姆（他忍受不了他，雖然在曼德爾施塔姆身陷困境時，竭盡全力去幫助他），也沒有讀過她本人的作品——他就她的詩歌給她寫過不少熱情洋溢的信，但這些信上說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她——她知道它們是些美好的幻想，與她的詩歌沒有什么關系：“或許偉大的詩人都是這樣。”

帕斯捷爾納克的恭維自然使那些受到恭維的人很得意，但這只是自欺欺人。他從不吝惜自己的贊美之辭，但實際上對其他人的作品根本不感興趣：當然，他感興趣的是莎士比亞、歌德、法國的象征主義者、里爾克，或許還有普魯斯特，但“不是我們中的任何人”。她說她生命中沒有一天不在思念帕斯捷爾納克這個人。他們從沒有戀愛過，但彼此深深愛著對方，這讓他的妻子很惱火。隨后她談起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期這段“空白”時期，這段時期她完全從官方的報道中消失了。她說她除了翻譯，就是讀俄國的詩歌：當然經常讀的是普希金，還有奧多耶夫斯基、萊蒙托夫、巴拉廷斯基——她認為巴拉廷斯基的《秋天》是一部完美的天才之作。她最近重讀了韋萊米爾·赫列布尼克夫——荒唐但很精彩。

我問她是否為《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作過注：那些不熟悉它與生活關系的人，可能難以理解其中的暗示；難道她希望他們一直無知嗎？她回答說，當那些了解她所說的世界的人都變得衰老或行將就木，這首詩歌的生命也就到了終點；它將伴隨著她和她的世紀一起變成歷史。它不是為永恒的未來而寫，甚至不是寫給子孫后代的：唯有過去對詩人才有意義——尤其是童年——那是他們渴望再創造出來、渴望使之復活的感情。預言、對未來的頌歌，甚至普希金致恰達耶夫的偉大詩篇，都是一種慷慨激昂的浮華辭藻，用冠冕堂皇的觀念來吸引眼球，是詩人用眼睛端詳晦暗不明的未來。她鄙視這樣的裝腔作勢。

她說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醫生確診她的心臟不好，因此她耐心地等待著大限到來。她不希望被憐憫。她已經面對過各種恐怖，也體會過最讓人悲傷欲絕的不幸。她要求朋友們發誓不對她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憐憫，一旦流露就馬上壓下去。要是有人表露出這種感情，她就再也不理他們了。仇恨、侮辱、輕蔑、誤解、迫害，這些她都能夠承受，唯獨不能忍受攙雜著憐憫的同情——我能夠向她說真話嗎？我答應并堅持做到。她很高傲，自尊心非常強。

接著她向我提起戰時與科爾內伊·茹科夫斯基的會面，當時他們都被疏散到烏茲別克斯坦的城市里。有幾年她對他感情上有一些矛盾：她尊重他作為學者的卓越才華和智慧，經常贊揚他的正直和獨立，但不喜歡他冷漠和疑慮重重的樣子，對他對俄國民粹派小說、19世紀犯罪文學尤其是平民詩歌的興趣表示反感，這一點，以及20世紀20年代他對她的惡意嘲諷，在他們之間挖出了一道鴻溝。今天，他們作為從斯大林暴政下過來的人，已經和解了。她說，在前往塔什干的路上他待她特別親切，她就要寬恕他的全部過失了，沒曾想他突然說：“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那個時代——20年代，是俄羅斯文化史上多么美好的時代啊！高爾基、馬雅科夫斯基、年輕的阿列克謝·托爾斯泰，那個時代都很活躍！”她馬上收回幾乎就要說出口的寬恕。

與那些從后革命實驗年代的動蕩中過來的人不同，阿赫瑪托娃對這些做法深感厭惡；在她看來，它凌亂不堪，波希米亞式的混亂，開啟了俄國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它把真正的藝術家送到他們所能找到的防空洞：他們要是從里面跑出來，唯一的結果就是被戕害。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向我談到她的一生，表現出來的超然和客觀只能部分地掩飾她的感情傾向和道德判斷，這一點顯然無可置疑。在她對他人性格和生活的描述中，都帶著對性格和處境的道德中心的深刻洞見（在這方面她對朋友也毫不留情），以及她無法擺脫的賦予事情動機和目的的固有觀念，尤其當它們涉及她自己時，甚至對于我這對實情經常一無所知的人來說都難以置信——但這可能是由于我未能深刻理解斯大林專制的非理性和反復無常的特點，它使得人們對道德準則失去信心。在我看來，通過教條式地認定前提，阿赫瑪托娃創立了她以非凡的凝聚力與洞察力加以發展的理論和假說。她堅信我們的會晤將產生重大的歷史后果，就是這種成見的例證；她相信斯大林曾下令慢慢毒死她，后來又收回成命；相信曼德爾施塔姆的說法，就是在他死前不久，他在集中營里分到的食物有毒；相信詩人格奧爾基·伊萬諾夫（她指責他移居外國后寫的回憶錄充滿謊話）曾是受雇于沙皇政府的警探；相信19世紀的詩人涅克拉索夫很可能是政府的代理人；認為因諾肯季·安年斯基被他的敵人迫害致死。這些揣測沒有明確的事實根據——它們完全是直覺，但它們也并非毫無意義，并非純然的空想；它們構成了關于她自己和自己民族生存和命運的一貫觀念，這也是帕斯捷爾納克要與斯大林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支撐和構成她的文學和藝術的想象要素。她不是幻想家：總體上，她有著很強的現實感。她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圣彼得堡的文學和社會圖景以及她在其中的活動時，運用的生動細節和冷靜的現實主義眼光，使她的描述完全可信。我為未能詳細記錄下她的思想、行為和處境的細節而遺憾。

阿赫瑪托娃生活在一個可怕的時代，據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所說，她表現得非常勇敢。這已為各種證據所證明。她從未公開，甚至也不曾私下里對我說過一句反對蘇聯政府的話。但她的一生，正如赫爾岑描述俄國文學狀況時曾經說過的，在不斷地對俄國的現實進行控訴。今天在蘇聯，對她的懷念和敬仰——作為一名藝術家和一個不屈不撓的人——雖然沒有公開表達卻非常廣泛，就我所知，實在罕有其匹。她一直堅決抵制她認為對她的國家和她自己來說都是可恥的事情，使她（像別林斯基預言過赫爾岑那樣）不單成為俄國文學界的重要人物，而且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俄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回到本文的開頭：在1945年致外交部的報告中[87](#_87_9)，我寫道：無論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純粹內在的趣味還是未受到粗制濫造的作品的侵蝕，事實上毫無疑問的是，今天或許還沒有哪個國家，在那里，詩歌，不論是新的還是老的，優秀的還是微不足道的，銷量會有蘇聯這么好，閱讀的熱情會有蘇聯這么高。這不可能不對詩人和批評家都產生強大的刺激。我接著說，這培養了一批公眾，他們的反響是西方小說家、詩人和戲劇家所羨慕的；因而，如果最高層驚人的政治控制有所松懈，如果允許藝術家有更大的表達自由的話，那么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這樣一個對藝術創造如此饑渴的社會，在這樣一個仍然如此渴望體驗，仍然如此年輕，對一切看起來新鮮乃至真實的事物如此著迷的國家，總之一個擁有無窮的生命力，能夠掃除對一個薄弱文化來說錯誤、荒誕、罪惡、災難的事物的國家，輝煌的創造藝術不會在將來的哪一天重新復活。對具有生命跡象的一切事物的極端渴求和經過批準的作家和作曲家所提供的死氣沉沉之物之間的巨大反差，是當前蘇聯文化最令人震驚的現象。

我在1945年寫下了這些話，現在仍然適用。許多時候，看似黎明就要到來了，但對俄國知識分子來說，太陽還是沒有升起來。即便是最令人厭惡的專制政權，無意間也能保護最優秀的人才免于被腐蝕，有助于捍衛人的價值。在俄國，在所有政權之下，這多半與極端、經常是精巧而細膩的滑稽感結合在一起，表現在俄國文學的所有領域中，有時還體現為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令人痛苦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它有某種直率、情不自禁、精力充沛的特征，異于西方文學的詼諧、譏誚和精心虛構的娛樂。我繼續說，這是俄國作家的特點，即便為政權服務者，只要他們稍稍離開崗位，他們的舉止和談話也會非常吸引外國訪客。到今天，在我看來這一點仍不錯。

我同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和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會面和談話，對他們幾乎難以描述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以及他們所遭受的對待的認識，還有我得以與他們兩人建立個人關系甚至是友誼，都深深地影響了我并永遠地改變了我的世界觀。當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們的名字，聽到別人說起他們，我就會清楚地回憶起他們臉上的生動表情，他們的手勢和他們說的話。直到今天，一讀到他們寫的東西，竟仿佛又聽到他們的聲音。

# 附錄

與《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中《來自未來的客人》[88](#_88_9)相關的某些段落出自下列詩作。參考文獻引用了維克托·馬克西莫維奇·日爾蒙斯基（下文簡稱Z）編輯的阿赫瑪托娃詩卷《詩集與詩人》（Stickhotvoreniya i poemy/G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илозты）[89](#_89_9)（列寧格勒，1976）。G.P.斯特魯韋和B.A.菲利波夫編輯的安娜·阿赫瑪托娃的《詩集》（Sochineniya/Coчнения），卷1，卷2[慕尼黑，1967（第2版），1968]（以下簡稱SF I和SF II）[90](#_90_9)。

《詩五首》[91](#_91_9)，Z第415-419號：1，1945年11月26日；2和3，1945年12月20日；4，1946年1月6日；5，1946年1月11日（Z第235-237頁，第412、488頁注釋；SF I第283-285頁，第410頁注釋）。

《綻放的玫瑰：選自燒毀的筆記本》（Shipovnik tsvetet：iz sozhzhen-noi tetradi/шиповникцветёт：извыжженнойтетради），Z第420-433號：1，《燒毀的筆記本》（Sozhzhennaya tetrad/выжженнаятетрадь），1961；2，《在現實中》（Nayavu/Наяву），1946年6月13日；3，《在夢中》（Vo sne/Восне），1946年2月15日；4，《第一曲》（Pervaya pesenka/Перваяпесенка），1956；5，《另一曲》（Drugaya pesenka/Другаяпесенка），1956；6，《夢》（Son/Сон），1956年8月14日，科洛姆納附近；7，無標題，無日期；8，無標題，1956年8月18日，斯塔基；9，《破鏡中》（Vrazbitomzerkale/Vrazbitom zerkaleВразбитомзеркале），1956；10，無標題，1956（1957，SF），科瑪洛沃；11，無標題，1962，科瑪洛沃（Z第238-443頁，第412-413注釋，第488-489頁；SF I第288-295頁，第411-412頁注釋）。

Z第555號，無標題，1946年1月27日（Z第296-297頁，第499頁注釋；SF I第295頁，經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授權，作為《綻放的玫瑰》中的第十三首詩印刷，第412頁注釋）。

《午夜篇：詩七首》（Polnochnye stikhi：sem’stikhotvorenii/Полночниестихи：семь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Z第442-450號：《奉獻的地方》（Vmesto posvyashcheniya/Вместопосвящения），1963年夏；1，《迎春哀曲》（Predvesennaya elegiya/Предвесенняяэлегия），1963年3月10日，科瑪洛沃；5，《吶喊》（Zov/Зов）（最初發表時采用了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第三樂章的標題“哀傷的詠嘆調”，作品第110號），1963年7月1日；6，《夜之旅》（Nochnoe poseshchenie/Ночноепосещение）；1963年9月10-13日，科瑪洛沃（Z第247-250頁，第414-415頁注釋；SF I第303-306頁，第414-415頁注釋）。

Z第456號，無標題，1959年10月13日（1959年10月，SF），《雅羅斯拉夫爾大道》（Yaroslavekoe Chaussée/Ярославскоешоссе）（Z第253頁，第413、491頁注釋；SF I第320-321頁，第418頁注釋）（日爾蒙斯基教授確信它應該歸于本條目，我對其歸屬不太肯定）。

《選自意大利日記》（Iz italyanskogo dnevnika/Изитальянскогодневника）（梅切爾），Z第597號，1964年12月（SF I第311-312頁，注釋見第502頁）。

Z第598號，無標題，1965年2月，莫斯科（Z第312頁，第502頁注釋）。

《短歌》（Pesenka/Песенка），Z第601號，無日期（Z第313頁，第422-423頁，第502頁注釋）。

Z第619號，無標題，無日期（Z第313頁，第503頁注釋）。

《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三聯詩》（Poema bez geroya：Triptych/Поэмабезгероя：триптих），Z第648號，1940-1962（列寧格勒——塔什干——莫斯科。SF）：《第三即最后一首獻詞》（[Posvyashchenie]Tret’s i poslednee/Посвящениетретьеипоследнее），1956年1月5日（主顯節）；1913：《彼得堡故事》（Devyat’sot trinadsatyi god：petersburgskaya pov-est’/Девятьсоттринадцатыйгод：Перербургскаяповесть），第133-145行，《白廳》（Belyi zal/белыйзал），210（Z第354-355、358、360頁，第427、513-514頁注釋；SF II第102-103頁，第107頁第82-89行，第109頁第166行，第357-370、603-605頁注釋）；《尾聲》（Epilog/Эпилог），第40-50行（SF II第130-131頁）。

提醒讀者注意，《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以及上述其他詩中的某些形象可能是兩個或更多真實的、虛構的或象征性人物的結合。

我對學者們能提供的幫助就這么多，不愿增添任何文字。

# 跋：我生命中的三條主線

1979年的耶路撒冷獎揭曉時，以色列廣播公司給遠在牛津的我打來電話。記者問我：我受到三種傳統——俄羅斯、不列顛和以色列傳統的影響，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我不擅于即席回答突如其來的問題，我被這個深度的個人調查嚇了一大跳，無法給出一個明朗的答復。我從不認為自已特別重要，也不覺得自己特別有趣，從而成為自我或他人反思的話題，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但這個問題本身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既然有人問起，就值得作答。現在我將盡量給出答案。

## 一

我認為，我對觀念的畢生興趣應歸結于我的俄羅斯出身。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現代歷史，是各種抽象思想觀念產生巨大威力的活教材，即便這些思想觀念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與社會經濟因素相比，思想觀念完全沒有歷史重要性的觀點。俄國人具有大大簡化他人思想并用以指導行動的非凡天賦。他們獨一無二地將西方社會理論付諸實踐，改造了我們的世界，無論好壞優劣。我迷戀各種思想觀念，相信它們巨大的、有時是險惡的力量；我認為，除非人類理解了這些思想，否則就會成為它們的受害者，其危害程度要甚于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和人類自己的組織所造成的破壞力——我的這些想法每天都會被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所強化。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美國民主和美國文明及其巨大影響力、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第三世界或去殖民化世界的興起、伊斯蘭教的復興、以色列建國——所有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轉變；如若對這些轉變所體現的社會、道德、精神觀念不具備一定的洞察力，便無法理解這些轉變在改變人類生活方面的影響——不管這些觀念是高尚人道，殘忍可惡還是兼而有之——它們往往是危險可怕的強大力量，目的或好或壞，或者好壞兼備。我想，這是我的社會歷史觀中應歸結于我的俄羅斯出身的一個因素。

在這些觀念中，最古老最令人向往的，或許是關于地球上完美社會的幻想，這個社會完全公正、完全幸福、完全理性：這是對除在一些情況下之外，人們可以把握的所有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這些情況包括人類頭腦中的非理性思想，或階級斗爭，或唯物主義乃至西方技術的破壞性后果；再有，組織——國家或教會——的惡果，或者其他邪說惡行；沒有這些巨大障礙，理想就可以在這里或隨后實現。順理成章的是，既然在人類前進的道路上所需的一切是破除這些僅有的障礙，如果這是實現該目標的唯一途徑，那么付出多大的犧牲都不為過。任何觀點都沒有造成過這么多的暴力、壓迫和苦難。為了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未來，必須犧牲現實的呼聲——這個要求一直被用來為大規模的暴行辯護。很久以前，赫爾岑就告誡我們，為了遠期結果犧牲當前目標——今天屠殺千萬人，明天億萬人可能會幸福——往往意味著確確實實殺戮了千萬人的生命，但億萬人幸福的諾言不是更近，而是仍然遙不可及。信念行動——autos-da-fé[92](#_92_9)——當它們以崇高理想的名義制造苦難和野蠻鎮壓時，效果是使犯罪者缺乏負罪感，并不會帶來極端手段所承諾的幸福狀態，也無法為駭人聽聞的手段辯護。歸根到底，我們還是不清楚——即便是我們中最明智的人也不清楚——什么對人類有益。到頭來，我們僅能合理地斷定那個由個人組成的特定社會渴望什么：什么讓他們痛苦悲慘，什么讓他們值得為之活著。

人類的終極目標有時相互沖突：無法避免偶爾令人痛苦的抉擇和令人不安的妥協。但有些需求是共通的。如果我們能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者食飽衣暖，擴展個人自由，抗拒不公，創造一個有尊嚴社會的最低條件，如果我們抱有一點點寬容，建立一點點法治和社會平等，如果我們能找到無需使人類面對難以忍受的選擇就能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這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進步了。與革命派的閃光觀點和絕對真理相比，這些目標不那么令人向往，不夠激動人心。這些目標對那些理想主義的年輕人缺乏吸引力，他們喜歡邪惡與美德之間的劇烈沖突，喜歡在真理與謬誤、黑與白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甘愿在善良與公平的祭壇上做出英勇犧牲——然而，為了這些更加人道、溫和的目標而工作，結果將引向一個更加仁慈、文明的社會。幻想帶來的絕對正確的感受確實更加激動人心，但會在社會和個體之中引發愚蠢瘋狂的行為。

## 二

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為強烈的激情帶來了解藥。這種激情在藝術上有創造力，在生活中則是毀滅性的。這種對人類現實的文明感，是在英國社會發展起來、基于妥協和寬容的生活的特征，這在19世紀中東歐受盡壓迫，處于赤貧、半翻身狀態的猶太人后代眼里是那么奇妙。我承認自己有親英國偏見。我在英國受教育，從1921年起一直住在英國。我所有的成就、行為和想法都不可磨滅地是英國式的。我無法公正地判斷英國的價值觀，因為它們也是我的一部分。我把這視為在知識和政治方面的最大運氣。這些價值觀是我的信仰基礎，即對別人給予體面的尊重和容忍異見，勝過自豪感和國家使命感；自由可能排斥并優于過高的效率；多元主義和混亂狀態，對珍視自由的人而言，勝過包羅萬象的制度的嚴格要求，無論這些制度多么理性和公正無私，也優于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的多數派統治。所有這些價值觀都具有強烈、獨特的英國特征。我坦率地承認我沉浸其中，信仰它們，只有在一個很大程度上把這些價值觀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中，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人性這根曲木，”伊曼努爾·康德說，“絕然造不出筆直的東西來。”[93](#_93_9)同時請允許我引用著名德籍猶太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在1964年一場演講中的話，“我相信，諸如絕對必然性、絕對準確性、終極真理等觀念，都是想象中的無稽之談，在任何科學領域中都不應該被承認——信仰一種唯一的真理，并相信自己是這一真理的持有者，是世界上所有罪惡最深刻的根源”[94](#_94_9)。這些都是深刻的英國觀點，盡管出自德國——這是對借純粹的烏托邦觀念所體現的絕對必然性之名為自身辯護的急躁情緒、恃強凌弱和壓迫的善意警告。在當今世界上，無論何處，只要存在一個不被仇恨和極端主義驅使、尚可容忍的人類社會，那里肯定會發現三個世紀以來英國經驗主義的有益影響——遺憾的是，不一定有很多英國式實踐。不去踐踏別人，不管他們多么難以相處，雖然并不代表一切，卻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 三

我的猶太出身，對我而言是如此深刻、如此自然，以至于我根本無法辨認出來，遑論分析。但是我可以說，盡管我長期信奉個人自由，但我從未經不起誘惑，與那些假個人自由之名拒絕忠于某個特定國家、團體、文化、傳統、語言——這些特征將人類區分為不同群體，不計其數而又無法分析——的人為伍。于我而言，這雖然高尚，卻讓人誤入歧途。當人們抱怨孤獨時，他們的意思是沒有人能理解他們所說的話。被人理解意味著分享共同的過去、共同的情感和語言、共同的設想，可以進行親密溝通——簡而言之，就是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人類需求：否認這一點是一種危險的謬誤。將一個人與他熟悉的環境相隔絕就是讓他消亡。兩千年的猶太歷史，只不過是單純的回歸渴望，渴望不再到處都被當成他鄉之客；每天早晚，流浪的猶太人都在祈禱重回過去的日子，再次成為一個國家，在自己的土地上過上正常生活——這是個人能夠不屈不撓地活著，充分發揮他們潛能的唯一條件。任何民族，如果他們永遠是少數派——更糟糕的是無論在哪里都是少數派，沒有一個國家作后盾，就做不到這一點。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這種困境帶來嚴重后果的證據，盡管有時猶太人自己也不承認。我是在對這一事實的清醒認識中長大的，正是對這種困境的意識使我更容易理解其他民族、少數派或個人相似的壓抑沮喪之感。我之所以批評啟蒙運動的教義，譴責它缺乏對各個種族和文化的成員之間感情紐帶的同情，指責其唯心、空洞而教條的國際主義，就我自身而言，是出于對于我自己猶太出身以及對共同忍受苦難（完全不同于追求國家榮譽）的猶太同胞的手足情誼——幾乎是本能般的意識；也是出于一種友愛感，這種友愛感也許在貧困和遭受社會壓迫的大眾之中最真實，特別是在我的祖先，那些貧窮但受過教育、有社會凝聚力的東歐猶太人之中。這種友愛感，在我度過一生的西方，已經變得稀薄而抽象。

這就是以色列廣播公司記者問及我的三條主線。我已竭盡所能回答她的問題。

[[1]](#1_4)本卷第一版最初于1980年在倫敦、1981年在紐約出版；起初，本書是已出版的四本書的最后一本，書名是《作品選集》；所以，伯林在第x頁上稱之為“本版文集”。其他三部書是《俄國思想家》（倫敦與紐約，1978），與艾林·凱利合編；《概念與范疇：哲學論文集》（倫敦，1978；紐約，1979）和《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倫敦，1979；紐約，1980）。十年后出版了第五本，《扭曲的人性之材》（倫敦，1990；紐約，1991）。還有一本從上述幾本及以前的文集中選編的論文集：《對人類的適當研究：文選》，亨利·哈代和羅杰·豪舍爾編（倫敦，1997；紐約，1998）。

[[2]](#2_4)《自由四論》（牛津，1969；紐約，1970）和《維柯與赫爾德：觀念史研究二則》（倫敦與紐約，1976）。其他文集僅以譯文形式出版。

[[3]](#3_4)皮姆利科的平裝版（倫敦，1997）刊印了最近更新的伯林書目。

[[4]](#4_4)《北方巫師：J.G.哈曼和現代非理性主義的起源》（倫敦，1993；紐約，1994）和《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倫敦，1996；紐約，1997）。

[[5]](#5_4)參見第3頁注釋3。我列舉的人物中，哈伊姆·魏茨曼是第49和84條的主人公，其他人物分別是第91、97、123、129、140、171a、173a、181a、188a、191、192、192a、193、203、203a和215條的主人公。

[[6]](#6_4)利·哈代1997年11月

[[7]](#7_4)原文為法語，éloge。——譯注

[[8]](#8_4)原文為“lopping off the heads off tall poppies”，意為“削去高個罌粟的花冠”。源自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卷5：希臘哥林多暴君佩里安德用行動向米利都暴君色拉西布洛斯獻計：將罌粟的頂部切去，意即“將最成功的人鏟除”。1931年，澳大利亞官員用“cutting the heads off tall poppies”表述其平等主義政策。在當今英聯邦國家，“tall poppy”是對成功人士的蔑稱，他們由于才華成就出眾而受到憎惡、嘲諷、批評或攻擊。——譯注

[[9]](#9_4)原文為西班牙語，banderilla，指斗牛用的彩色帶倒鉤的短劍。——譯注

[[10]](#10_4)原文為“depersonalized”，意指去除個性，抽象化。——譯注

[[11]](#11_4)原文為拉丁語，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譯注

[[12]](#12_4)原文為“the son of Shirach”。——譯注

[[13]](#13_4)原文為法語，bien-pensants，意為“善意者”。——譯注

[[14]](#14_4)即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指20世紀上半葉在倫敦布魯姆斯伯里工作、居住、學習，進行非正式討論的一群作家、知識分子、哲學家和藝術家，其工作深刻影響了文藝、美學、評論、經濟以及當今對女權主義、和平主義和性行為的態度。代表人物有弗吉尼亞·伍爾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利頓·斯特拉奇。——譯注

[[15]](#15_4)卡拉馬佐夫說：“和諧被估價得太高了，我出不起這樣多的錢來購買入場券。所以我趕緊把入場券退還。”《卡拉馬佐夫兄弟》，第5部第4章，戴維·馬格沙克譯（哈芒斯沃斯出版社，1958年，卷1第287頁）。

[[16]](#16_4)原文為法語，pointilliste。——譯注

[[17]](#17_4)原文為拉丁語，pietas。——譯注

[[18]](#18_4)原文為拉丁語，gravitas。——譯注

[[19]](#19_4)原文為“smooth as Jacob’s hands”，源自《圣經·創世記》27：16。——譯注

[[20]](#20_4)原文為法語，raison d’état。——譯注

[[21]](#21_4)原文為德語，realpolitik。——譯注

[[22]](#22_4)原文為法語，bien-pensants，意為“善意者”。——譯注

[[23]](#23_4)原文為法語，oeuvre。——譯注

[[24]](#24_4)赫伯特·里德：《英語散文風格》（倫敦，1928）。

[[25]](#25_4)《最光輝的時刻》，《第二次世界大戰》卷2，（倫敦，1949），第88頁。

[[26]](#26_4)同上書，第201頁。

[[27]](#27_4)亞伯拉罕·林肯，《給國會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見《林肯集》，R.P.巴斯勒編（新不倫瑞克，1953），卷5。

[[28]](#28_4)據說，魏茨曼曾經說：“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必然需要輕微的瘋狂，但它是有幫助的。”

[[29]](#29_4)這在一百多年前，就由摩西·赫斯在他的名著《羅馬與耶路撒冷》（萊比錫，1862）中以無與倫比的洞察力預見到了。直到今天，這仍是對“被解放的”猶太社會最精彩的分析。

[[30]](#30_4)維薩里昂·別林斯基。

[[31]](#31_4)據說，哲學家赫爾曼·科恩曾帶著對一個古老斯多葛哲人的鄙視，對試圖讓他相信猶太復國主義好處的弗朗茲·羅森茨韋克說：“噢，這幫家伙現在想幸福了，是吧？”魏茨曼希望的正是這些東西；他不明白為何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投降行為。

[[32]](#32_4)在我的記憶中，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茨基、拉狄克是他向我提到的那時他在伯爾尼或其他地方與之辯論的幾個人物。我不知道是否找到了這方面的記錄。

[[33]](#33_4)原文為“cave of Adullam”，意為避難所或安息之地。——譯注

[[34]](#34_4)意味深長的是，在他十二歲前用希伯來文寫給校長的一封信中，他談起英國的時候認為這是一個善良而自由的國度，將會幫助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條有意思的信息要歸功于鮑里斯·居里埃爾，他在保存魏茨曼的生平和活動記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5]](#35_4)他晚年對這個研究所傾注了最深沉的愛。他常常帶著巨大自豪和滿足談到它，談到他的同事，實際上談到了與這個研究所的工作有聯系的每一個人。這來自他在這里得到的情感滿足，而別的任何事情都不會帶來同等程度的滿足。這個偉大的定居點形成的繁榮的國家，就是他傳遞給所有他真正信得過的人的持久活力的證據。

[[36]](#36_4)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思想和見解》（Ideas and Opinions），索尼婭·巴格曼新譯本和修訂本（倫敦和紐約，1954），第171頁。以后所有愛因斯坦的引文均出自該書，只注明頁碼。

[[37]](#37_4)第184頁。

[[38]](#38_3)第171頁。

[[39]](#39_3)第181頁。

[[40]](#40_3)第182頁。

[[41]](#41_3)第182頁。

[[42]](#42_3)第181頁。

[[43]](#43_3)第183頁。

[[44]](#44_3)波蘭曾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沙俄、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1918年11月11日恢復獨立。——譯注

[[45]](#45_3)他確實有強烈的求知欲——他喜歡閱讀和研究，事實上在1918年到1920年內戰從軍期間成了位于克里米亞的辛菲羅波爾大學的一名學生，學習哲學和語言學。

[[46]](#46_3)我被帶到婚禮現場。后來人們告訴我，當時現場有很多客人、音樂聲音很大，我突然哭了起來，說“我討厭尖銳吵鬧的音樂聲”，家人只好將我帶走。那次我未能見到他。

[[47]](#47_3)俄國共產黨1917年建立的秘密警察組織，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譯注

[[48]](#48_3)綠軍是俄國內戰時期，一個以無黨派、無政府主義和無君主主義論者為主的組織，被視為除了紅軍、白軍之外的第三方勢力。——譯注

[[49]](#49_3)原文為“Yishuv”，指以色列建國之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猶太人。——譯注

[[50]](#50_3)原文是希伯來語，Zikhrono livrakha。這是猶太悼詞最后的慣用語。——譯注

[[51]](#51_3)《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新政治家》，1927年11月5日，第103-104頁；再版于《摩天大樓及其他論文》（倫敦，1931）。參見《猶太人》，《19世紀及以后》，130（1941年7-12月），第270-277頁；再版于《沖突》（倫敦，1942）。

[[52]](#52_3)“我總對格蘭特·羅伯遜有些懷恨在心，他當考官時，更喜歡克拉特韋爾而不是我，”納米爾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對我說，“但當我想到他對德國猶太難民所做的一切時，我就原諒他了。”

[[53]](#53_3)他用德語有滋有味地引述了這句話：“was ein Jud’vom andern Juden adschreibt”。但是這一次他說得并不準確。真正的作者，我以前就知道，是赫爾曼·畢洛拉維克，一名奧地利議會的盧埃格爾基督教——社會黨成員，捷克籍，很顯然他曾經說過：“literatur ist was ein Jud’vom andern Juden adschreibt”。

[[54]](#54_3)只有納米爾會認為，受過教育的普通英國人（或蘇格蘭人）會想到他說的是這一事實：哲學家洛克被他的學生沙夫茨伯里伯爵任命為副大臣，而戈弗雷·埃爾頓——馬爾科姆·麥克唐姆在牛津大學女王學院的老師，最近被封為貴族。

[[55]](#55_3)納米爾十分緩慢地說出這個詞，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這增強了敘述的戲劇化效果。

[[56]](#56_3)我一點也沒有提到瑪麗安·法蘭克福特。這是我故意省略的：她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出眾，使得她不能被以一個很不重要的方式提出來。她應得到一份完整描述，我想，她的朋友們沒有一個會否認這一點。我所奉行的原則是：與其只說一點跟其身份不太相符的簡單的話，還不如完全不說。

[[57]](#57_3)《牛津大學報》，83（1952-1953），85。

[[58]](#58_3)《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卷32（1931-1932），第139-170頁；再版見賴爾的《論文集》（倫敦，1971），卷2。

[[59]](#59_3)唐納德·麥克納布說，我們的討論僅僅使他想起了一群灰狗在狂叫（或許是為了真理）。艾耶爾可能是受此刺激而出此言的。

[[60]](#60_3)比如，我說：“如果一匹叫斯維亞的馬參加了這場比賽的話，它肯定會贏。”假定這匹馬根本就沒參加比賽，或者根本不存在，而別人問我為什么我認為它會贏。如果我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雖然——甚至就因為——它是一個不合理看法，但我就想在真相上賭博，因為我喜歡賭博，且沒有半點興趣去了解這個說法是否有（或者是否能有）任何證據，那么，從某種意義（不管多“微弱”）上講，反事實的含義就跟“它的實證方法”分離了，即使事情的真相并未與此分離。

[[61]](#61_3)我們經常隨意地相互打斷，如此頻繁以至于熱愛秩序的奧斯汀提出，我們應有“一個蜂鳴器”來建立秩序。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

[[62]](#62_3)這篇文章在1935年11月28日宣讀，發表在《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第36期（1935-1936），第131-150頁。

[[63]](#63_3)《先驗概念是否存在？》，《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增刊卷18（1939），第83-105頁；再版于奧斯汀的《哲學論文》（牛津，1961；第3版，1979）。

[[64]](#64_3)《我的早期信仰》，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兩本回憶錄》（倫敦，1949）；再版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作品集》（倫敦，1971-1989），卷10，《自傳中的散文》。

[[65]](#65_3)《德國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共產主義》（倫敦等，1954），第191頁。

[[66]](#66_3)《米哈伊洛維奇將軍案》（倫敦，1944）。

[[67]](#67_3)書里十章中有九章是在他去世后人們才發現的，這本書（《荷馬》）于1972年在倫敦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是《伊利亞特的傳統和構思》（牛津，1930）。

[[68]](#68_3)埃德蒙·威爾遜，《五十年代》，列昂·埃德爾編（紐約，1986），第135頁（檢索詞條1954年1月，20-21）。

[[69]](#69_3)我有一次問他（不知道為什么），他是否喜歡瓦格納。他說：“是的，是的，我喜歡，是的，當我年輕得多的時候，但那不是我現在能聽的東西了。”

[[70]](#70_3)兩篇文章是《醫生生活和他的守護天使》，《紐約客》，1958年11月15日，第201-226頁，和（與芭芭拉·德明、易杰利·雷侯維克）合寫的《〈日瓦戈醫生〉里的傳奇和象征》，《國家》，188第16期（1959年4月18日），第363-373頁，《相遇》，12第6期（1959年6月），第5-16頁；兩篇文章都收入威爾遜的《不服控制：1950-1965年文學編年史》（倫敦，1966）。

[[71]](#71_3)費迪南德·坎寧·斯科特·席勒，《形式邏輯：一個科學的和社會的問題》（倫敦，1912）。

[[72]](#72_3)我想對阿曼達·海特女士、喬治·卡特科夫博士、艾琳·凱利博士、羅賓·米爾納——古蘭德博士、季米特里·奧博連斯基教授、彼得·歐本海默先生、約瑟芬·帕斯捷爾納克夫人、莉迪婭·帕斯捷爾納克——斯賴特夫人、約翰·西蒙斯先生，以及帕特里夏·烏特金夫人表示謝意，他們閱讀了本回憶錄的初稿。從他們的建議中我獲益良多，采納了幾乎所有的意見。當然，對仍然存在的訛誤，全由我一人負責。我從未寫過日記，本回憶錄是根據我現在能回想起來的，或者我過去記得的，以及我在過去三十年或更長時間里，對朋友們提到的一些事情寫出來的。我非常明白，回憶，包括我的回憶，無論如何也不能可靠地作為事實和事件的見證；我引用的談話尤其如此。我只能說，我盡可能準確地記錄了自己所能回想起來的事情。如果有書面或其他證據表明，本回憶錄應該擴充或修正，我將感到欣慰。引自L.A.曼德里基娜《未寫之書：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日記散頁〉》（“Nenapisannaya Kniga：‘Listki iz dnevnika’A.A.Akhmatovoi”）。見Knigi，Arkhivy，Avtografy（莫斯科，1973），第57-76頁；所引文字在該書第75頁。曼德里基娜文章的依據是莫斯科V.I.列寧國家圖書館中A.A.阿赫瑪托娃的檔案材料（檔案號1073，第47-69項），所引文字在第47項第2頁。

[[73]](#73_3)現在稱作“導演”。

[[74]](#74_3)希臘南部的一座山，在希臘神話中，它是太陽神阿波羅和繆斯女神們的圣地。——譯注

[[75]](#75_3)這篇文章寫于1980年。

[[76]](#76_3)不久前他受到斯大林的嚴厲申斥。斯大林看了他的電影《恐怖的伊凡》的第二部分，表示不悅。據說主要是因為沙皇伊凡（斯大林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對號入座了）被刻畫為一位深受困擾的年輕統治者，發現貴族通敵和騷亂后很受驚嚇，為需要采取血腥手段去拯救國家和自己的生命而苦惱，這個經歷使他變得孤獨無依、黑暗專制、猜忌別人達到了神經衰弱的地步，甚至在他正把國家推向輝煌的頂峰的時候。

[[77]](#77_3)很多年后，我就此事問安德烈·馬爾羅，他說他記不起這個演講了。

[[78]](#78_3)謝爾巴科夫后來成為斯大林政治局的實權人物，1945年去世。

[[79]](#79_3)到1956年他才讀過薩特的一兩部戲劇，但還沒有讀過加繆的任何作品，加繆一直作為反動人物和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受到譴責。

[[80]](#80_3)參見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一線希望》，馬克斯·海沃德譯（倫敦，1971），第13頁與第32章。

[[81]](#81_3)阿赫瑪托娃和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據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說）決定，他的遭遇中五分之四是應得的。

[[82]](#82_3)源自《路加福音》2：29-32。——譯注

[[83]](#83_3)在一篇完全不同的文章里也曾出現過同樣的句子。評論家鮑里斯·艾亨鮑姆在《阿赫瑪托娃：分析的經驗》（彼得堡，1923年）一書的第114頁指出，阿赫瑪托娃早期的詩歌雜糅著性欲和宗教的主題。1930年，它被改成諷刺漫畫再次出現在《蘇聯文學百科全書》上一篇針對她的文章里。這就是日丹諾夫這句咒語的出處。

[[84]](#84_3)詳見“附錄”第245-247頁。

[[85]](#85_3)在我之前，她只接待過一個非蘇聯公民，康特·約瑟夫·恰普斯基，一位著名的波蘭評論家，是戰爭期間她在塔什干見的。

[[86]](#86_3)阿曼達·海特，《阿赫瑪托娃傳》（牛津，1976），第146頁。

[[87]](#87_3)《關于1945年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文學和藝術情況的筆記》，藏于公共檔案局F O371/56725。

[[88]](#88_3)見第235頁。

[[89]](#89_3)原文以英文列出詩的題目，并附有俄語的音譯，舉凡二十處。為準確起見，譯者根據俄語翻譯了詩題，并在其后括號內列出了俄語，以“/”分隔，前為俄語音譯，后為相應的俄語原文。——譯注

[[90]](#90_3)卷3由G.P.斯特魯韋、N.A.斯特魯韋和B.A.菲利波夫編輯，1983年在巴黎出版。阿赫瑪托娃詩集的英文全譯本已經出版：《安娜·阿赫瑪托娃詩歌全集》，朱迪斯·赫姆舍梅爾譯，羅伯塔·里德編（薩默維爾，馬薩諸塞，1989[英文版，1992第2版]，1990[英俄對照]）；此版收錄了很多日爾蒙斯基的注釋。編者，1997年。

[[91]](#91_3)原文為意大利語，Cinque，對應的俄語為пять。——譯注

[[92]](#92_3)葡萄牙語，來自拉丁文，指1481年到1850年間舉行的當眾宣讀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判決、隨后由世俗機關執行判決的公眾大會。——譯注

[[93]](#93_3)“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理念》）（1784）：第23頁，第22行，見《康德全集》（伯林，1900-），卷8。

[[94]](#94_3)《象征與現實》，《大學》，德文版，卷19（1964），第817-834頁，見第830頁。